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廖汉生回忆录



廖汉生回忆录

第一章

拿起刀枪跟贺龙

中国革命的道路曲折而漫长。它是无数先驱者经过探索和追求开拓出来的一条历史必由之路，是无数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铺筑而成的一条艰苦奋斗之路。

在这条路上，我走过了60余年的风雨里程。

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能不想起我出生的那个革命风暴迭起的年代，不能不想起用血与火的斗争哺育我成长的故乡热土，不能不想起给了我重大而深刻影响的革命引路人贺龙。

我的少年时代

我的故乡在湖南省桑植县。

同其它革命老根据地一样，桑植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穷，一个是交通不便。因为穷，革命才容易发动，容易得到人民的响应。因为交通不便，工农武装割据才能够实现，革命根据地才能够存在。

桑植位于湘西北的武陵山中，澧水源头，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处。在那个军阀混战、社会动乱的年代，这里地贫路塞，经济落后，官匪豪绅横行肆虐，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里成为一个“有枪则王”的世界，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武装蜂拥而起，自立一方：有称王称霸的军阀，鱼肉乡里的团防，恃强凌弱的财主豪绅，打家劫舍的土匪刀客；也有设坛习武、抗捐抗丁的“神兵”，除暴安良、抑富济贫的“民军”。

在与险恶的自然环境和残暴的统治阶级作长期斗争中，这里的人民不仅形成了吃苦耐劳、淳朴倔强的性格，而且铸造出英勇不屈、敢于斗争的精神。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不畏强暴，不惧艰险，揭竿而起，向恶势力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抗争。特别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在贺龙的影响和带领下，这里的人民建立起一支英勇的红军，先后创造出湘鄂边、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就生长在这样一块地方。

1911年11月14日（农历辛亥年九月廿四日）我出生在桑植县长瑞乡（今樵子湾乡）一个农民家庭。因为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之际，父亲便按照乡间流行的口号“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家天下”，给我起名叫“汉生”。

我的母亲是一位篾匠的女儿，婚后生育了一女三子。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

1986年桑植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给我来函称，根据查证我的民族成分不是汉族，应定为土家族。

我只记得，我家祖上几代都是以土为生的种田人，而且都是单传。从我爷爷那一辈起，为求人丁兴旺、门第转换，就取了一个颇为吉利的班辈排名“芝兰百世昌”。到了我父亲这一辈竟然有了转机。父亲兄弟六人，他最小，排名廖兰湘，字六谦，号茂才。“茂才”是“秀才”的别称。在全家人勤劳

耕作的供养下，他以最优等毕业生的资格从桑植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以后，又去省城长沙读书。

我母亲曾珍藏着一张旧照片，里面站着三排穿长衫的青年，父亲就在其中。母亲还给我指认过一位先生，说他叫林伯渠，和我父亲是朋友。据分析，此照当摄于 1915 年，其时林伯渠受中华革命党总部之命在长沙组织反袁机关，任湖南支部党务科长。由此推测，父亲可能也是一个革命党人或同情者。

我 5 岁那年，父亲从省城长沙回到湘西桑植，致力于乡村教育，在本乡本保办起新学，教授国文，领着学生下体操。唱歌子，在乡里很有些名望。

第二年，我 6 岁，母亲给了我一个竹编的书夹子，父亲背着我走了几里山路把我送入一间私塾。尽管当时已经有了新学，但农家孩子的发蒙，仍要首先借助传统的塾学和孔夫子，既学“人手足刀尺”《国语》识字课本，又背《论语》、《四书》。我在乡下读了四年书，换了四个私塾。

在父母的共同操持下，我的家境渐渐好起来，搬出了山里的老屋场，在平坝子边上的樵子湾起了一座新屋。父亲潜心教书，母亲料理家务，日子虽不富足倒也安宁。然而这种日子只过了三四年就发生了变化。时代的风暴，社会的斗争，贺龙的影响，改变了我家两代人的生活道路。

从樵子湾我家新屋到桑植县城约 20 公里，中间有个村落叫洪家关。村南小河上架着一座瓦屋桥，此桥今名“贺龙桥”。桥北头有一栋木屋，这就是贺龙的家。我从小常常听到有关贺龙造反的故事。

贺龙少年时迫于生计，赶骡子贩盐，奔走在湘鄂川黔边的崇山峻岭中，饱受官匪欺压，阅尽世事不平，立志要“反抗恶势力，为贫苦人打天下！”为此，他加入过清末民间秘密反清团体“哥老会”，18 岁时经桑植留日学生陈图南介绍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6 年农历二月间，贺龙邀集伙伴，手持菜刀，砸了桑植芭茅溪盐税局，夺得几条枪，竖起“讨袁护国”的义旗，拉起一支民军，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成为名震湘西、叱咤风云的“活龙”。

我父亲曾被贺龙邀请从军，但父亲尚文轻武，不屑于舞刀弄枪。他俩虽然都参加过革命党，但是各自的出身、经历和志向却有很大差异：一个是读书人，一个是骡子客；一个要以教育振兴乡里，一个要以武装打翻旧世道。

但是后来，父亲却一改初衷，加入到贺龙军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父亲改变的？我无从考究。但是我想，他是经过自己的反复比较和思索，认定贺龙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毅然投笔从戎，来到贺龙的桑植独立营里任职。我在家中看到过贺龙给我父亲的信封套子上写着“廖营附”、“廖副官”这样的称呼，老百姓则称他“廖师爷”，总之是在贺龙军中做些参谋、书记一类的文墨事。

父亲参加贺龙军后，离开了家，驻在县内时抽空回家看看，走的远了就很长时间不回来。

有一次，贺龙的队伍从我家附近的平坝子过，我和另一个小孩子跑到路边田埂上看“过兵”。

只见一支队伍走过来，队中一个兵的身后背着几根“大令”。这“大令”跟古戏里的令箭一样，我知道它代表着长官，它到哪里就好比长官本人亲自到哪里，查岗查哨，巡视军情，纠察军纪，下级见了都要向“大令”敬礼。

我正看得入神，一位留着“一字胡”的军官来到面前，他就是贺龙。

贺龙笑眯眯地问：“你是谁家的小孩呀？胆子这么大，敢看兵哟！”

当时老百姓是怕兵的，一听说“过兵”唯恐躲避不及，谁还敢看兵呢。

我回答他：“我是廖家的。”

他又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

贺龙夸了我几句，率队向洪家关方向去了。我没料到，这次看兵却看出了一段亲事。

不久以后，我父亲向贺龙请假回家，说要给儿子定亲。

贺龙问：“是不是我见过的那个？”

父亲说：“不是，有人给汉生的弟弟提亲。”

贺龙顺势说：“我也给你做个媒吧。”

“那当然好啦。”父亲答应下来。

这样，贺龙把他二姐贺戊姐的女儿肖良民说给了我。

过端午节时，我跟父亲的护兵王青儿骑着骡子到桑植县城，在贺龙的司令部里住了两天，见了贺龙和大姐贺民英、姐夫谷吉庭，这门亲事就正式订下来。从此我与贺家结下了亲戚关系。

我10岁那年，父亲染上暴病，于农历七月初十病逝在贺龙军中，灵柩由贺民英、各吉庭夫妇派人接回桑植，安葬在我家屋场旁。

父亲去世第二年，在主张新学的姨父阙安仁的劝说下，妈妈让我进了桑植县立高等小学校。入学时考了一篇作文，题目是“说人”。写了些什么，我大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其中一句是：“人有善人，有恶人。”表达出我对社会上各种人的一点朦胧认识。

桑植县立高小是全县唯一的一所高等小学。我因为在乡里读过四年私塾，所以一入学就读高小的课程，开的课有国文、算术、音乐、体育等，第二年还开了英文。澧源镇上还有一所初级小学，收的都是城里的小孩子，他们看不起乡下人，骂我们是“乡巴佬”、“苞谷佬”。我由此也感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我进高小读书的两年间，逢年过节到贺民英、贺戊姐的家里去拜年。她们对我家孤儿寡母尽力照顾。

1924年秋，贺龙北伐返湘，打跑了常澧镇守使唐荣阳，驻防澧州城，不久又当上建国川军第1师师长。1925年初，贺民英派人把我和戊姐的大儿子肖裴然、谷吉庭的侄儿谷化章接到澧州过春节。

节后，贺龙派徐焕然把我们三个小孩子送去常德读书，每人给了100块钱作学费和食宿费。

常德旧称武陵，是当时湘西地区以及沅澧流域的经济文化中心和进出门户。我这个山里伢子能够到常德读书，受益匪浅，不仅长了知识、见了世面，更重要的是接触到了大革命的风潮。

我们进的学校是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我插班上五年级。附小与第二师范学校仅一墙之隔，是二师毕业生实习的地方。二师是湘西地区的最高学府，集纳了30县市的众多英华。五四运动以来，二师的进步师生总是最先接受新思潮，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湘西最早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使二师成为湘西革命运动的发源地。

我入学时，正当大革命兴起之际，二师的学生运动也十分活跃。不久，孙中山先生逝世，围绕着如何看待“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左右两派学生的斗争越演越烈，最终导致了由国民党右派学生挑起的“二师

械斗”事件。

当时我只是听说，左右两派学生在第二师范打架，打死了一个国民党右派学生。共产党和左派学生一部分跑了，一部分被抓，数十人被校方挂牌开除，首当其冲的是麻阳籍学生、共产党员滕代远。

有一天我们附小正在上课，二师一个麻阳籍右派学生闯进教室，带着人来搜捕共产党。

事件发生后，右派学生借此发难，控制了全校，给死了的那个国民党右派学生开追悼会，我们附小学生也被带去参加。

从1925年春到1926年夏，我在二师附小先后读了三个学期。头一个学期正逢贺龙担任澧州镇守使，我放假回来就在他那里住几天。第二个学期贺龙被湖南省长赵恒惕逼出澧州，去了贵州。我的钱用光了，给他写了封信，他寄来30块钱，我才又上了第三个学期。1926年暑假回桑植，我听说贺龙率部参加二次北伐战争，由黔入湘到了常德。我跟贺龙的幺妹戎姑去找他，想继续求学，刚走出桑植县境，又听说他已经从常德出征走远了。我没了学费资助，只好辍学回家。

在常德上学虽然只有一年半，却使我第一次知道了“共产党”，第一次听到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列强！”的口号，对大革命有了一点印象。

为了完成高小学业，我再进桑植高小，学完了最后一个学期。

毕业考试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史”。我的一个堂兄写他有几个哥哥在黄埔军校如何如何，其实一个都没有，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大革命的影响已经传到了偏僻的湘西，黄埔的名声颇为响亮，也很时髦。我在作文中如实地记述了我家孤儿寡母生活的艰难，得到老师的赞许。毕业班60几个学生，我原想进前3名，结果没能如愿，以第5名的成绩通过毕业考试，完成了高小学业。

毕业之后，我无钱继续到外面升学，只好留在家中，一面帮妈妈干活，一面帮在乡里教书的高小同学带学生。

1927年春，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运动波及到湘西山区。桑植县筹备成立农民协会。我们长瑞乡的七八个高小毕业同学，也在乡里搞农民运动。大家推举朱照环领头，他到桑植城里领回一些标语、传单，每逢赶场天，我们跑到樵子湾集上，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杀尽贪官污吏！”

我们闹腾了个把月，还没有取得多少实绩，形势就急剧恶化，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从上海吹到省城，又吹到湘西。桑植县农民运动垮了台，我们长瑞乡的几个学生也散了伙。乡长刘子维仗着手下有十几条枪，来整我们。闹农会时，我们曾对这位乡长大人有点不大“尊重”，那时他也不敢怎么样，由着我们闹，农民运动一垮台，他就扬言要教训我们。结果，领头的朱照环见风使舵，投了团防队，胆小的朱琴材被吓死了，我在家里呆不下去，只好去投奔贺龙的两个姐姐贺民英、贺戊姐。

当时，因受黑暗社会的压迫以及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影响，贺龙的几位亲姊妹贺民英、贺戊姐、贺满姑、贺戎姑也都或多或少的拥有几条枪。我初到她们那里，不过是想走走亲戚，避避风头，没想到却从此投笔从戎，拿起刀枪，走上一条武装反抗旧制度的道路。

工农革命军的创建

1927年秋，一个消息象惊雷爆响，震动了湘西，震动了桑植：“贺龙在南昌暴动啦！”

正当人们惊愕未定之际，又一个消息传来：“南昌暴动垮台啦！”

一时间，桑植县里传言四起：“贺龙在南昌被大炮轰死啦！”“贺龙被蒋介石捉到南京城里，砍了脑壳！”“贺龙被洋鬼子装进洋船，不晓弄到哪里去啦！”总而言之，是说贺龙死了。

就在我们被搅得人心惶惶的时候，桑植县大大小小的坏家伙得意起来，猖狂起来，以为这一回可以横行无忌了。他们都想乘机把贺民英整死，好得人得枪得地盘。整整一个冬天，我们在风雪的侵袭和别人的虎视眈眈下熬过。

转眼到了1928年的春天。

农历二月初九是贺龙生日。几天前有人悄悄送信来，说贺龙就要回来了。

二月初八，贺民英带人赶到洪家关几里外的山垭口去接。这天，贺龙一行化装潜行，回到洪家关。

在贺龙家里，戊姐、满姑、戎姑和我们一些亲戚来见贺龙，远近各村的乡亲们来了，跟随贺龙参加北伐战争、南昌暴动的老部下们来了，桑植四区八乡那些团防老爷、“文武百官”、所有头面人物都来了，连堂堂的县长大人也坐着轿子从20公里外的县城赶来“朝拜”贺龙。那几天，洪家关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贺龙告诉我们：“我现在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中华革命党，我已经是共产党了。南昌暴动是失败了，但是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回来就是组织工农革命军，跟蒋介石这帮坏蛋干到底！”

后来，我逐渐知道，国民党公开背叛革命后，贺龙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利诱威逼，毅然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参加了共产党发动的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而后，贺龙率部经江西瑞金向广东潮汕转战。在瑞金，贺龙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由周恩来主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被打散后，贺龙经香港辗转到了上海，找到党中央。党要派他去苏联学习，他考虑到自己文化低，同时也对起义失败不眼气，就向党提出：“中国字我还认不到几个，恐怕学不好俄文，党要相信我，还是派我回家乡重新搞武装。我就不信搞不赢！”得到中央批准后，贺龙和周逸群、卢冬生等经武汉坐船沿长江而上，在洪湖地区的监利、石首会合了贺锦斋等人，发动年关暴动，搞起一支工农武装，而后又把武装留给当地党组织，回到湘西。

跟贺龙一路回来的共是七个人，除了贺龙还有：

周逸群，北伐时期贺龙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时20军的师长，中共湘西北特委负责人；

贺锦斋，贺龙的堂弟，20军的师长；

李良耀，原是做青年工作的，中共石首县委宣传部长；

卢冬生，公开身份是贺龙的“弃兵”，实际是党中央派来的交通员；

此外还有滕树云、朱炳章。

贺龙在洪家关召集各路“诸侯”举行聚义，号召大家参加工农革命军。

贺民英首先出来响应，把我们这支有40多个人、几十条枪的队伍交给了贺龙，交给了共产党。她对贺龙讲：“带队伍你比我强，但你现在没队伍了，我有队伍，但带队伍不如你。我把人枪都交给你。”此外，她也感觉到，自己一个女人、寡妇当“司令”，带队伍，太累了，流言蜚语也很多，把队伍

交给贺龙就可以安心过日子了。

随后，戊姐、满姑、戎姑几姊妹都把人枪交了出来。贺龙的旧部王炳南、李云卿、钟慎吾、文南甫、谷志龙、邓仁山等也带着队伍来了。一些地方团防刘子维、张东轩等也都慑于贺龙声威归附其麾下。不到20天，在“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下聚集起一支约3000人的队伍。

不久，工农革命军由贺龙、周逸群等率领进占桑植县城，成立了由李良耀任书记的中共桑植县委，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正式编起两个团。

贺龙等人和工农革命军的举动，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立即派兵来攻，主力是贵州军阀龙毓仁旅，桑植团防大队陈策勋、陈佑卿也积极配合。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工农革命军放弃桑植县城，退到洪家关准备迎战。

贺龙对贺民英讲：“你原来带的这一坨坨，什么姐姐、妹妹、外甥呀，过去都是你管的，还是归你吧。”结果又退了几条枪、几个人给她，贺民英几姊妹又都重新带起队伍。

我本想跟着工农革命军走，因为那里人多枪多好打仗，却被贺龙退回贺民英这里来。

刚刚成立不久的工农革命军，素质和组织都很差，初次交火，几千人的队伍一下子就散了。一部分跟着国民党反共了；大部分或回家观望或重立山头，采取“中应”了；仍有一小部分如李云卿、王炳南等继续跟着贺龙干。贺龙等人退到罗峪。周逸群与贺龙失散了，转往鄂西的石首、沙市一带发动武装斗争。我随贺家姊妹也到了罗峪。

在罗峪，贺龙就住在长瑞乡乡长刘子维家里。他与躲到这里来的贺氏族闹了一场“家庭纠纷”，实质上是一场如何对待革命的激烈辩论。

“家庭纠纷”是由贺龙的族叔、贺锦斋的父亲贺兴楼挑起的。贺兴楼在贺氏家族里年高辈长，考过前清秀才，当过几天县长，思想有些保守。他生气地指责贺龙“现在是国民党一统天下，势大力强，你为什么要当红脑壳呢？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程的，当共产党、红脑壳落下个啥？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图的是啥？害得贺氏族跟着你落难而逃！”

在当时的社会，一个师长、军长是很威风的。我记得贺龙当澧州镇守使的时候，每逢出门也曾前呼后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令人敬畏三分。从公馆到俱乐部看戏，没多远，也坐着轿子，身后跟着几十个弃兵。可是他这次回来，却弄得队伍没了，枪也没了，赤手空拳，衣衫褴褛。他图的究竟是什么呢？

乡亲们不理解，家族中有怨言。

贺龙对族叔的那一套陈腐之道十分厌恶，当场吵起来，他火气十足地吼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贺龙革命革走了！”气得族叔浑身直抖，拂袖而去。

贺龙又对在场的亲属们说：“我贺龙找真理，找个好领导，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就是把我脑壳砍了，我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你们看着吧，共产党一定会成功，国民党一定会垮台！”

听了贺龙的回答，贺家姊妹和大多数亲友都表示坚决跟着贺龙干下去。我也从中明白了贺龙为什么当了军长却要跟着共产党搞暴动，为什么失败了还要重新拉队伍再干，为什么不借脱掉将军服穿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这都是为了实现他心中的革命理想。我对贺龙更加敬佩了，跟着贺龙、跟着

共产党干革命的思想更加明确了。

这场“家庭纠纷”后不久，贺龙乘龙毓仁旅撤离桑植，率部驻到樵子湾附近。我母亲叫我提上一只黑母鸡给贺龙送去。

我来到贺龙驻地，他刚刚带人夺了几条枪回来。原来，贺龙打听到号称“黑军”的贵州军阀李孝渊的队伍从桑植过，就带着几个人去“撂尾子”。待大队过去了，只剩下后卫，贺龙、贺锦斋等一齐动手，干掉后卫，夺了枪就跑回来。

我看到贺龙手抚钢枪眉飞色舞的样子，心想：他是当军长的呀，带过上万人枪，今天为了搞枪却要亲自去守路口、撂尾子！

几天后，贺龙重回洪家关，又召集起几百人，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扩大起来。

不久，湘西军阀陈渠珍派一个团和桑植团防陈策勋、陈佑卿部又来进攻洪家关。工农革命军与敌人打了一仗，团长李云卿阵亡在洪家关瓦屋桥对面的山上，队伍损失很大，再次撤到罗峪。长瑞乡乡长刘子维叛变革命，把贺龙从罗峪赶走了。

贺龙带着遭受第二次挫折的队伍退往桑植与湖北鹤峰交界的大山，在那里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了以贺龙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

8月间工农革命军东进石门县，策应当地党组织发动石门暴动，发展、扩大游击战争。

贺龙走了，工农革命军走了，桑植县的反动派疯狂地进行报复。他们说：“贺龙所以还活着是有原因的。一个是洪家关的瓦屋桥把脉气连到贺龙家了，再就是南岔的八角亭和双溪桥的白果树，这三样东西主贺龙。”于是他们烧了瓦屋桥，拆了八角亭，砍了白果树，恨不得贺龙立即死。

贺民英、贺满姑原住罗峪附近，刘子维带着团防来袭击，贺民英的女警卫龚莲香被打死，贺民英受伤，满姑与大姐失散，转往自己的家。

贺戊姐带着女儿肖良民、小儿子肖庆云和我住在樵子湾我家里，没能跟上她们，只好单独活动。

我和肖良民早就由贺龙作媒定了亲。这一年我已经17岁了。按照本地风俗，青年男女虽已订婚，但还没正式结婚，是不能见面的，我们要对付敌人又不能不在一起，因此就在我家里匆匆成了亲。

成亲后住了不到一个月，陈渠珍部下的一连兵驻到樵子湾“清剿”，我们只好到我家老屋场的大山里躲避，天天在山里转，这里住两晚，那里呆两天。有一段时间，白天到一户姓刘的人家吃饭，晚上我和肖良民就在他家屋旁的“天坑”里露宿，所谓“天坑”就是山中天然形成的凹洞。本地有规矩：“宁借屋停丧，不借屋停双”。刚结婚的两口子是不能在别人家里过夜的，我们只能借两床被子睡“天坑”，宿岩洞。

到了寒冬腊月，天越来越冷了，不能总在山里露宿，戊姐带着我们悄悄回到泉峪她家里。

这时，我们听到一个噩耗：满姑被敌人捉住害死了！

满姑与贺民英在罗峪被刘子维打散后，回到自己家重。组队伍。当时她已经是五个孩子的妈妈了，她牵挂孩子，就把最小的三个接到身边。一天她在一个小村子住着，被桃子溪的团防队长张恒如带兵抓到了，连夜解送到桑植城，交给驻军余团长，关进黑牢。

反动派又是发电，又是登报，声称“捕获湘西工农革命军妇女总队长，

贺龙匪首之胞妹贺满姑”，还把抓到满姑和三个小孩子吹嘘成“消灭贺满姑率领之共匪三百余人”。

敌人对满姑一次次地审问，施用各种酷刑。她一次次昏死过去，醒来就痛骂敌人。

满姑生来一副硬脾气，天不怕，地不怕。在几姊妹中她是唯一敢跟大姐顶嘴的。我在鱼鳞寨上曾看到有一次不知因为什么，她和贺民英吵得一塌糊涂，然后拍腿就走。

满姑知道落在敌人手里就别想活着出去了。她请澧源镇上给牢里送饭的一个老婆子，送进几个汤圆来，那里面的馅子不是糖，是鸦片烟。满姑吃了鸦片汤圆，敌人发现了，马上把她拖到城边的校场坪，一刀一刀凌迟致死。

满姑的惨死，激起我们对敌人无比仇恨，也使我更加清楚地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跟共产党走，跟反动派斗。

满姑牺牲5年后，一天红军捉住了抓捕满姑的桃子溪团防队长张恒如，贺龙军长派我和戊姐的儿子肖庆云、满姑的儿子向轩去把张恒如押回军部。我们三人想起满姑的惨死，越想越气，半路上就把他杀了，为满姑报了仇。这是后话。

1928年冬，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兵败，撤回桑植与鹤峰交界的堰垭，住在红土坪的山沟里。贺戊姐叫我跟戎姑的丈夫刘玉阶去给贺龙送些东西，问问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俩来到红土坪，看到工农革命军正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

在石门转战中，军参谋长黄鳌和师长贺锦斋先后战死，许多人牺牲，一些人脱队，上千人的队伍一下子只剩百把人，第三次遭受严重挫折。回到堰垭红土坪，又有两个连长，即当初跟贺龙、周逸群一路回到洪家关组织工农革命军的滕树云、朱炳章，叛变作乱，竟打贺龙的黑枪，被王炳南及时发觉，抓起来枪毙了。我和刘玉阶到驻地时，部队刚刚处理完此事。

部队的的生活很困难。天已经下雪了，大家还穿着破烂的单衣，军长贺龙的脚上套着一双烂草鞋。军部招待我和刘玉阶吃饭，端上来的只有两碗苞谷糊糊。

在红土坪住了几天，贺龙要我回去，把刘玉阶留在队伍里。临走时，贺龙根据满姑惨死的教训，嘱咐我说：“回去告诉戊姐，你们不要单独在一边，还是去找大姐吧，她刚去了王家河的‘嘎嘎’家。”我们湘西把外祖母叫“嘎嘎”。

我回来把话转达给贺戊姐，她带儿子到鹤峰王家河“嘎嘎”家找贺民英去了。

在红土坪，贺龙把百余人的队伍做了整编，疏散了伤病员和家属，遣散了来历不清和动机不纯的分子，全军只剩下91个人、72条枪，建立了党的支部。为了减少敌人注意，对外由王炳南当大队长，打旗号，贺龙则化名“王副官”。

不久，工农革命军相继接到交通员带回的周逸群来信和中央指示信，学习了信中介绍的朱毛红军建军经验和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将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开始创建湘鄂边工农武装割据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参加苏维埃斗争

1929年初，贺龙率领红4军攻下鹤峰县城，宣告成立了湘鄂边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5月红军进入桑植，6月初攻占桑植县城。红4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形成了以桑鹤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

贺民英带着我们从鹤峰回到桑植，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我被派回长瑞乡组织农民协会。

我这是第二次搞农会了。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次我是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有贺龙和红军作靠山。

我向乡里的贫苦农民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宣传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组织成立了乡农民协会。开始农民们不晓什么是苏维埃，还以为是个大人物的名字呢。我按照刚刚学到的一点知识，解释说：苏维埃就是工人、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

不久，我被乡农会推选为代表，到县城参加桑植县农民协会并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

就在筹备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候，传来消息，驻永顺敌军向子云团前来攻打桑植城，苏区军民立即准备迎战。

早几天，向子云先派其团副率一个营进攻，在南岔被歼。向子云不甘心，亲率主力气势汹汹地扑来。

这时，红4军已经编起两个团和一个军部特务营，红1团团团长贺桂如、党代表龙在前，红4团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徐锡如，特务营营长贺沛卿。

老百姓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叫作“1团打胜仗，4团鏢鏢枪”，形象地概括了它们的特点。1团是红军的主力团，比较正规，集中了全军能打响的步枪300余支，红军打胜仗主要靠1团。4团是由鹤峰县那阳关的一支“神兵”队伍和农民武装编成的，士兵多为“神兵”出身，武器主要是梭鏢、大刀，因此又叫“神兵团”。

“神兵”是活跃在湘鄂川黔边地区的一种带有封建宗教色彩的农民武装。其成员大多是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其宗旨是“灭兵灭捐灭税”，其组织以神坛为单位，亦农亦兵。出战前要拜菩萨、念咒语、吞朱砂，身系红腰带，头缠红布帕，刀枪挂红，自信“刀枪不入”，作战十分神勇。“神兵”的封建宗教色彩很浓，有不少队伍控制在地主豪绅或巫婆神汉手里。红军初创时期，以贺龙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对神兵领袖采取分化政策，吸收其下层觉悟的群众，成为党的群众”（1928年9月贺龙给中央的报告）。党组织和红军成功地把鹤峰那阳关以陈连振、陈宗瑜父子为首领的“神兵”，从简单的“灭兵灭捐灭税”引导到打倒封建官僚军阀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上来，而后将这支“神兵”收编为红军特科大队。老百姓不晓什么叫“特科”，就根据谐音叫作“铁壳大队”。后来特科大队扩编为红4团，老百姓仍根据其出身称作“神兵团”。这次与向子云作战，我们县农会也带着农民赤卫队配属红4团。

向子云率部倾巢出动，仗着人多枪好，自以为消灭红军没得问题。他给部下发了许多棕绳子，扬言：“要把红脑壳们一个个捉回来。”同时，他为了消除部下害怕红军“神兵”的心理，又发了许多小孩子打水仗玩的唧筒，里面灌满乌鸡狗血，说：“有了这玩艺儿，撒到那些神兵身上，神法就不灵了。”

针对向下云骄横而愚蠢的特点，贺龙军长摆下一个埋伏阵，把部队拉出

城外，隐蔽起来，又叫红 4 团特意打扮了一番，人人头缠红布帕，梭镖大刀也都挂上红布条。

敌军渡过澧水，逼近城垣，发现是座空城，以为红军被吓跑了，大摇大摆地向城内开进。

突然间，枪声大作。贺桂如率领埋伏在梅家山制高点的红 1 团首先发起攻击，隐蔽在城内的小部队也向敌人袭击。陈宗瑜团长率领红 4 团出现在东门外，头缠红帕的战士们高举着挂红的梭镖大刀，象一条跃动的火龙，沿着东门外 300 多级的石阶昂然直上。

东门楼上的敌人吓慌了，两挺水机关枪一枪没放，撒腿就跑，边跑边喊：“神兵来了！神兵来了！”

敌军人踩马踏，乱成一团。有些胆大的也顾不得打枪了，只是拿出唧筒把乌鸡狗血往红军战士身上喷。我们的战士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吞丹画符的“神兵”了，而是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的神兵”，不管那一套，冲上去就缴枪抓俘虏。

在红 1 团和红 4 团的勇猛攻击下，敌军大部被歼，贺龙军长命令特务营乘胜追击。

向子云带着残兵败将拼命回逃，跑到赤溪渡口时船只早就被红军撑走了。敌人象一群被赶急了的鸭子扑通扑通往河里跳。

那天天气热得很，跟在敌人后面紧追的特务营营长贺沛卿是个胖子，更是热得受不住。他右手提着驳壳枪，左手拿着大蒲扇，一边追一边扇。这事后来被老百姓传得神乎其神，说：“红军神兵团厉害，扇子兵更厉害，一扇子能把几十人扇到河里去！”

敌团长向子云抓住骡子尾巴冒险泅渡，刚到河心，一股急流涌来，把他吞没了。

这一仗，向子云全团覆灭。红军自身的伤亡却微乎其微，只是“神兵团”一些战士的衣服被乌鸡狗血弄脏了。

第二天，桑植城召开庆祝赤溪大捷暨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大会。校场坪上扎起三个台子：一个是农民协会的，一个是苏维埃的，一个是红军的。台下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各乡的代表和县城附近的群众都来了。农民来的尤其多，农民协会那个台子上的人也最多。“苞谷佬”们第一次挺起腰杆，登上台子，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正在开会中间，忽然“轰”的一声，农民协会的台子因为上的人太多，压断了支柱，垮了下来。

当时有的农民就说：“哎呀，不吉利，农民协会长不了，要垮台了。”

人们一时议论纷纷。也有人争辩说：“台子垮了，可以再扎起来，我们农民组织起来，拿起刀枪跟着贺龙闹革命，当红军，垮不了！”

此后，红军迅速扩大到 4000 多人，新设了 1 路、2 路指挥，新编了 2 团、5 团。红军主力向大庸、慈利出击，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运动进一步开展，农会、工会、妇女会、儿童团、赤卫队纷纷建立起来。我每天跟着县苏维埃主席吴天锡、农会主任陈昌厚到各乡去开展工作。

有一次，苏维埃主席吴天锡带着我和 20 来人的赤卫队，到长瑞乡去惩办几个有劣迹的人，其中一个是我的三伯父廖清斋。

我的三伯父是个不务正业的痞子，干过一些欺负人的坏事。一年前贺戊姐到我家老屋场躲避敌军，他借口照顾我们，骗戊姐说：“你把家里的牲口、

东西都给了别人，别人就不会来找你麻烦了。”结果他把戊姐的家产全骗到自己手里，我们却仍要东躲西藏。真是乘人之危，掳人钱财。吴天锡主席带领我们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把我三伯父法办了。

我们返回县城时，又抓了两个兵痞子。吴天锡押着兵痞子走前头，我和赤卫队走后头。

半路上天黑下来，那两个家伙突然拔腿猛跑。

吴天锡在前面边追边喊：“快开枪！”他们三个穿的都是白衣服。不知是谁在后面开了一枪，误把吴天锡打死了。

以后，农会主任陈昌厚把我和他的警卫员贺炳炎带到县苏维埃工作。

红军在慈利、大庸出击，攻打大庸县教子垭团防的一处寨子，打了一个多月没能完全打开，敌军调集大批兵力围攻上来。

9月间，红军主动退出桑植县城。我也回到贺民英队伍上，跟随红军一路转移。

红军退到桑植边界的樟耳坪，遭到敌军重兵袭击。突围时红1团团长贺桂如、红4团团长陈宗瑜不幸中弹牺牲，部队伤亡了几百人，不得不退往鄂西鹤峰等地。

这一年秋天，我已满18岁。

初涉人生的18年，我从我的家庭，从桑植，从湘西，初步认识了中国社会，初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给了我思想的启蒙，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给了我人生的理想，叱咤风云的贺龙更为我树起一个英雄的形象。

他那种敢于反抗恶势力、为贫苦人打天下的宏大气魄，那种追求真理、忠于革命的坚定信念，那种失败了再干、永不服输的倔强性格，那种不图高官厚禄、不惧艰难困苦的斗争精神，都对我产生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使我走上拿起刀枪跟贺龙的革命道路。

我始终是把我的18岁作为参加革命的起点。这不仅是因为我从此长大成人，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从此成为一名红色游击队员，一名苏维埃的战士。

第二章

贺民英游击队

贺民英游击队，是一支没有红军正式番号却又实实在在从事工农武装斗争的革命队伍，是一支没有共产党员却又的确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武装。贺民英游击队多年活动在湘鄂边山区，在红军几度离开、白军频繁“围剿”的情况下，与苏区人民一道苦苦地坚持着，顽强地战斗着，为红军守护着这块得以进退依托的地方。

我在贺民英游击队里经历了湘鄂边的游击生活，这是一种充满着生与死、血与火、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斗的严酷生活。

坚持湘鄂边

1930年春，贺龙领导的湘鄂边红4军奉党的命令从鹤峰东下洪湖，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鄂西红6军会合。

关于这次行动，红4军军长贺龙、党代表恽代英（未到职）共同署名，在鹤峰城里出了告示。

这是我看到贺龙自1928年创建工农革命军以来第一次公开署名出告示。我感到很新鲜，看得特别仔细，记得告示中有这样两句话：

“与我六军会合，直下武汉三镇。”

红军临走时，对坚持湘鄂边苏区的工作做了部署，健全了中心县委和苏维埃，并把一个独立团留下，由贺文渊当团长，还留下原红4团团团长陈宗瑜烈士的父亲陈连振率领的“五路军”和贺民英游击队等游击武装。贺民英带着我们上了桑植与鹤峰交界的大山四门岩。

红军主力东下洪湖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对湘鄂边苏区进行“围剿”。苏区党政军民坚持游击战争，英勇抗击敌军“围剿”。以后敌军撤走，形势有所缓和，贺民英带领我们下山住到鹤峰太平镇东边的洞长湾。

1930年底，红军从洪湖回到鹤峰。这时已经不叫红4军了，改为红2军团。原来这年7月间，贺龙率领红4军与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6军在湖北公安县实现了会师，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创造了规模宏大的洪湖苏区。而后，红2军团奉命配合1、3军团攻打长沙，走到半路上，1、3军团停止打长沙，撤回湘赣苏区，红2军团也撤回来，在石首县杨林市，遭到敌军围攻，部队损失惨重，段德昌带着一部分人回到洪湖，贺龙率主力转往湘鄂边。

就在红2军团刚刚进入鹤峰境内的走马坪时，从川东来了一股二三千人的武装，领头的叫甘占元，在苏区内征粮派款，闹得鸡犬不宁。我们游击队住的太平镇正是甘占元队伍进入鹤峰城的必经之地，贺民英派人先去与甘占元联络，要我送信到走马坪把甘部情况报告给刚到那里的贺龙。红2军团前委根据中心县委及贺民英报告的情况，在走马坪把甘占元的队伍强行收编，处决了几个拒不服从的头子，红军一下子扩大了2000多人枪。

红军这次回来，在党的领导上已经有了“左”的东西。1931年1月湘鄂边特委负责人以“不服从党领导”为名错杀了“5路军”指挥陈连振等人，

撤消了“5路军”番号。正月间，又把一贯支持革命的谷大姐错杀了。谷大姐名叫谷德桃，桑植县人。她和丈夫邓仁山跟贺龙同期搞武装。谷大姐夫妇俩和贺民英、谷吉廷夫妇一样曾参加过哥老会，邓仁山是龙头大爷，谷德桃是风头大姐，也有几杆枪。1928年贺龙组织工农革命军，谷大姐夫妇同情革命，支持贺龙。不久邓仁山被人打死，谷大姐带着人枪到了鹤峰县七郎坪，先后给红军送来物资，收治伤员，照料家属，为革命出了很大力。我到走马坪向贺龙报告甘占元的情况时，贺民英要我首先到谷大姐那里，我在她家住过两晚，没想到一个月后，谷大姐这样一位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竟被以“通敌谋叛”的罪名杀掉了。

1931年春，红2军团奉命二下洪湖，再次离开湘鄂边苏区。红军留下一个独立师，4师师长王炳南当独立师长，陈协平任政委，不久独立师又改为独立团。此外还有一个桑植县游击大队，大队长贺炳南。苏区军民在中共湘鄂边特委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我随贺民英在走马坪送别了红军，重新上了四门岩。

四门岩是桑植与鹤峰交界的一处高山区。我们从1929年底到1933年初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里。开始住的地方叫割耳台。

我们这支队伍，领头的是贺民英，所以人们也管我们叫贺大姐的队伍。副手是徐焕然，他原是贺民英丈夫谷吉廷的弁兵，谷被人害死后就跟着贺民英。其他成员大多是贺家亲属旧部，有：徐焕然的弟弟徐武生，我和我的妻子肖良良，贺龙北伐时的弁兵唐小洋，贺龙的二姐贺戊姐、幺妹贺戎姑，贺龙三妹的女儿谷大妹，满姑的么儿子向轩，戊姐的么儿子肖庆云，以及做饭洗衣的田么姐、张月圆和雷连生、向连生、王化正、刘烈璜等十多名战士，男女老少共有二三十人。这样一支小队伍，要在敌人“围剿”中坚持下去，很不容易。在贺民英的带领下，我们不论大人小孩，能拿枪都拿起枪，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边打仗，一边生产。砍掉山岩上的树丛茅草，用火烧过，开出几块岩壳田，种上苞谷、南瓜，还养了猪，喂了鸡。由于肖庆云、谷大妹、向轩等都是未成年的小孩子，贺民英说他们不能光跟着一道舞刀弄枪，还要学点文化，就给他们请了一位教书先生谷波如，以后又叫我来当教书先生，教他们认字、唱歌子。

1931年和1932年国民党反动政府调集大军对全国各个苏区发动了第三、第四次“围剿”。在湘鄂边，敌军开始是南来北不来，北来南不来。尔后两省敌军举行联合“会剿”，苏区各地相继被敌人占领，鹤峰县城也几次落入敌手，斗争越来越残酷，越来越艰苦。

我们在四门岩山区，敌人拿我们没办法。大队人马上不来；小股敌军爬上来，我们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湖南敌军从南边来了，我们就跑到鹤峰一边；湖北敌军从北边上来了，我们又跑到桑植一边，从这座山头跑到那座山头，跟敌人来回转圈子。

我们这里有吃有住，能打能藏。在情况紧张时，湘鄂边特委和苏维埃的人员也上了四门岩，敌人退走了，他们就下山回到鹤峰城，情况紧张了再上来。红军伤病员和一些家属也时常到我们这里来休养、躲避，特委委员、桑植县委书记杨英就在割耳台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在山上始终同党组织和苏维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贺民英有时亲自去，有时派我代她去，找特委书记周小康，找鹤峰县委书记兼苏维埃副主席郭天明，找农会特派员、我在常德二师附小读书时的级任教员刘植吾，找独

立团团王炳南、经理处主任谷容年，主动接受他们的领导，互相通些消息，互相给予帮助。

1932年6月，就在敌军“围剿”日益疯狂的时候，苏区内部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由贺炳南率领的桑植县游击大队发生叛乱，贺沛卿、王湘泉也裹在其中。

贺炳南是桑植洪家关人，当过工农革命军大队长、红4军游击司令，后因违犯纪律被撤了职，他带着一些人枪回到桑植搞武装，红军二下洪湖时任命他为桑植县游击大队长。

贺沛卿是桑植罗峪人，贺龙北伐时的一个排长，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家。贺龙回洪家关聚义时，贺沛卿有两杆枪，他和妹夫王湘泉各背一杆，手下还有几个人，参加了工农革命军，以后一直跟到贺龙身边，从特务连长当到营长、团长。赤溪河大捷歼灭向子云部，贺沛卿被传为“一蒲扇就把敌人扇下河”的神奇人物。红2军团驻在走马坪时，他和王湘泉俩请假回桑植探家。红军走后，我随贺民英从走马坪回割耳台，半路碰上他俩急急忙忙去赶队，后来他俩没赶上又返回来，到了桑植县游击大队。

贺炳南与贺沛卿、王湘泉都在红军里战斗了多年，很能打仗，贺沛卿、王湘泉还加入了共产党，他们对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建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在离开红军主力后，贺炳南等与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桑植县委书记杨英发生了分歧，特委、县委不信任他们，他们也不服从特委、县委的指挥。桑植县游击大队与在鹤峰县活动的湘鄂边独立团也发生了矛盾。开始这两支武装的关系不错，有了敌情互相通报，互相配合。后来有一次，游击大队要求独立团配合，独立团因为有战斗没能赶上，贺炳南等便对独立团怨恨在心，当独立团受湖北这边敌军压迫退入桑植向游击大队借粮借弹时，贺炳南等挟嫌报复，拒绝支援，独立团数战不利，站不住脚，不得不退出鹤峰。贺炳南等又借口特委不信任他们，要缴他们的枪，竟然进行叛乱，叫喊着所谓“反共不反贺”的口号，打死了桑植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杨英、县委委员李少栋，接着闯上四门岩特委驻地，提了贺龙派给蹇先任的警卫员朱绍田的枪，打死了独立团经理处长谷容年，特委书记周小康因外出得以幸免。事件发生后，特委会合了独立团，转往洪湖找红军主力去了。这个事件是贺炳南的主谋，贺沛卿、王湘泉也跟着一起干了。

贺炳南等人的叛乱是一起十分严重的事件。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借口，实际上是走上一条以武力对抗党的领导、毁灭革命的道路，给湘鄂边苏区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也使自己走向了毁灭。叛乱之后，贺炳南把桑植游击大队拖到方头山上自立山头，结果被国民党团防包围，消灭了，贺炳南死后被砍了脑壳，提到桑植城示众。贺沛卿、王湘泉带着十几个人死里逃生，爬上四门岩躲藏起来，不再有什么大的活动。

山中岁月

1932年下半年，湘鄂边苏区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敌人到处烧屋，到处屠杀，对苏区人民进行血腥的报复、镇压。特委巡视员麦先为、农会特派员刘植吾等一批干部被敌人杀害，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远走洪湖，桑植游击大队被消灭，整个湘鄂边只剩下几支零星的游击武装。但是，苏区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敌人全部占领了苏区城镇、大道后，又上了四门岩山区“清剿”，我们的驻地割耳台也遭到团防袭击，敌人搜去了埋藏的粮食，毁掉了正待收割的庄稼。于是，我们把一部分妇女孩子送下山去。我这时已经有了一女一子，女儿2岁，儿子1岁，带着打游击很不方便。我写信要我妈妈来，把妻子、两个孩子和谷大妹接回桑植我家去。

我们从割耳台转移，钻入四门岩山区更高更密的深山老林里，千层壳、梯子岭、鸡公嘴，从这些小地名上就可以推知其地势的险恶、陡峭。这里是人烟绝迹的原始森林，林深草密，不见天日，没有人家，只有狼虫虎豹、狗熊猴子出没其间。我们原有两匹马，用来驮东西和病号，把马放进林子里吃草时竟被老虎咬死了。

山下到处是敌人，严密封锁，频频搜山，扬言要把我们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我们则要坚持下去。我们坚信：红军一定要回来的，贺龙一定要回来的！就是死在山上，也绝不向敌人屈服。当然，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敌人整死的。

冬天到了，大雪封住了山路，敌人的搜捕仍不见缓和，山上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贺民英带我下山去摸情况，找粮食。山下村子里正住着敌军，我们进不了村，摸到靠山根的一户独立人家，主人家姓朱。他悄悄找来附近几户群众，有的捧来几颗鸡蛋，有的抱来两个老南瓜，还有的揣来一壶黄米酒。临上山时，主人家又送了一罐黄豆。

回山的时候，我们不敢走山路，怕雪地上留下脚印使敌人会追踪而来，只能沿着流淌山水的水沟走，赤着的双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又被冰水冻僵了。遇到沟边枝丫横生的地方，直不起身子，我们就在冰雪上爬行。

我们带回山上的一罐黄豆，成了大家的救命粮，由徐焕然的弟弟徐武生负责保管。每天用铁锅煮上一点，大家围坐四周，贺民英郑重地宣布：吃的时候，只许“骑马”，不许“抬轿”。所谓“骑马”，就是用筷子立着夹，这样一次只能夹上一二颗豆子；所谓“抬轿”，就是用筷子平着抄，那样会多抄上几颗。

黄豆吃完了，我们就四处捡野果，挖野菜。

猕猴桃、羊桃子等野果，我们可吃了不少。蕨葛根根里面含淀粉，既是一种药材，又是老百姓的度荒食品，我们把它挖来当饭吃。总之，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吃遍了。

我们长年在山上爬，林里钻，鞋子磨坏了就扯把茅草打草鞋，衣服挂烂了自己想办法补。

冬天的寒夜是最难熬的。我们无铺无盖，饥寒交加，捡来干树枝，用火镰打击火石，引燃火绒，烧起一小堆篝火，围坐着取暖，胸前背后轮转着烤，真正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有一首山歌唱的就是这种游击生活的情形：

吃的洋芋果（土豆），
烤的转转火（篝火），
盖的黄丝被（稻草），
背的爪子火（土枪）。

就这样，我们食野果，饮山泉，宿岩洞，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从黑夜熬到白昼，从夏天熬到冬天，苦苦地坚持着，没有一个人动摇，没有一个人屈服。不管再苦再难，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坚持下去，坚持到红军重返湘鄂边。

常言道：“人须苦中练，刀须石上磨。”此话不无道理。这一段艰苦生活，磨练了我的筋骨，也磨练了我的意志，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解放后，我读到陈毅同志描述游击生活的《赣南游击词》，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湘鄂边的山中岁月。

红军回来了

1933年初，农历腊月间，敌军“围剿”有些松懈了。

贺民英把我和刘烈璜叫到跟前，说：“我们这样在山上紧呆着也不行，还是要出去找一找出路。你俩个下山看看，找点粮食。”

我和刘烈璜翻过几座大山，走了百多里山路，一路走一路打听，听说茅坝坪来了一支队伍，有的说是贵州的“黑军”，有的说是贺龙的红军。我两个商量了一下，不管是黑军、红军，总要弄个明白，就向茅坝坪走。走到与割耳台对门的大山上，再下去就是茅坝坪了，半山腰有户人家，我们与这一带的乡亲们都很熟，就再去问情况。

主人家说：“山下住的是红军，有的说是王炳南带的独立团回来了，有的说是贺龙亲自回来了，究竟住的是哪一个，也说不大清楚。”

我对刘烈璜说：“不管是贺龙还是王炳南，反正俩个都认识，下去看看。”

我两个下山走到茅坝坪的村子边上，突然被几个持枪的人拦住了，原来已经到警戒线上。我们一问，果然是红军。

哨兵把我们带进村里的连部，连长问明了我们的身份，告诉说，他们是红3军第8师的一个连哨。

红3军这个番号我没听说过，就问他：“是不是贺龙的队伍？”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又问：“8师师长是谁？”

连长告诉我：“师长是朱胜文，师政委是谷志标。”我一听，这两个人都熟啊！我请连长马上派人把我们带到师部去。

朱胜文在红军东下洪湖前还只是贺龙的一个警卫员，现在当了师长啦。

谷志标是桑植洪家关人，和我是高小同校不同级的同学，比我高一级，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1929年进了红军学校参谋训练班，出来后在军部当参谋，现在也当了师政委。

我们赶到8师师部，谷志标没在，到刚刚打开的鹤峰城里去了，只见到了师长朱胜文。朱胜文招待我们在师部吃了顿饭，我请他派人把我俩送到军部去。

临走时，我又找他要驳壳枪子弹。我说：“好啊，你现在当师长啦，人多枪多啦，给我两把子弹吧？”

朱胜文尽管当了师长，可他自己乃至整个红军的子弹也很少呀，但他还是慷慨地给了我两把驳壳枪子弹。

我和刘烈璜赶到军部，见到了日夜盼望的贺龙军长。这天他正在害病，一个名叫贺彪的医生给他看病，旁边还有一位个子不高、身材瘦瘦的人，贺龙告诉我，这是红3军政委关向应。

自从 1931 年春在走马坪送别了贺龙和红军，已经两年了。今日再见，我万分激动。我见他正在害病，就问：“怎么样啊？”

贺龙病也不看了，关切地说：“我没得关系。快说说大姐和大家都还安全吧，现在怎么样？”

我回答说：“大家都还安全，现住在山上。”接着，我把红军走后所发生的一切作了报告。

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听完，说：“这样吧，你俩个先回去，把大姐他们接出来。”

送我们出门时，贺龙又讲道：“再告诉大姐，叫大姐派人无论如何要把贺沛卿、王湘泉俩个找回来。”

我和刘烈璜当天又匆匆赶回山上，把贺龙率领红军回来的喜讯告诉贺民英。几天后，贺民英带着大家走出深山密林，到茅坝坪与红军团聚了。

出山的同时，贺民英按照贺龙说的，派人找到了贺沛卿、王湘泉。他们带着十几个人回到红军驻地。不久，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决定，把贺沛卿、王湘泉处死了。罪名嘛，他俩是“叛徒”。

红军这次回来也很苦。规模宏大的洪湖苏区丢掉了，原来 3 万余人的红 2 军团已经缩编为 8000 来人的红 3 军，途经鄂豫陕川边兜了个大圈子，才辗转回到湘鄂边。

红军回来，首先打开了鹤峰城，恢复了苏维埃政权，而后在茅坝坪开会决定：以鹤峰为依托，攻取桑植，恢复湘鄂边苏区。因此，我们到茅坝坪没几天，红军就出发去打桑植。贺龙要贺民英游击队继续留在鹤峰，当然用不着再回到山上去了。

好不容易盼回了红军，又要分手，我们有好多话还没来得及说呢。贺民英郑重地向贺龙、关向应提出：“我跟着共产党干也有这么多年啦，我要加入共产党！”

关向应政委回答她：“大姐，你有你的关系，你有你的影响，留在外面，活动起来更方便些。”

听到这番话，贺民英没再说什么。

我也有我的想法。我那时年少气盛，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就当着贺龙、贺民英、贺戊姐的面说：

“朱胜文原来跟我差不多，现在人家都当师长啦，我还是个游击队员。我不干了，我要跟红军走！”

贺民英不同意，贺戊姐也不愿让我走。我不听，埋怨她们：“以前都是你们拉着我，要不我早就在红军里了。这次不行，我一定要走！”

贺戊姐被我闹得没办法，呜呜地哭了起来。

看到这个情景，贺龙劝我说：“汉生，你还是不要走了，留下来吧。”

贺龙发了活，贺戊姐也把我哭软了，我只好同意。

为了满足我的好胜心，贺民英“提拔”了我一下，叫我担任游击队的文书，掌管她的名章。那个章子是金子铸的，有指甲盖那么大，每次要用时先由我根据她的口述写张便条，再盖上章子，这样就算是游击队的公文了。

红军向桑植进发后，我们住到鹤峰太平镇洞长湾徐焕然的家里。大家心想，红军有这么多人枪，拿下桑植城肯定没得问题。结果过了半个来月，一直得不到什么消息。已经到年根了，贺民英、贺戊姐两姊妹着急起来，都想

回桑植老家去。

贺民英把我和刘烈璜找去，说：“我想回桑植看看去，老家已经多年没回去啦，我要回去，看看老家，看看老朋友。”

是啊，从1929年随红军退出桑植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桑鹤交界的大山里打游击，一直没有回过家。在四门岩，我妈妈把肖良良母子三人接回家，也不知她们现在怎么样了？

我和刘烈璜一人背着一支驳壳枪又上路了。刘烈璜的妈妈在前边给我俩个探路，作掩护。我们从四门岩翻过五道水的大山，进入桑植县境，整整走了两天，到了樵子湾我的家。第三天到泉峪贺戊姐的家，戎姑正在那里。住了一晚，我和刘烈璜直奔桑植县城。

我俩走到离城不远的钱行岭，已经可以望见城西渡口了，发现情况好象不大对头。钱行岭本是出城一条要道，古时出远门的人就在这个岭上钱行告别，现代虽然不钱行了但进出县城人来人往仍很多，可是这天却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

我俩下岭又向前走了一段，碰到几个匆匆赶路的老百姓，他们讲：“红军昨天晚上已经出城走了，现在周矮子的队伍正在进城。”周矮子是湘西军阀陈渠珍的一个旅长，名叫周燮卿。

我俩又折回来，走到泉峪时，红军就驻在泉峪的山上宿营，于是放心地在戊姐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红军又走了。我和刘烈璜随后又紧紧追赶，顺路把戎姑、我的妻子孩子一起带上。

途经鸭儿池时，有几个人提着大刀、麻袋要干掉我们，下我们的枪。我们打了几枪，吓跑了那几个人，而后紧追红军，追到叫“一碗水”的地方终于追上了红军后卫侦察队。宿营后，我们见到了贺龙。在军部的村旁住了一晚，贺龙叫我们先回鹤峰去。过了春节，红军也返回鹤峰。

血洒洞长湾

红3军在桑植没站住脚回来后，在鹤峰、巴东、建始、恩施、宣恩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恢复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建立赤卫队、游击队，并在鹤峰走马坪与卢冬生率领的独立师会合，而后将全军缩编为7、9两个师。

3月间，敌军一度攻占了鹤峰城，红3军退到太平镇。我随贺民英到了军部。从几年来的游击生活中，贺民英和我们都深深感到：象过去那样孤零零地活动，力量太小了，只有紧紧地与党和红军靠在一起才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因此，我再一次提出要跟红军走。贺民英则向7师政委、负责湘鄂边游击队工作的陈培荫第二次提出入党要求。

陈培荫也象关向应政委一样对贺民英解释说：“大姐，你够条件，但是根据你过去的情况还是暂时留在党外好，”

离开军部时，贺龙、关向应对贺民英讲：“根据过去你们在湘鄂边坚持的情况，大姐你这个队伍还可以扩大些。”他们叫军部拨给我们几支步枪和一些子弹，说：“你们还是回洞长湾去，扩大武装，把附近村子里的贫苦农民都组织起来，成立赤卫队。”

这次见面之后，红军主力又去别处活动了，我们仍留在洞长湾。贺民英按贺关说的，集中了太平镇附近村子的一些贫苦农民，发了枪，成立了赤卫队，实行联防，分散务农，集中练兵。

5月，敌周矮子（周燮卿，旅长）、朱疤子（朱际凯，团长）率部围攻鹤峰城，各地团防乘势进攻游击队、赤卫队，太平镇一带的团防覃福斋也蠢蠢欲动。

这时正值插秧时节，各村的赤卫队员们白天要各回各家插秧，晚上再集中起来驻防。几天下来，大家都感到非常疲劳，就连苦了一辈子的贺民英也觉得有些吃不消了。

于是，她对大家讲：“这样太累啦。你们把秧插完再来，晚上就各回各家休息吧。”

这样，她只留下十来个人，分住在洞长湾的两户人家。

洞长湾周围是山，中间几块水田。一条小沟将两栋木屋隔开。沟西一户姓向的人家，住着贺民英、徐焕然、向轩、谷大妹、徐焕然的老父亲徐方刚、儿子徐立礼、唐老么兄弟俩、刘烈璜、张志道等。沟东面是农会委员许璜生家，住着贺戊姐、贺戎姑、我和妻子及两个孩子、肖庆云，还有一个在我们这里养病的红军团长向刚。两处屋场相距不到百米。

这天晚上大家太累了，只派了唐老么一个哨兵。

第二天拂晓，突然一声枪响，把我们从熟睡中惊醒。

原来就在夜里，我住的这家主人、农会委员许璜生叛变投敌，向团防覃福斋密告了游击队的情况，引着百多人的团防大队来偷袭。敌人从山背后摸下来，分两路靠近两处屋场。放哨的唐老么发现了，他刚要报警，就被敌人打死了。

我们听到枪响，摸到枪就往外打。红军团长向刚跳起来，背起我的女儿春莲，喊了声：“我喊赤卫队去啦！”他第一个冲出去，上了屋后的山坡。

我冲着屋里的人喊：“你们快走！”而后提着驳壳枪冲出去。天还是黑黑的，也不知敌人来了多少，到处是枪口进出的火光。我打了几枪，看到其他人都跑出来了，就绕到屋后上了山。后来才知道，贺戊姐患哮喘、肖良良抱着儿子跑不动，落在后面被敌人捉住了。

与此同时，沟西也打起来。贺民英提枪冲出门，被一颗子弹把右腿打断了，她跪在门边向敌人还击。7岁的向轩爬到她身边，要拽她起来，贺民英把手枪塞给他说：“快走，找大舅去，报仇！”徐焕然冲过来背上贺民英要走，肩膀上中了一枪，背不动了，只好把她放下，就在这时又一颗子弹打中了贺民英的肚子，把她打死了。徐焕然只好自己冲出去。向轩人小却很机灵，钻到地板下面，敌人冲进屋后没有发现他。

我们冲出来的人在山上跟敌人对射着，向刚带着从太平镇召集的赤卫队赶来，敌人匆匆退去。

太阳出来了，枪声平息了。我们来到屋场上，只见贺民英倒在屋门边，贺戊姐被敌人退走时枪杀在水田里，敌人还抓走了我的妻子肖良良和2岁的儿子。与贺民英、贺戊姐同时遇难的还有唐老么、张志道和徐焕然的父亲徐方刚，受伤的有徐焕然、向轩、谷大妹。一片片殷红的血迹洒满了洞长湾。

眼前的惨景，使每个人都不禁痛哭失声。今后怎么办呢，大家商量了一下，由我给贺龙写了封信，派人送到住在麻水的红3军军部。我们把贺民英、贺戊姐两姊妹和其他死难兄弟埋在洞长湾的山脚下。贺龙接到信后，派了警卫员朱绍田来。大家搀扶着受伤的人，跟着朱绍田，翻过山到了麻水。

在军部，我们向贺龙哭诉了所发生的一切。贺龙听后难过得许久不出声，看得出，他为一夜间就失去大姐、二姐而悲痛万分。过了好一阵，贺龙问徐

焕然和我：“大姐她们牺牲啦，你们打算怎么办？还干不干？”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干，横直革命到底！为她们报仇！”徐焕然也是这么回答。

“好！”贺龙说：“你们回去招人，搞枪，把游击队重新建立起来，同那帮坏家伙干到底！”

他指着徐焕然说：“我任命你为鹤峰县游击第4大队大队长。”又指着我说，“你为副大队长。”

徐焕然和我当即接受了任命。贺龙又说“你们先养养伤。”我们在军部休养了几天，把贺戎姑、谷大妹、向轩、肖庆云留下来，就准备回去。临走时，贺龙又给了我们一批枪。

我们重返太平镇，集合起各村寨的赤卫队员，在烈士牺牲的地方，继续同敌人战斗。我们游击大队在太平镇一带同团防队打了两仗，牺牲了两名战士，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不久，我调到红3军军部工作，游击大队编入红7师21团，大队长徐焕然当了21团副团长，在龙山县茨岩塘的战斗中牺牲，徐焕然的弟弟徐武生在长征时当了4师供给部长，病逝在贵州黔西县。

贺家姊妹

几十年来，围绕着贺民英几姊妹的生前与身后，各种各样的说法不一，尤其对贺民英更是众说纷坛。

在苏区老百姓的口碑中，她是贺龙红军的“女司令”，驰骋湘鄂西的“女赤卫队长”。

在白区国民党报纸上和桑鹤“剿匪临时指挥”陈策勋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以及叛徒罗钩关于“湘西共产党组织及其阴谋计划”的供词里，她是“带约二三百人，连枪居多”、“女扮男装”的“女共匪”。

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打成“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土匪婆”。

今天，贺民英又被人们称颂为传奇般的女英烈。

这些说法，有誉有毁，有褒有贬，既有从不同立场出发得出的不同结论，也有对不同侧面的不同认识。

对于贺民英及其姊妹，究竟怎么看？我觉的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她们，评价她们。

我个人对贺家姊妹是比较熟悉的。除去小时候的接触不算，从1927年秋投奔贺民英，直到1933年春亲手把贺民英、贺戎姐安葬，我在她们的身边生活、战斗了七个年头，应该说对她们的了解是比较多的。

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贺家姊妹，我的概括的看法是：两个阶段，五条贡献。

纵观贺家姊妹的一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反抗恶势力。

贺家姊妹出身贫苦，母亲体弱多病，很早就病死了，家里兄弟姊妹七个，生活相当艰难。她们从小就参加了家务劳动和生产劳动。由于不满反动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双重压迫，她们结婚后就协助自己的丈夫搞武装，反抗恶势力。以后贺民英、贺戎姐又自己带队伍，贺戎姐因体弱多病跟着大姐的队伍，贺三妹、贺戎姑则和丈夫一起带队伍。贺民英是大姐，最早帮助操持家务，侍奉父母，教养弟妹，担起生活的重担，磨练出描龙绣凤的巧手和吃苦耐劳的

品格。20岁时她与表兄谷吉廷成了亲，协助丈夫进行反对满清的斗争，夫妇双双参加了反清团体哥老会，分别被推举为“龙头大爷”和“风头大姐”。在他们的影响下，贺龙也加入哥老会，拉队伍，搞武装，以后因谷吉廷年纪大些，思想也保守一些，与贺龙有了分歧，各干各的。谷吉廷一度接受常澧镇守使唐荣阳的委任，当上支队司令，不久就被唐荣阳用武力提了枪，谷吉廷和贺民英逃回家乡，在杜家山的鱼鳞寨重整旗鼓，与官府豪绅作对。湘西军阀陈渠珍指使部下余连长，也是谷吉廷的旧友，在洪家关摆下“鸿门宴”，把谷吉廷整死了，随谷赴宴的弁兵只有徐焕然一人带枪冲了出来，跑回鱼鳞寨。亲人的惨死，使贺民英看到，在这个官匪横行、虎狼当道的世界上，要想不受欺辱、不被宰割地活下去，只有拿起刀枪。丈夫生前拉起的队伍，一些人散去了，一些人留下来，拥戴贺民英带领着大家继续干。为了生存，为了报仇，贺民英没有别的路可走，她接过丈夫的队伍，在鱼鳞寨上竖起“打富济贫”的旗帜。在这一阶段，贺家姊妹由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转变成旧世界的造反者。她们的目标还不高，是要生存，要反抗。她们的队伍也不大，多以亲戚、朋友和丈夫的旧部为主。她们的反抗，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发性、盲目性、狭隘性。在她们的身上既表现出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同时也沾染上一些江湖习气，象贺民英还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毛病，这都是由她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自身的经历所决定的。但是，主流是反抗恶势力。

后一个阶段，投身工农革命。

在大革命及其以后的年代，贺家姊妹受到工农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受到贺龙的直接影响。贺龙北伐到武汉，就写信叫贺民英去。她从桑植出发，一路走，一路看，沿途各地工农运动如火如荼，显示出翻天覆地的力量。她在汉口住了几个月，形势起了变化，国民党右派露出仇视工农运动的嘴脸，武汉国民革命政府的一些人也开始动摇，贺民英从贺龙那里要了一批枪，又筹款买了一些枪弹，返回家乡。她回桑植后，不仅带回了武器，也带回了新思想。从此，她把个人的抗争同工农革命联系在一起。关于贺民英的武汉之行，贺龙在1962年11月的一次谈话中告诉我：“贺民英的思想变化是从农民运动中受到启发。以后，又受了我的影响，有革命的英雄主义思想”。“在汉口时，她就告诉我，你靠那些国民党左派靠不住”，贺民英也对我谈过与武汉之行有关的一件事。那是她从汉口回来经过长沙时，遇见在省城读书并从事革命活动的桑植籍学生、共产党员朱孔华。应朱的要求，贺民英给了他一笔钱，作为费用。不久，朱孔华在常德惨遭枪杀，贺民英对他的死深感惋惜和愤慨。

她们的思想有了新的转变，眼界开阔了，目标也提高了，积极投身到工农革命中去。她们从同情到赞同共产党的主张，从支持到参加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斗争。她们自己也从传统的农民造反者转变成接受了新思想的革命参加者。这个阶段，是贺家姊妹一生中最光彩、最重要的阶段。

贺家姊妹从1928年洪家关“聚义”时起，为党和红军做了许多事情。我看，起码有这样五件事，或者说是五条贡献。

第一条，1928年贺龙、周逸群等受党中央派遣回洪家关组织工农革命军，贺家姊妹把自己的队伍连人带枪都交给了贺龙，交给了党，成为工农革命军的重要来源之一。后来只是由于斗争的需要，贺龙又退了一部分人枪给她们。她们这么做不光是出于对贺龙的姊妹情，如果对革命一点印象都没有，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我记得贺民英最先把自己的队伍交出来时，曾对贺龙讲：“带队伍你比我强，但你没队伍；我有队伍，但带队伍不如你。我把人枪都交给你。”贺民英所以能够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一种“龙胜于英”的思想。她从多年的斗争生活中，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带队伍，搞武装，贺龙比她强，当了共产党的贺龙就比她更强。这种“龙胜于英”的思想，反映出她对贺龙的认识和支持，对革命的认识和支持。

第二条，在工农革命军几起几落的困难时期，贺家姊妹给了力所能及的支援。1928年底，贺龙率部从石门转战回来，贺民英、贺戊姐相继派人送去了东西，贺民英还对贺龙谈了自己的建议。

对这件事，贺龙在1962年向我谈道：“我们队伍从石门失败回来，大姐问，你们有好多CP、好多CY？还说队伍就是要伍，要整顿，要多流动，才能强大。她给队伍送来棉衣，解决大问题。”

第三条，在红军主力东下洪湖以后，贺民英、贺戊姐、贺戎姑上了四门岩的大山，坚持反“围剿”斗争，并且招待、掩护了一些红军伤病员和党与苏维埃的干部。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相继撤走后，她们仍然在山上坚持，一直坚持到红军主力回来。

第四条，贺家姊妹的队伍虽然没有正式的游击队番号，队伍里面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但是她们是坚决跟着贺龙、跟着党的，她们的队伍是党影响下、领导下的游击武装。贺民英本人曾先后两次提出过入党要求，尽管她到死也没能入党，但那不是她本人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组织上认为她在党外更方便些。后来我到红3军工作又了解到另一个原因，就是湘鄂边苏区和红3军的党组织都被左倾路线给解散了，贺民英自然不可能再入党。

第五条，贺家姊妹是为革命而死的。贺民英、贺戊姐是在同一天、同一地点被敌人枪弹打死的，贺满姑是被敌人抓去后一刀一刀刺死的，贺戎姑在丈夫刘玉阶当红军营长牺牲后，病逝在最困难的1934年。

在湘鄂边反“围剿”的艰苦岁月里，我目睹了贺家姊妹对党的无私奉献，对革命的坚贞不渝，对敌人的绝不屈服。斯人已去，风范永存留。我永远怀念她们。

第三章

调入红三军

我是在红军处在最困难的时期调入红3军的。那个时期，红军一方面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一方面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严重破坏。这种复杂而严酷的斗争，对于我们党和红军无疑是巨大的灾难，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磨炼，给我上了终身难忘的一课。

毁灭的边缘 1933年农历闰五月的一天，红3军军部率9师从鹤峰太平镇过，在镇上住了一晚。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把我从鹤峰县游击第4大队调到军部当书记（相当于文书）。

过去我曾三番五次要跟贺龙到红军主力部队去，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如愿。今天终于实现了，自然欣喜万分。

但是这种喜悦之情，很快就被我在红3军中耳闻目睹的许多怪现象驱散了。

我到太平镇的当天，看到军部特务班里押着三个人，当即叫我吃了一惊！这三个被关押的人，有两个我认识。

一个是谷志标。我的这个同乡加同学几个月前还在任8师政治委员，8师撤销后他改任军政治部政务科长（相当于现在的保卫科长），搞了几天“肃反”，有人说他这个政务科长也是个反革命“改组派”，把他捆起来。

另一个是贺炳炎。他原是湖北松滋县的一个小铁匠，跟父亲一块当红军。1929年红军打开桑植城后，贺炳炎给县农会主任陈昌厚当警卫员，我也在农会工作，他16岁，我18岁，少年易熟，我俩认识了。以后贺炳炎到军部手枪大队当班长、队长，当过几个团的团长。部队到鹤峰后，他父亲在战斗中牺牲了，他本人也负了伤。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被怀疑是“改组派”同伙。他得到信跑到山上，想了一整天，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革命队伍，又回来了，一进门就被抓起来。

第三个人我不认识，听说叫宋盘铭，原是留苏学生，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当过少共湘鄂西省委书记，后来是9师政委，因为不满“肃反”扩大化而被说成是“改组派”，撤了职，关了起来。

看到谷志标、贺炳炎他们成了这个样子，我原想去打招呼，可又听说，他们要是看你一眼，说上一句话，被别人看到了，恐怕连你也抓起来。

就在这天晚上，谷志标被押往鹤峰城去枪毙。我们吃晚饭的时候，贺龙知道谷志标不见了，急忙派人追到鹤峰县城，不准杀，这才保下一条命。

我不晓得谷志标、贺炳炎、宋盘铭三个犯了什么大罪要捆要杀？只听说是“改组派”。究竟什么叫“改组派”？我在许多年后才搞明白，所谓“改组派”指的是由陈公博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是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向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个小团体。随着汪派得到了几个职位，这个小团体于1931年宣布解散了。叫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么个短命的东西，却在1932年被左倾路线搬到共产党里来了。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中革军委分会主席夏曦在湘鄂西苏区推行左倾路线，搞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大抓“改组派”，冤杀了几千人，使洪湖苏区的反“围剿”失败，红3军不得不退出洪湖转往湘鄂边。在数千公

里行军中，夏曦又搞了第二次“肃反”，走一路杀一路，回到湘鄂边，又接连搞了第三、第四次“肃反”。凡是反对这种搞法的人，工作中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以及战斗失利、工作失误、违犯纪律的人，统统被说成是反革命“改组派”。对被抓起来的人，大搞逼供信，再据此进行更大范围的“肃反”。夏曦等人甚至进行了极端荒谬的推理：

上一级是“改组派”，受其领导的下一级也必然是；军事指挥员是“改组派”，与其搭档的政治委员也必然是；首长是“改组派”，在其身边的警卫员也必然是；书记、主席是“改组派”，其党委、苏维埃的成员则统统是。

他们抓“改组派”抓昏了头。二人相遇，在茅房里说句话即有“兄弟团”嫌疑；同乡相聚，买些花生来吃即以“好吃会”之名杀掉。

在这位夏主席住鹤峰城的那一段时间，城外每天都有被杀者的尸体十几具。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干部就这样蒙冤而死。

我到红3军军部之前，段德昌、王炳南等一些我熟悉和敬仰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刚刚被杀掉。

段德昌是与贺龙、周逸群齐名的红2军团和洪湖苏区创始人，红2军团第6军军长、红3军9师师长。他战功卓著，深得洪湖人民爱戴。在湘鄂边，他因要求带人打回洪湖去，被诬为“右倾”、“企图拖枪逃跑”，杀死在鹤峰与巴东交界的金果坪。段德昌在“公审”会上作最后的陈言道：“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不要忘记去救洪湖苏区人民！”

王炳南从贺龙当营长时就跟着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潮汕兵败后，他回桑植搞起一支队伍，参加了洪家关聚义，当过工农革命军第一路指挥、红2军团的师长、湘鄂边独立团团团长、红3军9师参谋长，是湘鄂边赫赫有名的人物。由于湘鄂边特委、苏维埃、独立团都成了“改组派”，他也成了“同党”，被杀死在鹤峰的麻水。王炳南死后，他还有两个儿子在红军里，也被抓起来，先杀了二儿子、团长王宜林，又要杀大儿子、连长王盛林，被贺龙看到，发了火，才留下一条根。

在鹤峰期间，先后被杀的师级干部还有7师师长叶光吉、师政委盛联均等，团级干部只剩了贺炳炎一个，营连干部被杀的也不少，湘鄂边特委、县委和各级苏维埃干部除了被敌人杀害的，其余统统被自己人搞光了。

对那些被认为“改组派”情节较轻的基层指战员，不便全杀，即处以开除，逐出红军。尽管被开除者发誓忠于革命、勇敢作战，甚至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却始终得不到允许，只得洒泪离去。当时四面皆敌，有家不能回，有队不能归，走投无路，有的人仍悄悄跟着队伍后面走，死也要死在红军里；有的人四处逃亡，流浪他乡；也有少数人投到正跟红军对阵的敌新3旅、保安团里，常在两军阵前历述个人境遇，指名呼降，对我军士气影响颇大。

这样搞来搞去，“改组派”越抓越多，以至上上下下、军内军外无处不有“改组派”。这位夏主席不思反省，相反却得出一个结论：“改组派”已经完全把持了党团组织，必须予以解散。在湘鄂西分局会议上，夏曦不顾贺龙等同志的坚决反对，强行作出决定：“将地方上、红3军中、游击队中各级党的委员、支部干事会，一律解散，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

我到军部工作时，大规模的“肃反”高潮刚刚过去，但“肃反”本身仍未结束，捕人杀人的事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肃反”扩大化带来的恶果正在充分显露出来。

当时，党团组织解散了，全军只剩下四个党员，即：中央分局书记兼军

委分会主席夏曦、军长贺龙、军政治委员关向应、7师师长卢冬生。由于卢冬生最初是党中央派到贺龙部队的交通员，党员关系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夏曦无权取消他的党籍，但他不是湘鄂西分局成员，有时列席一下会议，没有表决权，在红3军只能算有一半党员关系。因此红3军有“三个半党员”之说。在党团组织解散的同时，红三军的各级政治机关也被撤销，政治干部关的关、杀的杀，只剩下关向应的军政治委员一职，政治工作制度随之瓦解。这样，就使红3军失去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政治工作的有力保证。同时由于无线电台已经丢失，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红3军在政治上陷入一种盲目迷惘的境地。

这支红军部队在全盛时期曾达到过3万之众，退出洪湖后锐减至9000余人，重返湘鄂边的短短几个月里又一次大量减员，“肃反”杀掉的，作战牺牲的，离队逃亡的，使全军只剩下3000来人，行军时从队头可以看到队尾。

“肃反”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军中充满恐怖气象，指战员情绪低沉，看不到一个笑脸。以往红军最拿手的扩红工作如今也不灵了，指战员对扩兵的积极性不高，因为介绍了熟人来，出了问题一个倒霉一个受连累，苏区群众看到“肃反”搞的那样凶，也不愿来了。过去一直是人比枪多的红军出现了枪多于人的怪现象。红3军缩编为7、9两师，每师各辖三个团，团以下取消了营的建制，每团只有三四个连，其中还有一个是“自首连”，其成员均是“改组派”“自首”而未杀的营、连、排干部。行军时，叫“自首连”抬担架、背粮食；打仗时，发枪下来，要他们去冲杀；缴到武器弹药，却要送给其他连。他们虽然身如囚犯，随时有被处决的可能，作战却特别勇敢，对革命矢志不渝。但是，在“肃反”领导者看来，“反革命分子其所以坚决勇敢的战斗，表现对革命的忠贞，正是因为他们企图更有力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在是荒谬得很，可悲得很。

由于内部的“肃反”扩大化和外部的敌军“围剿”，红3军在湘鄂边虽然先后占领鹤峰、桑植县城，却不能象以往那样重整旗鼓，甚至难于立足。1933年7月，敌军相继攻占鹤峰县城和分局、军部驻地麻水，红3军转至鹤峰、宣恩交界的烧巴岩，在那里开会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贺龙、关向应率领军部和9师前往宣恩、咸丰、利川一带开辟新区，一路由夏曦带7师留在鹤峰。不久7师也退出鹤峰，湘鄂西苏区最后一块根据地从此丢掉了。

此时此刻的红3军已经被搞到了濒临毁灭的绝境。

逆境中入党

7月底，红3军军部率9师踏着崎岖的山路向宣恩进发。

我在队列中张望了一下行军序列：军部前后是师长汤福林带领的9师部队，紧跟着前卫的是贺龙军长和关向应政委，他们身后是我和警卫班，我们后边是特务班，特务班里押解着几名“政治犯”，再后边是所谓军机关，其实司令部、政治部已经撤消了，只有几个参谋和一个管理科，管理科成员都是当作“改组派”罢了官的连、营、团干部。

我们这支不足2000人的队伍，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游动着。由于暂时摆脱了夏曦的左倾领导，贺关开始在军部和9师纠正过去的错误。

贺龙从“肃反”一开始就不同意左倾领导人搞的那一套，但他是个党性极强的人，他从遵从党的领导出发，不愿也不能过多地反对中央分局书记、

军委分会主席的决定。在“肃反”中他自己的处境也很困难，夏曦曾逼着要他写什么“自白书”。当他看到身边的老战友、老部下被当作“改组派”一个一个地杀掉了，历尽艰险积聚起来的革命力量一步一步地被搞垮了，他感到再也不能沉默了，便愤起抗争。

贺龙军长曾对解散党团组织的人质问道：“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后才加入。红军是党领导的，怎么能把党解散呢？”但仍挡不住夏曦的一意孤行。

贺龙军长亲自出面担保，救下了一批批被捆起来准备杀掉的同志，仍挡不住更多的人被杀掉。

在率领军部和9师活动的日子里，贺龙想起党和红军的损失就痛心，焦急，苦恼。

一天行军路上，他突然犯病，肚子痛得满地打滚，贺彪、杨云阶医生来给他看病，我跟警卫班守在他的身边。

他伤心地对大家说：“我没能完成党交给的巩固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任务，反而失掉了根据地，减弱了红军，成了党的罪人。看来我不行了，不能赎罪了……”

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听到军长引咎自责的这番话，无不伤心落泪。

贺龙病好后，征得关政委同意，先后释放了谷志标、贺炳炎和宋盘铭。他调谷志标当了军部参谋，调贺炳炎到管理科当了管理员，对宋盘铭他无权安排什么工作，但我常看到贺龙、关向应跟宋盘铭一起行军、吃饭、睡觉，空闲时还一起下棋、谈天，亲密无间。

关向应政委是在1932年由中央派到湘鄂西苏区来的。在实际工作中，他逐渐看清了夏曦的错误，应贺龙的请求，以军政治委员的身份出面保下了一些干部。“肃反”高潮一过，他又着手恢复被解散的党团组织。我就是在关政委的培养和教导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干部。

关政委首先在军部恢复了第一个党的支部，接着又开始发展新党员。

我到红3军刚刚一个多月，由于没有受过“肃反”扩大化的牵连，可以说是一身清白，另外也由于红3军有文化的干部如留苏生、黄埔生基本上都杀掉了，我是高小毕业生，能认得几个字，在军部当书记，因此贺关把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选中了我。

农历七月的一天，部队来到建始县某镇子。军部住进一幢门字形的二层木楼，在警卫班的房间里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讨论我的入党问题。参加会的有：支部书记、警卫班班长朱绍田，特务队队长常德善，警卫员王立中和几个战士党员，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关向应政委。另一位介绍人贺龙军长因下部队去了没有到会。我作为发展对象列席参加支部会。

支部书记朱绍田宣布会议开始后，关政委首先代表贺龙和他本人简要介绍我的情况。

他说：“廖汉生过去一直在贺大姐的队伍上，长期坚持湘鄂边游击战争，大姐牺牲后他当游击第4大队副大队长，我们把他调来军部当书记。他的表现大家都清楚，有文化，工作积极，经受过艰苦奋斗的考验。现在党和红军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我们急需这样的同志参加党，因此我和贺龙同志介绍廖汉生入党。”

关政委做完介绍，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马上就通过了。从这一天起，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讨论完我的入党问题，关向应政委对我，也是对全体党员进行了党的任务的教育。他着重讲解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我们当前开展的土地革命战争，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封建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将来，我们还要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对关政委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论述，我没怎么听懂。对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我听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尽管当时我们只有那么点人，那么点枪，连一块立足安身的根据地也没有，但是我们却敢于喊出这样的口号，我们坚信一定能够实现这样的理想。

我是在红3军处于濒临毁灭的逆境中入党的，当一名共产党员是我多年追求的理想。我第一次听到“共产党”的名字是在常德第二师范学校附小读书时。我接触的第一个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的人，是我从小就敬佩的英雄——贺龙，他那种“就是把我脑壳砍了，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的决心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以后，我又从贺民英两次申请入党中，看到了她对共产党的向往；从周逸群、关向应这些党的工作者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形象。这些年来，大革命的风暴、工农武装斗争的烽火、苏维埃的工作、游击战争的岁月，使我对党的认识，从领头造反的“红脑壳”逐步上升到为天下劳苦人民求解放的先锋队。我决心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辈子！流血牺牲，在所不惜！

我入党后就跟在关向应政委身边学做党的工作。关政委象谆谆善诱的先生一样地教导我，培养我。他给我详细解释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手把手地教我怎么样填写党员登记表，亲自带着我去做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当时叫做“重新登记党”。

10月间，部队在利川县小河镇驻扎。关向应政委亲自到连队登记党员，他把我也带上了。我们到的第一个连队是9师25团第2连。

关政委在该连召集军人大会，讲了一番话：“同志们，我们还是要建立党的。红军不能没有党！过去我们的党组织部解散了，党员都不作数了，现在要重新登记。同志们哪个是党员的，可以出来报名！”

关政委慷慨激昂他讲了一大堆话，我提起笔准备登记，会场上的反应却非常冷淡，大家都用惊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闷不作声。看得出，他们还以为关政委带我是来抓“改组派”呢，搞得我们很尴尬。

看到没人出来报名，关政委又按事先摸到的党员姓名，一个一个地点名。点到谁，谁都不肯承认。

后来点到一个战士，关政委问他：“朱长清，你是不是党员？”

那个战士站起来报告：“我是共产党员！”

我在给他登记时了解到，朱长清原来是个脚夫，也就是码头工人，在长江码头上给人挑脚，不甘压迫当了红军，入了党。

这次重新登记党员，朱长清是唯一的一个。后来，由于他是全军第一个登记的连队战士党员，又因为他的出身是纯正的无产阶级，他一直当到湘鄂川黔省苏维埃副主席，另一个副主席是夏曦，主席是贺龙。在省苏维埃的所有布告上，朱长清与贺龙、夏曦赫然齐名。

继9师25团第2连登记党员之后，关政委又带我去过9师其它几个连队。7、9两师会合后，首先在7师特务连登记了该连司务长黄新远。在关政委的主持下，全军各单位先后登记了一批党团员，我也通过关政委的言传身教初

步学到了一些党务工作的知识和方法。

处决熊贡卿

1933年8月到12月，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率军部和9师先后进出宣恩、建始、咸丰、利川、来凤等地，一面与敌军周旋，一面打土豪，筹粮款，组织游击武装。在宣恩收编了一支神兵，编为红3军第4特科大队，人称“铁壳4大队”。红军人数略有增加，但仍然只能在各县边上游来游去。与此同时，夏曦带领7师没能坚持住鹤峰地区，转往五峰、松滋、澧县、石门和桑植、龙山游击。退出鹤峰时，夏曦不相信群众，“怕游击队不巩固，枪支反武装了团防”，遂将各路游击队编入主力带走。我原来所在的鹤峰游击第4大队编入7师21团，徐焕然担任了副团长，不久牺牲在龙山县茨岩塘的战斗中。

12月间，7、9两师会合于鹤峰与宣恩交界的石灰窑，而后转至咸丰县大村。湘鄂西中央分局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苏区的意图，改向川东南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一带发展，创造新的根据地。

12月22日拂晓，红3军从湖北咸丰县洗龙坪出发，奔袭川东南的黔江县城。那一天，部队行军百里，连打三仗。先在黔江大路坝消灭守敌，而后在中坝击溃敌人，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黔江城外的山上，把守敌打垮，天黑时进入黔江城。

在打开黔江城的第二天，夏曦下令把已被贺关释放的原9师政委宋盘铭重新捆了起来，拉到城外。就在进城前打垮敌人的那座山头上，夏曦主持召开9师的审判大会，宣布了宋盘铭的所谓“罪恶”，把他枪杀了。我亲眼目睹了这幕惨剧，对夏曦的作法极为不解：贺关已经把宋盘铭放了嘛，怎么夏主席一回来又把他杀了呢？

红3军在黔江驻了一个星期，敌军反扑过来，夏曦害怕了，命令退入湖北利川。

老苏区没能恢复，新苏区又建立不起来，红3军毫无根据地可言，天天在走路，天天在减员，伤员无处休养，弹药没法补充。四顾茫茫群山，处处烽火硝烟，竟没有我们的一块立足之地。

就在这时候，亲任全国“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把眼睛盯向了红3军。他一面调集重兵加紧“围剿”，一面派来说客企图“招安”。

腊月初，有一位施南（今恩施）来客到了利川县小河镇的红3军军部，求见贺龙。此人名叫梁素佛，是先来取联络的，带来了熊贡卿以昔年好友名义写给贺龙的一封信。熊贡卿在贺龙任渣州镇守使时有过一面之交，他在信中要求前来拜访、叙旧，并称愿意帮助贺龙摆脱困境。

贺龙一眼就看穿了熊贡卿的用意，这是替蒋介石作“说客”，招降、策反来了。他气得两眼冒火，恨不得一刀把那个取联络的梁素佛劈了。但他克制住冲动，把信交给了关向应政委。

湘鄂西中央分局开会分析了熊贡卿的来信，同意贺龙的看法，为了摸清外界情况和“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4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决定以贺龙名义复信熊贡卿，允许他来红3军。

几天后，梁素佛引着熊贡卿一路回来了。熊贡卿摆出蒋介石代表的架子，带着礼品，坐着轿子，身后还跟着护兵。贺龙按照分局会议的决定，出面接

待了他，而后红3军转入湘西龙山县茨岩塘休整了半月。在这半月里，贺龙向熊贡卿进行了多次询问，得知蒋介石以为贺龙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只要一面以重兵“剿”之，一面以高官“抚”之，就可以“招降”贺龙。贺龙还从熊贡卿口中探知敌人已经派了四个人到红4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也派进了人，这些人都是去搞上层收买的，企图打入红军领导机关，破坏红军。

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湘鄂西分局决定处决熊贡卿。一天凌晨，红3军准备从茨岩塘向桑植出发。贺龙军长命令我同一名警卫员去逮捕熊贡卿。

熊贡卿住在军部旁边的一座屋里，他的那些护兵住在远离军部的特务队驻地，早已被严密控制起来了。我受领任务后，带上警卫班班长张伢，闯进熊贡卿的屋里，他还在酣然大睡。

我上前一把扯开他的被子，厉声喝道：“起来！”

熊贡卿从睡梦中惊醒，莫名其妙地问：“你们干什么？”

“逮捕你！”

他坐起来，惊慌地说：“你们误会了吧？我是贺军长的客人。”

“快起来，少废话！”我用枪指着，命令道。

“你们抓人，贺军长知道不知道？”他还是赖在床上不动。

“我们就是奉贺军长命令来的。”

“啊！”熊贡卿绝望地叫了一声，吓瘫了。

我们提起他的小皮箱，把他押到特务队。

在茨岩塘去桑植的路上，有一个山垭口，待命出发的部队集合在这里举行公判大会。

贺龙军长站到一块突出的岩石上，迎着凛冽的山风，高声宣布：

“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极大的污辱。同时他又是个奸细，我们绝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

贺龙越说声越大，他把手臂猛力一挥，使我们感到有一股披荆斩棘的力量。

部队群情激昂，高呼口号：

“不怕一切困难，坚决革命到底！”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接着，贺龙军长命令9师25团团长刘开绪执法。一声枪响，结束了熊贡卿这个反动说客的可耻一生，也对蒋介石的“劝降”阴谋作出了有力的回答。

处决熊贡卿，深深地教育了在场的红军指战员。我们从中看到了贺龙军长对党和革命的耿耿丹心，敌我分明、疾恶如仇的革命立场，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坚定意志，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

随着一声出发令下，我们迈着坚定的步子，踏着崎岖的山路，跟着贺龙军长向桑植挺进。

熊贡卿死了，蒋介石败了！这是铁打钢铸的历史事实。但是在30余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忠良成了“叛臣”，功绩成了“罪恶”。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旧事重提，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处决熊贡卿说成是什么“通敌”、“请求收编”，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搞投敌叛变”，企图从历史上来打倒贺龙。

贺龙拍案而起，怒斥道：“撞鬼哟！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脏，完全是

栽脏！”

专案组的人也曾找到我，因为我在军部当书记，他们说熊贡卿是贺龙派我具体联络的，要我交代什么“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逮捕熊贡卿，是贺龙派我去的；处决熊贡卿，是红3军3000多名指战员有目共睹的，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也是白纸黑字，有案可查。在这个问题上贺龙无懈可击，功不可没。历史不容篡改，我据实写出了我所经历的全部过程。

流动游击

1933年过去了，1934年开始了。红3军仍在湘鄂川黔边界上四处流动，四处游击。

蒋介石“劝降”不成，督令大军进行更加严密的“围剿”，各地团防也日益猖獗，伺机袭扰红军，残害红军家属和群众。

春节之前，红3军由桑植向慈利游动，从离樵子湾只1公里的地方过。我和在军部当警卫员的肖庆云向贺龙军长提出，顺路拐回家看看。

自从贺民英游击队在洞长湾遭袭击、肖良良母子被抓走，我们还一直没有见到她们。听说，我妈妈拿钱请人把她们母子赎了出来，不晓现在怎么样了。

贺龙军长也一直惦记着她们，他对我们说：“你俩回去看看良良吧，队伍今晚宿营在洪家关的杜家山，明天出发，早点回来。”

我和肖庆云急匆匆地赶到家，见到了我妈妈、肖良良和女儿、儿子及弟弟、弟媳，全家人团聚一堂，诉说别后的经历，一起吃顿晚饭，也算是提前过个年吧。

正在吃晚饭的时候，一个叫伍于盛的人进门来。伍于盛是个痞子，1929年桑植县苏维埃主席吴天锡带我到长瑞乡惩办我三伯父等三个有劣迹的人，其中就有他一个，他当时跑了，没打到。这次他到我家来，是受樵子湾团防朱照环之托打探我回来的消息。

我看出他的来意，不动声色地招呼他一起吃饭。他顺势坐下来，一边吃一边向我打听这，打听那。

这时，门外又来了四个人，是军部警卫班的四名战士。他们告诉我，部队宿营后，7师师长卢冬生到了军部。卢师长看到你不在，就问军长：“廖汉生哪去啦？”军长告诉他：“廖汉生跟肖庆云俩个请假回家了。”卢师长说：“那怎么行？7师有一次从樵子湾过，团防朱照环都敢在后面撂尾子，他俩个回去怎么行？要再派几个人去。”这样，军部又派了四个人来。

饭未吃完，那个打探消息的伍于盛坐不住了，匆忙告辞而去。当晚10时左右，伍家峪的我姑表兄伍象高和原军部裁缝匆匆跑来，报信给我：“朱照环知道你跟肖庆云回来了，要来打你，提你俩的枪。”

我谢过他们，对我妈妈说：“不怕他。我们又多了四个人、四条枪，朱照环他要打就打吧。我估计他今晚不会来，要来也是明天早上天将亮时来。”

报信的伍象高和裁缝走了。我又对妈妈说：“朱照环是专来打我的，你们都不要在家睡了，到别人家躲一躲，过了今晚就没事了。”

交代完，我带着肖庆云和四个警卫员到肖庆云的另一个姐姐家住了一

晚，第二天一早赶回军部。

我刚到军部，紧跟着又得到消息说，我们离家后，肖良良带着孩子躲出去了，我妈妈不愿走，弟弟、弟媳也留下来陪她。天还没亮，朱照环带着团防队来了，围住我家屋子就打，弟媳跑出来被当成肖良良给打死了，弟弟打破屋后的板壁跑了，我妈妈倒还没事。

我一听就火了，怒冲冲地要求返回去报仇。贺龙军长当时没在屋，我找到关向应政委，大吼大叫道：“给我一个连，我要回去报仇！朱照环毁了我的家，我也不叫他好过！”

关政委没有给我人，也不同意我回去，而是很严肃地对我说：“队伍马上要出发，你不能回去。”

我勉强压住一肚子火，带着对家人的忧虑，跟着队伍走了。

现在看起来，当时我那些话也不怎么对头，只想到个人的复仇。

红3军在慈利等地游击了一阵，于4月间转到湖北利川县十字路。湘鄂西分局总结了前一段流动游击的情况，决定再次进军川东南的西秀黔彭，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

5月8日，红3军打开乌江边上的彭水县城，发布了《告湘鄂川黔人民书》，准备继续向西阳、秀山、黔江发展。但是夏曦提出：“彭水背山面水，易攻难守，敌人打来难以应付。”下令撤出彭水，转向黔东游击。

在彭水驻扎时，军部驻的天主堂里有一个美国神甫，叫史密斯。他曾听到过国民党污蔑红军“杀人放火”的造谣，害怕把他当作帝国主义分子杀掉。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向他反复解释红军的政策，才使他平静下来。部队退出彭水时，为了解决经费困难，带走了史密斯，叫人转告国民党地方官员拿十万块大洋来赎。

6月1日，红3军攻占贵州沿河县城。沿河城跨在乌江两岸，更不利于防守，红3军于次日退出。4日进驻四川西阳县的南腰界，而后再入黔东印江县，6月19日到达沿河县枫香溪（今属德江县）。

在这一个来月里，军部一直带着史密斯行军，不但不捆他，贺龙还常常跟他下棋、谈天，请他给红军治病、照相，他也乐于帮忙。这样一直走到了沿河县的枫香溪，史密斯乘看守他的小战士不注意，跑掉了。我们也没有再追他，找不到就算了。只是史密斯一跑，那十万块大洋也飞了。从那以后，我们就给负责看守史密斯的小战士起了个浑名，叫他“十万块”。

事隔40年后，贺龙的夫人薛明告诉我一个意外的消息，红3军在彭水捉到的那个外国神甫史密斯，派他的儿子从美国远渡重洋飞到中国，拜访贺龙的家人，转达他对贺龙和红军的钦佩之情。看来，史密斯还是很怀念他跟红3军相处的那一段日子呢。

这是发生在流动游击中的一个小插曲。

从1933年夏红3军7、9两师相继退出鹤峰，到1934年6月抵达沿河枫香溪，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红3军在湘鄂川黔边来回转战，虽然先后攻占过黔江、利川、彭水、沿河等数座县城，却始终未能冲破敌军的“围剿”，未能建立起一块根据地，陷于盲目的流动游击状态，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极度困苦。

然而是什么力量驱使我们顽强奋斗，没有在左倾路线的重压下和敌人的重兵“围剿”中垮掉呢？我想，主要有三条：

第一，经过几年的土地革命斗争，党的影响已经深深地扎根于革命队伍

之中。当时，大家尽管对左倾路线的各种行为感到困惑、迷惘、苦闷、压抑，但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从来没有怀疑、动摇过，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我们不甘心，也不相信红军会就此散伙，革命会就此垮台？

第二，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从工农革命军到红3军，历经几起几落，屡遭挫折，但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不论受到多大的损失，最后都能够挺过来。

第三，依仗贺龙军长的威望维系着军心、人心。这一条在我们这支红军里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是抱着“拿起刀枪跟贺龙”的初衷来当红军的，在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被完全取消的情况下，在身受冤屈的境遇中，我们认定只要贺龙没垮台，这支红军就垮不了！

当然，只靠这么几条是不够的。要想使红军和苏区有一个大恢复、大发展，就必须彻底纠正左倾错误路线。

黔东再起

湘鄂西苏区的全部丧失，红3军的惨重损失，使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再也不能这么下去了！根据地必须建立，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必须恢复，群众必须发动起来！夏曦此时已经被一连串的挫折搞得没了主意，同意了贺关的意见。

这样，红3军首先恢复了军政治部。

政治部共6人。主任是中央分局书记、军委分会主席夏曦兼。我是秘书。一个组织干事，湖北沔阳人，洪湖时期参加红军的。一个宣传干事，叫周林，四川石柱人，原是地下党员，红3军在石柱时参加红军。两个政务干事（即现在的保卫干事）是7师特务队司务长黄新远和9师25团2连战士朱长清，他俩个出身好，一个是长工，一个是脚夫，又都是所在师第一个重新登记的党员，所以当政务干事。军政治部就这样恢复起来了。

7月13日，红3军进驻沿河县枫香溪的当天下午，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在军部住的一座地主宅院里，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当晚，又在军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我作为军政治部秘书参加了会。

关向应政委向我们传达了分局会议决定精神：

- 一、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
- 二、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
- 三、派一批干部去做地方工作。

枫香溪会议，揭开了红3军历史上新的一页。

会议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项工作需要大批干部来实施，而各级政治干部几乎都被当作“改组派”杀光了。因此当务之急是培训出一批政治干部。

我们军政治部把全军前一段重新登记的党团员干部约100来人，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干部大队，在枫香溪进行学习。我和政治部干事既负责组织又参加学习。

干部大队以学政治为主，兼学军事。政治主要是学习《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红军的纪律》等小册子，学习怎么样做政治工作、党团工作、群众工作，怎么样组织苏维埃、农民协会、游击队，怎么样打土豪、分土地等。军事主要是学习一些基本技术、战术。经过一个来月的学习，干部大队在枫香溪的一片树林子里召开了毕业典礼大会。夏曦、关向应在会上讲了话，要

求大家回去以后努力把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恢复起来。

干部大队的学员毕业后进行了分配。一部分充实到军政治部。当时说“要建立黔东根据地，地方工作很重要”，于是就在政治部里面首先建立了一个地方工作部，黄新远当部长。其他大部分人到7、9两师去当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和组织成立师宣传队。我由军政治部秘书调到7师任党务委员会书记，又叫“师委书记”。7师没有政委，因为7师领导力量强一些，师长卢冬生是老资格，入党也早。9师师长钟炳然不是党员，领导力量弱一些，所以在1933年冬调警卫营政委朱绍田到9师当政委。这样，大体上红3军每个连有了指导员，每个团有了政委，师一级也有了政委或师委书记，组织了宣传队，加上经过充实的军政治部和军师两级党务委员会，从上至下恢复了政治干部队伍和政治工作制度。尽管还很不健全，很不完善，但毕竟有了一个雏形。

我到7师当师委书记后，在卢冬生师长的领导下，恢复党团组织，继续登记党团员。过去是党员的予以登记，不是党员的团一级干部发展为党员，连队的干部战士暂时没来得及发展。由于党员人数还很少，没有以连为单位恢复党组织，而是先在各团成立党支部，我时常到团里参加支部会议。

我入党后一直跟着关政委做登记党员的工作，现在担任了师委书记亲自干，碰到的困难仍然很多。

7师有个基层军事指挥员，打仗杀敌非常勇敢，入过党，也被抓过“改组派”。我们动员他重新登记，说：“你过去打仗多么好呀！”

“过去？”他立即伸出双手，让我们看他手腕子上被棕绳子捆出的深深的沟痕，作为回答。以后他仍然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却坚持不入党，直到抗日战争中经过贺关再三解释才恢复了党籍。

师部有一个重新登记的优秀青年团员干部，卢冬生和我动员他加入党，他不相信我们的话，跑去问关向应政委：“我可不可以入党？还抓不抓我的‘改组派’？”直到关政委当面向他保证，他才同意我们介绍他入党。

党员登记中的思想顾虑，主要是来自对大抓“改组派”的恐怖情绪。这些同志不是对革命有什么二心了，而是对参加党害怕了，或者说是“心有余悸”。由于“肃反”扩大化捆杀的大多是党员，是干部，人们认为党员、干部等于“改组派”，“改组派”等于杀头，我不是党员，就抓不了我的“改组派”，也就杀不了我的头。人们不是一般的怕杀头，当红军还不是照样要被反动派杀头吗？是怕被莫名其妙地当作反革命杀头。因此当时人皆不愿当干部，不愿入党，老党员则不愿承认自己是党员而重新登记。

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指战员不敢参加共产党，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不肯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悲剧！由此可见，左倾路线把我们党的形象和威望毁坏成了什么样子！

尽管困难不少，我们仍然耐心而细致地做着恢复党团组织的工作。那一段时间，我每天背着一个装满党员登记表的皮挎包到处跑，一个一个地动员、解释，一个一个地登记、发展。

全军政治工作人员经过一番努力，成效显著，重新登记和新发展的党团员逐渐多起来。到9月份，全军党团员总数达到436人，其中党员267人、团员196人，大部分是重新登记的，新加入的也有数十人。

在军内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的同时，红3军在黔东的沿河、德江、印江、松桃和川东南的酉阳、秀山等地开展了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初到

这里时，群众不了解我们，纷纷跑兵，躲进山林岩洞。经过喊话宣传和严守纪律的感召，群众看出这是一支真正为贫苦人谋利益的队伍，纷纷走出来。红军宣传队、地方工作队深入到村寨摸清情况，而后召集群众大会斗争土豪，把没收的不义之财分给贫苦农民。开始许多人不敢要，怕土豪报复，我们这些新干部也不晓该怎么搞。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就亲自出马，带领我们在夜晚背着苞谷、衣物、银元送上门去。主人家不敢开门，贺龙教我们把东西靠在门上而后离去，主人家打开门，东西倒进门里，他悄悄收起来，土豪也不会知道了。我们就这样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了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

为了保卫根据地、扩大工农武装，红3军抽调一批军事干部到各地帮助群众组织游击队。贺炳炎带着管理科十几个受冤屈的干部，下到沿河，很快组织起几个游击大队，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沿河独立团，贺炳炎当团长。不久，沿河独立团与由神兵武装改编的黔东纵队合编为黔东独立师，贺炳炎当了师长。

黔东一带神兵力量不小。红3军一进黔东就发布了《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界神坛诸同志书》，把几支神兵收编过来，加以改造，使它们成为反抗反动统治的游击武装，有的还编为红军“特科大队”。

黔东群众有的参加了游击队，有的当了红军，也有的帮助红军打探消息，侦察敌情。

有一天，我在枫香溪看到一个没有胳膊的人在饭馆里用脚夹着筷子吃面条。我觉得稀奇：“这个人手都没得，还吃面条！”没过多久，我听到从敌人那里传出的消息，说这个人贺龙的探子，被团防捉住，在某个县城里给杀头示众了。当时红3军的便衣侦察队吸收了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扮成卖药的、算命的、说书的、耍把戏演猴戏的，三教九流，各色不一，或搞侦察，或作内应，搅得敌人草木皆兵。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一个以川东南西阳和黔东沿河为中心包括印江、德江、松桃、秀山等县的游击根据地初具规模。在沿河县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

7月的一天，桑植县的谷佑箴引着中央交通员找到红3军驻地。谷佑箴是桑植县洪家关横路湾人，他的家是一个秘密交通点。红3军与党中央失掉电台联络后，就只有靠陆上交通。中央的交通员从江西苏区辗转到湘西，找到谷佑箴家，再由谷佑箴引到了黔东。他们带来了党中央给湘鄂西分局的指示信和六届五中全会文件。信和文件是用药水密写在交通员的白布衫上的，用药水洗后又显现出来。

中央指示信对“肃反”扩大化和解散党团组织提出严厉的批评。湘鄂西分局在西阳的南腰界开会，作出决定表示完全接收中央的批评，在坚持“我们与反革命的改组派作了斗争，这是正确的”前提下，检讨了由于“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而将反革命力量反扩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导致“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的根本错误”、“解散党和团组织的错误”，造成了“不能击破敌人的围剿及固守新创造的苏区”，“陷于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着”的局面。红3军公开宣布取消计划中的“第五次肃反”，使长达两年的“肃反”运动终于停止下来，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逐步缓解。

此后，对尚未登记的党团员的党籍团籍加快作了恢复，政治干部也作了进一步配备。鉴于7师没有政委，就把朱绍田调来7师当政委，把我从7师

调到 9 师当政委。7 师宣传队长杨秀山接替了我的师委书记一职。我离开 7 师时，把党员登记表连同皮挎包一起移交给了他。

9 月中旬，湘鄂西分局在酉阳南腰界再次召开会议，我们师、团干部都参加了。人多，屋子里装不下，就在军部屋外的树林子里开会。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同时总结了重返湘鄂边、游击湘鄂川边、创建黔东苏区几个阶段和二、三、四次“肃反”的情况。

夏曦对湘鄂边的失败以及没能及早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做了一点自我批评。他讲：“我犯了错误。”

我们 9 师 26 团政委汤成功接上来，给夏曦提了个问题：“你是党的书记，为什么要犯解散党这样的错误？”

这一下夏曦不干了，大发脾气。

贺龙也火了，批评夏曦说：“你自己既然也说犯了错误，别人问一下，有什么不可以？怎么就火啦？”

两个人当场吵了起来。我们师、团干部除了卢冬生外，都是第一次在这种会议上碰到这种场面，谁也不晓说什么好。会议开不下去了，未果而散，没能进一步揭露左倾错误，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误产生的原因。

红 3 军在南腰界前前后后住了四次，住的时间也比较长，在这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军司令部住在南腰界街东头一家地主屋子，政治部住街西头，7 师住东边的山上，9 师住西边几里外的冉家祠堂四周。冉家祠堂里龟缩着南腰界团总、恶霸地主冉瑞庭的一支武装，经常乘红军主力外出游击时捣乱，是苏区内的一颗钉子。我们第三次到南腰界时，冉瑞庭跑进了酉阳县城，他的儿子带着十几条枪，裹挟了一些群众，躲进冉家祠堂，继续顽抗。我从 7 师调到 9 师当政委的当天，就参加了攻打冉家祠堂的战斗。冉家祠堂座落在一片开阔的水田中央，祠堂四面是三米高的石头围墙。我们没有炮，请来当地木匠做土炮，掏空一段树筒子，打上几道铁箍作炮身，里面填进铁砂、铁片捣实，炮身屁股上装进火药，点燃后利用火药的力量把炮筒里的铁东西摧出去，可以打到几十米，还是蛮有威慑力的。

部队作好进攻准备后，师长钟炳然下令：“开炮！”

“轰”的一声巨响，炮膛里面的铁东西没有打出去，炮身却炸了，没有成功。部队硬攻了一下，也没攻进去。

我们暂时收兵，将冉家祠堂围了半月。里面的粮食吃光了，宣传队又组织被裹胁者的家属喊话，许多人跑了出来。部队再次组织进攻。

这一回，我们挑选了精干强壮的战士组成几支突击队，身背大刀、短枪、手榴弹，由各团团长担任突击队长，又新做了几门土炮。炮声一响，轰塌了围墙一角，突击队乘势发起猛攻，我跟着突击队一起冲进去，拔掉了这颗钉子。

在黔东苏区，红 3 军打了几个小仗，都取得了胜利。两次打开沿河城，极大地震动了反动统治；两打淇滩，各消灭敌军一个营；9 师在印江木黄迎战敌军一个团，7 师在秀山倒马坎袭击敌地方保安团，都有所俘获，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扩大了根据地。

黔东苏区先后坚持了半年，虽然时间不长，地域不大，人口不多，也很穷，但是对红 3 军来说，意义却是很大的。

它的建立，使红 3 军结束了四处流动的状况，开始有了一个落脚点、一块临时根据地，不再大天走路了，而是扎下来为建设根据地而斗争。

它的建立，使红 3 军得以吸收 1000 多名贫苦青年人伍，壮大了队伍，增强了力量，也在黔东人民心中播下土地革命的火种。

它的建立，为从湘赣苏区突围长征的红 6 军团提供了一个找寻的目标，为两军会师创造了条件，也为开辟更大更可靠的湘鄂川黔新苏区提供了依托。

尤其难得的是，在这里，红 3 军停止了“肃反”，恢复了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对夏曦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从而实现了由失利走向胜利、由毁灭走向发展的重大转折。

红 3 军在黔东重新崛起了！

历史教训

我在红 3 军经历的这个时期，正值我们这支红军乃至整个党、整个红军都遭遇到空前巨大的困难。

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说敌军的疯狂“围剿”是其外部原因，那么左倾路线的严重摧残就是其内部原因。它给党、给红军、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之巨大，损失之惨重，教训之深刻，使我们每一个经历者终身难忘。

当时，左倾路线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难以数计的党员、干部的头颅，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刀枪打不倒、重金买不到的头颅，就那么白白地断送了；党的组织遭到解散，党的形象受到损害；用鲜血和生命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毁于一旦，屡遭挫折发展起来的红军几几乎要垮掉。这个灾难可算是大哟！

1984 年我到洪湖参加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典礼，一些红 3 军老战士提起当年左倾路线的危害，仍啼位失声，怨愤难平。有的同志手指纪念馆中夏曦的照片，火气十足，数落不休。

夏曦的错误确实是相当严重的。毫不夸张的说，那是对革命的犯罪！但夏曦之所以犯那样的错误，有他本人的原因，也有中央的原因，因为这是一条路线。事物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从夏曦的错误中，我们看到了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它同有的东西表现形式不同，但同样会置革命于死地，毁掉革命，毁掉党。可见，作为一个领导革命事业的政党来说，路线正确与否是何等的重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警惕“左”，防止“左”，这是红 3 军历史给我们的最大的教训。

另一点教训是，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制度一时一刻也不能取消。

想一想红 3 军党组织被解散、政治工作制度被撤消的那段日子吧，政治上陷入盲目，军事上屡遭失败，精神上极度困惑，人心散了，队伍少了，根据地丢了，红 3 军就象一只失去了舵手和风帆的小船四处漂流，吃尽了苦头。只有在恢复了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之后，我们的队伍才重新崛起，我们的事业才重新发展起来。

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强核心，政治工作制度是革命胜利的有力保证，这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

第三点教训是，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对党的信念。

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同时，跟一个人一样，党也免不了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特别是在当时，我们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好象

是一个还很幼稚的十二三岁的娃娃，即使是在以后党逐步成熟起来了，也难保永不犯错误。因此，作为党的一员，不应该因为党犯了错误就动摇对党的信念，要相信我们这个党是有能力纠正错误继续前进的，要积极向错误的东西作斗争。

当时在红 3 军确实有个别人因为被错整而动摇了，怀疑了。还有一些同志则是产生了误解，一时不愿或不敢重新入党，后来还是明白过来了。经历了这么一次教训之后，绝大多数红 3 军老战士一直保持着对党的坚定信念，即使是在 30 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在身遭厄运、重陷囹圄的情况下，仍毫不动摇，愤起抗争，最终在党的领导下与全国人民一道，赢得了胜利。这也算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一个教益吧。

第四章

二、六军团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是散布在神州大地上的星星之火，随着土地革命战争形势的变化，不断地汇聚起来，发展起来，形成燎原之势。

我所参加的这支红军部队，就有过多次与兄弟红军的会师或合编：

1930年7月，红4军与红6军会师洪湖，组建为红2军团，把湘鄂西苏区连为一体；

1934年10月，红2军团与红6军团会师黔东，合为一个战略单位，共同创造出湘鄂川黔新苏区；

1936年7月，红2、6军团与红4方面军会师甘孜，与红32军台编为红2方面军，而后2、4方面军携手北上，10月又与红1方面军会师西北，结束了伟大的长征；

1937年8月，红2方面军在陕西富平与陕北红28军等部合编，组成八路军120师，开赴抗日前线……

所有这些会师，每一次都壮大了革命的队伍，创造出新的战绩，推动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不光我们这支红军是这样，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经历过类似的发展过程。因此可以说，会师，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中一个独具特色之处；搞好会师，是我军传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贺龙同志在回顾我们这支红军部队的战史时，曾对2、6军团的黔东会师做过高度评价：“2、6军团会师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些会师的模范”。

迎接六军团

1934年10月，红3军正在致力于黔东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偶然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有一支红军部队前来谋求会合。

当时，由于没有电台，红3军只能从国民党报纸刊载的“剿共新闻”中推测一些外界的情况和其他红军的消息。

我9师二打沿河县城时，曾缴到一部电台，但是当我们把它收上来时，它已经成了一蛇废铁。战士们不认得电台，只当是个铁盒子，想打开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打了半天打不开，就用枪托子把它捶烂了，闹出了笑话。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看到报废的电台，又好气又好笑，于是下了一道命令：今后凡是缴到电台或是其它认不得的东西，一律上交，不得毁坏。

在没有电台的情况下，国民党的报纸就成了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我们因此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地，一面安营扎寨，一面派人四处搜集报纸，等军部一到，贺关就要我们拿来报纸看。

贺关率9师回到西阳县南腰界不久，从南腰界小学校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

“江西肖克匪部第6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

贺关经过分析，认为敌人披露的有关6军团的消息十有八九是可能的，6军团远道而来，人地生疏，又必定受到敌军围堵，我们不能坐等人家上门，立即兵分两路，以游击方式主动出迎。

为什么兵分两路？贺龙军长在向部队下达任务时，讲了一句话：我们是去“撞”6军团！

得知要去同另一支红军会合，全军同志欣喜万分，立刻整装出发。贺关卒军部和7师为一路，在西；命令我9师为一路，在东；两路同时向南行进，越过川黔边界，进入沿河。贺关向在这里主持根据地工作的夏曦报告了情况，而后继续前进。

10月15日，在沿河县的水田坝，贺炳炎领导的沿河独立团引着一支队伍来见贺关。这是6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的先头部队，约二三百人。

当晚，我9师也在铅厂坝遇到李达部队的另一部分人。那天，我师正准备宿营，湘军周燮卿部插过来，我接到25团5连连长黄新廷报告：“后卫26团被周矮子挡在后面。”钟炳然师长和我立即派人去跟26团联络，不久26团赶上来了，还带来了6军团的一些同志。

原来，26团被周矮子的部队截断后，常德善团长、汤成功政委发现山下小河边有小股队伍在运动，遂带人下去查看，双方遭遇，打了几枪，拾到一顶缀着红五星的军帽，知道是6军团的人，就带着他们一起赶来了。

从南腰界出来只一两天就撞到了6军团的部队，大家都喜出望外。据李达参谋长讲，6军团于8月间奉党中央命令退出湘赣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寻找新的立足点，并谋求与贺龙率领的红军部队取得联系。他们进入黔东后，在石阡县甘溪遭敌重兵包围，李达参谋长率领先头一部突了出来，找不到主力，遂经江口、印江等县一路打听来到沿河。

听了李达参谋长的介绍，大家又喜又忧，喜的是有了6军团的确切消息，忧的是6军团处境非常困难，随时随地有陷入敌人包围的危险。

黔东各县大部仍是白区，红3军仅在一块极为狭小的区域活动，四周均有敌军驻守，敌主力侵入苏区千方百计捕捉我军。我军若深入白区，则敌必然乘虚而入，有可能搞垮这块刚刚建起的根据地，我军也难免与强敌遭遇，但是6军团此刻的处境比我们更困难。贺关当机立断，不惜一切也要把6军团接应回来。

第二天，全军仍分两路，朝着6军团与敌交战的方向急速南下，李达参谋长也带人随行。我们心急如焚，脚下的步子迈得飞快。

一连几天，红3军穿松桃，过印江，入江口。所到之处，广贴标语，大造声势。吓得地方官吏频频向上报告：“贺龙匪部企图寻路南窜，接应肖匪。”报纸上也接连出现“贺龙匪部”、“肖克匪部”动向如何的报道。这样一来，实际上等于给正在互相寻找的两支红军通报了消息。

10月23日，红3军两路相继转到江口县内的梵净山麓。

我9师正在行进中，忽然发现前面那座山有一支队伍，手扒藤蔓，脚踏峭壁，艰难地向上攀登。对方也发现了我们，把机关枪架到山顶上。钟师长和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看他们那疲惫的样子，又专捡险峻、陡峭的地势走，不象是前来“围剿”的敌军。通过联络，得知他们正是红6军团第50团，大家欢呼着跑过去。我跟钟炳然师长与50团团长沙鹏、政委彭栋材握手相见，而后把他们接下山。山脚下还有50团的一部分同志，躺卧在草丛里，一步也走不动了。我们走上前去把他们一一扶起来。

据郭鹏团长、彭栋材政委介绍：50团在甘溪掩护主力突围后被敌截断，与军团部失掉联络，后来从捡到的半张旧报纸上看到我军活动方位，向北走来，碰到了我们。

我们帮助 50 团收拢了部队，带着他们一起北上印江。

第二天，军部和 7 师也在印江县木黄镇与 6 军团主力——会合。

当晚，9 师和 50 团赶到宿营地石梁。我顾不上休息，径自跑到军部报告情况。

我推门进屋，看见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正跟几个穿灰布军装的人商量事情。贺关把我引到面前作了介绍，我才知道，那位留着小胡子的是中央代表、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那位长相很年轻的就是被敌人喊作“肖匪”的红 6 军团的军团长肖克，那位长着络腮胡子的是 6 军团政委王震，又叫“王胡子”。我向 6 军团首长报告了与 50 团会合的经过，转达了 9 师全体同志的问候。

由于这一带仍属游击区，敌军又跟了上来，贺关建议：此地不宜久停，请 6 军团同志到川黔边界的西阳县南腰界再休息。

26 日，两军抵达南腰界。

经过十几天的转战，深入白区兜了一个大圈子，我们终于把 6 军团接回到自己的“家”。

到达南腰界的第二天下午，两支红军齐集在一块刚刚收过庄稼的大田里，扎起台子，插上红旗，隆重举行会师庆祝大会。

军号声中，两军首长一起登上台子。任弼时同志宣读了党中央发来的贺电，宣布红 3 军正式恢复红 2 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接下来，两个军团首长相继讲话，祝贺会师，强调今后要加强团结，并肩战斗。

贺龙代表 2 军团向 6 军团战友表示热烈欢迎，而后他说：“同志们来到贺龙的后方，想好好休息一下，打双草鞋，这个要求不过分。但是我们这块根据地是新开辟的，还不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说到这，他停了一下，抬起一只脚，用手中的竹烟杆敲了敲草鞋底，放开嗓门说：“根据地还在我们的脚板上！”会场上顿时响起了一阵欢快的笑声。

庆祝大会一直开到天黑下来，才尽兴而散。

会后，部队进行了整编。

红 2 军团加上黔东游击武装共 4000 余人，仍编两个师，每个师由三个团改为两个团，团以下恢复了营的建制。原 7 师改为 4 师，辖 10 团、12 团。原 9 师改为 6 师，辖 16 团、18 团。原黔东独立师的一部分编入 18 团，贺炳炎当 18 团团长、熊仲卿当政委，16 团团长常德善、政委汤成功。

红 6 军团 3000 余人，暂时撤销了师的建制，缩编为 3 个团。另外由 6 军团伤病员和地方游击队组建了新的黔东独立师，6 军团干部王光泽、段苏权担任师长、政委，继续坚持黔东游击战争。

两个军团 8000 名健儿决心乘会师势头，再接再厉，创造更大更可靠的根据地。

谁也离不开谁

在南腰界，红 2、6 军团进行了短暂休整。当时两军正面临着各自不同的困难。

我们 2 军团的困难主要是政治上的。乱捕滥杀的“肃反”运动虽已停止，

但“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恶果还没有完全消除；曾被解散的党团组织虽已逐步重建，但党团员数量还不多，特别是基层连队显得更少；一度取消的政治工作制度虽已恢复，但政治干部还很缺乏，素质也不高；与党中央的陆上交通虽已沟通，但无线电联络还没有恢复；夏曦的错误领导虽已受到初步批评，但左倾路线的统治还没有结束。因此，我们迫切需要6军团在政治上给予帮助。

6军团的困难也不小。他们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远征，人枪损失很大，出发时9000多人到黔东会师只剩下3300人，其中有300多名伤病员。队伍在连续行军、连续作战后，衣服挂烂了，鞋子磨穿了，骡马丢弃了，行李辎重被迫烧掉了，人员疲劳，亟待休整和补充。同时也需要借助2军团人熟地熟的长处来谋求立足和发展。

这样，两军一会合就迫切地感到：“今后我们谁也离不开谁！”指战员们自觉把加强团结与合作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休整期间，两军进行了互相支援。我们2军团的家底虽——气——然很穷，仍倾己所有，从物资补给上给6军团以最大的帮助。全军抽出一批精壮的骡马，给6军团的营以上干部每人配备了坐骑，给部队解决了辎重驮马。各师、团派人上山割来细软的茅草送去作铺草，拿出个人的草鞋筋子帮助打草鞋。此外还送粮、送肉，承担警戒、勤务，保证6军团战友吃好、休息好。

6军团则着重从政治上给2军团以支援。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了解到2军团政治工作仍很薄弱情况，立即向中央发电，提出夏曦“不能继续领导，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并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会的主席”。为了加强2军团政治工作力量，又把6军团政治部整个搬到2军团，并调来大批优秀干部担任师团政治委员、政治机关支部和党总支书记，使2军团的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干部队伍一下子充实、健全起来。4师调来方理明任师政治委员，张平化任师政治部主任。我们6师调来袁任远当师政治委员。我们师部过去只有一个宣传队，队长是范忠祥，下面十几个队员。两个人提着浆糊桶子出去贴标语，落款也要写上“红3军9师政治部”，其实还没得什么政治部。这次一下子就调来戴文彬任组织科长，金如柏任宣传科长，刘型任特派员，支起了政治部的摊子。6师还调来洗恒汉任16团政治委员，李剑珠任18团特派员，曾敬凡任18团党总支书记。以后又陆续调来几批干部。两军的军事干部也作了一些交流，2军团调了一个团长到6军团去，6军团调李达任2军团参谋长，还调来一部电台和几名报务人员，使2军团总指挥部可以直接跟中央联络。

军团干部调来后，贺关一声令下，2军团原有的干部或改为副手，或降职使用，或调去学习。方理明到了4师，原师政委朱绍田下到10团当政委。袁任远到了6师，我改当副政委。洗恒汉到了16团，原政委汤成功调离学习。我们下来的同志诚心诚意地支持、配合6军团来的同志，并在工作中注意向他们学习。

贺老总说过：“会师会师，我们会见老师了。”的确，在我们眼里，6军团是党中央身边的一支劲旅，是从著名的井冈山根据地来的，带来了朱毛红军的建军经验和优良传统，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老师。

就拿6师新任政委袁任远同志来说，他是湘西慈利县人，和我是邻县同乡。论年龄，他比我年长13岁，论文化，他上过大学，我是高小毕业；论党龄，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我是入党仅一年的新党员；论做政治工作，

他当过多年的师政委、师和军的政治部主任，调来前担任6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我当师政委才不足三个月。因此，从各方面说，袁任远同志都是我的一位好老师。在他的领导下，我师的政治工作有了很大进步。我们先后建立了师、团政治机关，配齐了营、连政治干部，继续恢复了一些同志的党籍、团籍，加快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在每个连队建立了党的支部。

为了协调会师以后的指挥和行动，两军首长先后在木——qF——黄、石梁、南腰界几次开会，共同商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任弼时同志是党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委员，我们2军团同志都拥护他作为最高政治领导人，来取代夏曦的错误领导。贺龙同志曾是南昌起义军的总指挥，6军团同志久闻其名并拥戴他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员，来指挥今后的战斗。这样，很自然地形成了以贺任关统一领导两个军团的格局，并确定以2军团部作为总指挥部。

至于今后的行动，党中央曾给两个军团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向，要求6军团会师后即于“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我们2军团同志都知道，凤凰一带正是“湘西王”陈渠珍的老窝子，即使是在湘鄂西苏区大发展的时期，红军也没能到过那里，6军团若孤军前往很难立足。在贺龙的建议下，两军决定把2、6军团合为一个战略单位，一起向湘西的永顺、大庸、龙山、桑植地区发展。那里敌人力量相对较为薄弱，有老苏区作基础，有党和红军的影响，有贺龙的声望和号召力。

后来我听说，就在部队出发的当天，又接到军委指令，严厉指责“2、6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2、6军团应仍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6军团应速以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误”。这个指令给两军带来的压力很大，但从当时的敌情我情来看，2、6军团分则力弱，合则力盛；分则两损，合则两全。贺任关肖王首长审时度势，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认为不能分开行动，于是一面按自己的方案继续行进，一面向中央重申理由：“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10月28日，红2、6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挺进，开始了并肩战斗的历程。

同创新局面

11月初，我军进入湘西，发动了凌厉的湘西攻势。

这次重返湘西，2军团在前面开路，6军团在后面跟进，我们6师则是全军的先锋。本来我们就有“腿子长”之称，再加上此番回来我军人枪扩大了一倍，士气高昂，指战员们如猛虎归山，迈开两条长腿，跑得飞快。军团总指挥部不得不传令我们：“你们的腿子太长了，6军团在后面没有跟上来，你们停下等一等”。

我师收住脚，等到后面部队赶上来，而后直取永顺城下。11月7日，我师消灭了守城的团防武装，夺占永顺城。

红2、6军团在永顺休整了约一星期。其间，在城内天主堂召开了一次干部会。6军团政委王震给我们传达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决议。这个决议很长，充满着左倾路线的思想和词句，断言国民党政权对红军进行的第五次“围剿”

是“绝望的进攻”，五次反“围剿”是“决定胜负的决战”，夺取这个胜利，“将实现一省或数省的苏维埃革命首先胜利，并奠定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的坚固基础”。我是第一次听到中央的决议，听了半天也没完全听明白。

永顺天主堂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是我们2军团的干部看到夏曦跟贺任关肖王一起坐到主席台上，大家心存疑虑，不敢讲话，反倒是6军团调来的干部出来代表各师团发了言。

这个时期，左的思想仍然存在。五中全会决议本身就把四中全会以来的王明左倾路线推到了顶点。受其影响，永顺天主堂会议在批评夏曦搞的“肃反”扩大化错误时，作了一个决议，说凡是过去的“改组派”分子都不能当主官，已经当了都要撤下来。我师18团团团长贺炳炎被撤了下来，重回军团部管理科当管理员。

同时，对统一战线也有影响。过去红3军没有根据地了，伤病员天天抬着走也不是办法，于是以贺龙的名义把伤病员寄在比较中立的团防那里。贺龙给他们写信讲：我有多少伤员、病号交给你，你要把他们弄好，以后我们回来再归队。当时只有这个办法了。这个办法也灵，团防他不敢怎么样，因为贺龙既有红军这个名义还有些旧名义、旧关系，声威大得很。很多伤病员就这样寄在团防那里，养好了又回到红军里来。现在根据五中全会决议，反对利用中间派别，强调要讲“明确的阶级路线”，把这些旧关系都给批掉了。

永顺天主堂会议开了两天，敌人来进攻，会议没开完就草草结束，准备迎敌。

“湘西王”陈渠珍派周燮卿、龚仁杰、杨其昌的三旅一团，共万余人，向水顺扑来，企图阻挡我军深入湘西。

为了打好第一仗2、6军团首长决定主动放弃永顺，诱敌尾追，运动歼敌。开始准备在城北不远的地方打，但敌进城后没有马上追来。我军一退再退，故意示弱，一直撤到离城45公里的龙家寨一带，沿十万坪谷地布下一个口袋阵，部队埋伏在两翼，我们师部带16团作口袋底。

一直等到天快黑了，敌人才到。2、6军团一齐出击，密切协同，打了整整一个晚上，把敌三旅一团或歼灭或击溃。俘虏2000多人，缴枪2000多支。

总指挥部命令6师追击逃敌。我们带着16团紧追周矮子、龚仁杰的屁股后头，一气再跑45公里，二次占领永顺城。

龙家寨大捷，把这些年来一直在湘鄂川黔边同我军作战的几个老对头打趴下了，打开了湘西的局面，同时也初次显示了2、6军团并肩作战的巨大威力，使团结战斗的思想在部队中扎下了根。

战后，我军乘胜打开桑植、大庸两城。我师16团由常德善团长、洗恒汉政委带领到桑植，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大庸，成立了由两军首长共同组成的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袁任远调到军区工作，我重新接任6师政委。两军指挥机关和部队分成前方后方两个摊子，任弼时、王震带领6军团大部和我师16团在永顺、大庸、龙山、桑植地区继续开辟根据地，贺龙、关向应、肖克率2军团主力和6军团51团继续发展湘西攻势，配合、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

中央红军已于10月间退出根据地，突围长征，6军团就是他们派出的一支先遣队，中央红军仍准备继6军团之后来湘西会合。

我军从大庸南下，先攻沅陵，打了两天没打开，遂沿沅江向东，直逼桃

源、常德。

我军在悟溪河与敌打了一仗，由6师18团和4师12团担任主攻，消灭了敌罗启疆一个旅。战斗结束时，已是下午，军团总指挥部命令18团追击逃敌。我们带着18团跑了30多公里，一直追到常德。天已黑了，18团一个班跟着逃敌冲进城去。可惜，后续部队没有赶到，敌人把城门一关，那个班再没见出来。我们没有重武器，子弹也不多，打不进去，只好撤下来。18团和51团打下了桃源，6师驻扎桃源，其它部队驻在澧市、河洑，造成兵围常德、威胁长沙之势。

湘西攻势，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在湘南的行动，迫使敌人从堵截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调十多个师，回过头来对付红2、6军团，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

大批敌军聚集常德后，向我军进攻，占领了桃源。我军看到湘西攻势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同时得知中央红军也已放弃与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往贵州遵义地区，遂于12月下旬胜利回师，投入湘鄂川黔苏区建设，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努力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

还在围沉陵的时候，我军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三个月内扩大一万二千主力红军”，开展扩红比赛，看哪个部队扩大的多。因此，我们一面打仗，一面扩红。我们每到一地，就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号召白军士兵拖枪过来当红军，号召贫苦农民参加红军。

由于有时搞得不怎么扎实，关向应副政委及时告诫我们，说：“扩大红军，首先来的这批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贫苦农民，而可能是兵油子、痞子这么一些人，对这些人要加以改造。”我们对关政委的这句话，一开始不怎么理解。关政委又进一步解释说：“真正的贫苦农民，红军刚到他那个地方，还没有开始土地革命，他没有得到实际利益，会来当兵吗？要扩大真正的贫苦农民当红军，这是不容易的，必须深入开展土地革命。”

关政委的话给我们印象很深。我们把它当作一句至理名言，用来警惕粗糙作风，指导扩红工作深入、扎实地进行。

从桃源回到慈利，2、6军团又掀起扩红高潮，一方面组织农民游击队，一方面收编改造土著武装。我们6师把大庸李吉宇的一个支队收编为17团，4师新编了11团，6军团也恢复了17、18两个师的建制。

李吉宇是大庸人，参加过哥老会，也是贺龙的老部下，一脸的伤疤。他通过哥老会的旧关系，联络了十几股土著武装，组织了一个游击支队，他当司令，大庸军分区政委袁任远兼支队政委。这个支队的干部多是本地土匪出身的人，成份很杂，我们把它收编过来，加以改造。

收编改造的办法很简单，军团总指挥部在慈利的溪口召开一个会，以开会的名义把该支队的连以上干部召去，扣留起来，而后派了红军干部去改造这支队伍，整编成立了17团。李吉宇还是当团长，谭友林调去当政委，刘美阶当第1营营长，黄新廷当第2营营长，张秀龙当第3营营长，还调去了一些连级干部。这样把干部一换，部队一编，就拿过来了。当然对士兵群众的教育，使之成为有觉悟的红军战士，就不是这么一下子可以完成的了。

1935年1月下旬，红2、6军团在大庸城西的丁家溶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又叫作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继续批评夏曦的错误。

会上，我们2军团的干部也打破了永顺天主堂会议时的顾虑，发言批评夏曦。

同志们想起那些被当作“改组派”杀掉的成百上千的好同志，想起党团组织被解散、政治工作制度被撤销的恶果。想起丧失根据地、四处流动游击的苦日子，都憋了一肚子气。有的声泪俱下地诉说过去的遭遇，有的鼓起眼睛瞪着夏曦。但是由于我们的政治水平低，讲不出好多有份量的话来，相比之下，倒是6军团的干部讲的多一些，听起来也有些道理。我感到，还是6军团干部的政治水平比我们都高一些。

任弼时政委在会上讲话，系统地揭露了夏曦错误的实质、恶果及其根源，既有理论，又有事实；既有分析，又有归纳。那些话都是我们不会讲，也讲不出来的。

丁家溶会议上，正式撤销了夏曦的军委分会主席、分局书记领导职务。会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夏曦调到6军团当政治部主任。夏曦本人在会上作了检讨。但是他对把他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执行中央六届四中全会路线不力，感到很冤枉，很不服气。

夏曦争辩说：“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路线的呀！”事实上，正是这条以王明为代表的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给党和红军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由于当时这条路线在中央还没有得到纠正，丁家溶会议也不可能对夏曦的错误进行更准确、更深刻的批评，反把他的左倾当成有倾来批了。

任弼时政委在会上还全面总结了会师两个多月来2军团政治工作取得的成绩：“党的基础初步地建立，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开始恢复系统的政治工作”，“指战员的积极性正在发扬，肃反恐怖的现象逐渐消灭，战斗员的胜利信心大大的提高了，”“部队扩大一倍以上”。同时，任政委也指出了存在的弱点，特别批评了轻视政治工作的倾向：“对于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的重要，缺乏深刻认识。在部队中还不了解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甚至轻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以为‘政治工作不能打仗’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

以丁家溶会议为标志，夏曦的错误领导彻底结束了。2、6军团以政治、军事的双双胜利和湘鄂川黔苏区的建立，开创出一个大发展的崭新局面。

湘鄂川黔反“围剿”

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湘鄂两省10万正规军，向湘鄂川黔苏区暨2、6军团发动了大规模“围剿”。敌军分六个纵队，从几个方向进犯，搬用了对付中央苏区的那一套“堡垒主义”战法，稳打稳扎，步步为营，企图把我军逐步压迫于狭小的区域内消灭。

2月8日，敌郭汝栋纵队一个旅首先向慈利县溪口发动进攻。溪口是慈利至大庸交通大道上的一个镇子，6师和全军侦察队驻在这里，担负苏区外围的警戒。我师16团正在桑植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我们手里只有一个18团。溪口战斗没能挡住敌人进攻，18团政委熊仲卿牺牲，我师撤回大庸。

3月中旬，沅陵方向的敌陶广纵队一部及两个保安团与我军在高梁坪打了一仗，我军击溃了敌人，6师担任追击，一直追到黄昏后才停下来，17团一下子把梭标换成了清一色的步枪。

高梁坪战斗之后，2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调我到军团政治部当组织部长，从6军团调来余导群接替我当6师政委。

当时党的组织工作主要是为着粉碎敌人的“围剿”，进行战前的思想动

员，加强党在部队中的核心领导，号召共产党员在战斗中发挥先锋和模范作用。我这个组织部长也是以打仗为主。

这时，敌军各路纵队都围了上来，并占领了大庸城。2、6军团决定在后坪消灭敌李觉纵队。后坪位于大庸城西、澧水右岸。我军计划诱敌深入，趁敌刚刚渡过澧水时来打它。

第一天，部队上阵地等了一整天，敌人则在澧水对岸停下来。晚上我军撤下阵地休息，派了一个团在鸡公坪担任警戒。第二天拂晓又拉上去，但敌先头部队已抢渡澧水并抢占了鸡公坪高地，我军立即向敌反攻。

这一仗开始打得不错，一下子把敌人压到澧水河里。但由于鸡公坪制高点没拿下来，敌人一面以火力侧击，一面乘势组织反扑，一直逼到我方指挥机关面前。情况相当紧急。贺老总指挥大喊一声“贺炳炎上！”在管理科打杂的贺炳炎带着几个警卫员冲上去，把敌人顶住了。我6师和4师从两翼插过来，才把敌人击退。

后坪战斗打了一个平手仗，我军没能消灭敌人，敌我双方各伤亡几百人，2军团4师师长卢冬生负重伤，把腿骨打断了，6军团牺牲了两个团政委。敌军围上来的更多了，把我军压缩在永顺县塔卧、龙家寨狭小地带。我军不得不决定放弃守卫苏区，跳出敌人的圈子。

总指挥部派我这个组织部长到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区驻地塔卧，疏散伤病员，把卢冬生等师团干部带走，营以下干部、战士分散寄养到老百姓家里。

撤离塔卧之前，2、6军团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由肖克军团长传达中央以电报发来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实际上就是遵义会议决议。中央指出反“围剿”的“总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

4月中旬，2、6军团撤离苏区，向湖北转移。走到桑植县陈家河，碰到鄂军纵队司令兼58师师长陈耀汉的部队。该敌一个旅孤军深入到了陈家河，陈耀汉本人率师部和另一个旅在桃子溪，中间相距约30公里。贺老总指挥下决心要打这一仗，说：“我们要走，也要打了这一仗再走。”其他首长也表示同意。

部队要打仗了，我这个组织部长受命组织一个拦阻队，我当队长。给我的权力很大，不管什么人一律不准后退，谁擅自退下来就执行战场纪律。

实际上用不着。贺老总抓的战机好，我军集中了优势兵力，指战员个个都勇敢。战斗一打响，我军就猛冲到陈家河街里，到黄昏时把敌人一个旅全部消灭掉。

隔了一天，我军冒着大雨，沿着澧水插到桃子溪，消灭了敌58师师部和另一个旅。

我军三天内连打两个胜仗，消灭了敌人一个整师，还缴到两门山炮，指战员的情绪高涨极了。陈耀汉的58师被消灭，其它方向的敌人都害怕了，停了下来，我军乘胜反击，收复了桑植城，一直打到慈利的江垭。

陈家河、桃子溪的战斗，是扭转乾坤的一战。它使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撤退转为进攻，保住了湘鄂川黔苏区。更重要的是，它使2、6军团从实战中对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有了深刻的理解。在六届五中全会上，王明他们搞了一条“短促突击”的战术，以堡垒对堡垒。受其影响，2、6军团在反“围剿”作战初期也是搞阵地正面防御，造成了不得不撤离苏区的危机。陈家河、桃子溪的胜利，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上来，大踏步地前进，

大踏步地后退，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我从几次战斗中，感觉到这个转变是十分明显的，虽然当时不象现在这样，中央有什么决定一直传达到支部和每个党员，但是在部队的战斗行动中充分体现出来了。

4月下旬，2、6军团决定“以主力远出东面敌人的侧后方，伸出到江垭、慈利一线，调动敌人离开基本苏区，并求得在敌人远距离运动中抓住敌人之过失，给以新的胜利的打击。”我军进占江垭，总指挥部驻在象耳桥。为了进一步造成东取津市、澧州之势，贺任关要我和6师参谋长向国登组织2、6军团所有便衣侦察队，深入白区去捉土豪，筹款。向国登当队长，我当政委。

我俩带着百多人的侦察队，一直深入到常德附近。红军一到，有钱人早都跑到城里去了。我们象武装大游行一样，在白区里转了一趟，声势搞得很大，只是土豪没捉到，钱也没等到，走到常德附近就回来了。

这时，2、6军团主力已经撤回中心区，只有6师16团还留在江垭。侦察队各自归建，我回去当组织部长。

6月初，2、6军团转向鄂西，围城打援，在咸丰县忠堡包围了敌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振汉的部队。

战斗中间，4师政委方理明、6师18团团团长高利国、18团政委朱绍田相继负伤。贺任关把我和贺炳炎叫到指挥所。贺龙总指挥正在生病发高烧，粥时政委下达了命令，要我到4师代理政委，要贺炳炎去18团当团长。

我同意了。贺炳炎却不干。他在永顺天主堂会议时被当作“改组派自首分子”从18团团长的职位上拉了下来，到管理科打杂，因此对这个问题有气。

贺炳炎对粥时政委讲：“我是自首分子，不能当团长嘛。”

粥时政委很严肃地说：“你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处于困难的时候，你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听粥时政委这么一说，贺炳炎把大腿一拍，说：“好，我去！打完仗再回来。”

我看到他俩个的对话，想到在黔东时贺炳炎也跟关向应政委闹过一次。那时贺炳炎也是因为“改组派”问题撤了他的团长，还差点被杀头，贺关把他放出来在管理科当管理员。”

关政委要他到沿河去组织游击队，他说：“我是改组派，不能带兵嘛！”

关政委说：“你是共产党员！过去抓你的改组派搞错了，党对不起你。现在党和红军都处在困难的时候，党需要你出来工作。”

贺炳炎二话不说，带着十几个被罢了官的同志下到沿河，很快就搞起一个独立团来。

这一次又是这样。

贺炳炎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倔脾气。当你错整了他，他心里有气，有气就要发出来，他才不管你谁呢。但是一旦你给他讲清楚，一旦党需要他站出来，他会把个人的冤屈统统抛到一边，坚决、勇敢地完成党的任务，就是掉脑袋他都干！

我和贺炳炎受领了任务，转身奔向炮火纷飞的战场，组织部队向敌人阵地发起新的冲击。

忠堡战斗，我军消灭了敌4、师师部和121旅，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战斗结束后，贺炳炎的团长职务保留下来，他本人也甩掉了“自首分子”的包袱。

忠堡大捷之后，2、6军团从鄂西回头再入湘西，围困龙山县城，我带4

师 14 团到龙山、来凤方向游击，筹款。

红军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靠捉土豪筹款。我们专打那些罪恶大、财富多的大土豪，一般不杀他们，而是叫他交出不义之财，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一部分留作军用。我们管这叫作“抓经济犯”或“捉肥猪”。有时候土豪带着钱财跑了，就把他的老婆孩子扣起来，叫他拿钱来赎。有一个姓陈的土豪扔下么儿子自己跑了，又不肯拿钱来赎，干脆不要了。我们没办法，只好把土豪的儿子养起来。他在红军队伍里长大了，不愿再回土豪家，就当红军，从一个土豪的儿子成为一名红小鬼，拿起枪来向地主阶级、反动派斗争。

龙山围困战进行了一个多月，没打开，敌人又来了。我带 4 师 10 团，6 军团参谋长谭家述带一个团，在大交河击溃了敌人的偷袭。这时，原 4 师政委方明理伤愈归队，我又回到组织部当部长。

2、6 军团撤围龙山后，于 8 月初再入鄂西的敌后，在宣恩县板栗园打伏击，消灭了敌 85 师，把敌师长谢彬打死了。

谢彬这家伙很反动，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时屠杀了许多人。这一次遭到伏击，他带警卫营死守着一个土围子，使我军付出了很大代价。4 师师长卢冬生负伤，4 师政委方明理也负了重伤，总指挥部要我二次到 4 师代理政委。贺炳炎的 6 师 18 团打的也很苦，两个营长牺牲了，全团伤亡一半。战斗结束时，贺炳炎看到战士押来一副滑杆，上面躺着浑身血迹的敌师长谢彬，他气得大冒火，忘了俘虏政策。上去就把谢彬的脑袋砍了，为此他受到严厉的批评。

板栗园战后，2、6 军团又在芭蕉坨击溃敌军十个团。至此，彻底粉碎了 10 万敌军的“围剿”。2、6 军团乘胜出击，任务是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牵制敌人，减轻他们的负担，中央红军向西走，我们向东打。我军从桑植出击，除了游击队、独立团留在苏区，主力全部打了出去，一直打到临澧、津市、澧州。在那里，一面宣传抗日反蒋主张，一面扩大部队，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布匹、银元。

这期间，4 师在澧县大堰当与敌新调来的 26 路军部队打了一仗。我正在 4 师代理政委，4 师参谋长金承忠代理师长。我带 10 团在左翼，金承忠带 12 团在右翼，把敌人打垮了，而后指挥部队追击。我站着观察情况，被敌人一颗子弹打中了头部，负伤住进了医院。伤好后，关向应副政委要我重到 6 师当政委，我就没再回军团组织部。

我在组织部前后当了几个月的部长，两次代理 4 师政委，两次带部队单独出去游击、筹款，实际上没有多少时间在组织部工作，主要任务还是打仗，粉碎敌人的“围剿”。

10 月间，在慈利县热水溪开了一次会，任弼时同志总结了 2、6 军团自会师以来创建湘鄂川黔苏区和反“围剿”所取得的胜利。

通过会师，2、6 军团在短短的一年里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从被敌人追着打变成可以整旅整师地消灭敌人，写下了 2、6 军团战史上的最为辉煌的一页；从原来的 8000 人扩大到 20000 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

团结的模范

2、6 军团分别生长于湘鄂西和湘赣边两块根据地，国民党反动军队把我们长期隔绝开来。指战员们除了关向应与任弼时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一

段外，几乎谁都没有见过面，两军之间也从未通过音讯。因此在作战、指挥、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一些不尽相同之处，甚至连装束、语言也有较大差异，刚见面时讲话都不大能听得懂。那么 2、6 军团会师为什么能团结得这么好呢？我想，这里面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有这么几条。

首先，我们这两支红军性质完全相同，目标完全一致。

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都是为着工农解放和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的。不管是由谁来指挥，实际上都是党指挥；不管是谁打了胜仗都是革命的胜利，谁打了败仗都是革命的损失。我们本身绝没有半点私利或小山头的利益可图，不象那些“围剿”我们的军阀武装，各占一方，各保实力，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正因为有了这根本的一条，两军从会师之日起，就能彼此充分信赖，服从统一指挥，不争个人高低，只图革命利益。

正因为有了这根本的一条，两军从会师之日起，就能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共同对敌，成为一个同生死共存亡的战斗整体。

正因为有了这根本的一条，两军从会师之日起，就能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倾其所有进行无私的帮助和真诚的支持。6 军团着力从政治上帮助军团清除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及其恶果，2 军团则尽力从物质上支持 6 军团的立足和发展，从而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

还因为有了这根本的一条，两军从会师之日起，就能够从革命的整体利益着眼，从实际的斗争形势出发，作出结成一个战略单位、并肩战斗的决策。在受到中央来电批评、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两军首长坚持实事求是，没有动摇自己的认识。结果，2、6 军团以自己在军事、政治上的胜利，以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建立，证明了当初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得到中央的认可。

第二条，两军最高首长讲团结、顾大局的模范行为，为广大指战员作出了表率。这是 2、6 军团会师之后能够团结一致的关键。

2、6 军团过去一直各受党中央直接指挥，会师后则自动形成了由 2 军团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特定格局。两军首长贺任关肖王等十分珍惜和维护革命团结，时时处处注意从整体和全局出发来处理问题。他们对每一件涉及全军的事情都要一起协商、决策，对每一次关系全局的战斗都要共同部署、指挥，对所属部队常常是交叉配置、交叉指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领导同志之间，总是互敬互重，亲密合作，坦诚相见。即使有了争论，也能够做到：一是服从组织决议，不另搞一套；二是服从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对于部队中发生的矛盾，两军首长都是严肃处理，毫不姑息。

记得部队从桃源回师慈利时，正逢春节，2 军团政治部代主任汤祥丰在慈利城里请我们师一级干部到政治部吃饭，座谈。他是在南腰界随 6 军团政治部调来的，开始当组织部长，后来代主任。正在高高兴兴中间，不晓因为什么，4 师师长卢冬生跟他吵起来，闹得大家饭也没吃成，不欢而散。这以后，6 军团就把汤祥丰调了回去，另调甘泗淇来当主任，卢冬生也挨了贺任关的批评。

我们的总指挥贺龙更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典范。他对越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越是心爱的战将，要求得越严，批评得越凶，使用得越狠。

6 师师长钟炳然是贺龙的亲戚、旧部。他的妈妈是贺龙的堂姐。他很早就跟贺龙当兵，北伐时当连长，后负伤回家。1928 年贺龙回洪家关组织工农革命军钟炳然又跟着干，后来当了参谋处长、师长。钟炳然始终不是党

员，固守着旧军人的思想与作风，对红军的一套新东西不熟悉。永顺十万坪战斗中，6师追击逃敌到了永顺城下，钟炳然不按红军猛打猛追的战术乘胜冲进城去，而是沿用旧军队稳打稳扎的那一套，叫16团搜索前进，等待后卫。结果等部队进了城，周矮子等人已经逃走了。以后，随着2、6军团的胜利发展，钟炳然的那一套陈旧战法越来越不适应了，在大庸休整期间，贺任关把他调到红军学校参谋训练队学习。在训练队，李达参谋长去讲战术课，钟炳然不眼气，提出要比试比试，贺龙严肃批评了他。钟炳然学习毕业后，没给他任职，原来的师长职位已经由6军团5、团团长沙鹏担任了，他有些不满意，赌气跑回家不干了。以后我听说他被团防捉住杀掉了。

在钟炳然的问题上，贺龙并没有因为他是亲戚、旧部而有所迁就，不是任人唯亲而是任人唯贤。

再比如对6师18团团长沙炳炎。他是贺龙最喜爱的一员战将，打仗时碰到别人拔不掉的硬钉子，贺龙就大喊一声“贺炳炎，上”，指派他担负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

贺炳炎打仗勇猛异常，平时却调皮得出奇，不是跟这个摔一跤就是跟那个逗两句，闹急了免不了厮打起来，常有人告他的状。为这，贺龙没少批他，就差拿烟袋杆敲他的脑袋了。

我也曾经挨过贺龙的批评。在攻占桃源期间，6师兼任桃源城防警备司令部，我跟师长钟炳然把在语溪河战斗缴到的一挺轻机关枪抬去试枪。枪打响了，我俩高兴得忘乎所以。

贺龙和肖克匆匆跑来，问：“发生了什么情况？是不是沅陵方向的敌人来了？”

我们不在乎地说：“没事，试枪呢。”

贺龙一下子火了，严厉地问：“你们试枪出布告没有？”

我照实讲：“没有。”

贺龙当着肖克军团长的面，把我和钟炳然狠狠批了一顿，直到我俩连声认错，他还余怒未消。

可是对6军团的同志，贺龙的脾气却格外的好，在任用上也统统委以主官。如果说他对部属有什么亲疏之分的话，那就是律己宽人，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与作风。开始我们一些人感到很不理解，抱怨他“偏心”、“不公道”。时间长了，我们渐渐懂得了他维护团结的良苦用心，懂得了我们共产党人的事业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事业，只靠少数人、几根枪是打不得天下的。

领导同志的模范行动，为我们下级干部和整个部队作出了表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就引出了团结的第三个因素，2、6军团的团结不光是几位领导者之间的团结，而是贯彻到了整个部队和每一位同志。“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大家确实都有这样的认识和觉悟。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讲过：“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可以说这是对当时整个革命队伍的真实写照，也是红2、6军团会师之后的真实写照。

我在担任2军团组织部长期间，对此有着深刻的感受。

我们组织部是会师后随6军团政治部一起搬来的。我当部长时人不多，组织干事肖新春、青年干事颜金生等，都是6军团来的。颜金生是个红小鬼，也是个“老资格”，12岁入团，14岁入党，原是6军团的一位政治指导员，

调来 2 军团组织部当青年干事，管着全军的共青团工作。

除了几个干事，以后又调来一位女同志当副部长。她叫李贞，从童养媳当了红军。会师后她从 6 军团调到湘鄂川黔军区当组织部长，我们开会时见过几次面，以后军区驻地塔卧受到敌人进攻，她调来 2 军团组织部当副部长。李贞是个精明强干的女同志，她党性强，工作积极，作风朴实，得到我们 2 军团同志的敬重。此后，我们之间的友谊得以长期的保持，直至这位共和国的第一位女将军 80 寿辰时，我们还在一起同唱“洪湖水浪打浪”呢。

我们组织部的人虽然来自两个军团，但大家合作得很好，相互信任，亲密无间，从来没有什么谁是哪个山头之分。我们统管全军党务和干部工作，在干部的调配使用上总是从全局来考虑，唯贤是举，唯能是任，无亲疏厚薄之分。

我了解到任弼时政委身边的警卫员余秋里原是 6 军团的一位连队政治指导员，在湘赣苏区红军学校学习过，6 军团从湘赣出发时把他调去给中央代表任弼时当警卫员。我向弼时政委提出：

“现在跟会师前的情况不同了，我们部队扩大了，干部很缺，警卫员到处都可以找到，是不是把余秋里调出来，到下面当干部。”

弼时政委同意了。我们组织部就把余秋里派到 6 师 18 团担任党总支书记，不久又当了团政委，以后他一直是我们这个部队中一位优秀的政治委员。

有许许多多的同志从 6 军团调到 2 军团后，就在这里扎下根，和我们成了生死患难几十年的战友。这两支部队从会师后，也再没有分开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始终并肩战斗。

直到今天，我们 2、6 军团的老战士碰到一起，提起当年的初次相会以及共同创造的辉煌战绩，都忍不住同声感叹：

“我们是模范的会师！”

第五章

长 征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

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

长征的胜利，曾宣告了敌人围追堵截的破产，开创了革命战争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1935年11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第6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于1936年10月22日胜利抵达宁夏将台堡，从而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结束了伟大的长征。

在长征中，我在红2军团第6师担任政治委员。凭借马灯、篝火、月光，我曾逐日记下了那一段段艰苦的历程。遗憾的是，这些日记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全部失掉了。但是，正如长征这块用红军的血与肉铸就的革命基石和历史丰碑永远铺垫在共和国的大厦里，永远矗立在亿万人的心目中一样，长征的伟业及其精神也始终铭刻在我的心里。长征路上，那长眠的战友身影，那鏖战的枪雨剑幕，那跨越的万水千山，那激荡的革命正气，时时扑面而来。

跳出堡垒区

1935年11月，红2、6军团收缩到苏区中心不久，在桑植县刘家坪的总指挥部驻地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

这天，阴雨绵绵，秋风瑟瑟。我们围坐在一盆炭火边，听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下达冲破敌军“围剿”、实施战略转移的计划。苏区面临的形势，也象这屋外的天气一样，阴冷肃杀，寒气逼人。

当时，中央红军和红4方面军已相继长征到了西部地区，长江以南只剩下这一支主力孤军奋斗，威胁武汉、长沙等国民党统治的腹地。蒋介石调集130个团的正规军，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30万兵力，以堡垒为依据，从四面八方湘鄂川黔苏区中心围攻上来。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形势一天天严峻。为此，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2、6军团以迅速果敢的行动从南面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进入湘中无堡垒地区，进行胜利的运动战，求得在湘黔边广大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会后，郭鹏师长和我回到6师，立即传达党的决走，进行思想动员。

我们把面前的困难以及战胜困难的办法如实向部队讲清楚：大批敌军已经包围上来了，要想在日益狭小的苏区内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只有跳出去，跳到敌人后面，跳到没有堡垒的地方，跟敌人打运动战，才能取得胜利。同时，我们根据上级所发材料，向部队宣传全国苏维埃运动和抗日反蒋运动的新发展，宣传中央红军长征在川西取得的胜利（由于2、6军团与党中央电讯联络中断，我们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北上陕甘），使同志们从中看到光明的前途，树立必胜的信心。

部队的动员本来比较容易。因为过去经常遭到敌人“围剿”，在苏区内打不退敌人时总要跳到外线去。我们把这些情况讲清楚了，战士们也就明白了。不过这次却遇到一个特殊的问题：虽然没有哪个人讲突围后不回来了，

可我们都清楚这次突围跟以往不同，能不能回来？何时回来？很难讲。估计会走得更远一些，时间更长一些。因此，要离开苏区，离开家乡，离开生养我们的红色土地和父老乡亲，大家都有一种依依不舍之情，有的还受着“故土难离”观念的羁绊。特别是我们红2军团，从干部到战士，有许多人本身就是苏区子弟，不仅是新编的第5师，而且在4师、6师两个老部队中间除了洪湖籍外，湘鄂边的人也很多。为了保证这些战士在离开苏区后坚决地执行战略转移任务，各个党支部专门做了教育工作，除了讲抗日反蒋的斗争形势和任务之外，还引导大家放开眼界干革命，自觉破除乡土观念。认识提高后，许多苏区籍指战员主动向自家的亲属做解释工作。

在思想动员、教育的同时，我们组织全师进行政治、军事、物资方面的突围准备，以使部队能比较充分地应付今后的困难。政治准备，由我负责，主要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紧发展了一大批新党员，整理、充实了各连队的党支部，并对党团员作了专门教育。军事准备，由郭鹏师长负责，突击训练了扩大来的新战士，演练运动战所必需的战术、技术。物质准备，主要是动员轻装，把所有不必要的东西减掉，每个人打了三五双草鞋。

在此期间，2、6军团整编了部队，把桑植、大庸、永顺、龙山等几个地方独立团编为2军团第5师和6军团第16师。我师18团团长贺炳炎17团政委谭友林调到5师担任师长、政委。整编后的2、6军团各辖三个师，总计2万人，分别集结在刘家坪、瑞塔铺两地，准备突围。

苏区群众从苏维埃政府动员坚壁清野中知道红军要走了，很多人赶来看望自己的子弟。6师师部住在刘家坪旁边的一户独立人家，附近一位老太太的儿子就在师里当兵。6师还有很多家属都是我的熟人，她们从洪家关、樵子湾来了很多，直接到师部找到我，言辞恳切地说：

“汉生，我这个儿子交给你了……”

“汉生，我的丈夫交给你了……”

其言其情，感人至深。

我不能不承诺下来：“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的。有我廖汉生在，就有你们的儿子、丈夫在！”同时我也对来队家属做工作：“红军走了，白军来了，苏区人民要吃苦的，请多保重，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一定会回来的！”

俗话说，一诺千金啊。我对乡亲们的一句承诺，竟使我从此背上了永难偿还的感情债。她们的儿子、丈夫有许多都在长征中牺牲了，有些连牺牲在什么地方我也很难说清。这笔沉重的感情债，在我心头压了几十年。全国解放后的30年间我也迟迟没有回去看望故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一想到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一想到那些红军家属们，我的心就不安起来。

我自己的家离师部住的地方不太远，骑马也就是个把小时。我也很想回去一趟，见见家中的亲人们。但我是师的政治委员，我的一言一行都影响到全师同志的情绪，我没有回去，埋头于突围准备。出发前夕，我妈妈和肖良良赶来驻地给我送别。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几十年，一走就是几万里。

1936年11月19日，红2、6军团除留下18师担任掩护、策应外，踏上了战略转移的万里征程。前一天，我6师奉命先行出发，向大庸方向警戒。

在我军的面前，敌人沿澧、沅二水构筑了两道堡垒封锁线。6军团前卫在大庸城边的张家湾首先抢渡澧水，搭起浮桥。我6师担任后卫，隐蔽在岸边的桔子林里。那天，敌人飞机频繁出动，来回轰炸、扫射。我师在桔子林里隐蔽了五六个小时，又饥又渴，挂满枝头的桔子都已经熟了，被敌机震落

的俯拾即是，全师却没有一个人捡摘老百姓的桔子充饥解渴。我们就这样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接着，2、6 军团迅速插到沅陵东北的洞庭溪、大宴溪，抢渡沅江，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至此，我们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乘虚南下湘中。2 军团 4 师、5 师占辰溪，6 师占淑浦，6 军团占新化、兰田、锡矿山。

湘中腹地，敌人兵力空虚，主力都调去“围剿”苏区了，被我军甩在身后，剩下的团防武装也在我军锋芒指处望风而逃。

在离淑浦 15 公里的地方有一股敌人的杂牌武装，我师参谋长常德善率 17 团到那里打了一仗，第一天打成对峙，第二天师主力全部赶去，把这股敌人消灭了。但 17 团团团长范春生不幸牺牲，他是我师在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个团级干部。

除了打仗之外，2、6 军团在湘中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团体，扩大红军。我们师部住在淑浦县城的天主堂，每天组织各团在城里和乡村进行群众工作、扩红工作，由于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和抗日救国主张深受群众拥护，扩红一天就达百人以上，两大就可成立游击队，在城里还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和职工联合会，争取其整批地加入了红军。

2、6 军团向湘中这么一走，打破了敌人企图将我压缩围歼于苏区内的部署，把大批敌军牵向湘中。当敌“追剿军”从湘西开到后，我军又走了，经湘南西进湘黔边界。在洞口县的瓦屋塘，我军遭遇敌陶广纵队阻截，5 师师长贺炳炎负重伤，右臂骨头被打碎。我军虽经激烈战斗仍未能冲开西进道路，遂绕道西行。

1936 年元旦刚过，2、6 军团来到湘黔交界的晃县、玉屏，接预定设想在这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敌李觉纵队紧跟上来，先头一个师从便水一带渡过沉水河，向晃县追来。2、6 军团立即沿河的左右两岸向便水渡河点迎敌。

6 师赶到作战位置后，4 师代理师长金承忠率部正从我师指挥所面前过。金承忠和我师师长郭鹏都是从 6 军团调来的，他在 4 师当参谋长，我曾两次在 4 师代理过政委，因此大家都很熟。郭鹏和我看到金承忠从面前过，就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喂，我们打了胜仗以后，请你喝酒！注意，你老兄可不要打死哟。”

过去我们打仗时经常这样开玩笑。打的仗多了，生死大事都在笑谈之中，谁也不在意。

金承忠对郭鹏和我笑了笑，答应了一句：“好哇！”带着 4 师向敌先头部队发起突击。

没想到，我们这个玩笑开过仅仅十几分钟，金承忠就牺牲了！我们又痛心又懊悔，真不该跟他开这个玩笑。打这以后，我再也不开这样的玩笑了。郭鹏师长和我带着对金承忠同志深深的痛惜，指挥全师与敌展开激战。

战斗进行中，敌纵队司令李觉率一个师窜到军团总指挥部机关所在的龙溪口，那里只有一个团负责保护总指挥部机关，主力部队急忙从便水返回龙溪口阻敌。我师 16 团参谋长常海柏为掩护总指挥部机关牺牲了。

由于便水战斗没打好，未能有效地消灭敌人、阻住敌人，2、6 军团原拟在湘黔边立足、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落空了，只好继续向西走，几天后到了黔东的石阡、江口。长征出发时留在苏区的 6 军团 18 师也突破重围到达江口，与主力会合。

转战黔西北

1936年1月中旬，红2、6军团乘贵州的国民党正规军堵截部队尚未赶到，在石阡地区从容地休整了个把星期。

在石阡城一座规模不小的天主堂里，总指挥部召集连以上军政干部举行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任弼时政委给我们讲话，他根据部队收集的白区报纸上关于一个月前北平等地相继爆发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报道，对全国的民族革命形势作了简要的分析。尽管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的“12.9”运动，但我们从中看到了党和红军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赞同，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这将大大地有利于我们的长征，大大地有利于全国抗战的发动。

任弼时政委在会上提出了2、6军团新的任务。他说：“我们原准备在湘黔边界搞根据地的，现在敌人来了，我们还要继续向西走，到贵州西部，以战斗的胜利创造新的根据地。”

会后，我们利用休整，组织部队总结了前一阶段长征的经验，检查了指战员的政治情绪，针对一些同志认为“便水无堡垒也不能消灭敌人，还有什么仗好打？”“贵州山多，人都会拖死的。”这样一些消极情绪，进行了批评、解释和教育工作。

经过石阡七天的休整，我们又以饱满的斗志和充沛的体力，投入长征。

石阡以西，贵州的国民党军第23师设置了由数公里至数十公里纵深的堡垒封锁线，企图阻挡红军深入黔境。向敌封锁线接近时6师走后卫，正在行进中，前边传来贺龙总指挥命令：“传18团跑步前进，赶上前去！”

成本兴团长、余秋里政委立即带着18团跑步上前，受领了突破封锁线的任务，一下子消灭了敌23师一个营，在堡垒群中打开一条通路，还缴获敌人新装备的一支20响驳壳枪。过去我们的驳壳枪都是打单发的，这次缴的20响驳壳枪既可以打单发又可以打连发，手指头勾住扳机不松，哗哗哗，20发子弹全打出去，象机关枪一样。这是我们部队第一次缴到20响驳壳枪，郭鹏师长高兴得爱不释手，成本兴团长、余秋里政委把这支枪送给了郭师长。

沿着18团打开的通路，2、6军团顺利通过了封锁线。

1月24日是农历春节。2、6军团攻占瓮安，我6师在瓮安县一个叫“猪场”的小地方吃了顿年夜饭，即随主力向贵阳挺进。

在距贵阳城北30余公里的扎佐一带，敌军仍有一道堡垒封锁线。6师走后卫，避开敌人的堡垒，从看似难以逾越的崖涧上奇兵飞渡。这道崖涧深达数十丈，涧水不宽却很急，两边是陡峭的绝壁，一条绳索凌空飞架，上面挂着一只木斗，我们一次一个人坐进木斗攀绳而过。过去后，我师冲开封锁线，打下了修文县城。

2、6军团兵逼贵阳、攻占修文的举动，迫使敌军一面向贵阳收缩，一面向乌江北岸严密布防，以防我沿一年前中央红军的老路北渡乌江，攻取遵义。我军却出其不意，西渡乌江上游的鸭池河，进军黔西北。

鸭池河是乌江的上游，也是黔西北的门户。总指挥部把突破乌江天险的任务交给了6师。

2月1日夜，我师冒着冬雨，踩着泥泞，一夜疾行60公里，扑向鸭池河

边。师部一参谋（相当于现在的作战科长）王绍南带着由师和各团侦察员组成的一支百多人的便衣侦察队，伪装成国民党正规军，摸进河边的黔军阵地。敌军一个连正在睡大觉，等他们知道是红军时要反抗已经来不及了，全部当了俘虏。接着，侦察队占领渡口，用机枪打跑了对岸守船的敌人，招呼船工撑过来几只小船。这时，天已大亮，前卫 18 团也已赶到，一面以猛烈的火力压制对岸高山上的敌军，一面组织强渡，而后搭设浮桥，让大部队通过。

2 月 2 日，2、6 军团仅用多半天时间就渡过了乌江天险，将尾追而来的敌军两个师甩到了身后。

6 师先行渡过鸭池河后，分别从公路和小路翻过高山，奔袭黔西县城。几天后 5 师进占大定（今大方县），6 军团进占毕节。2、6 军团在黔、大、毕地区铺开摊子，摆开架势，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创建红色根据地的斗争。

我师袭占黔西县城的当天，砸开了国民党县政府旁的监狱，解救出 300 多名被关押的百姓，给他们治伤医病，洗理更衣。他们中的一些人当场报名参加红军，一些人回到乡下把红军到来的消息带给贫苦百姓。师团营连纷纷派出宣传队、工作队、扩红队，深入城乡各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取消苛捐杂税，开展土地革命，组织武装，扩大红军。

人们都说贵州是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地方、苦地方，黔西高原更穷，更苦。红军到这里时，正值春节刚过，元宵将临，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片凄凉惨苦的景象：有的人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有的人栖身岩洞，衣不蔽体……这里的贫苦百姓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干人”。与此相反，在土豪的家里却囤积着清代的贡布、洪宪的银元、陈年的苞谷。

红军指战员深入到村寨岩洞，跟“干人”们促膝交谈：“你们说，自己种的苞谷自家却没得温饱，哪里去啦？”引导他们看到，“干人”之所以成为“干人”，是被土豪官府榨干了血汗！要想改变“干人”的命运就必须起来革命，打倒土豪，推翻官府！

我们把土豪中谁个巧取豪夺、鱼肉百姓，谁个勾结官府、横行乡里，摸得一清二楚，而后召开群众大会，公布其罪恶，由“没收委员会”没收其不义之财分发给“干人”们。

“干人”们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其革命热情如烈火干柴一下子点燃起来，在红军的帮助下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起大大小小的游击队，踊跃参加红军。

在各部队分兵扩红的同时，总指挥部也直接派人去做当地一些旧式武装的争取工作。黔、大、毕这个地方，拖枪的人很多。这里过去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势力范围，一年前蒋介石借堵截中央红军搞垮了王家烈，一些武装对蒋不满，还有“一些武装原本就是反王家烈的。总指挥部一方面以贺龙个人的名义，一方面以红军反蒋反王家烈的名义，对当地几支武装进行了联络、联合、收编。当红军从黔、大、毕继续长征时，这几支武装自行脱离，6 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去争取一支队伍，徒涉过河，溺水牺牲了。

2、6 军团在黔、大、毕驻扎 20 余天，扩大了 5000 多名新战士，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建立了一块临时根据地，把革命的红旗树立在黔西高原上。

蒋介石对此极度恐慌，迅速调来近 120 个团的兵力，进行围追堵截，敌万耀煌纵队抢先进入黔西。6 师在黔西城的西北边与敌人打了一仗，18 团参谋长贺崇禄在战斗中牺牲。6 军团 17 师师长吴正卿率该师从我师位置前过，

郭鹏和我跟他扯了几句，吴正卿离开没多久，就在夺取打鼓新场的战斗中牺牲了。以后，6师在黄家坝阻击敌郝梦龄纵队向大定进攻之先头，俘获人枪数十；4师、5师各一部配合6军团17师在将军山击溃敌万耀煌纵队向毕节前进之先头，俘获人枪数百，17师在将军山顽强阻击数日……这些战斗虽然取得一定战果，但未能挡住敌人进攻，黔西、大定、毕节相继被敌占领，2、6军团遂放弃这一地区，继续向西长征，进入黔滇交界的乌蒙山。

在此后一个月里，2、6军团与围追堵截的敌军展开一场气势磅礴的千里回旋战。我们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牵着敌军在乌蒙山中盘旋往复，把敌人转得晕头转向。在赫章县的则章坝，我6师与4师相配合，伏击敌万耀煌纵队的后梯队，俘敌人枪200余，敌纵队司令万耀煌只身逃脱，险些被活捉。战斗中，我和18团团长成本兴、政委余秋里在一个山包上指挥部队出击。成团长正要冲下山去，敌人的一串“花机关枪”子弹打来，余政委喊了一声：“危险！”伸手把成团长拉了回来，他自己的左手骨头被打断。他包扎了一下，坚持不下火线，左臂再次负伤，直到黄昏后部队撤离则章坝，才被送进军团卫生部。这以后，他离职在卫生部治伤，由于无药可医，生活又异常艰苦，他的伤迟迟不能痊愈，行军中我常常可以看到他用一块凉水手中敷在伤处镇痛，直到长征后期才作手术，截掉了左手。

余秋里负伤离职后，总指挥部下令调4师副政委杨秀山接任18团政委。杨秀山二话不说，打起背包找到6师师部，向我报到后，下到18团去了。

3月底，2、6军团经云南的宣威进入贵州盘县，拟在这里创造根据地。因接连收到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名义发来的电报，要求2、6军团渡金沙江北上，2、6军团遂根据总的形势，改变自长征以来试图在长江以南建立和保持一块根据地的战略意图，开始北渡金沙江，会合1、4方面军的新的战略行动。

抢渡金沙江

1936年4月初，2、6军团分左右两路西入云南腹地，占领沾益、曲靖，我6师占领寻甸。而后2、6军团挥戈直指普渡河边，计划西渡普渡河后经元谋北渡金沙，直上四川。这条路线也是一年前中央红军的北上路线，敌人已有防范，川敌沿金沙江严密布防，云南军阀龙云调集滇军围堵上来，并指挥从湖南、贵州尾追而来的各纵队加速追击。

4月8日，前卫4师从普渡河铁索桥下游强渡过河，即被河西守敌所阻，原打算继4师后渡河的6军团在河东与敌孙渡纵队遭遇，后面敌几个纵队迫近，其先头距我不足百里。2、6军团面临着被敌压缩包围在普渡河边的危险境地。总指挥部审时度势，决定改变原计划，转兵滇西由金沙江上游北上。此举成败，关键在于能否阻敌追兵，为全军转移脱险赢得时间。

9日凌晨，我后卫6师经夜行军后到达甸尾、可郎一带宿营。没有睡多大会儿，总指挥部来人传达贺老总的命令：要6师即刻原路返回，赶到六甲，最好赶过六甲，阻止敌人的追击，掩护整个部队行动，一定要狠狠地敲！抢时间，抢地形，什么都不要怕！

郭鹏师长和我研究了一下，决定全师后卫变前卫，马上出发，以强行军向六甲开进。先一天行军时，18团是后卫，部队一回头，他们改前卫，我们再到18团下命令已经来不及了，郭鹏和我分头通知16团、17团，同时派人

给 18 团交待任务：

“这次返回去是阻止敌人的追击，估计时间、距离和敌我行军速度，很可能在六甲打一场预期遭遇战。”

我们边走边下达具体部署，边进行战斗动员：“同志们，这是一场关系到全军安危的战斗，我们要不怕疲劳，不惜牺牲，坚决阻住敌人！”

上午 9 点多钟，前卫 18 团果然在六甲与敌龚顺壁旅先头遭遇。敌人想不到红军会在这里打它个回马枪，毫无戒备。18 团在成本兴团长、杨秀山政委指挥下，立即按预先部署，争取先敌之利，先展开先开火，消灭了敌人先头部队，并抢占了右侧的小山岭。敌人后续部队向 18 团反扑，枪声传到后面，我们趁势发出号召：“同志们，18 团已经打响了，冲上前去啊！”师部带领 16 团迅速赶上来，在 18 团左翼的另一山岭占领阵地，随后赶到的 17 团在后侧山凹里设置了第二道防线。

这一仗打了一整天，打得相当残酷。敌龚顺壁旅在大炮、飞机的火力掩护下，发起数次集团冲锋，都被打了回去。我师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全师伤亡 220 余人。18 团政委杨秀山、参谋长陈刚负伤了，三个营长伤亡两个，九个连长伤亡八个。16 团参谋长牺牲，两个营长牺牲，六个连长负伤。师长郭鹏也在指挥 17 团掩护部队撤出时负了伤。尽管伤亡这么大，但是指战员们打得顽强，打得英勇。上一级倒下了，下一级马上代理；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石头拼杀；敌人爬上了阵地，抱住他肉搏。

敌人的疯狂冲击，靠的是炮火壮胆，督战队威逼。我们顽强阻击，靠的是灵活有效的战术技术，靠的是深入有力的战场鼓动，靠的是旺盛高昂的战斗意志。就这样，我们硬是把敌人死死顶住了，又在 5 师增援部队的配合下把敌人打退了，为使全军摆脱被敌前堵后追两面夹击的危险境地赢得了十分宝贵的时间，为实现抢渡金沙江北上的战略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天黑后，我师赶上安全转移的主力。贺老总疼爱地说：“你们这一仗打得苦啊，打得好啊！”

接着，他又给我们交待说：“这一次情况很紧张。明天敌人飞机来了都不要躲，还是要行军。要保住本钱，就看我们能不能摆脱敌人啦。”

我把贺老总的勉励和要求传达下去，全师同志情绪倍增，决心再接再厉，连续作战。

第二天，我师担任全军前卫，急行军南下昆明附近。18 团仅以一个连兵力就乘虚攻占富民城，震动了相距 20 公里的省城昆明。此时昆明已是一座空城，2、6 军团集结富民，故意摆出一副攻打昆明的架势，吓得龙云急令围堵红军的大批敌军回师救援。2、6 军团则掉头西去，甩开敌人，向滇西的金沙江上游急进。

从昆明到滇西，沿途地势平坦，田野宽阔，给养丰富。敌人的正规军都叫龙云调去守昆明，且被甩到身后；前方各城仅有民团性质的常备队担任防守，战斗力甚差。由湘黔两省入滇的敌“追剿军”经长途行军和屡遭打击后，疲惫不堪，减员很大，不敢象过去那样衔尾紧追，只在后面保持二、三日的行程跟进。敌人的飞机每天天一亮出来侦察，骚扰，天黑后就不见踪影。红 2、6 军团兵分两路，夜行晓宿，沿汽车大道长驱直入，畅行无阻。各师交替担任前卫，开展了一场夺城大赛，几乎是一日克一城。

4 月 18 日夜，我前卫 6 师来到祥云城下，先头 18 团立即攻城。该团一个“小鬼”从城洞子里钻进去，打开城门，大部队一涌而入，只半个钟头就

占领了全城，活捉县长、团总和 2000 多名常备队员。

师部入城后，刘型主任带着政治部工作人员把那些惊恐不安的常备队员集中起来开会，宣传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解除其恐惧心理。那些人多是农家之弟，在红军入滇时被强拉壮丁编入常备队，挖壕筑堡，看守城池。政治部的同志发动他们起来揭露土豪劣绅、保长村长剥削压迫的罪恶，揭露反动军队抽了制的罪恶，同时给他们解释红军主张，搞清“当兵就要当红军”的道理，争取了其中的 1000 多人参加红军，编成一个新兵团，随师主力踏上长征的道路。经过十来天的边行军边进行军政突击训练，这 1000 多名新战士全部补入战斗部队，紧跟着就开始了爬雪山、过草地那一段最艰苦的行程。尽管他们当中一些人受不了那样的苦，开了小差，但绝大多数还是坚定地走下去，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为优秀的红军战士。

至于那个被捉住的国民党祥云县长，50 年后，祥云县为编写红军长征史料，来信问我：“红军捉住的那个县长哪里去了？是不是杀掉了？”

我记得，长征中 6 师先后捉住过几个县长，都没有杀，因为红军是有严格的政策和纪律的。为了搞准确，我又问了当年的 18 团政委杨秀山，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没有杀，你们师部命令，把他交给师政治部，后来放了。”

继 6 师占祥云之后，2 军团以 4 师为前卫，向北连克宾川，鹤庆、丽江。从富民出发时走右路的 6 军团，在连克盐兴、牟定、姚安、盐丰后于宾川与 2 军团会合，同抵金沙江边。

从祥云开始，总指挥部向全军正式提出了“渡金沙江北上，会合中央红军”的号召，一方面要求“扩大红军一万人”，一方面要求准备皮袄、棉衣、生姜、辣椒。对扩红，大家信心满大。但对准备那些东西，许多人不理解：

“大热的天，准备这些干什么？再说，叫我上哪里找啊？”

我心里也不十分明白，但我相信上级的指示总是不会错的。

我们向全师进行了渡江的紧急政治动员，发动大家尽力按上级要求去做。由于时间来不及，也由于一些同志思想重视不够，虽然做了准备但很不充足。

4 月 26 日，2、6 军团来到金沙江边。前卫 4 师在石鼓找到一只船，并绑扎木排，先行渡江。我带 6 师 16 团到石鼓后，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给我和 16 团团团长顿星云、政委汤成功下达命令：“沿江上，哪里有船从哪里过。”我们即率 16 团溯流而上，寻找新的渡口和船只，先期渡江的 4 师 12 团也和我们夹江并进，相互呼应。在离石鼓 60 公里的巨甸，我们找到了一只船，遂从那里渡江，6 军团 16 师也随 16 团之后渡江。经过三个昼夜抢渡，全军人马胜利渡过金沙江。

当大批敌军在蒋介石、龙云乘飞机巡视督逼下赶到金沙江边时，红军已经隐入雪山藏区，敌人只好望而却步。

金沙江水，喧腾奔涌，为红军唱着英雄的赞歌，对敌人发出无情的嘲笑。

北上甘孜

5 月 1 日，2、6 军团进驻中甸地区休整，庆祝转战湘黔滇取得的胜利，准备完成新的任务。

总指挥部在中甸县城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任弼时政委向我们宣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中央提出的“在西北创造全国抗日根

据地”的任务，关向应副政委总结了从刘家坪出发到中甸这一段长征的情况。会议提出了2、6军团目前的任务是，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过雪山藏区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会议还对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做了专门的说明。

我们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全师党团员和战士中去，普遍进行了“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创造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战胜艰苦困难的教育，在藏民区执行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的教育，并动员部队充分做好通过雪山藏区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资准备。

如果说前一阶段的长征，主要是跟围追堵截的敌军作斗争的话，那么从这时起，我们主要是跟自然界罕见的困难作斗争。

过金沙江以后，敌军的追堵暂时停止了，大的战斗没有了，只是有时会碰到零星的藏族反动头人武装打冷枪。4师12团政委朱辉照就是第一个遭冷枪射伤的。4师师长卢冬生从6师把18团政委杨秀山要回去担任12团政委，由董瑞林接任18团政委。

同时，我们面临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却急剧恶化。

一方面是大雪山，山高路险，气候多变，空气稀薄，行进艰难。到中甸的那天，我们就翻越了第一座大雪山。上山前本来天气不错，风和日丽。一上雪山，气温骤降，狂风卷着积雪扑面而来，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喘气都很困难，胸口憋得象要爆炸。由于是第一次过雪山，缺乏经验，准备的也不充分，有的同志走不动了，还象过去翻山那样坐下来休息，却再也站不起来了；有的同志耐不住干渴，抓起几把雪吞进肚子，从里到外都冻僵了；还有的同志走着走着，一口气喘不赢，一头栽进雪窝，停止了呼吸……

从中甸再往前，横断山脉连着康藏高原，到处都是雪山，道路更加崎岖艰难，我们吸取教训，摸索出一套办法。

另一方面是藏民区，人烟稀少，给养匮乏，言语不通，习俗不同。初进藏民区，我们住的是藏家木楼，楼下关牛羊，楼上住人，没得铺盖，就睡在楼板上，盖一张羊皮，楼下牛羊的臊气冲鼻而来，叫人无法入睡。上下楼的梯子其实就是一截树，树身上用刀砍出一个个脚窝，攀树而上。我们吃的是一种叫酥油糌粑的食物，把青稞麦炒熟后磨成粉子，用酥油拌和，盛在木碗里用手抓着吃。开始大家都吃不惯那股味，不愿吃，政治机关专门发了材料，解释藏民的这种食物其实对身体健壮是很有好处的。再后来，断了粮，我们想吃也没得

这种困难的程度，是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的，甚至大大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到的。过江之前，总指挥部曾提出过“扩大一万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口号，现在完全落空了，连人都见不到，就是现有的18000人能不能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掉队的、冻死的、病饿而死的各种非战斗减员与日俱增，甚至超过了前一阶段的战斗减员。

随着环境和任务的变化，我们的一切工作都由保证战斗的胜利，转变成动员和组织部队为了行军和生存而斗争。

从中甸出发后，2、6军团分左右两路北上。2军团为左路，在西，走德荣、巴塘、白玉；6军团为右路，在东，取道定乡、稻城、理化、瞻化，共同向甘孜前进。2军团走的这条路，贴近康藏交界的金沙江，人烟更加稀少，道路更加坎坷，沿途尽是大雪山。气候怪异多变，忽而大雨倾盆，忽而飞雪漫天，忽而冰雹盖地。每过一座雪山，常常要付出十几、几十甚至上百名同

志的生命，我6师仅这段路就牺牲了137人。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死亡和掉队，我师在翻越雪山时，进行了大量的尽可能充分的政治动员和准备工作。上山前各级政治干部向部队反复宣讲过雪山的纪律和注意事项。解释为什么不能在山上坐下休息的道理。各党支部召开会议分析可能掉队的人员，组织体力好的党团员分工扶助病员，借衣物给他们御寒。各连队在山脚下烧好开水，放进辣椒，让每个同志都能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上山后，组织大家开展体力互助和宣传鼓动，有的同志支持不住倒在雪窝里，我们用尽一切办法也要帮助他重新站立起来。同志们互相鼓动着，搀扶着，紧紧地跟着风雪中飞舞的红旗，翻过雪山。

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上百里才能见到人家和喇嘛寺。藏民和喇嘛在红军到达前因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头人威胁早已逃避一空，连牛羊粮食也都带走或藏匿起来了。部队要行军，要吃饭，不得不自行筹粮。在筹粮中，我们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尊重藏民风俗习惯。从总指挥部到师以下部队都建立了政策纪律检查组，发现问题立即处理。部队的自觉性也很高，不论是谁，找到粮食后写个条子，说明北上的目的和困难，留下足够的银元作为赔偿，后来又把留钱改为打借条。

5月中旬，我师随总指挥部来到西康的得荣县城。我们原以为在得荣筹粮容易些，没想到所谓县城竟只有三家旧屋。县长在逃跑的路上被我师捉住了，他是湖南长沙人，不晓什么原因被贬到这个偏僻穷苦的地方，堂堂“县长大人”还要搞副业，打草鞋卖。贺龙总指挥看他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把他放了。

得荣之穷，可想而知。

我们筹不到粮，只好自己想办法。16团第2连在一个牛圈里挖到一大缸青稞。指导员钱治安在牛圈旁召开了党支部委员会，讨论怎么处理。吃吧，怕主人家回来有误解；不吃吧，部队正饿着肚子。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形成决议，取出粮食，放入银元，并留下一张字条，郑重地署名“中国工农红军二连”。

从得荣出发后，部队接连翻越了几座雪山，向巴塘前进。一天宿营后，军团参谋长李达来到6师，向郭鹏师长和我传达了总指挥部的命令：“军团直属队已经断粮了，你师把粮食拿出来，另外去筹粮。”李达参谋长摊开地图，指点了金沙江右岸的一个地方，接着说：“筹到粮食后，不要再回头，沿金沙江直接向北前进。”

郭鹏师长和我受领任务后，立即向部队进行了动员。部队出发经过总指挥部驻地时，路两旁已经摆好了箩筐。郭鹏师长和我率先把自己粮袋里的青稞粉子倒进去，而后全师依次从箩筐旁走过，每过一人就倒光一条干粮袋子。随着刷刷的脚步声，路旁的箩筐渐渐满起来。

我师在李达参谋长带领下到达指定地点，那里的青稞麦还没有成熟，我们只找到很少一点陈粮，远远不敷全师需用。尽管如此，我师仍按原定路线沿金沙江前进。金沙江的这一段是康藏两省的分界线，西藏当时被英帝国主义所占领，我师到金沙江边即遭到左岸藏军的射击拦阻。我们派人去交涉，申明红军是借道北上，他们就是不允。结果我师又原路返回，追踪主力而行。原定的计划落空了，粮食更少了，又跑了冤枉路，部队中出现了埋怨情绪，有人甚至把这一连串的挫折都归咎于当初的让粮。这种情绪如不及时消除，将会影响到上级命令的执行，影响到部队间的团结。我们及时向部队进行教

育，说明：直属队要保障领率机关的指挥，他们当中还有不少老幼弱病的和女同志，困难比我们更大些；我们是战斗部队，找粮、跑路方便得多。同志们很能理解这个道理，不再说这说那了，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

6月上旬，2军团绕过巴塘，经白玉向甘孜行进。7月1日，6师作为军团后卫到达甘孜西边45公里的绒坝岔，见到了迎候在这里的红4方面军30军88师。该师政委郑维山告诉我们：2、6军团主力已经到达甘孜与4方面军会师了！

第二天，我们两个师并肩赶到甘孜，参加会师庆典。

7月2日晚上，在甘孜古城，两支主力红军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相慕已久的红军兄弟欢聚一起，共叙衷肠；藏族同胞在苏维埃“波巴”政府的带领下载歌载舞，同庆胜利。随4方面军行动的朱德总司令也来出席联欢大会。我第一次见到了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总司令身材魁伟，衣着朴素，神态淳厚、慈祥。他带着亲切的微笑给我们讲话：

“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草地，我欢迎你们来与红4方面军会合！”

接着，他向我们宣布：“中央已于去年带着红1方面军胜利地通过草地，到达陕甘抗日前哨。现在陕甘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我们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团结一致，继续北上！”

联欢会上充满了热烈、欢乐的气氛，响亮的口号彼伏此起：“欢迎横扫湘鄂黔滇康的2、6军团！”“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两支红军的会师，使我们每个同志十分高兴，十分振奋。会师前，我们曾多次进行过会师教育，会师后又亲身感受到兄弟红军的深厚情谊。特别是4方面军那强大的队伍、整齐的军容、严明的纪律和作风，以及许许多多英勇善战的传奇故事，都使我们产生了由衷的敬佩。

同时，我们也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有关1、4方面军之间发生的问题。一路上，我们一直以为在甘孜会合的不光是4方面军，还有党中央率领的1方面军，我们的动员口号也一直是这么提的。到了甘孜才知道，党中央已不在这里，中央红军已不在这里，早在一年前单独北上陕甘了，张国焘同中央分裂了。他还想把2、6军团也拉到他那边去。

在庆祝会师的联欢大会上，张国焘派人来讲话，关向应副政委告诉来人：“你要讲话，可以。但不能讲1方面军和党中央怎么样，不能讲毛主席、党中央是机会主义逃跑。你讲这些，我马上就结束这个会。你只能讲生活问题，讲西北这个地区怎么样生活。”结果，这个同志在会上向我们介绍了糌粑粉子和牦牛毛织的呢子布怎么好。

张国焘还以红军总政治部名义给2、6军团发来两种小册子：一个叫《西北讲座》，是讲西北地区生活的；一个叫《干部必读》，讲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是什么机会主义逃跑。这两种书发到师部以后，我们已有警觉，没有下发。

当天晚上，关向应副政委从总指挥部打电话给我，问：“你们把书怎么处理的？发下去没有？”

我报告说：“书刚收到，没有发，还放在师部。”

关向应命令说：“没有发，好。赶紧把书集中起来，给我送来。”

我立即派人把《干部必读》送到总指挥部，只把《西北讲座》留下来，给部队作参考。

张国焘还耍了几个小手段：一个是给喜爱骡马的贺老总送来几匹骡子，企图笼络贺龙；一个是要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到他那去任职，以扩大他那个已被取消了的“中央”的力量；再一个是派人来换掉关向应和洗恒汉、我等三个政委，企图从政治上控制部队。张国焘的这一套被理所当然顶了回去。

贺老总义正辞严地回绝了张国焘的笼络；弼时政委到红军总部随4方面军行动，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继续做张国焘的工作；准备换掉三个政委的人已经到了部队，但没有接任，被关向应谢绝了，留下来和我们一道工作。

为了维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维护红军的团结，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等2、6军团首长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一道，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迫使他同意早日北上会合中央红军。

同时，我们师以下干部和部队，严格遵守上级规定的政治纪律，不利于红军团结的不说、不传、不做，深入进行团结北上的正面教育，学习宣传党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线、中央红军在陕甘取得的伟大胜利和主力红军会师西北的重大意义，号召指战员努力向4方面军学习，学习他们的光荣战绩、优良作风以及草地生活的经验，在团结北上的旗帜下战胜草地，实现会师。

草地情深

在甘孜，奉党中央电令，红2、6军团与红32军合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方面军。32军原是1方面军第9军团，1、4方面军会师后编为4方面军第32军，现在又编入了2方面军。这支英雄的部队在长征中以善打后卫著称，打得很苦，损失也大，现在只剩下千把人，还不足我们一个师的人多，军长罗炳辉一声哨子全军就可以集合起来了。贺老总指挥看到这种情况，把2军团第5师拨给了罗炳辉，后改称第96师，原32军部队改为第95师。

在我们北上的道路上，横亘着茫茫千里的水草地。根据4方面军两过草地的经验，这将是一段漫长而艰险的路程。我师按照上级要求，一面动员全体指战员发扬红军刻苦耐劳的精神，树立战胜草地的决心；一面全力以赴筹集粮食，制作帐篷、背具，进行各种物质准备。

上级通知我们向4方面军学做“背夹子”。所谓“背夹子”是4方面军从川军那里借鉴而来的一种行军背具，两边各有一根木棍，中间用麻绳子拉起来，把衣物装备夹在里面，行军、负重都很方便。上级要求每人都做一个。

郭鹏师长检查时发现师骑兵侦察连没有做，十分恼火。侦察连长申辩说：“我们连都骑马，背包放在马背上，不需要再做背夹子。我们跟常德善参谋长报告过了，常参谋长同意的。”郭鹏看到侦察连没按上级要求做，连长又当面顶撞，更火了，一时气昏了头，竟打了连长几下，还罚全连下跪。

我听到这个情况，也火了，立刻赶到现场，制止了郭鹏的作法，冲着郭鹏师长火气十足地批评道：“你这个作法根本就不象话！人家没有做背夹子，也是有道理的，事先又报告过，你应该听清楚嘛。”我向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琪报告了此事。总指挥部对郭鹏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通报批评，并报经红军总部批准撤销了他的师长职务，从5师调来贺炳炎任6师师长。

对郭鹏师长所犯的 error 及被撤职，我感到痛心和惋惜。他从6军团调到6师当师长以来，我俩个一直合作得不错。他一贯作战勇敢，带兵严格，执行上级命令坚决、不打折扣。他这次发这么大火也是有原因的，是为了贯彻

上级要求，同时他从云南六甲战斗负伤以来，伤没有好利索，搅得脾气变得暴躁起来，常常发火。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次他不辨青红皂白，打骂体罚下属的行为实在太不象活了，这是红军队伍不能容许的。郭鹏师长的撤职，给我和全师干部敲了一个警钟，告诫我们越是在艰苦困难的时候，越是在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越要关心和爱护下属，越要讲究工作方法，克服急躁情绪，防止简单粗暴的作风，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内部团结，齐心协力战胜困难。

6师在甘孜准备过草地的物资不到一个星期，找不到粮食，又移师朱俄喇嘛寺筹借，也没得到多少。这时，主力已先后进入草地，时间不容我们再找了。为了早日通过草地，我们每人只携带一天半量额的青稞粉子，毅然向草地进发了。

茫茫草地，看起来充满了生机，绿草如毡，野花铺地，实际上却是个杀机四伏的死亡之地。茂密的绿草下潜藏着无数个水窝泥潭，稍有不慎踏进去就会陷入没顶之灾，必须小心地踏着先头人马的足迹跟进。草地又是一个人烟绝迹的无人区。走上数百里也见不到一个人影，见不到一处房屋，没有青稞麦，没有牛羊群，给养根本无处可筹，宿营只能睡在荒野。我们的“帐篷”也不行，我跟贺炳炎师长把两个床单搭起来，一边高一边低，钻在里面抵足而眠。草地上天气一日数变，雨雪冰雹时时来袭。即使是在7、8月出太阳的时候，也不觉得怎么暖和，夜晚更感风寒。

草地行军，6师仍然担任后卫。4方面军走前面，2方面军走后面，我们走在最后面。作为后卫，我们不光要完成自己的行军任务，保障主力后卫安全，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收容掉队的同志，不光收容2方面军同志，还要收容4方面军同志，可以说是全军的一个“总收容队”。前面的部队有人掉队了，后面的可以收容他，而从我们这里再掉队那就永远跟不上了，因此我们的责任特别重。不管是哪个部队的同志，我们都象自己的战士一样看待，拿出自己的干粮给他吃，帮助他恢复体力，赶上队伍。

我师曾经收容了一些4方面军的“小鬼”，他们都还是十来岁的娃娃，人小力薄，掉了队。我师尽力照顾他们，带着他们一起赶路。行军中，有的“小鬼”不无稚气地对我说：“以前我们啥也不知道，张主席教我们唱歌子，一唱歌子啥也知道了，毛周张博是机会主义逃跑。”碰到这种情况，我和他们边走边聊，用大量事实来做耐心的解释：“中央红军北上绝不是什么机会主义逃跑，恰恰相反，是为了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担，走上抗日前哨。我们今天不正是沿着中央的路线走吗！”“小鬼”们信服地点点头，目标明确地跟我们一道北上。

越向草地深处走，因疲劳、伤病、饥饿而掉队的同志越来越多，我师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单靠过去那种由政治机关组织收容队和由后卫连收容的办法已经不胜重负。我们发动全师党团员和各级干部都来搞收容，党团员的肩上都背起了“加枪”，营以上干部的骡马都驮起了伤病员。每天一到宿营地，贺炳炎师长和我带着师部人员和骡马返回去接应掉队的同志。我去给战士背“加枪”，搞鼓动。贺炳炎在长征中打断了右臂，背不了“加枪”，就请掉队战士骑上他的骡子，亲自给战士扶鞍认镫，而后把缰绳套在肩膀头上，用剩下的那只好胳膊牵缰引路，他自己拖着被打残的跛脚一拐一拐地走着。骡背上的同志望着贺师长战伤累累的身子，感动地落下泪来。

7月下旬，我师在向绒玉行进途中翻越麻尔柯山，走到山上即下大雨，

跟着又下大雪，冻倒了不少人。师部和两个团滑下山后，天已经黑了，后卫16团及收容的人员没有下得及山，山上又无火烤，风雪一夜不停。贺炳炎师长和我急了，带人带骡马去接应，上了几次都摸不上去，直到天亮后才拼力接应下来。这一夜，仅16团就冻死了几十人，团政委汤成功也冻伤了，全师则有174位同志连病带冻而死。

从甘孜到草地中心的阿坝这段路，预计要走10天左右，结果走了17天，而我师只筹带了一天半的青稞粉子。随着一天天向草地深入，本来就不多的粉子一天天在消减，总指挥部首长给6师从其他师调剂了一些，我师自己也开展节省粮食的运动。我们做出规定：

- 一、各级首长要亲自到连上帮助分发粉子。
- 二、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粉子。
- 三、不到开饭时间不准自由吃粉子。

为了节省粮食，我们师首长带头严守规定，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向战士们强调“要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啊！”组织检查队在路边检查有无随便吃粉子的现象。

就在这时，17团有一个连队政治指导员在给全连分发粉子时，悄悄为自己多拿了一把。此事迅速反映到师部，引起了我们的震动。就因为这一把粉子，这个指导员被撤了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亲自做出处分决定。

这样的处分在今天的环境中看来，也许是过于严厉了，但是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这样做。尤其是一个政治工作干部，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参加红军多年的老战士，他只有带领同志向饥饿作斗争的责任，绝没有为个人谋取一点私利的权力，哪怕仅仅是一把粉子。

我宣布了上级的处分决定，同时对这个指导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流着痛悔的眼泪向全连做了检讨，表示接受教训，当好普通士兵，跟大家一起向饥饿做顽强的斗争。

以后，这个同志由于体力不支掉了队，我再也没有见到他。然而我想，在红军长征的英名录上，应该记上这样一位曾经为一把粉子被撤了职的政治指导员，一位被饥饿和草地吞噬了生命的红色士兵。

7月27日，6师来到号称“草地上海”的阿坝。

上海，我们没去过，但知道那是中国最大的城市。阿坝既有“草地上海”之称，一定错不了，听说是个大地方，人家很多。我们赶到阿坝一看，所谓“草地上海”不过是荒野深处的三个居民点，分作上中下阿坝，人家不算少，还有喇嘛庙，但人都跑光了，前边的部队相继经过这里早把粮食筹尽了，连附近的野菜都给扯光了。

据前边部队介绍的经验讲，屋旁藏民烧火用的牛粪堆里藏有粮食，佛龛上供的菩萨肚子里装有一包敬佛的青稞麦。我师已经断粮多日了，出于无奈只好把一堆堆牛粪挑翻了，把一个个菩萨肚子打开了，结果也没找到多少。全师在这个“草地上海”仍然饿死了十几个同志。17团政委因为筹粮不力，被方面军政治部撤了职，调去重新学习。18团政委董瑞林在一次外出筹粮的路上，不幸被藏族反动头人武装打冷枪牺牲了。同志们含着热泪，手捧董政委用生命换来的粮食，把他掩埋在荒凉的草地中。

为了挽救全师的生命，为了能够走出草地，我们号召全体指战员去捡牛皮，拾马骨，扯野菜，把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拿来充饥。贺炳炎师长和我既要组织部队找吃的，又必须自己解决吃饭问题。一天午后，贺炳炎和我带着警

卫员出去扯野菜，跑了很远才扯到一点点。

贺炳炎看见一团团乌云压过来，劝我说：“算了吧，搞不好一会儿要淋雨了。”

我看了看手里的寥寥无几的野菜，说：“算了？今晚我们吃什么呀？再坚持一会儿吧。”

我们又扯下去，果然倾盆大雨铺天盖地面来，空旷的草地上连避雨的地方都没得，回到驻地浑身上下早就淋了个透，好在总算扯回了一些野菜。

贺炳炎和我俩个倒净了干粮袋，凑出一把粉子，架起锅于，用牛粪烧起火，熬了一锅野菜汤，调入粉子，叫来警卫员一起围坐在篝火旁，一边喝着野菜粉子糊糊，一边烘烤衣服。

为了指导部队采食野菜，我们根据上级政治机关下发的材料向战士介绍哪些可以吃，哪些有毒不能吃。我也根据自己在湘鄂边大山里的游击生活经验，给大家介绍几种野菜。有时碰到谁也认不得的野菜，我们师长、政委先尝尝，证明确实无事，再向全师推广。

干部关心着战士，战士也在关心着干部。一天，我什么吃的都没了。师部几个警卫员不晓怎么保存下一小块草鞋上的牛皮，把两面烧得焦黄焦黄，用小刀刮得干干净净，拿来给我吃，说：“政委，你饿吧？快吃吧！”

我一听就火了：“我饿，你们就不饿？为什么就该我吃？真是莫名其妙！”

“你是首长嘛。”他们不服气地嘟囔道。

我狠狠地把他们几个批了一通，吓得他们垂着脑壳一声不吭。我嘴上发着火，可心里那个难受呀：他们比我也小不了几岁，都是二十来岁的人，谁不知道饿呀？可是他们为了照护好首长，宁愿自己饿肚子，这种感情实在是深啊！

我极力控制住眼眶里的泪水，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反过来劝他们吃了这一小块烧牛皮。结果，推过来让过去，谁也没有吃，送给了更困难的同志。

6师在阿坝休整了几天，找不到粮食，又继续踏入草地，向包座前进。这段路上，全军都已绝粮，许多地方的野菜都被扯光了，沿途倒下的同志一天比一天多，掩埋都来不及，死去的同志口里还含着野草……

就在这难以支持下去的时候，我师在噶曲河边，见到一群羊子，见到了守候在这里的4方面军同志。原来是朱德总司令想到2方面军走在后面困难很大，指示4方面军同志抽出一批牛羊，在噶曲河边设立兵站。2方面军到达后，贺龙总指挥又从中给后卫6师留下几十只羊子。我们得到了一点补充，解救了燃眉之急。在噶曲河边等候我们的还有4方面军的剧团。领队的是一位女同志，叫李伯钊，她是留苏学生，曾在中央红军剧团搞文艺宣传，1、4方面军会合后调到4方面军剧团工作，她们也是奉朱总司令指示留在这里慰问2方面军的。我师围坐在河边的草坡上，吃着4方面军送的羊肉，看着剧团同志演出的红军歌舞，消失多日的笑容重又回到每个人的脸上。红军各部队之间真挚热烈的团结友爱精神久久地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两天后，6师随军团主力渡过牙磨河，由红32军接替后卫。办交接的时候，贺炳炎师长和我送给罗炳辉军长50发手枪子弹，罗军长送给我们二两盐巴。这二两盐巴在当时也是相当珍贵了。

从过噶曲河以后，草地上的小河水洼很多，贺龙总指挥发动大家钓鱼以补充食物。草地上的鱼从没见过人，又多又好钓，我们学着贺老总的办法，把缝衣针弄弯作钩，吊上一节线，一会儿功夫就可以钓上十几条。但无盐无

油，难以下咽，有了罗军长送的盐巴，每次在鱼汤里放进一小撮，味道既鲜美又长力气。

再往前走，逐渐有了牧场和游牧人家，部队可以找到点剩东西来吃，条件一天一天好起来。

8月中旬，红2方面军到达草地边缘的包座，而后翻过腊子口，进入甘肃南部。我们终于战胜了饥饿、死亡，战胜了草地！

会师陕甘

9月初，红2方面军进驻岷山脚下的哈达铺地区，总指挥部驻哈达铺，6师驻脚力铺，部队在这里进行走出草地后的短期休整。

哈达铺地区是回族同胞聚居的地方，人家较多，物产较丰，商业活跃。我们可以在街上买到一种叫“锅盔”的烧饼，从此吃到了饱饭，比起草地来，仿佛从死亡的地狱重新回到人间的天堂。一些战士不懂得饿得太久、太狠不能马上吃饱，一下子吃进过量又干又硬的“锅盔”，口干了又去喝水，结果肚子胀起来，胀病胀死的也有。各级干部不得不继续严格限制战士的食量，经过一段时间后才摆脱了草地遗祸。经过几天休整，我们洗去满身污垢，理掉蓬头长发，补好褴褛的军衣，从身体到精神都焕然一新，准备以新的战斗来最后完成1、2、4方面军的大会师。

9月8日，根据党中央和军委制定的战略，总指挥部发布了《第2方面军基本命令》：“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配合1、4方面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会合”。

命令下达后，指战员们不顾刚刚通过草地减员大、病员多、体力虚弱等困难，连续急行军东出甘陕边。左路6军团向两当、凤县出击，中路由总指挥部亲率4师、32军向成县、徽县出击，右路由关向应副政委率6师向康县、略阳出击。至9月19日，各路纵队顺利攻占了成、徽、两、康四座县城，并在这一地区开展群众斗争，建立临时根据地。

我6师攻占康县后，即把17团和师政治部主任刘型率领的师部及各团的扩红队、伤病员，留驻康县，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成立苏维埃政权。贺炳炎师长和我率直属队、16、18团，由关向应带领继续向陕西的略阳出击。

我们渡过嘉陵江上游的白水江接近略阳县城时，敌情发生了变化，前面略阳敌军增加，后面敌王钧第3军向成县反扑。总指挥部电令我带18团立即赶到徽县。

我向贺炳炎打了个招呼：“你在这里住着吧，我可是要回去了。”而后带18团重返甘肃境内，赶到总指挥部所在地徽县城，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也一同返回。

贺任关首长招呼我在总指挥部吃了顿晚饭，命我带18团连夜赶到成县西南15公里的小川镇，增援4师、32军阻敌。

我们赶到时，4师正与敌军对峙，我带18团从4师12团左翼投入战斗。两个团密切协同，把进攻之敌压了下去。18团团长成本兴、政委周盛宏带着1、2营反冲击，一直冲到小川镇里，与敌人展开巷战。18团政委周盛宏身先士卒，冲在前面，不幸中弹牺牲。敌后续部队会合了退却之敌发动第二次进攻，我急令正在出击的18团两个营撤出镇子，转至原阵地后面的山头上组

织抗击。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我们再次把敌人打了下去。

黄昏时，敌军集中一个旅的全部兵力向我军各阵地发起进攻，仗着人多火力强，不惜代价地往上爬，连老本都豁上了。我军兵力不足，子弹也不多，防守极其艰难。我除了协同成团长指挥 18 团，还亲自带领该团 3 营的一个连守一座山头。我们的人越打越少，子弹也几乎打光了，连长牺牲了，一连人只剩下不多的几个。我从师部带出来的特务班，班长牺牲了，我的三个警卫员也牺牲了一个，负伤了两个。敌人从我们在山坎上挖开的一道口子摸上来，突破了阵地。我们余下的同志不得不带着伤员仓促撤下来，收拢后向成县城撤去。死伤惨重的敌军亦暂时停止了进攻。

这一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月挂中天，银辉洒地。部队踏着月光，带着血迹，匆匆北上。儿时背熟的一首边塞古诗，不觉脱口而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午夜，贺关首长来到成县城，我报告了白天战斗的经过：“我们打死打伤了数百名敌人，自己的伤亡也不小，18 团政委周盛宏牺牲了，12 团政委杨秀山负重伤……”

贺老总指挥仔细查看了伤员的伤势，而后给我交代说：“冬季快到了，我们的长征还没有结束，还要往北走，你带 18 团在成县准备冬衣。”

贺关带 4 师、32 军连夜转回徽县去了。我带 18 团留在成县，收集到一批做冬衣的布匹，而后也撤向徽县。

就在成县战斗的时候，敌胡宗南部已由陕西沿西兰大道进至清水、秦安和庄浪，与天水、武山、陇西、定西的毛炳文、王钧部靠拢；南面，敌王钧部进攻成县，川敌孙震部已迫近康县。红 2 方面军腹背受敌，并有被敌重兵截断于渭水以南的危险。10 月 3 日，总指挥部经中央复电批准，急令全军放弃现地，夺路北上，会合 1、4 方面军。

红 2 方面军仓促撤出徽县、两当，此时 6 师 17 团还分散在康县，收拢不及，与主力失掉联系，其命运令人担忧。我带 18 团与先期回到徽县的贺炳炎师长会合后，贺炳炎告诉我：“部队撤离徽县时，已派常德善参谋长带着便衣侦察队到康县找 17 团去了。”军情紧急，刻不容缓。红 2 方面军边打边走，于敌军缝隙中杀出一条生路、不顾渭河涨水冒险抢渡，经通渭、会宁以东进入宁夏境内。

这时，常德善参谋长率便衣侦察队赶上师部，遗憾地报告：“没有找到 17 团，他们在康县被敌人隔断了。”以后我们陆续得知，17 团在康县孤陷敌中，虽几度突围终未成功，在那里没能生存好久。全团同志有的牺牲，有的负伤，有的被俘，有的流落当地，有的辗转回乡，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同志历经磨难找到部队。带领 17 团在康县扩红的师政治部主任刘型同志也不幸牺牲。

17 团的损失，是 6 师长征中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从我师干部到方面军首长都痛惜万分。从长征出发至进草地前，我师一直保持有 3000 多人，走起路来也称得上是浩浩荡荡，不见首尾，这次一下子就损失了千把人，再加上沿途的损失，只剩下不足 2000 人，因而在团一级下面撤销了营的建制。我走在行军队列中，不禁向贺炳炎师长感叹道：“我们一个师就剩这么点人了，骑在马上可以从队前看到队尾，我们失去了多少好同志啊！”

1936 年 10 月 22 日，红 2 方面军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 1 方面军会师，在此之前，红 4 方面军已在会宁与红 1 方面军会师。至此，我们的长

征结束了，整个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结束了！

长征路上的政治工作

从桑植出发到将台堡会师，红 2、6 军团暨红 2 方面军的长征，历时近一年，跨越湘黔滇康川甘陕宁等省，进行大小战斗难以数计。论兵力，我们不足 2 万人，面对的却是数十万敌军；论装备，我们主要是步枪大刀，面对的却是飞机、大炮；论机动力，我们只有几双草鞋、一副脚板，面对的却是万水千山。然而，长征终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是什么力量使得红军得以完成长征这一前所未有的壮举呢？对这个问题，我作为一名长征路上的红军政治工作者，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所能作出的回答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所在。

红 2、6 军团的长征路线，可谓盘桓往复、千回百折。然而，有一点却是十分明确而又始终不移的，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目标——以红军的远征推动全国苏维埃和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

这个目标，始终贯穿在长征的每个战略阶段，贯穿在长征的全过程。在长征的前一阶段，部队忽东忽西，忽南忽北，转进湘黔边，驻足黔大毕，回旋乌蒙山，三次力图建立新的根据地，是为着贯彻在江南坚持斗争、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救亡的战略意图。在长征的最后一阶段，渡金沙，爬雪山，过草地，则是为着实现主力红军会合西北、创造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这个目标，深深地植根在每个红色战士的心中，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中。不管征途如何漫长曲折，不管战斗如何残酷频繁，不管面对多少艰难险阻，不管需要付出多大牺牲，大家总是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总是走到哪里，就把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到哪里，就把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做到哪里，就把革命的种子撒到哪里，就把苏维埃的红旗插到哪里。

红军对实现这一政治目标表现得如此坚决、顽强，是因为红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工农武装，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因为党在红军中进行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特别是适时地结合革命斗争的形势与任务，不懈地用党的战略思想、战略路线教育和武装部队。

在长征中，对党制定的抗日路线和每一个战略决策，对长征总的政治目标和各个阶段的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通过反复地政治动员、政治总结、政治检查，通过一次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通过行军中的政治工作、战场上的政治工作以至一张政治标语、一句政治口号，使之深入人心并化为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自觉行动。

同几千年来旧式军队奉行的“愚兵”政策相反，红军非常重视进行形势教育。也许有人会感到难以置信，长征路上军情紧急，戎马倥偬，红军又多在狭路僻地中疾行，哪里搞得了形势教育？可事实上，我们不但随时观察着前进的道路和敌情，也在密切关注着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情，并把这些大事情及时告知每一个红色战士，传播给沿途民众。部队每攻占一个集镇、一座县城，指挥机关立即派人进驻邮电局、所，不动邮件，不拿汇票，只把白区出版的各种报纸不论新旧统统收来，从中了解哪一块国土又遭沦丧，哪里的民众又燃起救亡烈火，也从国民党“剿匪”动态中推测白军的动向和其他主力

红军的行踪。根据这些材料再向部队进行形势教育，对全国的政治形势、苏维埃运动形势和民族革命形势作出简要的分析说明。广大指战员身在长征路上，心里装着全国的斗争形势，从而对党的路线和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自己肩上担负的工农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更加明确。

在长征中，就是通过这样的政治工作，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决贯彻和执行。使部队保持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着饱满高涨的政治热情。

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念，是红军在长征中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动力。红军开动自己的双脚，踏过万水千山，长驱二万余里；红军凭着步枪、大刀，与数倍甚至十倍于我的装备精良的敌军进行大小战斗难以数计，战斗中从不惧流血牺牲，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也要继续战斗下去；红军以一身单衣、一口辣椒水御寒，翻越了一座座雪山；红军用一把野菜、一把草根充饥，涉过了荒无人迹的草地；还有许多同志竟是一直拖着伤残的躯体，坚持走完了万里征程。这些奇迹是靠什么创造出来的？回答只有一个：理想和信念。

与白军不同，红军的战斗力不仅取决于兵力的多寡、火力的优劣、物力的富缺等诸多因素，更重要的是靠指战员本身的阶级觉悟、政治理想所焕发出来的巨大精神力量。党在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历来重视革命理想的教育。通过这一教育，使每一个红军指挥员、战斗员都成为具有革命理想、具有牺牲精神、为阶级和民族解放自觉战斗的红色战士。

我们当时进行这种教育，受到文化程度、理论素养、战争环境的制约，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简单。但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紧密联系实际，从头至尾都贯穿着“联系”二字。它与我们所处的阶级地位、社会状况、战争实践和革命前途紧紧地联系起来，使一般干部、战士和广大工农群众都能理解，都能接受。

红军指战员绝大多数都出身于工农劳苦阶级。开始我们只是对某个土豪、某个保长特别地恨，对个人的命运表示不满。针对这种情况，党给我们讲阶级斗争的道理：自己种的东西自己没得温饱，哪里去啦？天底下还是穷人多老财少，哪个力量大？我们初步懂得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压迫，鼓起了阶级斗争的勇气。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打倒了这个土豪、这个保长，报了仇，翻了身，分到了土地，取得一些利益。在这个基础上，再引导大家进行联系：把这个土豪、这个保长打倒了，可他的上面还有乡长、区长、县长、衙门、团防，他们有权有枪，不会甘心我们这样干的。于是我们又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苏维埃，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游击队。再联系一下，我们看到：县衙门的上面还有一级一级衙门直到最大的衙门——国民党反动政府，这个最大衙门的手里有镇压工农的工具——国民党反动军队，它们的身旁和身后还有帝国主义列强……

就这样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地进行联系，我们的认识逐步提高，由打倒某个土豪联系到要打倒整个封建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统治，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驱逐帝国主义列强；由建立某个苏维埃政权联系到要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由组织某个游击队联系到要组织起中国工农红军；由夺取某个战斗的胜利联系到夺取全国的胜利；由个人的翻身解放联系到要实现全阶级、全民族的翻身解放，最终要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的大同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具有坚定信念的战士是无敌的战士，具有崇

高理想的军队是无敌的军队。

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和红军的中心任务的实现，是党在红军中政治工作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人们常常以“千难万险”来形容红军长征面临的种种问题，此话并不夸张。然而，在这“千难万险”中最突出的问题有三个，即“打”、“走”、“吃”。这三个问题哪一个解决得不好，都会导致长征失败，导致红军的毁灭。因此，全军上下都为之绞尽了脑汁，耗尽了气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做政治工作就特别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来保证部队解决好这三个非常实际而又关系重大的问题。

打仗，是长征面临的首要问题。从开始的突围、中间的转战到会师后的立足，都没有离开打，而这种打又是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没有后方保障、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苏区人民支援等种种不利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保证部队打胜仗就成为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每次战斗前，我们总要进行思想动员，使指战员在明确敌情我情、方案部署的同时也明确打好这一仗的意义，明确取胜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树立信心，坚定决心。战斗开始后，我们适时进行战场鼓动，激励斗志。初战获胜时，我们通过传送捷报、后送俘虏来鼓舞士气。战斗结束后，我们及时总结经验，找出教训，振奋军心，以利再战。这一套办法几乎是每一仗都必须采用的，只不过根据具体情况在内容上有所不同。激励部队英勇杀敌，是战时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另一个重要方面则在于珍爱每一个红色战士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伤亡。我们总是教育部队既要不怕牺牲，又要避免无代价的牺牲；既要敢于消灭敌人，又要善于保存自己；既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又要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情绪；既要有勇气，又要讲智谋，并且经常用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一些战例去教育大家英勇灵活地打击敌人。

走路，是长征的基本形式。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战斗和短暂难得的休整外，几乎天天都处在行军状态中。对于不停地走，不断变换方位地走，一些同志产生了厌烦情绪。有人发牢骚：“拖、拖、拖！不晓得要到哪里去，干脆到外国去吧！”我们师一级干部在长征前期对长征目的地也并不是很清楚，每天都是按总指挥部下达的行军命令组织部队的行宿，包括贺任关首长也并非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陕甘的。但是各级政治机关不断地向部队进行全国战争形势的教育，使大家懂得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为着配合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战争的发动、发展。同时向部队说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革命战争的特点，决定了红军的游击性和运动性，走路是甩脱敌人、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由此使同志们从理论上懂得“为什么要走路”以及“走路应该成为红色战士的看家本领”。老战士们还用自己的斗争经历向新战士介绍：我们这支红军一诞生就基本上天天在游击，天天在走路，练出了一双飞毛腿、一副铁脚板，一天走上一二百里路从不在话下。在讲活这些“大道理”的同时，我们也注意讲好“小道理”。比如说，寒冬腊月天红军最多只穿夹衣夹裤，当然很冷，但行动方便，想上山就上山，想涉水就涉水；白军穿着棉衣棉裤，当然暖和，但臃肿沉重，跑不动路，敌人的北方马又大又胖，走在南方的田埂上不是掉在这边就是掉在那边；眼下我们疲劳，敌人更疲劳，敌人的“追剿军”从湘西起一直跟到红军屁股后边，拖过来拖过去，人马越来越少，士气越来越低……为了保证行军不掉队，我们政治工作干部同军事指挥员一起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行军出发前，要摸清哪些同志伤病体弱可能掉队，安排党团

员分工扶助他们；要检查每个同志脚上是不是都穿上了完好的草鞋，腰后是不是还别着一双；要叮嘱行军中可能遇到哪些问题，应该采取哪些措施。行军路上，要组织部队开展互助，进行比赛；要亲自收容，甚至还要带头唱歌子，讲故事，说笑话，让同志们忘掉疲劳、忘掉瞌睡。宿营以后，要带人找粮找柴，帮助炊事员尽早开饭；要督促战士洗脸烫脚，处理脚泡，检查大家睡得好不好，还要进行第二天的行军准备。也许有的同志会认为，这些看起来都算不上是政治工作，但那个时候就是要这样来做。试想一下，部队正处于紧张的行军中，而政治工作干部却在一旁“坐而论道”，那怎么行呢！

吃饭，是长征中关系到部队能否生存的大问题。因为我们必须经常与饥饿作斗争，特别是在进入藏民区到走出草地这一时期，粮食完全断绝，政治工作的中心便由保证战斗胜利转入动员部队为生存而斗争。我们努力纠正那种以为给养工作不是政治工作的错误认识，提出了“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政治”的口号。所有政工干部都亲自参加筹粮，并检查部队在筹粮中的政策执行情况。过草地的时候，许多政工干部带头找野菜，尝野草。政治机关还就仅有的一点青稞粉子如何吃法作出了专门决定。为了吃饭问题，有的政治干部被撤了职，有的献出了生命。

不断地扩大红军，是党在红军中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红2方面军政治部所做的《2、6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记录着6师的一组数字：桑植出发时，全师人数为3303人；到甘孜前，阵亡309人（报告中另一处统计仅死亡党团员达616人），病亡137人（仅计中甸到白玉雪山区），伤病寄留190人，其他原因减员513人，减员总数为1000多人，然而到达甘孜时，六师仍有3044人。

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个统计并不完全，但它足以表明：红军在艰苦的长征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却又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红军是怎样得到补充的呢？办法有两个。

最主要的是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在长征中，红军每到一地，首先深入到工农劳苦群众之中了解群众疾苦，调查土豪罪恶，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和抗日救国主张，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打土豪分田地，使群众获得实际利益，提高阶级觉悟，帮助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使群众懂得红军是工农的武装、是苏维埃革命的主要力量，在这个基础上动员群众踊跃参加红军。扩红工作，从本质上讲就是群众工作。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一项经常性的政治工作，也是广大指战员都很熟悉并共同来做的一项工作。整个部队从上到下都建立了一套扩红组织和制度，每个人都掌握了一套扩红办法，每个单位、个人都有自己的扩红计划，开展扩红比赛，收到了很大成效。据统计，我6师仅在湘黔滇三省就扩大补充了3000余名新战士。

红军兵员得到补充的另一个来源是瓦解敌军，争取和改造敌军士兵加入红军。我们既有战胜一切敌人的英勇气概，又有对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不打不杀、予以优待的政策观念。凡是捉到的俘虏，均由政治机关给予教育，愿意当红军的收留下来，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因顾虑家人而不得不重回白军队伍的也绝不为难，有时还特意挑选一些思想较进步的分子派回白军中工作。白军士兵多是贫苦出身，被欺骗、胁迫去为反动统治阶级卖命，在白军中仍然受到官长的压迫，挨打受骂，体罚虐待。我们对白军士兵俘虏进行教育，讲明红军的性质、宗旨和工农革命的道理，他们自己也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一致、人人平等，看到红军战士自觉自愿为工农群众战斗，从而懂得了两

种军队的本质不同，做出了“当兵就要当红军”的选择。在红军部队里，他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时上半年当了红军，下半年就向白军作战。有些人负了伤或是牺牲了，连自己是哪个单位的都还没搞清呢，但他们知道自己就是红军！我师在祥云曾争取到上千名俘虏加入红军，方面军政治部在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给予了表扬：“6师在这个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

通过扩红和争取敌军俘虏，2、6军团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在长征中始终保持着永不枯竭的生命力。

把建立在共同革命理想基础上的团结战斗的思想灌输到全体指战员心中，从而生发出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将全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凝聚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战斗整体，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又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

比起国民党军队来，红军虽人少力薄，但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红军内部的团结，首先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上，真正做到了政治上同心同德，生活上同袍同泽，战斗中同生同死，官兵之间亲如兄弟，同志之间情同手足。形成这种关系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干部和政治工作者时刻把自己置于广大士兵之中，真心实意地去尊重人、关心人、教育人、团结人，越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越要这样去做。在战斗中间，干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你掩护我，我保护你。在行军路上，从贺老总到师团营干部都把自己的骡马让给体弱伤病的战士来骑，所有的干部都背起了“加枪”。宿营时，只要有一个战士没赶到，干部也要返回去接应。断粮的时候，一把粉子、一块牛皮，干部让给战士，战士让给干部。总结会上，战士给干部提意见毫不顾忌，干部也并不觉得难堪。那个时候，在红军这个集体里处处充满着同志情、阶级爱，我们的干部可没有任何的特殊啊！

红军内部的团结还表现在各个战斗单位的密切协同，互相支援。整个长征的进程，也可以说是红军各部队之间紧密团结的进程。因此，我们象爱护生命一样维护红军的团结。无论是主力红军的会师还是战役、战斗的协同配合，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都在部队中抓团结的教育，做团结的工作，造成一个讲团结光荣、不讲团结可耻的风气。各个部队初到一块，就能够政治上互相信任，战斗中密切配合，生活上互相帮助，即使在雪山草地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互送衣物，调剂粮食，帮助收容。红军之间的紧密团结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中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为了巩固红军的团结，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除了在部队反复开展教育以外，还制定了严格的政治纪律。不管哪个单位、哪个人做了损害团结的事，都要受到严厉批评，甚至给予处分，通报全军，让大家引以为戒。

团结就是力量。这种团结的力量在红军长征中得到了最完满、最充分的体现。

党在红军中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和党的组织来实现的，特别是通过政治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来实现的。

同今天相比，红军政治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还比较低，识字不多，读书不多，讲不出好多深奥的道理，工作方法也不够多。这是我们的一个缺憾，也是我们力求不断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我们也有一个长处，这就是身体力行，为人表率，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贯彻党的指示，推进工作，带动和影响部队。因而，广大政治工作干部和共产党员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说出的话大家信眼，布置的事情能够很快落实，我们的政治工作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我当师政治委员，给自己总结了三条经验：第一、打仗勇敢不怕死，即做英勇战斗的模范；第二、多扩大一些人，少减员一些人，即做扩大与巩固部队的模范；第三、遵守纪律，按政策办事，不脱离群众，即做联系群众的模范。这三条虽然不那么全面，却是我从自己做政治工作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也是许多政治工作干部的共同经验。

我师 18 团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团队，长征中屡屡担负重要任务，完成得都相当出色。这与该团历任政治委员是密不可分的。18 团长征中首任政治委员是余秋里，在则章坝战斗中为掩护团长失去了左臂；第二任政委杨秀山，在六甲战斗中负伤；第三任政委董瑞林在西康为给部队筹粮牺牲了生命；第四任政委周盛宏在成县战斗中率领部队反冲击，中弹阵亡。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用鲜血和生命，忠实地履行了政治委员的崇高职责，为部队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在长征中，党的组织切实起到了战斗堡垒的作用，党员切实起到了先锋和模范作用。那时候，下级组织执行上级的决议，党员执行组织的决议，是一点也不含糊的。因此，吃苦最多的是党员，负伤最多的是党员，牺牲最多的也是党员。青年团员也是这样。据统计，6 师仅从出发到中甸这一段，就牺牲了党员 360 名、团员 256 名，这还不算更为艰苦的雪山草地。在我的记忆中，6 师团以上干部党员牺牲、负伤的就不在 10 人以下。同时，我们也在长征中不断地发展党团员，注意吸收那些表现积极、勇敢、吃苦耐劳的新同志加入到党团队伍中，使党团员在牺牲很大的情况下及时地得到补充。长征出发时，6 师有党员 801 名，团员 144 名，合占全师人员总数不足 28%；到甘孜时有党员 761 名，团员 615 名，与全师人员总数的比例上升到 45%，班长以上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党团员。正是因为我们拥有这样一支党团员队伍，使党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做得普遍而深入，使红军长征的政治任务、军事任务能够胜利完成。

长征时期，是红军历史上一个充满艰苦、充满困难的时期，是党在红军中政治工作做得大有成效的时期。它保证了党制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在红军中得到坚决地贯彻和执行，使我们的长征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方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它在指战员的心中树立起崇高的理想，保持着坚定的信念，激发出高昂的斗志，使我们的长征冲破了敌军重兵的围追堵截，战胜了世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它维护和增强了红军内部的团结，使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统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共同走向抗日前哨；它把党和红军的正义主张传播开来，在沿途各地撒下革命的火种，发动起万千民众……总之一句话，党在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生命线！

第六章

从红军到八路军

中国工农红军在胜利完成伟大的长征之后，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的历史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从这时起到翌年秋，在事变迭起、时局动荡的日子里，红军指战员坚决听从党中央的号令，努力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政治整训，认真解决各种思想波动，而后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从而保证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顺利实现。

这个转变过程虽然前后不足一年时间，又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冲击却是巨大的，它所产生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是深远的，党领导红军为之进行的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准备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因此它在我军发展史上，尤其是在政治工作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一页。

统战风波

1936年11月中下旬，红军三大主力齐集陕甘边，发动山城堡战役，歼灭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一个多旅。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

其实，在当时还不能说是最后一仗。山城堡之后，战事未了。蒋介石、胡宗南仍在准备新的进攻。我军则在甘肃环县、陕西定边、盐池地区驻扎下来，一边休整，一边练兵，准备继续粉碎胡宗南部队的进攻。

一年前，当我们红2、6军团开始长征不久，先行到达陕甘的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经过一年来的努力，我党的正义主张已经在全国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红军首先在西北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但是蒋介石拒不接受我党和西北爱国将领发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呼吁，顽固坚持反共内战政策，于1936年12月亲赴西安部署“剿共”。

在红军驻地上空，国民党军的飞机频繁出动，侦察骚扰，肆无忌惮地从我们头上只有屋脊那么高的地方飞过去，掠起一股股狂尘，相当地欺负我们。

我们打飞机没有足够的子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在我们头上耀武扬威，气得战士们指着飞机斥责：“有本事怎么不去打日本，在红军头上逞什么威风！”

在驻训期间，红2方面军的部队和干部进行了一些调整。任弼时调到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担任政治委员，关向应接任了方面军政委。李达参谋长带领32军参加援西军，移师宁夏。贺关首长从部队中抽调了杨秀山、王尚荣、谭友林等一批师团干部，送入红军大学学习。党中央则从红1方面军调来一批军政干部，如方面军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朱瑞、4师政委李井泉、6师参谋长曾来古等。陕北红军一个团调入6师，改称17团，以补上在甘南康县丢掉的那个团。

12月12日晚，6师正在定边附近的驻地搞夜间练兵，我在师部接到方面军参谋长周士第打来的电话。周士第刚来不久，讲的一口广东话，语气又很激动，我听不懂，猜也猜不出。周士第参谋长在电话里喊了半天，其实就是一句话，当我终于听懂后，不由得也跟着喊了起来：

“抓住蒋介石啦！”

放下电话，我急忙跑到野外训练场，高声宣布：“抓住蒋介石啦！”

霎时间，这个惊人的消息随着众口所传，无翼而飞，迅速在全师指战员和驻地群众中传播开来。

当晚贺炳炎师长和我带领各团团长、政委，兴冲冲地赶到方面军总指挥部参加紧急会议。贺龙总指挥、关向应政委向我们传达了上级的情况通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不满于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毅然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双十二的这一夜，我和所有红军指战员一样，兴奋得通宵都睡不着觉，真正是思绪万千，感慨万千：“这个蒋介石，自从他背叛革命以来，我们和他打了十年仗。十年中他打死了我们多少人，杀了我们多少亲属和工农群众呀！这下捉到了，该好好清算总帐啦！”

高兴之中，我们也有几分担心，担心张、杨的部队会不会再把蒋介石放掉，最好是交给红军来看守。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不同反响，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借机发难，调集大军前来“讨伐”东北军、西北军。应张、杨要求，我党中央派出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调解谈判，同时命令红军主力南下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

红2方面军立即从三边、环县经庆阳、旬邑、淳化到达靠近西安的富平、三原一带，修筑工事，准备迎击何应钦部队的进攻。6师先在三原县云阳镇住防，几天后移师泾阳县百斗镇，方面军总指挥部驻云阳镇。

不久，在我党和张、杨共同努力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张、杨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

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广大红军指战员是拥护的。但是对于放蒋，不少人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不解地说：“他打了我们十年啊，远的不说，长征的时候把我们赶得那样苦，死了那么多人，现在就白白把他放跑了？”

特别是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背信弃义，拘禁张学良，分化东北军、西北军，进兵蒲城，致使西北地区战云密布。为预防蒋军进攻，红2方面军在富平的流曲一带集结。有的同志发牢骚说：“你们看吧，我们在讲统一战线，可别人却在进攻！”

为了争取早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重新合作，我党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表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要求国民党实行停止内战、保障民主、召开国民大会、完成抗战准备和改善人民生活五项国策；我党则给国民党以四项保证：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改名并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四项保证实际上宣布了我党土地革命政策的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开始。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接受我党主张的决议案，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行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此结束，开始了准备抗战的

新阶段。

在如此急剧的重大转变中，在前所未遇的新形势、新任务面前，红军绝大多数指战员立场坚定，跟得上革命形势的发展，对党中央的领导、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对抗日救国更是怀着血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但是，对党根据新形势制定的新政策，不是所有人一开始都能认识清楚的。党中央提出“四项保证”的新政策在部队引起了继释放蒋介石之后的又一次强烈的震动，许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有的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否定红军10年的奋斗，有的怀疑这是不是等于向国民党投降……总之，部队中的不满情绪一时间还是不小的。

为了统一广大指战员的思想，使部队尽快适应革命形势的转变，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策略而斗争，红军总部和方面军政治部发出了进行统一战线新政策教育的指示。当时在我们干部中间、部队中间有一个长处，就是坚决听从指挥，服从命令。既然中央已经有了决定我们就坚决执行中央决定，既然上级下了命令我们就坚决服从上级命令，并按照党中央、红军总部发出的一系列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和宣传解释大纲开展统一战线的学习。

我自己一面学习，一面组织全师的学习，针对部队中的种种思想疑虑做一些解释工作。

着重说明：民族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抗日救国是革命的首要任务；捉蒋、放蒋都是为了逼蒋、联蒋抗日；四项保证是以我党我军的让步来换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现和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

同时也说明：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停止土地革命但对工农已获得的权益要继续保障；苏区和红军改名但共产党的领导要继续保持；红军的本质不会改变，仍然是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过去我们为之牺牲奋斗的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今天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

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学习，消除了一些疑虑，使我们的思想能够跟上时局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当然，思想上的转变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它一直进行到红军改编完毕，开赴抗日前线，有些问题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经过贯彻统一战线的实践，才逐步认识清楚的。在学习中间也出现过一些反复。曾有个别同志向外写信骂了蒋介石、国民党一通，被人家当作共产党没有合作诚意的辫子来抓，毛主席、朱总司令为此要求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请通令全军注意统一战线教育，以后勿发生此类行为。”

随着国内和平的开始实现和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红2方面军在富平一带安定地驻扎下来，不再奔波行军，没有流血战斗，除了训练演习之外，很长时间听不到枪声，看不见硝烟。陕甘宁苏区也与外界沟通了联系，一些指战员与家乡幸存的亲友们通了音信。

我没有收到家人的来信，却意外接到樵子湾团防朱照环的一封信。朱的来信洋洋洒洒写了好几篇，除了扯些我俩高小同学的老话和国共合作的现话，主要是说我当红军后探家他带团防队打我，把我弟媳妇打死了，向我表示“道歉”，还说什么他已经给我弟弟另找了一个媳妇。言辞当中似乎真要化干戈为玉帛、变仇敌为兄弟了。我没有理睬他这一套，没有给他回信。

在国内和平的新环境中，我们大多数同志是清醒的，但也确有少数人被五光十色的和平现象眩花了眼睛，冲昏了头脑，思想麻痹，斗志衰退，滋生出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的思想倾向。他们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没有畏惧

过，在雪山草地的长征中没有退缩过，却在一时的和平中动摇了，迷失了。

有的人对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感到厌倦，产生离队情绪，认为和平了，该回家了，回去以后地方上的团防官吏再不会杀他，家里人再不会被当作“匪属”遭受迫害了。于是，他们开了小差。

我师 18 团一次就跑了三个连长，都是参加红军多年的老兵，是在红军里长大的红小鬼。我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人去追，结果只拦回一个，其他两个还是跑了。师部的三参谋（相当于现在的通信科长）、司号长也跑了。还有一个文书，是从洪湖苏区出来的，他在部队出发开赴抗日前线的头一晚，把我的私章、名片等物交给警卫员柴成祖，说：“政委的章子、名片你来保存吧。”说完又揣起一张名片，把警卫员柴成祖搞得莫名其妙。第二天早上出发时，发现他不辞而别。

这些人只想着回家过安稳日子去，却忘记了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忘记了抗日救国的责任。其实，国之将亡，家又何存！当整个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危难之时，哪个人、哪一家能有什么安稳日子呢？这些人回家后没有好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到了那里，他们不得不重新拿起了枪。1945 年初贺炳炎和我率领以湘鄂西老红军干部为主组成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第 5 干部大队重返洪湖地区，那位在抗日出征前夕离队回乡的文书拿着我的名片找来了，检讨了自己的短视，他已经是襄北抗日根据地的公安局长了。历史最终教育了这些人。

除了离队情绪之外，还有的同志在物质生活得到一些改善之后，产生了享乐情绪。他们认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就跟过去不一样了。他们丢开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盲目模仿起别人那一套排场和派头。

我们师部的特派干事王保才不晓怎么凑了 5 块银元，跑到咸阳城里镶了一颗金牙回来。

在方面军召开的一次干部会上，贺龙总指挥以王保才镶金牙为例子对那种追求奢华之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生气地说：“放牛娃出身的王保才，在雪山草地、枪林弹雨的环境中没有倒下，跟上来了，算得个英雄嘛。为什么到了新的环境，思想就退步，想当‘狗熊’了呢？镶什么金牙，乱弹琴！要给王保才纪律处分。”

上述几种情绪，虽然只是发生在极少数同志身上，却起着涣散斗志的有害作用，它从另一个方面妨碍着红军顺利完成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有鉴于此，我们在进行统一战线新政策教育的同时，也注意进行继续保持艰苦奋斗革命传统的教育，教育干部战士忠实于民族解放的利益，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党的路线与方针。

开展反腐化、反享乐的思想斗争，给干部战士敲了警钟：国内革命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战争会更加艰苦，更加残酷，需要我们更加努力的奋斗；红军虽然要改编了，但是红军的传统和本色永远不能丢！

军政整训

1937 年 2 月初，春节前，红 2 方面军各部队向北移动了一下。总指挥部出富平，进驻同官的陈炉镇。陈炉镇座落在一座山上，那里有不少旧瓷窑，古时即以盛产“耀州瓷”著称，陈炉镇因此得名。6 师驻在陈炉镇山脚下的

富平县底店镇，4师驻底店与流曲中间的薛镇，6军团驻流曲。

从这时起，我们为了更好地适应未来抗日民族战争的需要，利用国内和平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政治等多方面的整训。

首先进行的是党组织和党员思想的整训。我师乃至整个红2军团的各级党组织曾遭受过左倾路线的毁灭性的破坏，直到1934年逐步纠正左倾错误之后，又得到健康、迅速的发展，在反“围剿”的斗争中特别是在长征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长征后期的大量减员，仍然存在着组织不够健全、成分过新等弱点。根据这种状况和方面军政治部的部署，我们着重整理党的基层组织。小组、支部、总支依次进行了改选。各支部均设立了由书记和组织、宣传、地方、抗日、青年、候补六个委员组成的支部委员会，师团政治机关分别集训了党支部书记、委员和小组长。各支部对每个党员的思想、工作做了认真的检查、鉴定，组织党员以党的基本知识和统一战线政策为重点进行党课学习，还发展了大批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考验的新党员。经过整理，党的领导得到健全和加强，党的组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

在这个基础上，红2方面军于1937年3月8日在陈炉镇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这是2方面军所属部队自创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党的盛会，除了32军参加援西军不在外，2、6军团各师、团的党员负责干部和基层代表都参加了大会，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任弼时、参谋长左权也从云阳镇赶来出席，并作了重要报告。代表们认真回顾、总结了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讨论了新形势下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了今后部队建设的方向和任务，而后形成一项决议：“认为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且坚决地为实现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而斗争”。决议强调指出“在巩固和平和对日抗战的时期中，红军的巩固与军事、政治的强化，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就要求党继续不断地巩固红军（即或改变了名称）；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保证党在红军中绝对领导与红军的独立性”。决议对在新形势下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干部培养、党的建设以及扩大部队、争取友军等各项工作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党代表大会经过选举正式建立了红2方面军党的委员会。党委委员都是师以上党员负责干部，有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甘泗淇，组织部长刘亚球、民运部长朱明，2军团4师师长卢冬生、政治委员李井泉，6师师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6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治委员王震、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等同志。会议期间，党委委员和全体代表照了几张像，留作纪念。

大会的另一项议程是为党中央准备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选出了代表。方面军总指挥部的代表是关向应，2军团4师代表是卢冬生和另一位同志，6师代表是我和16团政委陈文彪，6军团也有几名代表。

党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各部队又变动了一下驻地。总指挥部驻到富平的庄里镇，6师驻庄里镇西边、西安至延安大路边上的觅子镇，4师驻觅子镇东南，6军团仍驻流曲，以后红32军从援西军归建驻觅子镇北边的十八坊。

5月1日，我们出席苏区代表会议的代表在关向应政委带领下赶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第二天，大会隆重开幕，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同志致了开幕词。

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转变关头举行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因此又被称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届次排列的“中国共产党

全国代表会议”。

会议期间，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同志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我从入党以来还是第一次出席党的全国性代表会议，也是第一次面对面地跟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众多中央领导同志坐在一起开会，第一次直接了当、原原本本地聆听党中央的报告。这使长期与中央分隔两地的我们红2方面军干部感到特别的兴奋。

围绕毛主席的报告，我们连续几天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从中进一步了解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由来，进一步明确了党提出“四项保证”的必要性，进一步搞懂了实行新的国共合作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关系，提高了既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又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自觉性，原来一些不那么理解的问题基本上理解了，原来憋在心里的疑虑和担心一下子消除了，对部队做工作也更加有本钱了。

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统一了与会代表的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批准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的决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批准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和苏维埃政府改为民主政府。十来天的会议结束后，我们把党中央的精神带回部队，进而统一了全体指战员的思想。

在党内整训同时，部队掀起了群众性习文练武的热潮。

干部的学习，除以统一战线理论为主外，还着重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其中有一门课叫作《政治常识》，讲人类社会怎样从原始社会发展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又怎样必然地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从社会发展史上说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此外我们还学习了《论帝国主义》、《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列宁主义问题》等课程。这些课程学习的不是革命导师的原著，而是普及性的小册子，它适合我们师以下干部的阅读和理解水平。透过那些浅显通俗的语言，我们从中得到了一次革命理论的启蒙教育，对于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中国革命等这些重大问题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对于我们过去经历的奋斗、当前面临的战争、将来达到的前途看得更加清楚了。

战士的学习，一个是由各连队政治指导员在连里上政治课，一个是由政治机关将革命口号、抗日口号编成识字课本，边学文化边学理论。

红军战士大多出身穷苦，无钱读书，因而识字不多，或根本就不识字，这种状况有碍于我军军政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战士们经过学习，既认了不少字，又熟记了我党我军一些基本的方针。不论干部或战士还都有一门共同的“时事政策”课，宣讲“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到了哪里？中国人民应该怎样？”

我们在全师每一个连队都建立了“列宁室”（现在叫“军人俱乐部”）。“列宁室”是连队学习和娱乐的场所，里面张贴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肖像画。开始大家不认识那上面画的是谁，我也是头一回见到，后来经别人介绍才知道，“大胡子叫马克思，光头叫列宁”。这样好认好记，战士们人人都认得了。各连队在“列宁室”里出墙报，画漫画，教唱“誓死不当亡国奴”、“武装上前线”等抗日歌曲。抗日气氛十分浓厚。

在军事上，为适应今后对日作战的要求，我们秣马厉兵，组织部队进行了严格、正规的训练。技术训练以投弹、刺杀、射击为主，战术训练从单兵

动作到连的攻防。

5月30日，红2方面军在庄里镇与觅子镇之间石川河宽旷的河滩上举行了“五卅”运动大会。竞赛项目有投弹、刺杀、射击、球类、田径、唱歌、墙报等，各师、团都选派了优秀代表参加角逐。这个运动大会实际上也是对军政整训成果的一次大检阅。

整训期间，我们还在驻地开展了宣传抗日、扩大红军的工作。师、团派出扩红队、工作队到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帮助群众建立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并在激发群众爱国热情的基础上扩大红军。

6师驻泾阳百斗镇时的一天，我凭着一腔抗日热情，只带了两个警卫员就径直跑到附近咸阳城里去搞宣传。把守城门的东北军士兵看到我是红军。问也没问就让我进去了。我找到城里的抗日救国会，只见那里人来人往很多，我表明来意，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慷慨激昂地讲了一大通，受到救国会工作人员和过往群众的热烈欢迎。

我师的扩红队也把工作做到了咸阳城。咸阳有个棉花打包厂，雇用了许多工人。当时厂子不景气，关闭了，工人们失了业，扩红队到厂子里把抗日救国的道理一讲，立刻得到热烈的响应，一下子就扩大了许多工人弟兄参加红军。在驻富平期间，这项工作做得更加深入，6师在底店建立过新兵连，在觅子镇及其周围各保都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扩大了不少人。

军政整训从1937年1月一直进行到改编、出征，历时大半年。经过整训，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从思想、组织、军事等方面完成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做好了抗日出征的准备。

编队出征

1937年7月7日，“腥风骤起卢沟桥畔，血雨横飞华夏天。”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战争由此而爆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接连发表通电，呼吁立即实行抗战，请缨杀敌。同时，中央军委主席团向红军团以上各级干部发布了改编命令。遵照此令，红军各部队开始抗日编队工作。

这期间，红2方面军所属部队和干部做了一些调整。参加援西军的32军回到富平归建，由陕北红军一个团编成的我6师17团调入4师，陕北红28军军部率一个团调来觅子镇与6师合编，首批送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原红军大学）和庆阳步兵学校学习的干部毕业回到部队。

这样红2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一部合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主任关向应。由于改编是按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来搞的，因此撤销了原来的政治委员和政治部，政治干部都改为政训主任或军事副职。

原红2军团编为120师358旅，旅长最初是原红4师师长卢冬生，但他因为在反军阀主义斗争中受到过火的斗争，有情绪，坚决要求去延安抗大学习，中央遂另派张宗逊来担任旅长，原4师政委李井泉担任副旅长。

4师编为358旅715团，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

6师与红28军一部合编为716团。红28军是由陕甘苏区和红军创始人刘志丹领导的部队，1936年春东征时刘志丹牺牲，而后由宋时轮接任军长。在这次合编中，28军军长宋时轮任团长，我由6师政委改任副团长，6师参

谋长曾来古任团参谋长、28军政治部主任伍晋南任团政训主任。6师18团编为716团第1营，营长是刚从抗大毕业的彭家诗，副营长是罗成章；红28军某团编为第2营，营长是该部原团长陈仿仁，副营长王再兴；6师16团编为第3营，营长是16团团长王祥发，副营长曾祥煌。我们716团共有三个营，每营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团直辖一个警卫连、一个迫击炮连，每连约140人，全团2000多人。

原红6军团与红32军合编为120师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辖717团、718团。此外多出人员，少部分去抗大学习，大部分编入师教导团。师部还有几个直属独立营。

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抗日力量本应是越多越好，然而，国民党当局却极力限制八路军的力量，给我军的编制压的很低，员额卡的很死，并且苛刻地按编制员额发饷，超出的就不发饷。

我们6师师部原有一位浑名叫“猴子”的管理员，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长征中为了保障同志们的吃饭，他自己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饿。部队改编后团部没有管理员的编制，按规定必须送他走。他不愿走，我也舍不得让他走，可又不能不去动员他：“团里没有你的编制了，你还是走吧，你不走连饷都没得拿。”

他却态度坚决地对我说：“我要跟你们上前线。我当红军这些年从来没发过什么饷，还不是照样干革命？打日本强盗，没有饷我也干！”他再三向我恳求，几乎要哭出来了。

我被他的抗日热情深深打动了，作主把他留下来。国民党当局不给他发饷，我来发，从我们几个团干部的饷里分出一些给他。以后，这位不发饷也要上前线的好同志英勇牺牲在抗日沙场上。可惜我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他的名叫“猴子”。

在部队改编期间，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从前总驻地三原县云阳镇来检查工作，在觅子镇我团司令部住了两三天，宋时轮和我向彭总汇报了部队的思想、训练及编队情况，请彭总作了指示。

1937年8月，党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贺龙、关向应在庄里镇向我们团以上干部传达了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抗日出师后我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洛川会议上对要不要留下部分兵力守卫陕甘宁根据地有过争议。毛主席提出要留兵，林彪则说要倾巢出动，贺龙首先站出来赞同主席的意见，并派359旅旅长陈伯钧率718团（团长文年生）及师部直属的五个独立营留守陕甘宁，129师也派出385旅副旅长王维舟率770团（团长张才干）留下。洛川会议结束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了八路军各师各旅的序列和指挥员。

抗日编队工作基本完成后，随之而来的是更换服装。红军与国民革命军的衣服式样区别不大，都是中山装，帽子却大不一样了，红军的帽子不论是六角帽、八角帽上面都有一颗红布做的五角星，而国民革命军的帽子则缀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徽。因为换帽子，部队中又引起一阵波动。

尽管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进行改编教育，但是真要摘下红军帽，戴上国民党的帽子，大家在感情上仍然难以接受。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跟国民党军队作战。在我们的眼里，红星是革命的

象征，那“青天白日”的白帽花则是反动派的标志，我们与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却要同戴一顶帽子，总觉得有些别扭。

有的同志不情愿地提出：“抗日嘛，为什么非得戴国民党的帽子？”

有的同志不放心地说：“先把红军帽收起来，再看吧。”

党中央和军委领导是了解这些情绪的，及时发出了红军为何一定要改编国民革命军的四条解释。我依据这四条解释向部队进一步说明，不这样做就不能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实现全国抗战，就不能实现对日直接作战，为了民族存亡的大局，我们不必计较戴什么帽子。

同时，为了满足同志们对红军帽的留恋之情，我们把富平城里的一位照像师傅请到觅子镇驻地，在镇内一座土戏台上扯起一大幅红布作背景，每人照一张“红军像”，留作纪念。

那一天，我挑出自己最好的军装穿上，仔细地扎好绑腿，脚蹬缀着红绒球的新草鞋，身上披挂着从警卫员那里借来的皮制子弹袋和驳壳枪，端端正正地戴好红军帽，照下一张很神气的红军像。照过像后，同志们把红军帽珍爱地收进自己的小包袱。

9月2日，我716团从觅子镇渡过正在涨水的石川河向师部靠拢。

在庄里镇东边靠近流曲的一个地方，120师全体将士举行了庄严的改编暨抗日出征誓师大会。

八路军总指挥、红军总司令朱德参加了大会。朱总司令给我们讲了抗战面临的紧迫形势，对出征作了动员。而后他象看透大家心思似地说：“毛主席说了，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接着，贺龙师长讲话，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部队：“国民党的帽子我戴过，将军服我穿过，今天国难当头，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上灰衣服，戴上白帽徽。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两位老总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红军老战士都知道，两位老总部曾在旧军队里做过大官，但他们抛弃了高官厚禄去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十年前的8月1日，他们毅然率领自己指挥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参加并领导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又分别在湘南和湘西创建了工农革命武装。他们是红军的缔造者，是红军十年苦斗的领导者。今天两位老总又带领我们改编出征，我们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信心和力量。

在两位老总的带领下，全师将士庄严宣誓：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誓不还家！9月3日，120师从富平出发，过合阳到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

第七章

山西抗敌

抗战初期的山西，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进攻华北、灭亡中国战略的重点地区，也是八路军出师抗敌的首战之地。

在这里，我们挥戈上阵，英勇杀敌，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中华民族不甘灭亡的胆气，接连创造出举世瞩目的辉煌战绩。在这里，我们发动起千千万万的民众，组织起一支支游击武装，建立了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开赴前线

1937年9月，八路军120师进入山西，昼夜兼程赶赴晋北前线，增援第2战区友军作战。

我716团是师的前卫，走在最前面。我们东渡黄河后先是徒步行军，走万荣、稷山、新绛到侯马，再从侯马乘火车北上。

早些年，山西军阀、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了经营他的独立王国，把山西境内的铁路修成了窄轨，火车也不大，一列车仅能运送一个营400多人。宋时轮团长和我分了工，由我带第1营乘前一列车先行，宋团长率主力乘后面的车跟进。

列车中途在一个小站停下，部队下车休息。我们这些从山沟里打出来的“土包子”都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坐火车，虽然事先进行了登车教育，规定了一些注意事项，但也还是有人没搞清楚，出了“洋相”。

列车继续发车时，1营副营长罗成章不晓得跑到什么地方去，被丢下了。宋时轮团长带的第二列车把他带上来。

一见面，罗成章就大发牢骚：“我带的这个营，我还没到，部队为什么就走了？”

他老兄不懂得火车说走就走，才不管你是营长、团长呢。这虽然是个笑话，但也暴露出我们一些同志的观念和习惯还不能完全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

我们心急如焚地上前线，阎锡山的小火车却不争气，走到太原就停下来，等了几个钟头。从太原出发，我带着1营沿北同蒲铁路继续北上，刚刚走到原平大牛店，机车坏了，又停下来。象这样走走停停，何时才能赶到啊，多耽搁一天，甚至一个钟头就会有多少国土沦入敌手啊！我急忙打电话给仍在太原等车的宋团长，他好不容易交涉来新的机车，换过之后，我们继续前进。

120师原定目标是到朔县，支援在雁北防御的晋绥军。但是当我们赶到宁武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大同、朔县，晋绥军撤退到了平型关、雁门关、宁武关一线的内长城防线，雁北已被敌侵占。我们遂在宁武下车，上山到了神池。根据敌情变化和八路军总部命令，120师部署在晋西北的管涔山区，师部驻神池县义井镇，358旅集结在神池、宁武一带，359旅到五台、定襄、繁峙一带，进行紧张的备战。

到神池10来天后，宋时轮团长奉命率716团第2营和团侦察连组成雁北

支队，挺进朔县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

送走宋团长，我又接来了老搭档、新任团长贺炳炎。富平编队时，贺炳炎和杨秀山、谭友林去西安一家医院动手术，取身上残留的弹片。听到部队开赴抗日前线的消息，他们就匆匆赶来了。

备战期间，师部组织我们各团干部参观宁武关的国防工事。

宁武关的关城不在宁武县城，而在宁武正北的阳方口。阎锡山在这里沿内长城修筑了国防工事，由外国军事顾问设计，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历时数载，构成了规模巨大的防御体系。但是当日军突破平型关、雁门关后，宁武关守军就把它放弃了，退到崞县、原平一带。

宁武关的放弃，令我们叹息不已：在畏敌如虎的晋绥军手里，不论是古代的长城险关还是现代的国防工事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力，白白地丢弃了。我们八路军则决心，“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

10月上旬的一天，我团收复了被日军侵占的宁武县城。走进这座古城一看，我们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那是怎样的一幅惨景啊，以至于我今天想起来仿佛就在眼前，令人不寒而栗：

宁武街头，到处是横倒竖卧的被害百姓尸体，有的身首分了家，有的肠子流了一地，有的手脚被砍掉。女人大多赤身露体，被百般蹂躏后又遭杀害。最叫我惨不忍睹的是那些小孩子，有的被挑在刺刀尖上甩到房上、树上，有的被高高举起摔得脑浆迸裂，有的被扯住双腿生生撕成两半。我们走进居民家，院内、屋里、菜窖下都是死人。我们来到水井旁，只见井里腥红的水水泡着一具具尸体。好端端一座古城，竟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屠刀下变成了死城、血城！成百上千的同胞乡亲，竟遭到如此惨无人道的屠杀！

我团的指战员绝大多数都是经历过多年土地革命战争的老红军，是在战场上九死一生拼杀出来的硬汉子，见到过尸陈遍野、血染沙场，可从来没见过这样血腥的惨景和暴行，每一个人都不得不由得毛骨悚然、恸哭失声，不由得肝胆欲裂、怒火满腔。

一连几天，我们的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一团团血肉、一具具尸体，捧起饭碗就想吐，躺到铺上睡不着。

贺炳炎团长和我命令各营连一边掩埋尸体、刮洗血迹，一边倾听幸存者的血泪控诉。

什么是帝国主义？

它在中国要干什么？

从宁武城血淋淋的事实中，指战员们得到了最深刻、最现实的教育。我们虽然还没有见过日本侵略者的面，却已经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其践踏我河山、屠杀我同胞的法西斯暴行。

“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血债要用血来还！”这口号，从每个人心底喊出来，响彻整个宁武城。

这些天里，各营连送到团部的请战书象雪片一样多，叫我一看就是一个通宵。不论我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战士们怒不可遏地发誓：“日后碰到日本强盗，一定叫他用血来偿还这笔血债！”

初战雁门

10月间，根据总部命令，八路军重新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恢复了政治机关，我也由716团副团长改任团政治委员。

一天，师部通知贺炳炎团长和我去受领任务。我俩立即策马赶到驻在神池县义井镇的师部。

一进门，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周士第参谋长就问：“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我们把指战员求战杀敌的急切心情向师首长作了详细报告。贺关周指着地图，给我们介绍了目前的态势和任务：

忻口战役已经开始，正在进入紧张时刻。在日军进攻正面担任防御的是阎锡山的晋绥军、卫立煌的中央军以及西北军、川军，部署在忻州北面的山中。这些山一旦打开，太原就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八路军担负配合、支援忻口战役的任务，120师在忻口以北的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具体部署是，359旅和358旅在原平以西攻击大牛店等地日军侧翼，你俩率716团直属队和第3营组成贺廖支队，再向北去，插到雁门关，以游击战争袭扰、伏击日军的南北运输线，切断敌人的交通，占领雁门关。

我们向师首长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临出门，贺龙师长又提醒道：“现在打的是日本侵略军，不是过去的国民党军了，作战对象变了，一定要注意在战术思想上也要很快扭过来。”

回到团部，贺炳炎团长和我传达了师首长的战斗意图，率团直属队和第3营组成贺廖支队向雁门关地区挺进，第1营则随358旅旅部和715团行动。

我支队一路急行军赶到雁门关西南临洮梁山中的老窝村驻下，侦察敌情，寻找战机。

老窝村的群众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侵扰，都逃到山里躲藏起来了。我们派人找回逃散的群众，帮助收割地里的莜麦，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赢得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由一位放羊老汉的引导，我们插到雁门关附近勘察地形，同时派出侦察员摸清了日军的运输规律。

雁门关是内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也是沟通雁北高原与晋中腹地的门户，为历代戍守要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杨家将镇守三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古今不同的是，古代大道经雁门关进出，而现代的汽车路是从关西的山腰处盘旋而过，距关口尚有几公里。

自从忻口会战打响后，日军汽车队南来北往，很是繁忙，向南经太和岭口往忻口前线运去援兵和弹药，向北出广武往大同拉回伤兵和死尸。日军自以为这一带中国军队早已败退一空，因此警戒疏忽，肆行无忌。

我们得到情报，10月18日日军将从原平撤回死伤的士兵，于是决定打它一个伏击。

由于敌车队不走雁门关过，那里并没有日军驻守，只在广武驻有少量兵力，我们主动改变师部指定的位置，确定在黑石头沟一带的公路设伏，同时派少量兵力占领雁门关。我们的计划得到了师部批准。

为了打好对日作战的第一仗，贺炳炎团长和我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布置任务，进行动员。

我有意识地问到会的干部：“怎么样，你们说打不打？”

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激昂的喊“打”声，各连连长纷纷代表本连争当突击队。3营营长王祥发和11连政治指导员胡觉三提起日军血洗宁武城的暴

行，11连连部驻的那家八口被杀了七口，连不满3岁的小孩子也被刺刀戳死了，只剩下痛不欲生的老太太。他们表示决心，一定要叫敌人以血还血，把雁门关变成日本侵略者的鬼门关！

我接过大家的话题，动员说：“是的，我们一定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打好对日作战的第一仗！要把敌人血洗宁武的罪行作为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的材料，掀起复仇杀敌的高潮。”

任务传达下去以后，整个部队沸腾起来了，指战员们磨拳擦掌。“为死难同胞报仇！打好对日作战第一仗！”的战斗口号喊得十分响亮。

10月17日，部队由老窝村进至离雁门关汽车路不远的王庄、秦庄隐蔽宿营。贺炳炎团长和我带上各连干部到黑石头沟一段汽车路去看地形，确定伏击部署，并派人预先做破路工作。

18日凌晨5时，部队踏着牧羊人走的山间小道向预伏地一雁门关南山脚下的黑石头沟开进。

此沟南低北高，沟底尽是山洪冲下的乱石头，汽车路顺沟由南向北而上，南端有一座小石桥。这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上午9时许，我们到达沟西侧的山上，各连队迅速进入伏击位置，团指挥所设在一处山头上。

不一会，日军车队拖着滚滚烟尘象长蛇一般从南向北驶来。据观察哨报告约有百十辆之多，我从指挥位置上看到的就有二三十辆，前面的几辆车拉着伤兵、死尸和护卫的武装士兵，后面都是空车。

日军车队缓慢地拐过小石桥，爬上陡坡，进入我伏击地域。

就在这时，贺炳炎团长一声令下：“打！”各种火器一齐射击，步枪、机枪交织成密集的火网，团属迫击炮连把一颗颗炮弹准确地吊进车厢。

打头的几辆车被打着了火，燃烧爆炸，车上的敌兵纷纷跳车。

随着冲锋号响，3营营长王祥发率领突击连如猛虎一般扑下山去，其他几个连也相继发起冲击。部队打得很猛，一下子就把敌人压到乱石滚滚的沟里。

根据我们在红军时期的老经验：打伏击战，只怕敌人不来，只要它钻进伏击圈，那么这一仗消灭敌人的把握十分就有了八九分，特别是当部队往下一冲，敌人就垮了，战斗也就接近解决了。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凶猛残暴的日本侵略军，正象战前贺龙师长提醒我们的那样，日军的战斗力与过去的敌手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遭我突然打击后很快就从一时的慌乱中清醒过来，趴在汽车肚子底下用机枪向冲下山来的我军扫射。

我们的战士很勇敢，一边冲，一边甩手榴弹，很快冲到汽车前，不管敌人听不听得懂，喊着“缴枪不杀！”，上去抓俘虏。

日军从车肚子底下爬出来，端着刺刀作拼死的反扑。看到敌人那副狰狞的面孔，战士们分外眼红，喊着“为宁武死难同胞报仇”的口号，勇敢地迎上前，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贺炳炎团长和我带着几个警卫员也冲下山，靠前指挥。

战斗打响不久，在黑石头沟北边担任警戒的分队报告，从广武方向又开来日军车队，也有百多辆，满载着向忻口增援的弹药和士兵，急急驶进黑石头沟。

我警戒分队冲着打头的几辆汽车一顿猛揍，打着了火。后面的日军迅速跳车登山，顺着西边的山梁转到我军左侧，向在公路上出击的我军射击，对

我威胁极大，天上敌机 4 架也赶来助战。

我们立即把部队重新拉上山。在这个过程中，我军的伤亡骤然增大，贺炳炎团长的警卫员被敌人机枪打倒，负了重伤，贺炳炎的胸前也被一颗子弹横着穿过，把他的皮袄贯穿了两个洞。

我们看到伏击目的已经达到，战场形势急转直下，遂主动撤出战斗。

这一仗，我们击毁敌军车二三十辆，毙伤敌兵 200 多名。黑石头沟里黑烟滚滚，击毁的汽车从南北两头把路堵死了，日军南北两个车队 300 来辆车被阻在沟里，动弹不得。据战后到过现场的群众讲，日军一直收拾到夜晚才撤走，临走时在黑石头沟竖了一块木牌子，写着此地被打死 67 人，提醒过往车队千万小心。

这一仗，我们的伤亡也不小。据统计，负伤 53 人，阵亡 50 人。11 连损失最大。该连政治指导员胡觉三在与敌人格斗中，发现车下藏着一个敌兵，上前去捉活的，却被那家伙一枪打中了胸膛，不幸牺牲。撤出战斗时，由于情况紧急，我们只把伤员背了出来，胡觉三等 50 位牺牲同志的遗体没能抢运出来。

烈士们捐躯赴国难，血洒雁门关，成为激励我们英勇抗战的楷模。他们的牺牲，不仅换取了对日作战的初战胜利，更重要的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雁门关一仗，再次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我们、为民族证明了一条在当时还未被许多人完全认识的真理：日本帝国主义是不足怕的，是完全可以战胜的！

战斗结束的当天下午，我们回到老窝村驻地。由我起草电报向师部报告了战况，师首长回电予以嘉勉，并命旅部将我团第 1 营归还建制，赶到雁门关地区与团主力会合。

两天后，我们又把部队拉到雁门关西边的山坳子上，选择从广武方向来的汽车路将要上垭口的地方作为伏击点，第 1 营、第 3 营分别摆在汽车路东西两侧，伏击日军从北向南的运兵车队。

吸取上一仗的经验教训，我们事先对公路、桥梁进行了彻底的破坏，贺炳炎团长和我各带两个连到黑石头沟及斗口梁子一带破坏了七座桥梁和几千米的电话线。

20 日上午，日军 200 多辆汽车结队而来。过去日军从

广武过雁门关地段，都自恃援兵众多、弹药充足，端坐在汽车上不下来。自从 18 日在黑石头沟遭我伏击后就改变了。

这次在广武镇就下了车，首先是一个营的步兵通过，人走前，车走后，并有 5 架飞机侦察助战，边搜索边前进。

敌变我变，为了避免过大的伤亡，我们在给敌人以猛烈、突然的火力袭击之后，立即撤出战斗。团部把 1 营带回来，王祥发营长率 3 营占领了雁门关，把抗战的旗帜插到了古关上。

在忻口会战的日子里，我 716 团接连在雁门关一带伏击敌汽车队，袭扰并一度切断了交通运输线，迟滞了日军对忻口前线的增援，使敌人没有饭吃，没有子弹，没有援兵，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也给忻口正面防御作战的国民党守军以有力的配合。

南京国民政府特对 716 团进行传令嘉奖，海内外报纸也大力宣传雁门关伏击的战果，称之为“雁门关大捷”。

毛泽东主席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

题》一书中，列举了包括我贺廖支队对大同雁门关问敌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雁门关的两次夺回在内的诸多胜仗，说明“八路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雁门关伏击，作为120师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一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

汾阳扩兵

1937年11月，忻口战役因娘子关失守而功亏一篑，日本侵略军继续向山西省会太原进攻，第2战区组织了太原守卫战。

傅作义的部队有点名气，说是会守，阎锡山就叫傅作义当了太原守备司令，八路军仍是配合作战。结果，傅作义守了两天，没守住，日军占据了太原，阎锡山跑到晋南的临汾，他的队伍兵败如山倒，四处溃散了。

太原的失陷，标志着“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八路军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由配合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作战转为独立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为此，八路军各部队化整为零，分兵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扩大力量，为今后的持久抗战作准备。

就在这个时候，我716团奉师部命令，从雁门关地区南下，以强行军经太原、河口、古交赶赴汾阳一带，其任务一个是帮助地方恢复被阎锡山的散兵扰乱的社会秩序，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一个是组织游击武装。贺炳炎和我率团直属队和1营及3营大部轻装前进，3营11连由连长宋发富带领担任后卫，掩护全团大行李。

南下途中，我团经过阎锡山部74师和中央军何柱国部驻地。团主力先行通过了，11连还在后面，74师想乘机卡我们的11连，抢夺大行李。

不久前我团去打雁门关来回路上，都曾路过何柱国部队当时的驻地何庄，他们知道雁门关战斗的情况，就出面劝告阎锡山的74师说：“八路军716团厉害，你可不能去惹他，他连日本鬼子都一次次地干了，你惹他还会有你的好？”吓得74师没敢动手，把11连放过来了。

我团一路强行军，只用两天就赶到汾阳以西、离石以东的吴城镇，按照预定任务开展工作。

阎锡山的散兵游勇流落各处，为害四方。别看他们在日军进攻面前胆小如鼠，可是祸害老百姓却如狼似虎，满有一套呢。他们每到一个村子附近，先打两枪，震唬住老百姓，然后开进村子，要吃要喝，抢钱抢物，再把男人都赶跑，把女人集中到几家炕上肆意轮奸。这些家伙奸淫掳掠，胡作非为，把地方上整得一塌糊涂，把老百姓扰得很惨很苦。

应老百姓的请求，八路军出来收拢被阎锡山丢弃的散兵。

贺炳炎团长每天带着部队，到处去收散兵，先后收容了有几百人，下了他们的枪，对其进行抗日教育后遣返回乡。其中有些士兵年纪轻，根子正，没做过坏事又有抗日热情，愿意参加八路军，我们经过审查后收留下来。

在参加八路军的这批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张霖的“小鬼”。他是五台县人，阎锡山的小同乡，只有15岁就被阎锡山拉了壮丁，队伍溃散后流落在散兵群中。716团把他收留下来，当了一名小兵，我们都喊他“小五台”。在八路军里，“小五台”学政治，学军事，迅速成长起来。他在我们这支部队里从战士、文书、参谋当到团长、师长、军长，成为人民解放军

的高级将领，被授予中将军衔。

我团收容散兵搞得很有成绩，使被扰乱的地方迅速恢复了秩序，扩大、充实了抗日武装力量。3营11连在雁门关的两次战斗中打得很苦，全连包括炊事员在内只剩几十人，到汾阳后我派宋发富连长带领这几十人出去扩兵。他们到文水、交城收了大批散兵，回来时已是齐装满员的一个连，得到师、旅的表扬。

对散兵游勇中的军官，我团把他们都遣送回去了。这些军官，当散兵搅扰地方的时候他们放纵不管，当八路军为着稳定地方秩序、维护群众利益而收容散兵的时候他们却大告黑状。

阎锡山的一个副官刚刚从我团回去，就向阎锡山告我们的状，说：八路军716团破坏统一战线，吞并友军队伍，收走了多少人，多少枪。

阎锡山以第2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发电报给贺龙师长要求追查，还派了那个副官到我团调查。

那个副官二次到了团部，远不是当初那种落难感恩的态度，变得趾高气扬起来，对我们兴师问罪。

贺炳炎团长和我没理睬他这一套，只派了一个参谋告诉他：“716团是曾收了点人，收了点枪，你回去后他们也回家了。至于回哪儿去了，我们也不知道。”把他顶了回去。

在汾阳一带，我团配合地方党，开展抗日宣传，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武装。

南下汾阳前，师部曾交给我团一项任务，叫找到“成成中学”师生游击队，给他们以帮助。“成成中学”是太原城里一所名气很大的学校，有不少师生包括校长刘墉如在内是共产党员。他们投笔从戎，组织了几百人的师生游击队，太原失守后到离石一带。我团到达汾阳与离石之间的吴城镇立即寻找“成成中学”的人，没有找到。他们已经向北到了五寨、奇岚。次年春，“成成中学”师生游击队配合120师在晋西北作战，以后又受120师派遣与715团组成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我们一直无缘见面，但时常可以听到他们的战斗消息。

汾阳西边的离石县，驻着山西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动总会的武装部长是共产党员、原红15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他在红军改编时离开部队，到山西做统一战线工作。他从离石给贺炳炎和我写信：“战动总会派人前往汾阳县城就任抗日县长，希望716团派武装掩护，协助开展工作。”

这时我们团部从吴城镇向汾阳靠近，到了向阳镇。贺炳炎和我决定派1营第4连护送抗日县长进入汾阳。

自从阎锡山的县长弃城逃跑后，汾阳城里一片混乱。我团4连进城，帮助地下党和战动总会开展抗战工作，同时也在群众支持下筹集了一批资财，收了一些人枪，其中还有几挺轻机关枪。

汾阳城里的局面稳定下来了，阎锡山坐享其成，又派来一个县长和一个叫傅存怀的“执法司令”。

这些家伙，当日军进攻时扔下老百姓自己跑得没影了，当共产党、八路军收拾了危局后又堂而皇之地前来走马上任，打着抗日的旗号重新搜括民脂民膏，一进城，就下令把战动总会的县长和共产党、八路军赶出汾阳，要我团4连把汾阳老百姓支援八路军抗战的枪枝都退出来。我军从来就没有交枪

的习惯，当然不能退出来。4 连出城的时候，“执法司令”还企图扣住不让出来。

我们的这个连长姓周，很有点脑筋。他事先估计到那个“执法司令”不会轻易放连队出来，就让指导员带队先出城，他一个人走在后面，因为阎锡山的晋绥军只认连长不认指导员。

指导员带着连队走到城门口，“执法司令”派的把门士兵拦住问：“哪里去？”

战士们七嘴八舌的回答：“不知道。”“连长叫到哪里就到哪里，你去问连长吧。”

把门的又问：“你们连长呢？”

“在后面。”

把门的以为把一连之长扣住，这个连队也就走不脱了，于是放 4 连先出来了。

周连长在后面见全连出城了，才慢吞吞地来到城门下。

把门的拦住他，问：“到哪里去？”

周连长假装糊涂，说：“我也不知道，指导员把连队带走啦。”

“执法司令”到此才明白被耍弄了，可是晚了，连队已经走啦，扣住个光杆连长又有什么用呢。结果，一个连全都出来了。

以后，我团就在汾阳、孝义一带扩兵，组织游击队。我们派团特派员裴周玉到离汾阳 10 公里的三泉镇，他在那里组织了 300 来人的三泉游击队，我团离开汾阳时，裴周玉带回来 100 来人，其余的由八路军总部政治部留在当地建立了一支部队。

1937 年底，日本侵略军从太原继续向南进攻，侵占榆次。

我团奉命结束在汾阳一带的扩兵工作，经文水县开栅镇北上，到达太原西边的古交、河口，与 358 旅旅部会合。我们把三泉游击队、汾阳收集的散兵以及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收容的阎锡山部一个连，合在一起，组建了 716 团第 2 营，重新恢复了宋时轮团长带走的第 2 营建制。以后鉴于 2 营是新组建的，战斗力弱，我们在团内进行调整，从 1、3 营各抽了一个老红军连和团警卫连与 2 营换了新连，使 2 营与其它营一样具有同等的战斗力。

建立根据地

1938 年春节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往年早就热闹起来了，可是今年却冷冷清清。眼看着国土沦丧、生灵涂炭，谁还有心思过年呢。

大年初二，日军就来进攻河口，激烈的枪炮声代替了往年的爆竹声。我 716 团在河口整整打了一天，将进攻之敌击退，在战斗中过了一个年。

新春伊始，第 2 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有了一个新计划，叫作“集中力量，反攻太原”。为了配合阎锡山部反攻，120 师全部集中起来插到太原北面的阳曲以北、忻口以南地区进行破袭战，截断日军退路。

358 旅在平社车站附近破袭同蒲铁路，断敌交通，在何庄与日军打了一仗，715 团团团长王尚荣身负重伤。

我奉师部命令带 716 团第 1 营到太原城郊的东山袭扰敌人，发动游击战争。我们袭击了太原飞机场，叫敌人恐慌了一阵子。

在八路军积极对日军作战、配合反攻太原的时候，阎锡山的部队却根本

没动，不但未收复太原，反而把阎锡山自己呆的临汾也丢掉了。

这么一来，日本侵略军更加猖狂，大同日军乘势再次向晋西北发动进攻。晋西北本来是由八路军 120 师收复后交给阎锡山的晋绥军手里的。晋绥军不堪一击，致使日军一下子就把宁武、神池、五寨、奇岚、河曲、保德、偏关七座县城都给占领了。120 师不得不从太原附近紧急返回晋西北，重新收复七城。

我接到回师命令时，正带着 1 营在太原东山活动，在那里组织了一个游击大队，收集了阎锡山部队丢散的一批军火，其中有两门山炮，我带部队走小道，派侦察兵走牛车路把山炮拉回来。

当我们赶回晋西北时，120 师已经打完了奇岚、三井战斗，收复了奇岚城。

我 716 团全部集中后袭占了五寨，接着增援 715 团打神池附近的凤凰山战斗，消灭了 300 余名敌人，乘胜追击至神池。

在神池战斗中，团警卫连用的是阎锡山部制造的手提式冲锋枪，打连发，弹头是锡制的，越打越软，一会儿就不行了，于是战士们举起冲锋枪跟敌人格斗，枪又太不结实，一打就把枪把子打断了，结果该连伤亡不小。

神池收复后，358 旅和 359 旅分别从西面和东面夹攻宁武，刚一接触，敌人就乘夜弃城而逃，只消灭了一部分。

120 师回师晋西北，把被日军侵占的七座县城重新夺回来，从此奠定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我军在晋西北地区原来只是打仗，收复失地，收复后再交到阎锡山手里。虽然我党通过阎锡山在各县组织了抗日团体“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和“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了“新军”部队和由民国老将、抗日坚决的续范亭将军指挥的暂 1 师，但是地盘是晋绥军与八路军共居，县以上政权则全部是阎锡山委派的。我们没有建立独立的抗日政权和自己的根据地，而是利用阎锡山“主持公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入，有枪出枪”的口号来进行群众的动员组织工作。

1938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把建立根据地作为抗日战争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提出来，指出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实现就失去了依托”。

经过日军连占七城、我军连克七城的斗争，我们进一步懂得了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只有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根据地，才能站住脚跟，攻守在我，进退自如，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才能更好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断获得人力物力补充，日益壮大抗日力量；才能坚持长期艰苦的战争，完成抗战的历史任务。于是，120 师和晋西北地方党着手在乡村中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自己的抗日根据地，尽管这时还是在统一战线下由阎锡山和共产党两种政权并存，但毕竟有了一个雏形。

经过这场斗争，我们也进一步懂得了晋西北的特殊战略意义。120 师呆的这块地方，地贫人稀，很穷很苦，干旱的

黄土地上只能出产一点小米子、苳麦面、山药蛋。小米子很稀贵，山西的婆姨用它坐月子，但对我们南方人来说不那么好吃。苳麦面难消化，不敢吃饱，否则涨得肚子痛。我们一年有多半要要吃山药蛋，几个人煮上一盆，干巴巴地当饭吃。这样的地方养不了多少人，部队很难扩大多少兵，兵多了

也养不起。但是晋西北战略地位很重要，它与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是沟通党中央与各个战略区的交通要道和中心枢纽，也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门户与屏障。

党中央把 120 师放在这里，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因此不管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困难多么大，为了延安，为了抗日，为了全局，我们也一定要把晋西北根据地坚持住，建设好。

连克七城之后，为了进一步地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20 师各团深入到雁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我 716 团到朔县、怀仁、左云、右玉一带连续打了几仗。这几仗，尽管规模不算大，缴获也不多，却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支持和发展了这些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在平鲁县的井坪战斗中，我团第一次捉到了日军俘虏。

以前我团同日军打过多次仗，打死过不少日本兵，可捉到活的还是第一次。日军俘虏很不容易捉，他们深受法西斯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宁死不当俘虏。我们捉的这个家伙很不老实，只好把他捆到担架上，一直抬回神池县义井镇，而后送到五寨去。一路上围观者甚多，大大增加了部队的信心，增加了群众的信心。

这年夏天，120 师根据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抽调 715 团等部组成大青山支队，由 358 旅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姚喆率领，挺进绥远，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120 师又将几支游击队组建了 358 旅第 714 团，为晋西北根据地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8 月间，716 团团团长贺炳炎离职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由刚从抗大毕业回来的黄新廷同志接任了团长。

夜战滑石片

1938 年秋，侵华日军制走了“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方针，在华北，日军集中 5 万余众，兵分 25 路，向晋察冀边区中心的五台大举围攻，企图摧毁这块模范根据地。我党中央命令 120 师配合、支援晋察冀兄弟部队进行反围攻作战。

11 月初，358 旅旅部率刚组建不久的 714 团和我 716 团风雪兼程，从晋西北向东跨过北同蒲铁路，赶到晋察冀边区五台县，隐蔽待机，准备消灭侵占五台的日军。

我们初到五台，还没能与晋察冀军区领率机关取得联系，情况不明，为此我团派参谋长刘忠带一个骑兵侦察排贴近到五台城边，侦察敌情。

第二天，即 11 月 3 日，雪后初晴，部队在五台山下的驻地一边休整，一边备战。午后，刘忠参谋长侦察回来了，报告说：“五台城里没有多少敌人，日军纳野大队昨夜从五台出动，袭击了晋察冀 2 分区机关所在地高洪口。”

我团得到这个情况后正考虑怎么行动，358 旅旅长张宗逊和旅政治部主任张平化恰好来到团部，旅首长和我们一起围着地图，分析敌情，研究作战方案。

我们估计：这次日军纳野大队乘夜出动，进袭高洪口，不会久占，今天白天要在那里休息，今晚或明晨将会撤回五台县城，我团在敌归途中埋伏就

一定可以打它一个伏击。伏击地点选定在从高洪口至五台城大路中间一个叫滑石片的山沟。

旅首长同意我们的计划，确定由我团向滑石片开进，伏击敌蚋野大队；7i4 团在滑石片西北警戒五台方向，并阻截漏网之敌。

我团从驻地到滑石片有 25 公里山路，日军从高洪口到滑石片只有 10 公里大路。能不能打上伏击，关键在于能不能抢在敌人前头到达滑石片。张宗逊旅长强调说：“一定要快！要和敌人抢时间，争取先敌到达，作好伏击准备，最低也要和敌人同时到达，打一个预期遭遇战。部队马上进行准备，1 小时内必须出发。”

黄新廷团长和我立即分头到各营下达任务。这时已是下午 4 点多钟，部队正准备做晚饭，我们把任务一下达，战士们纷纷表示：“不吃饭了，打鬼子要紧！”不到 1 小时各营，就先后出发，向滑石片疾进。

太阳落下五台山后，气温越来越低，夜色越来越浓，寒风卷着积雪打在脸上生疼，汗湿的衣服裹在身上冰凉，冰雪覆盖的山中小道又陡又滑，队列中不时有人跌倒。有的战士说笑话：“快到滑石片了，你们看，滑得站不住脚。”

我团经过四个来小时急行军，走完了 25 公里山路，终于在晚上 9 点多钟登上了滑石片西面的高山。

滑石片，东西两座高山夹着一条狭长的山沟，沟中大路弯弯曲曲由南向北而去，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我们命令部队按预定部署迅速向伏击位置运动：3 营拦头，占领滑石片西北及道沟东侧高地；2 营拦腰，设伏在道沟西侧；1 营截尾，并担任预备队；团指挥所设在西侧高地上。

部队正在从高山上向下运动，日军蚋野大队就进了沟。从 1 营方向传来一声枪响，不一会该营通信员跑来报告：“敌人来了，我营只插过路东两个连，还有两个连没过去，营长请示怎么办？”

黄新廷团长问：“刚才是谁乱开枪？”

通信员回答说：“那是敌人放的壮胆枪。”

看来日军还没有发现我们。黄团长和我向 1 营通信员交代：“告诉你们营长、教导员，没有插过去的就不要强过了，注意隐蔽，把敌人全部放进来，3 营在前边一打响，你们就堵住敌人后路。”

我们命令 2、3 营加快向山下运动。为了指挥方便，我们把团指挥所移向沟口的 3 营阵地。

这时，日军大队人马已经涌入沟里，嘈杂的马蹄声、牛羊猪鸡的嘶叫声清晰可闻，旧本兵嘴上烟头的星星火光明灭可见。

当 3 营刚刚下到沟口西侧的陡崖上，敌先头已经过去了十来个人。3 营 9 连飞身跃到沟底，迎头向敌行军纵队猛打，步枪、机枪一齐开火。日军人喊马叫，乱作一团，随后又集中全部骑兵向 9 连正面猛冲，企图冲出沟口。

黄新廷团长立即命令 3 营营长王祥发：“往下压！”

王祥发营长把棉衣往雪地上一甩，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拎着手榴弹，大吼一声：“11 连跟我来！”带领部队象一阵风似地冲了下去。9 连连长曾祥旺也率两个排从侧翼压下来。沟底响起手榴弹的连续爆炸声。

第 2 营从路沟西侧往下压时，也与朝前涌去的日军遭遇。营长蔡九、教导员黄新义率领部队勇猛冲杀，把敌拦腰斩断。

日军蚋野大队见正面冲不出去，又转头往回冲。第1营阵地只有两个连守在那里，日军却一股劲往那里涌去。

我们在团指挥所听到1营方向传来的枪声越来越紧，越来越急。我向黄新廷团长提议：“要派一个连去加强1营。”

刘忠参谋长喊了一声：“我去！”立即跑到2营，带上第5连前去增援1营。

战斗逐渐进行到了自热化的程度。日军接连发动一次次冲击，都被打垮了。全团各营连英勇冲杀，顽强抗击，将敌拦头、截尾、击腰，分割成数段。残敌进退无路，被压在陡崖下面只有被动挨打，急得嗷嗷直叫，有的还在尝试作垂死的挣扎，有的躲进沟里几所土房子负隅顽抗。

临近拂晓时，张宗逊旅长、张平化主任来到我们团指挥所，指示说：“现在是彻底消灭敌人的时候了，全部冲下去！”

嘹亮的冲锋号四处响起，震荡着滑石片整条山沟。战士们端着雪亮的刺刀，全部冲到沟底，与敌展开白刃格斗。

敌蚋野大队大部被歼，少数乘乱逃出也被担任警戒的714团拦截消灭。

当太阳从东山升起的时候，枪声停息了。我站在山上向下望去，只见山沟里敌尸横陈，残刀断枪，一片狼藉。

我们团指挥员和旅首长抽着刚刚缴获的日本香烟，等候打扫战场的结果。不久前，八路军总部发电通报，在缴获的日本香烟中藏有炸弹，有人曾被炸伤，要求团以上指挥员戒烟，特别禁止抽缴获的日本香烟。我们在山上又饿又冷，顾不得那么多了，借抽烟来充饥驱寒。

打扫战场的统计结果出来了，我们一个团一夜之间，就把旧军蚋野大队大部消灭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果：击毙日军500余名，俘敌20余名，缴获步枪340余支、机枪30余挺、小炮4门、山炮2门、战马100余匹，以及罐头、毛毯、大衣等物资。我们还解救出日军从高洪口抓来的几十名干部群众，夺回了日军抢掠的财物牲畜。疯狂一时的蚋野大队就这样覆没于滑石片。

我团从滑石片顺着日军来路，到了高洪口，在那里休整待命，并与晋察冀边区领率机关沟通了联系。高洪口的群众看到我团为他们报了仇，带回了被日军抓走的人员、抢走的物资，对我们非常热情。

晋察冀边区的记者叫我们的战士穿上日军黄呢大衣，一字排开缴获的几十挺“歪把子”机枪，拍了照片登在边区报纸上。

几天后，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25路围攻以失败而告终。358旅胜利完成了支援晋察冀边区反围攻作战的任务，奉命返回晋西北。

我团返回途中路过阎锡山的骑兵军驻地静乐城。骑兵军军长赵承绶是出了名的“草包军长”。他身为骑兵军长，出门、行军却不骑马，而是坐骡子拉的“轿窝子”。我们没见他主动跟日军打过一仗，日军来了他就跑，八路军收复了他又回来住下。我团路过静乐城，本来可以不走街里过，从城外多绕几步路也没什么，但黄新廷团长和我商量后，决定专门要从街里走一趟，显示一下八路军的胜利。

我团排着整齐的纵队，扛着缴获的机枪，拖着山炮，骑着洋马，唱着歌子：“奋斗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威风得很，神气得很。满街的老百姓以及赵承绶的士兵翘首观看，连声赞叹。

我团到娄烦镇住下来后，黄新廷团长和我穿着日本军官的呢子大衣到岚县城里的师部，看望刚从延安回来的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

我俩兴致勃勃地汇报了滑石片战斗的情况。

贺关听了，很满意。贺老总给我们讲了三条：一是仗打得不错，应该表扬，应该鼓励；二是不要骄傲，不要翘尾巴；三是把你团缴获的日军呢子大衣、毛毯全部收集起来送到延安去。

送我们出门时，贺老总又指着黄团长和我身上的呢子大衣说：“你俩个穿的大衣现在就脱下来，留在这里吧。”

回到团里，我们把所有的大衣、毛毯送交师部，再由师部转送到延安去了。

不久以后我团由贺关带领挺进冀中，在阜平县与晋察冀军区部队联欢，人家穿的都是日军黄呢大衣，又挡寒又威风，我们穿的仍是灰布军装，相形之下，显得比较寒酸。一些同志因此“抱怨”说：“都怪贺老总把我们的呢子大衣送走了，搞得我们好没面子。”

尽管嘴上“抱怨”，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贺老总就是这个样子，想问题办事情总是从大局着眼，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本来我们120师呆的晋西北这块地方就够苦的了，可是他宁愿自己苦一点，宁愿自己的部队苦一点，也要想方设法照顾延安，照顾党中央。这种宽广无私的胸怀和风格实在令我们敬佩，也激励着我们艰苦抗战。

第八章

在冀中平原

1938年秋，日本侵略军相继攻占广州、武汉之后，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代之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而将其主要军事力量抽调回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更加持久、更加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

1939年，根据党中央制定的方针，120师肩负“巩固冀中、帮助3纵队、壮大自己”的使命，挺进冀中平原，与冀中抗日军民一道，纵横驰骋，创造出平原游击作战的英勇业绩，展开了威震敌胆的人民战争。

日军的围攻一次又一次地被粉碎了，冀中根据地巍然屹立！敌人的有主力量一股又一股地被歼灭了，120师和3纵队愈战愈强。

冀中的斗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人昭示：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坚强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站在抗战最前列的先锋模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任何力量都摧不垮、攻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挺进冀中

1938年12月间，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从延安回到晋西北，在岚县师部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了7天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会上，贺关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组织我们学习了毛泽东同志《论新阶段》的报告和党中央制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贺关告诉我们，党中央决定120师挺进冀中，具体任务有三个：

第一、巩固冀中根据地，抗击日军的大举围攻；

第二、帮助整理冀中的八路军第3纵队，使这支新部队正规化、八路军化；

第三、利用冀中人口稠密、兵源众多的优势，发展扩大120师自己。

围绕这三个任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拟定了行动计划。

会后，部队做了一些调整。

当时，120师358旅的情况是：714团由几支游击队组建不久，是个新团；715团已于8月间由358旅政治委员李井泉和参谋长姚品率领，挺进绥远的大青山区；老部队只剩下我们716团。

贺关决定，由师部亲率716团及杨嘉瑞的特务团、彭绍辉的教导团挺进冀中，715团主力从大青山直接开赴冀中，358旅旅部带领714团并指挥独立1团、独立2团、警备6团、独立6支队等部留驻晋西北坚持斗争。

由于714团是个新团，战斗力较弱，我716团拿出三个老红军连与714团换了三个新连，加强了他们的战斗力。

从晋西北到冀中，要进行数百公里的长途行军，中间还要穿越同蒲、平汉两条铁路线，经过敌伪的许多据点。120师此行只有716团这一个主力团，特务团是游击队组建起来的，教导团都是教员和学员，是到冀中办学校的。

我团既要承担开路任务，又要护卫好师部，担子重大。为此，黄新廷团长和我向部队作了深入的政治动员，进行了周密的行军准备。

12月22日，部队从岚县出发，同行的还有赴晋察冀工作的120师副师长肖克，以及贺老总从延安带来的作家何其芳、沙汀和几十名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男女学生。

出发时，贺关向大青山发电，命令715团除留一个营坚持原地斗争外，其余由团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率领从大青山直接开赴冀中。

那几天连降大雪，我们踏着被冰雪覆盖的山路向东行进，下吕梁，涉汾河，过同浦，上太行，于1939年新年前后到达晋察冀边区的灵寿县。

1月15日夜，我们又从石家庄北面的新乐县越过平汉铁路，进入冀中地区。再经深泽、安平、饶阳等县，于25日抵达河间县西北的惠伯口村，与吕正操司令员率领的冀中军区暨3纵队指挥机关会合。

从这时起，为了隐蔽部队的动向和意图，120师对外使用了“亚洲部”的代号，716团对外称作“亚洲部第6团”，简称“亚6团”。

冀中真是个好地方。这里地势平坦，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总面积约33000平方公里，含39县、800余万人口，冀中处在北平、天津、石家庄三座大城市之间的三角地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革命历史悠久，党的工作很有基础，群众抗日情绪颇为高涨。

七七事变以后，侵华日军首先沿平汉、津浦、石太三条铁路干线南下、西进、东突，占据了沿线主要城镇。国民党政府军如洪水一般掠过冀中平原，向南溃逃。

中国共产党领导冀中人民，举起抗日大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活动。其中，共产党员、东北军的团长吕正操遵照党的指示，毅然率部挥师冀中，武装抗日。1938年，冀中党组织又把几路抗日武装合编起来，组成冀中军区暨八路军第3纵队，正式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日本侵略军为除掉这块心腹之患，确保华北，从华中调来大量兵力，仅在1938年11月至12月，就对冀中地区连续进行了两次围攻，致使大部分县城陷入敌手，冀中军民在日益困难的境况中浴血抗战，坚持斗争。

120师到达冀中时，日军正在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攻，形势十分危急。

贺龙师长与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同志商定，由120师部队担负反围攻作战任务，让冀中部队腾出身来抓紧进行整训。师部派杨嘉瑞率独立1支队到献县以东，协同冀中1分区部队活动；派肖新怀率师直两个连组成独立2支队，到文安、任丘、大城，协同3分区部队活动；派刚从延安抗大学习回来的贺炳炎、余秋里、常德善率716团抽调的三个老红军连和一部分干部组成独立3支队，到大清河北岸的霸县地区，协同5分区部队活动；师部直接指挥我716团协同冀中军区领率机关在肃宁、河间地区活动，寻机歼灭敌人。

老实讲，这次挺进冀中，我和团里一些同志的心情与往常有些不同。所谓不同，不是对战争形势的险恶有任何怯懦，多少年来不管遇到多么强大的敌人、多么艰难的处境，我们部未曾有过丝毫犹豫、动摇和畏惧；我们也不是对部队的战斗意志、战斗作风、战斗能力有任何怀疑，我从红军时代起就担任这支部队的师团政治委员，几乎熟悉每个人的秉性、脾气，深知这是一支英勇善战、绝对可以信赖的队伍；我们更不是对师首长的指挥有任何顾虑，

贺老总对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运用得好，我们跟随他转战多年体会犹深，这次我团在贺关首长直接指挥下战斗，更是军心振奋，志在必胜。

那么，不同之处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战场发生了变化，我们从山区初到平原，对今后的仗怎么样打，心里头没得多少底。

我这个湘西人，自幼在山里生山里长，参加革命后在山里行军山里打仗，飞鸟绝迹的高山也敢上，猴子难攀的陡壁也能爬。

我们这支部队，从红军时代起，除了洪湖那一段外，基本上都是在山区活动；抗日出征到了山西，还是在山区，开展山地游击战。

在山里，我们是一群猛虎，如今到了大平原，换了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仿佛一下子失掉了依托。

大家置身平原，心里都在嘀咕：

“这么大的平坝子，一眼望不到边，种庄稼是好，打仗可不行。”

“眼下正值冬季，青纱帐倒了，田野里白茫茫一片，连只兔子也藏不住，何况是数千人马呢。”

“平原上公路四通八达，几十里、上百里，敌人的汽车、坦克轮子一转就到了眼前。”

“平原上没得山包当掩护，没得沟谷打伏击，部队怎么样隐蔽？战斗怎么样打？”

俗话说：虎落平阳被犬欺。眼下这群下山虎，真有那么点担心。

如何使干部战士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掌握平原地形的特点，学会平原作战的本领？这成了我们到冀中之后急需解决的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关系到部队在平原作战的信心，也关系到能否在冀中迅速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完成中央提出的三项任务。为着解决这个问题，从上到下，从军事指挥员到政治工作干部，都花了相当的时间和气力。

首先，还是从政治思想教育入手，使部队牢固树立起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平原游击战争是人民群众的战争的观念。贺关等首长反复教育我们：人民群众是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坚强堡垒。大家懂得了只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只要有了人民、政权和军队的密切结合，我们坚持平原抗战就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

其次，是组织部队学习师司令部编辑下发的平原游击战材料，请冀中军区的同志介绍他们坚持斗争的经验，讲解平原战斗的特点和规律、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及其与山地游击战争的区别，使大家对敌军战术、平坦地形的改造和利用、村落平原游击战中的重要战术价值等问题，有一个概略的了解，明确“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仍然是指导我们在平原抗敌的根本战略方针。

再次，是大力鼓励全团指战员充分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通过上述工作，加上在平原上实地转了一转，大家心里有了谱，战斗情绪特别高昂，决心在贺关首长指挥下，以冀中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村落为依托，以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为靠山，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平原歼敌

曹家庄战斗是我团到冀中后打的头一仗。

曹家庄位于河间城西约 10 公里处。为了待机打击河间出扰之敌，716 团开进该地区，本着慎重初战、初战必胜的原则，紧张地进行了各项战前准备。

2 月 2 日，河间城里的日军官崎联队 200 余人，携山炮一门及伪军一部，企图进占肃宁。前一天，日军就在城里召集附近各村村长开会，公开宣布“明日出西关打游击”，嚣张之极无所顾忌。

上午 9 时许，日军大摇大摆地进至曹家庄。我团 3 营 10 连根据群众飞报来的敌情，早已占领有利阵地，严阵以待。

骄横的日军尚不知我主力部队的到来，仍象以往那样先架起山炮进行威慑性轰击，而后端着步枪发起进攻。

10 连沉着抗击，3 营主力随后赶到，以 9 连、12 连向村东树林坟地中的敌阵地冲击，日军大概从来还没有碰到被人冲击的事，卒不及防，被我当即夺占了阵地，缴获轻机关枪 1 挺、步枪 11 支。与此同时，1 营夺取了东北侧的日军阵地，也缴获轻机关枪 1 挺、步枪 10 支。2 营则以 4 连将敌一部击溃。

日军来时气势汹汹的，没料到仅仅一个回合就被我军打败了，只好退守待援，我们即令团属迫击炮连向敌射击，部队乘势发动数次冲锋，给敌较大杀伤，而后形成对峙。

下午，驻任邱、河间两城的日军 400 余人，分三路前来增援，其中北路有骑兵 100 余名，快速迂回过来；中路 150 余人，携炮 10 门，沿公路直进；南路 100 余人押着马车 40 多辆，看来是准备捞点什么东西回去。

敌援兵与残敌会合后，气焰又嚣张起来，以猛烈火力和大量步兵向我进攻。我团坚定地依托村落和工事，利用房角、墙头，以火力杀伤敌人。一直打到黄昏，敌人的多次进攻都被我击退。

天一黑，我们立即抓住有利时机，发挥我军夜战近战优势，派 2 营摸进日军占据的村子，一通猛打。日军顶不住了，弃阵而逃，拉着 30 多辆大车的死伤人员跑回河间城。

黄新廷团长率领 2 营和配属我团的 1 支队一个营，一口气追到河间城下，先头部队乘敌混乱冲进城去，把河间城搅得天翻地覆，而后在天亮前主动撤出，安全返回。

曹家庄一仗，我团首战告捷，毙伤日军 140 余名，缴获枪支弹药一批，狠狠震动了敌人，也大大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和群众的情绪。

由于是第一次在平原作战，一些战士还不善于利用田坎、沟渠、树木、坟包等地形地物隐蔽自己，而是直着身子冲锋，因此伤亡 139 人，其中牺牲 48 人。我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摸到了平原村落战斗的一些规律。

我团向师部报告了曹家庄战斗的胜利，贺龙师长高兴地赞扬了我们，同时他也提醒我们：“马上转移，别只顾发洋财咯。搞不好，今晚有你们的苦头吃。”我团随即转至曹家庄西南的大曹村待机。

在师部，有一个国民党军委会派驻 120 师的上校联络参谋，叫陈宏漠。他得知我团打了胜仗以后，跑到我们团部“慰问”。

陈宏漠装腔作势地向我们讲了一通：“你们 716 团仗打得不错，我来看一看你们。我要把你们的情况向上峰报告。”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拉拢我们。

他正向黄新廷团长讲得起劲时，我向他宣布：大批日军来进攻大曹村。这位国民党军委会的联络参谋连一句告辞的话都没有，抬起屁股就跑回师部去了。他就是这么一个胆小鬼。

日军官崎联队 2 月 2 日在曹家庄遭我打击后，又从任邱、献县等据点抽调兵力，集结河间，于 4 日拂晓向我报复而来。敌步、骑、炮兵共 1000 余名，携山炮 5 门、迫击炮 6 门，借着天上降着小雪和尚未完全消退的蒙蒙夜色，隐蔽地进至大曹村东约 5 公里的小刘庄。

在这同时，我们也接到了群众送来的敌情报告。因为报信人见到的只是敌先头部队，所以讲只有几十人。我团派 2 营 7 连向小刘庄施行威力侦察，主力占领大曹村阵地准备迎战。

天大亮后，日军开始炮击，而后向大曹村进攻。这次战斗，比前一次打得更为激烈。日军连续四次冲击都被打退了，遂施放起毒气来。

阵地上毒烟弥漫呛得人流泪、咳嗽不止，令人窒息。我军没有防毒面具，黄新廷团长和我用毛巾包住地上的积雪蒙住鼻子，战士们也掏出手中，有的放上雪，有的尿上尿，还有的蘸上人血，捂住口鼻，只管打。

我们从上一次战斗中得到经验，预先设置了多层防御阵地，第一层是村外的林沿，第二层是村沿，第三层是房沿。这次，只打到村沿。就把敌人击退了。接着，部队在迫击炮准确有效的射击下实施反冲击，夺取了日军第一线的几处阵地，与敌形成对峙。

夜间 11 时，各营同时发起冲击，日军顶不住了，仓惶溃退，3 营跟踪追击，又把敌人追到河间城下。

大曹村战斗，我团以伤亡 54 人的代价，毙伤敌 300 余名，还打死一名日军大队长。

战后，师部移住东湾里，我团驻在窝北镇，我们一方面扩大部队，一方面进行整训。我团补充了一批冀中子弟，并带领冀中军区第 30 大队，帮助他们整理队伍，加紧训练，尽快提高战斗力。

在这期间，715 团从大青山赶到冀中，在深县邢家庄与敌遭遇；歼敌 130 余名，取得了 120 师平原作战的第三个胜利。我 716 团打的第三个胜仗则是黑马张庄伏击。

河间之敌自曹家庄、大曹村两战皆败后，元气大伤，锐气大减，一时间再不敢主动向我进攻。

我们可不客气。2 月 17 日，我团带领 30 大队一部主动进袭河间城，搅得敌伪惊恐不安。此后敌人每晚睡觉都不踏实，上半夜住西街，下半夜住东街。敌军活动也受到限制，只有在大白天才敢出来在城周巡逻，先是离城两三里，渐次扩大到五六里、十余里，“扫荡”一下就匆匆回缩。

根据我团的侦察和群众的报告，出城游动的日军“单日出西门，双日出东门”。这个规律被摸准之后，我团主动报告师部：“我们要进行一次伏击，地点就选在城西的黑马张庄。敌人虽然出来的不远，但城里只有敌一个大队，我们只要隐蔽的好，可以给他一个突然打击。”

贺龙师长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2 月 28 日夜，我团从窝北镇夜行军进至距河间城仅 4 公里的黑马张庄。部队不叫门，不进屋，布置完任务后就露宿在寒冷的街头。

天快亮时，群众起来了。我们即向群众说明情况，请他们还象平常一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部队进入村边的房屋内隐蔽起来。

3 月 1 日晨 7 时，日军 120 余人刻板地按计划从河间西门出外巡逻，进至黑马张庄。

日军不敢再象过去那样大摇大摆地进村搜索，其先头 40 余人在离村百米

外就停了下来，后面的 70 多人也相距 500 米停止前进，谨慎地进行观察。

此刻的黑马张庄，家家户户屋顶上的小烟筒炊烟缭绕，村头处有三两个老百姓在拾粪，完全是一派宁静的田园晨景。其实这正是我们迷惑、引诱敌人的布置，连那几个拾粪人也是我团便衣侦察员化装的。

日军观察了好一阵，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于是进到村子边上集合。

这时，我团的一个便衣侦察员沉不住气了，扔掉粪叉、粪筐，大喊大叫：“敌人来了，为什么还不打！”

日军猛然一惊，冲着他打了一枪。仅仅打了一枪，埋伏在这里的 3 营就从房上房下、屋里屋外把手榴弹、机关枪、步枪同时打向敌人，当时就打倒了一大片。敌后续部队向村南侧击，被埋伏在那里的 2 营给予很大杀伤。两股日军慌忙退到一片坟地里顽抗，又被我团属迫击炮连猛揍一顿。

河间城里的日军先后三次派出增援部队共 200 多名，都被我们击退。

敌我双方对峙到黄昏，我团发起进攻，同时令 30 大队袭击河间，抄其老窝，日军支持不住，逃回河间。

日军作战素来讲究不丢死尸，这回也狼狈地遗弃了几十具尸体。

我团共毙伤敌 130 名，夺获了轻重机枪、短枪、步枪 60 余支，各种子弹、炮弹 7000 多发，以及毒瓦斯、防毒面具、军毯、自行车等物资。

黑马张庄战斗，我团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巧抓战机，大胆设伏，打了一个漂亮、利索的伏击战。120 师挺进冀中仅一个月，先后打了曹家庄、大曹村、邢家庄、黑马张庄战斗，共是四战四捷，粉碎了日军的第三次、第四次围攻，稳定了冀中的斗争形势，同时也打出了我军平原歼敌的信心。

从这以后，贺龙师长的名字和老八路“亚五”、“亚六”的声威象神话一样在冀中大地上传开了。老百姓闻之鼓舞，日伪军闻之丧胆。

老八路带新八路

“司令遍天下，主任赛中毛。”

这是我在冀中干部群众当中听到的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它形象地反映出七七事变后冀中大地上各种抗日武装和组织蜂拥而起的状况。

这里面，既有我党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和民众自发成立的自卫队、义勇军，也有国民党遗弃下来的散兵游勇以及地主乡绅拉起的联庄会。他们多则上百条枪、千数来人，少则几条枪、几十人，占一块地盘，找一个靠山，自封头衔，举旗平起平坐，共同组合。按冀中军区的意思，是把这两个支队编给 120 师；按一般人的想法，由老八路改编、指挥新八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究竟怎么样来编，才能够既使这两个支队顺利地得到改造、提高，又使支队的头头高士一、魏大光不至猜忌别人要吃掉他。贺关的作法，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3 月间，四战四捷刚刚结束，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就把 715 团编给了高士一的部队，成立了独立第 1 旅，下辖 715 团和原 4 支队改编的 1、2、3 团。

高士一担任独立第 1 旅旅长。他原是任丘县一个有名的大地主、大士绅，事变后拉起队伍抗日。

独 1 旅副旅长是原 715 团团团长王尚荣。他是位智勇双全的战将，长征时的红 5 师师长，冀中邢家庄战斗出名的“亚五”团团团长。贺关叫他给高士一

当副手。

独1旅政治委员是原715团政委朱辉照，红军时期的团政委。他原是个篾匠出身，生活穷苦，初到独1旅时对高士一的那一套生活作风有点看不惯，有时跑到贺关那里发牢骚，结果挨了严厉批评又回去继续工作。

大概在4月中旬，贺关又把我们716团编给了魏大光的部队，成立了独立第2旅，辖716团和原5支队改编的4团、5团。

魏大光担任独立第2旅旅长。他的部队原有一个政委，叫王同安，是个大学生、地下党员，当了独2旅政治委员。

我在这时调离了716团，到独2旅当副政治委员，协助王同安政委领导全旅的政治工作，并帮助魏大光旅长指挥作战。跟我到独2旅工作的还有戴文彬，当旅政治部主任。独2旅4团、5团的军事干部完全由魏大光的人担任，我们只派了几个政治干部。4团政委孙占彪，红小鬼出身，当过青年干事。5团政委范保顺，也是个老红军。

独2旅编成以后，我们遵照贺关的指示，对魏大光及其部下，不是去吞并他们、轻视他们、排挤他们，而是去亲近他们、尊重他们、团结他们，通过我们的工作和自身的影响来带动、帮助他们进步。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对魏大光和他的部下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魏大光是冀中霸县人，做过工，当过兵。七七事变后他动员本村几户地主出枪，拉起一支队伍，当上联防队队长，又用结拜兄弟的办法联络了邻县的几支队伍，举旗抗日。王同安、李公侠等天津地下党员找到他们，建立了党的影响。成立了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27支队，以后又编为八路军3纵队独立第5支队，魏大光当司令，在天津西边的大清河以北地区开展抗日斗争。

他这个人出身贫苦，没有家产，没有钱财，有很强的正义感和民族心；他年轻，和我同龄，血气方刚，易于接受新思想；但他也有一些毛病，讲究义气，感情用事，争强好胜。

魏大光手下的几个团长和其他一些人，都是与他同期拉队伍的结拜兄弟。4团团团长叫王庭文，几个月后当部队再次整编时他不干了，回家乡去了。5团团团长叫徐立树，能打仗，很勇敢，只是脾气有点蛮，别人给他起了个浑名叫“横牛”。由于先天的原因，这支队伍带有一些不好的习气。过去他们在支队司令部开会的时候，警卫们把机关枪架在大门口，摆威风。

对于魏大光他们身上的一些旧习惯，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要求我们：一方面是通过谈话和引导，积极帮助他们进步；一方面是要看到他们过去是怎么样一个人，长期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对他们的要求不能操之过急，要通过他们自己的学习和锻炼，逐步得到提高。

在政治上，魏大光及其部队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有很强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是坚决抗日的，但是他们当初拿起枪仅仅是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保家乡。我们引导他们学习革命道理，使之逐步地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不只是为了打走日本侵略者，还要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中国；使之逐步地由为自己而战转变到为人民和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战，从而树立起一个更加远大的政治理想。

在党的建设上，魏大光部队原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进行活动，秘密地吸收了一些同志入党，建立了党的支部，但是党在部队中仍处于半隐蔽半公开状态，仅以政治工作干部的面目出现，军事干部则不是共产党员。我们来到独2旅后，大张旗鼓地开展党的建设，积极扩大党员队

伍，健全了从旅到团、营、连各级党的组织。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18周年之际，独2旅首次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宣布公开党的组织，党在这支部队中从此成为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我们还在部队中大力加强政治教育和正规化训练，系统学习红军、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和战略战术，努力破除轻视政治工作的单纯军事观点、小团体主义思想和军阀残余作风，从而使广大干部、战士逐步地完成从新八路向老八路的转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军人，使这支部队真正成为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战斗力的劲旅。

独立第2旅正式编成后，即随师部在河间县东北的齐会一带整训，师部驻大朱村，独2旅驻卧佛堂、齐会等村，不几天独1旅也来了。这是120师主力到冀中以后的第一次会合。

4月2日，120师两个旅集中在一起开大会，庆祝整编与会合。会上，高士一代表独1旅、魏大光代表独2旅登台讲话。魏大光是头一次在这样大的场合讲话，不晓得应该讲些什么。我和戴文彬主任就详细地告诉他，并准备了一个稿子，鼓励他来讲。从魏大光当上旅长起，我们就使他这个旅长不是作样子，而是有职有权，注意树立他的威信，凡遇抛头露面的事情都让他来干。

正在开会的中间，师部得到情报：从沧州新近调河间的日军吉田大队800余人，气势汹汹地前来进攻。庆祝会立即变成了战斗动员大会。贺龙师长决心抓住战机，实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歼灭吉田大队，给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

第二天，日军吉田大队向齐会村进攻。驻守齐会的我独2旅716团第3营由王祥发营长率领，在日军的包围中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抗击，将敌人死死拖住。黄新廷团长率另两个营在村外又对进攻之敌实施了反包围。120师集中两个旅围歼日军，我独2旅在卧佛堂阻击增援之敌，将其击退。天黑后，我军对齐会之敌发起总攻，村内与村外一齐夹击，吉田率部突围，716团衔尾猛追，715团迎头狠打。第2天战斗，日军又是死伤惨重，残敌逃至一片坟地里。挨到黄昏，我军发起总攻。忽然刮起一阵狂风，吉田带几十人借着飞扬的尘土，侥幸逃脱，跑回河间城。

齐会战斗，120师集中两个旅共七个团，打了一场大规模的平原歼灭战，一举消灭日军700余名，震动了全国。这是日军自进攻冀中根据地以来受到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也是八路军首次取得平原歼灭战的胜利。

在战斗中，贺龙师长靠近前沿指挥。当日军的毒气弹打来时，他中了毒。但他毫不在意，接过卫生员递来的湿口罩，继续指挥战斗。我军各部队在贺龙师长统一指挥下，冒着日军的炮火和毒气，英勇战斗，密切协同，并肩杀敌。

我独2旅716团作为主力，担负了最艰巨的任务，打得顽强，打得勇猛。在齐会村内率部抗击日军的3营营长王祥发，身负重伤，腿被打断。以“猛虎”著称的10连连长余志杰在突击敌机枪阵地时被打出了肠子，他解下绑腿缠住肚子，继续冲锋，直到第二次腹部受伤，才被送下火线。

我旅4团、5团作为新八路，第一次参加这种正规化的大兵团作战，能够坚决执行上级部署，把增援的敌人打了回去，保证了战局的顺利发展，他们自己在战斗中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还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外国八路，也为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他就

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白求恩到冀中后，一直随 120 师行动，我曾在师部见过他几次。大曹庄、黑马张庄等战斗 716 团的重伤员都是由他亲手抢救的。白求恩在救治黑马张庄战斗的伤员中，度过了他 49 岁的生日。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击败了敌人。敌人在战场上遗留下了 50 具尸体。我们缴获了 40 支步枪，损失了 40 个人，一条性命换一支步枪！我们的枪就是这样得来的。”

这次打齐会，白求恩大夫把他的医疗队设在距火线仅 3 公里的一座小庙里，连续 69 个小时不停的工作，给 115 名伤员做了手术。当王祥发营长、徐志杰连长等重伤员被送到这里，白求恩大夫一面做手术，一面叹道：“毛主席的战士了不起！”

齐会战斗之后，魏大光旅长看到自己的部队少了，就要求回到津西的大清河以北地区扩大部队。魏大光的部队原来跟高士一的部队一样都是四个团，改编为八路军后，他的一些把兄弟把一部分队伍带了回去，因此成立独 2 旅时只剩下两个团，而高士一仍有三个团。魏大光这个人很要强，他想重返家乡一带，把那些跑回去的队伍再收拢起来，带回来。齐会战斗之前，他就要求回去。战后，他又提了出来。

当时，我考虑到他家乡那里情况复杂，同时独 2 旅也需要他，就劝魏大光：“你不要自己回去，可以派人去嘛。”

魏大光解释说：“不行呀，派人去弄不来，必须得我亲自出马。”

魏大光态度坚决，再三要求，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反复考虑后同意他回去。

临走前，魏大光向我要求：“政委，我现在是老八路了，可家乡的人们不一定知道，要别人相信我是老八路，你要把老八路的人给我几个才行。”

我说：“那好吧，你要谁呢？”

他提出要派政治部主任戴文彬跟他一块去，戴文彬不光是老八路，还是一个老红军呢。经贺关批准，我把戴文彬给了他。

魏大光又提出：“政委，你再把你的警卫员给我一个。”

我从 716 团到独 2 旅时带了三个警卫员，我把其中一个叫何娃的警卫员给了他。

此外，他还带了旅骑兵连连长韩祥，也是他的把兄弟，一共十来个人。

魏大光走后，据说在霸县、安次、永清一带，收拢了不少人。

7 月间，冀中地区连降暴雨，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军把猪龙河的大堤掘开了，企图淹死我抗日军民。独 1 旅和独 2 旅 4、5 团，原在河间、任丘一带活动，因猪龙河决口，大水淹没了这些地方，我们就向南边的安平、饶阳、武强、深县、深泽转移。敌人又把滹沱河掘开了，我们再向南走，大水也向南涌来，日军则从西向东“扫荡”。独 2 旅和独 1 旅在深县与安平、深泽之间的大冯营打了一次伏击，打成一个对峙战、消耗战，大水来了，我军主动撤退了。

8 月，独 1 旅、独 2 旅奉命离开冀中，向西越过平汉铁路，到晋察冀边区的行唐、灵寿地区休整。独 2 旅把原 4 团、5 团合编为一个第 4 团。

在这个时候，有消息传来：魏大光旅长牺牲了！

8 月间的一天，魏大光带人坐船在大清河洪水泛滥区活动，碰到了日军巡逻炮艇，打了起来。战斗中，魏大光中弹牺牲，我给他的那个警卫员何娃也同时牺牲了。

魏大光旅长牺牲后，由我代理独立第2旅旅长，率领部队继续战斗。

对于魏旅长的死，我们全旅同志都十分悲痛。

9月间，独2旅在行唐县西边驻地举行追悼大会，隆重悼念魏大光同志。追悼会由我主持，王同安政委致悼词，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派人送来了挽联。

我在讲话中沉痛地说：“年仅28岁的魏大光同志，还有许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做就光荣牺牲了。他的死是我党和我军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坚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们要永远怀念他。”

以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电通报全军褒扬魏大光旅长。总参谋长叶剑英发表悼念文章，称赞：“这种百战而死的精神，说明魏旅长为国家尽了大忠，为民族尽了大孝。”

9月下旬，716团跟随师部也从冀中回到晋察冀边区的行唐县。

9月25日，敌水原旅团长率一个大队在灵寿县城集结后，袭击晋察冀边区后方机关和抗大2分校所在地陈庄镇。120师各部队立即部署在陈庄附近战斗。日军沿鲁柏山麓的一条沟，从东向西到陈庄，扑了空，放火烧房后向东撤退。我带独2旅4团卡住日军的来路，逼敌不能沿原路退回，716团和独1旅部队两面夹击，716团将敌逼到小村子里。

第二天，日军从灵寿、慈峪出动800多人前来解围，被津南自卫军阻住，又被我独2旅4团击退，我率4团插到慈峪与鲁柏山之间，截击敌人。在我军主力的打击下，敌被歼1380余人，少将旅团长水原也被击毙，残敌翻越鲁柏山逃了回去。

陈庄战斗以后，120师进行了整编。由于主力、老部队减少了，各支队扩大了，因此将独2旅编入358旅，张宗逊当旅长，张平化当政委。

这时，师政委关向应找我谈话，说：“独2旅撤销了，调你去358旅当政治部主任。”

我从红军时代起就一直是当政治委员，没当过政治部主任，没搞过机关工作。因此我向关政委提出：“我当不了主任。”

谈到第三次时，关政委又征求我意见：“你不当，那么谁来当主任啊？”

我提出叫金如柏去当主任。

金如柏是个长期搞政治机关工作的同志。红2、6军团会师时，我在6师当政治委员，他从6军团调到我师任宣传科长，抗日编队时他在120师政治部当宣传科长，赴冀中前他到716团当政治处主任，我离开716团到独2旅时他接替我当了716团政委。

因此我向关政委推荐：“金如柏当主任不错嘛。”

关政委又问我：“金如柏当主任，你怎么办？你到哪里去啊？”

我干脆地说：“我好办，回716团当政委嘛。”

关政委考虑到我过去曾由师到团，现在当了旅的干部再下到团里，金如柏则由我的下级到了旅里。他有点不放心地说：“这样行吗？你行吗？”

我没去想什么下级、上级，主要是从工作上考虑的。那个时候的干部都把个人的升迁看得很淡，能上能下。我连声保证说：“可以，行啊。”这样，我又重回716团当政委。

从1939年1月到9月，120师在冀中战斗了八个月。我们和冀中抗日军民一道击退了敌人的一次次围攻，歼灭了大量敌军：保卫并巩固了这块根据地，使之成为一座屹立在冀中大地上的坚不可摧的抗日堡垒。

我们带动和影响了冀中抗日武装，帮助这支新八路军进行整理、改造、提高，使之逐步成为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度战斗力的八路军主力部队。

我们自己也得到了迅速的扩大，从初到冀中的两个团、一个支队约 8000 余人，扩大到两个旅、七个支队共 47000 多人。

当 120 师于 1940 年 1 月重返晋西北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和军委交给的三大任务。

冀中的老百姓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般的亲情、有着鱼水般的关系。这种亲情和关系，在冀中大平原上表现得尤其充分。在这里，我们不论是行军还是宿营，不论是打仗还是转移，不论是寄养伤病员还是补充新战士，都离不开冀中大地上那星罗棋布的村落和村落里的老百姓。可以说，我们的每时每刻、一举一动都在人民群众的眼睛里。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连一天也生存不下去，更不要说坚持冀中游击战争、完成中央交予的三大任务了。

冀中的老百姓，从外表上看，他们就象这块大地一样平平淡淡，朴实无华，可是他们心里却透亮得很。他们热情、勇敢、聪明，抗战积极性非常之高，当向导、搞侦察、支前参战十分踊跃。

初到冀中，这里的老百姓就使我产生了良好的印象。经过几次战斗之后，我有了更深的体验。

曹家庄战斗，河间的日军出城仅 3 华里，一位老百姓看到了，骑自行车一阵风似地跑到曹家庄，飞报敌情：“鬼子朝这里来了！”

我们根据这个报告，迅速做出了歼敌部署。当日军接近曹家庄时，我团的连哨早已占领了阵地。

大曹村战斗，日军以夜行军隐蔽地前来偷袭。其先头部队胁迫一位老百姓到大曹村侦察我情，结果他反向我军报告了敌情，使日军阴谋破了产。

我团在黑马张庄打伏击，村里的老百姓配合得那样好，一切都伪装得跟平常一样，狡猾的日军观察了好一阵也看不出丝毫破绽，上了当。

在冀中，敌方的一举一动都有群众主动报告，而对我方的行动却守口如瓶，使得“我知敌而敌不知我”。敌人是聋子、瞎子，处处挨打，处处被动；我们却是耳聪目明，如鱼得水，任意遨游。

冀中的老百姓刚开始也曾怀疑过我们：“这些山西来的老八路军身穿灰军装，脚蹬布草鞋，装备不咋样，说话倚里倚气，能打过鬼子兵吗？”

打第一仗时，我们带着部队往前开，一些老百姓纷纷向后跑。有一户人家正在办喜事，听到枪响，婚也不敢结了，衣服没换拔腿就跑。

可是当我们跟日军打了一会儿以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自动又回来啦！那一天我团从上午 9 点打到午夜后 4 点，整整 19 小时，部队根本就不用自己作饭，老百姓全都给包下啦。战区各村群众纷纷送来自家的馍馍、大饼、点心和开水，日军身后的群众也冒险绕过火线送来了吃的，我们放开肚子都吃不完。火线上下来的伤员，也都由老百姓转送，担架不够用，他们拆下门板，赶来牛车，运送伤员。

我在人群中看到那位娶媳妇的新郎头戴礼帽，身穿长衫，十字披红，给部队抬担架，忙得满头大汗，沾得一身血迹。

我问他：“新郎倌，敌人打来时，我们部队向前去，你们都跑了，为什么现在又回来帮着抬担架？”

他告诉我：“你别见怪，过去有些队伍是一打就跑，鬼子来啦我们不跑不行呀。你们这次不同，硬把日本鬼子打趴下啦！”

我跟他开玩笑：“你这个新郎倌今天娶媳妇也来抬担架，可别误了你入洞房呀？”

他红着脸只是笑。

战士们纷纷向他道喜，说：“你今天这个婚结得好有意义哩，娶了新媳妇，打了大胜仗，双喜临门！”

打过第一仗之后，老百姓对我们更热情了。以后再打仗，不但没人跑，有些胆子大的还趴在房上观战，要亲眼看看我们是怎么样打鬼子的。战斗刚开始，老百姓就把吃的喝的送来了，一定要亲手交到一线作战人员手里。自家做的馍馍、大饼还嫌不够好，又买来点心给我们吃。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竟会吃着点心打仗！

几次战斗间隙，正逢老百姓的传统节日，一个是春节，一个是元宵节。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争相赶着猪羊，踏着冰雪，一路打听找到驻地，慰问我们。

一进村就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是不是老八路，是不是消灭好几百鬼子兵的‘亚六’团？”

是，就把所有慰问品都送给你。不是，就不给。

当时我团负责带训冀中军区 30 大队，都驻在一起。我们怕厚此薄彼影响团结，主动将慰问品转送给 30 大队。老百姓可不管这些，只认得“谁打死了鬼子就给谁吃”这个理。我觉得这些老百姓有点太那个，搞得过了头，可他们那种单纯、直朴的心实在令我感叹不已。要知道，30 大队全都是冀中老百姓自己的子弟呢！

我团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来不及装殓，只能就地掩埋起来。老百姓知道了不干，又挖出来，凑钱买来最好的棺材，将烈士遗体擦洗干净，盛殓后重新入葬。干部战士看到这个场面，受到很大激励，流着泪说：“我为老百姓打仗死了，老百姓这样待我，我心满意足啦……”

曹家庄战斗的第二天，老百姓把我团的 48 位烈士集体安葬。此后，虽经战火磨难，但怀念之情愈烈。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周围五村的老百姓自发集资修建了 48 烈士墓碑。一位当过前清拔贡的老先生撰写了千字碑铭，记述了我八路军曹家庄战斗“流血殉国之实在情形”，慨叹“兹者，日寇无条件投降，抗战大功告成，从此国耻可雪，失地可复，吾济国民免却受帝国主义者之压榨、束缚……借非我已故及现在士兵之艰苦抗战，何能有此？群众追念功始，金原立石墓门，以旌其当年杀身成仁之行，呜呼盛矣！”

在冀中平原进行村落战斗，我军需要在老百姓家墙壁上掏枪眼，在房顶上做掩体；日军对着村子用机枪扫，用大炮轰，老百姓的房子毁坏不少。可是为了抗战，他们毫不顾惜，什么都舍得豁出来。参军参战，更是十分踊跃。

大曹村一仗，我团请的一位向导在阵地上看到机枪手负伤了，抱起机枪，转移了位置，哗哗地打起来。他以前当过兵，打得很内行。

战后补充到团里的冀中子弟兵，当兵一个星期就参加了战斗，表现得十分勇敢，一边打一边还喊鼓动口号。

贺龙师长曾向随军作家沙汀夸耀说：“老实讲，同志，这里的士兵质量

好呢。文化程度高，生活又很简单，只要有两个窝窝头往肚皮里一装就完事了，睡觉也不要被盖，连鞋子都不脱，穿起衣服往炕上一滚就睡，作战又勇敢。6团那些新兵，才补充进来不久，就可以拖起枪打冲锋！”

在冀中战斗的200多个日日夜夜，在与冀中老百姓的朝夕相处中，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甘屈辱的强烈爱国主义意识，那种同心同德的高昂抗战热情，那种舍家纾难的高度自我牺牲精神，那种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意志，以及他们热爱共产党、热爱子弟兵的那种深厚感情，无时无刻不在感奋着我，教育着我，激励着我。

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是何等的深刻、何等的正确啊。冀中人民所做出的无私而巨大的贡献正是对这一真理的最好印证，英勇、智慧的冀中人民正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缩影！

冀中的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这就是我们坚持持久抗战的铜墙铁壁，是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是我们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赖以生存的雄厚根基，是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得以兴旺发展的力量源泉。

对此，我是终生不会忘记的。

第九章

延安四年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一面以坚韧不拔的意志，领导敌后抗日军民顽强斗争，苦度难关；一面以宏伟远大的气魄，首先在延安、继而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学习马克思主义、整顿党的作风的伟大运动，从而为克服严重困难、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从1941年至1944年在延安学习、工作了四个年头。在土窑洞里，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在延水河边，我沐浴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洗礼；在宝塔山下，我认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延安，这是我们一代共产党人的思想故乡，是我们心中的革命圣地。

求 学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参加者，对于革命理论的掌握，大体上不外乎有这么两种情况：

一种是占少数的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对救国救民之策的探索，通过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首先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而后运用这种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例如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革命先驱和党的领袖，以及我所熟悉的周逸群、关向应、任弼时等军队政治工作领导者。而像王明那种只会背诵马克思列宁著作中的词句，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用教条主义吓唬、蒙骗人们，危害革命事业的人，自然不能属于此例。

另一种是占绝大多数的普通的工农群众，无法忍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逼上梁山，首先投身于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实践，而后在共产党的引导下逐步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例如彭德怀、贺龙等这样一些从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以及广大指战员。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开创出一条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道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群众的结合，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浩荡大军。

对于我们工农出身的同志来说，在积极参加斗争实践的同时，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乃是一项十分必要、十分紧迫的任务。这也是我参加革命队伍后追求多年的宿愿。

我是在党和贺龙同志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在紧张的战斗中，我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也摸索到一些打仗带兵的经验 and 做政治工作的方法，对党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所提高。

同时，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和部队的壮大，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理论水平、思想水平、工作水平都显得太低了，理论上缺乏系统的学习，思想上还有不少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工作上也常常带有盲目性。

因此，我一直渴望有机会能系统的学习、提高。每当看到身边的战友一批又一批地进“红校”，上“抗大”，我心里总是羡慕不已；每当听到这个或那个同志讲话都能大段大段地引出理论根据，我总是佩服得不得了，要求

学习的愿望越来越急切。

长征结束后、抗战爆发前，曾有两批干部去延安上红军大学，我找到贺关要求学习，却没能如愿。

1938年夏，为了能到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贺炳炎和我跑到关向应政委那里，争了五六个钟头，关政委被磨得没办法了，最后决定两个去一个，叫贺炳炎去了，我还是没去成。

1939年冬，120师组织了一个干部训练大队，又叫“高级读书班”，抽出部分营以上干部进行短期轮训，我调去当大队长，边带队边学习。我们这个读书班由延安马列学院来的教员文山、甘惜芬讲授唯物论与辩证法，每天除了下早操、晚操就是上课、自习，隔几天还要考试。不久日军进行“扫荡”，我们一边游击一边学习，每天跟敌人转山头，转到哪里停下来就开课，找一块向阳背风的地方，石头当凳，膝盖当桌。虽说条件十分艰苦，可我们学得还是满认真，满不错呢！学唯物论时，大家兴趣十足，联系工作搞清楚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讲辩证法时，大家也学着辩这样，辩那样。可惜只学了两个来月，就因为晋西事变发生而仓促结束。

1940年春，为了对付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阴谋，师部率358旅在黄河边的临县、离石驻防了一段时间。我们听驻河西的359旅同志讲，他们送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干部提高得很快，毕业后变得怎么不得了。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41年1月间，冬季反“扫荡”胜利结束，晋西北的战局刚刚稳定下来，贺关下决心从部队中抽出一批军政主官送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我716团一下子就去了三个，团长黄新廷、政治委员廖汉生、营长张树芝。其他人有715团团团长顿星云、2团团团长傅传作、358旅政治委员李井泉、副旅长贺炳炎、独1旅政治委员朱辉照等，共是十几个人。

多年的求学愿望终于实现了，而且是到向往已久的延安去学习，我心里高兴极了。我们告别了贺关首长和部队，西渡黄河。路过绥德时，359旅旅长兼绥德警备区司令王震邀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天，而后匆匆赶往延安。

我曾在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5月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来过延安。转眼之间四个年头过去了，延安这座默默无闻的陕北小城，在抗战风云中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革命圣地，成为领导敌后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成为造就中华民族抗日精英的大熔炉。

我们一行除李井泉同志另有去处外，全都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安排住下来。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新挖的窑洞里，拥挤、潮湿。吃饭就是一桶小米饭，一盘青菜，顿顿如此。对于生活上的单调、清苦，谁都没有怨言，问题是住了好几天，入学的事情还未办好。正巧延安新成立一所八路军军政学院，专门培训军事政治干部，正适合我们学习。组织上就决定我们这些人不上马列学院而是进军政学院学习，可是军政学院一直没有人来安排我们。我们这些刚刚从烽火前线下来的学子，整天闷在窑洞里扯“乱谈”，实在无法忍受。大家等不下去了，一商量，干脆自己找军政学院上学去！

我们打听到军政学院的副教育长是陈伯钧。长征中2、4方面军会师，陈伯钧调来当6军团的军团长；抗日编队时他当359旅旅长，率718团留守陕甘宁边区。他是我们的熟人。我们把背包背上，东西提上，直接找到军政学院。

在离院部几百米的八路军大礼堂前，大家停下来。贺炳炎和我自告奋勇

去找陈伯钧办交涉，其他同志在那里等候。

我俩进了院部，找到陈伯钧，熟人见面用不着客气，开口就说：“我们358旅的十几个人要进军政学院学习，你收不收啊？”

“欢迎，欢迎！”陈伯钧爽快地答应下来。

我们马上把等在外面的同志接进来，当场办好了入学手续。

八路军军政学院的“牌子”很大，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院长，张如心任教育长，陈伯钧任副教育长。学员有四个队，1、2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3、4队是工农出身的老红军干部，其中3队文化程度又低一些，4队稍高一些。我们入学后一开始就是考试，考文化基础和政治常识。根据考试结果，贺炳炎、黄新廷等大部分人到了3队，我和顿星云、孟昭亮等分到4队。军政学院的课程有军事指挥课和政治理论课。军事课学习初、中级战术，教员有曾任过716团团长的宋时轮、八路军总参谋部一局局长郭化若。政治课主要组织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学习党中央作出的一些决定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报告。

我在4队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被改选为党支部书记，由于学员都是共产党员，因此我这个书记的任务就是带领大家学习。

这年8月，八路军军政学院一分为二，原校址改为政治学院，另在延安飞机场附近新建了军事学院，教员、学员也按军政分开，贺炳炎、黄新廷等去了军事学院，我留在政治学院。

1941年底、1942年初，党中央对原中共中央党校进行重大改组，建立了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毛泽东主席亲自担任校长，邓发任副校长，彭真任教育长。中央把准备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在延安各校学习的军队团以上、地方地委以上干部，都集中到党校学习。

我是七大代表，也进了党校。经过文化考试，文化程度低的同志分到预科文化，我被分到本科第2支部，本科没有学文化的任务。党校学员是按照支部组织的。我们第2支部的书记叫赵振生，即李大钊烈士的长子李葆华，他要我担任党小组长。党小组又是学习小组。

我怕影响学习，解释说：“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学习任务重，当不了小组长，我是想来专心学习的。”

这样，我成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一名普通学员。

我从开始进军政学院，尔后到政治学院，最后入中央党校，前后差不多有一年时间。

这一年，从全党看，为进行全党性整风运动的内外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各项准备也已基本就绪，特别是毛主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还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组织了高级干部的学习。这些都为全党性的整风运动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

这一年，对我个人来讲，收获亦不薄。我对所学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对难得的学习机会十分珍惜，学起来也确实聚精会神。学得虽然不那么深，但还是增长了不少知识。这对我后来投入整风学习与担负党校工作都大有益处。

整 风

早在 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就初步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已经有了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什么还要开展全党性的整风呢？

毛泽东同志曾在他的一系列报告和讲话中，明白无误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当时在全党，对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路线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系统的清理，还没有完全认识产生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同时抗战后党内吸收了一大批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新党员，其中一些人思想入党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党内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非马克思主义的作风。这些问题，即使在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也是存在着的。

初到延安，我就听到过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叫作：“王明的理论，博古的口才，毛泽东的实践。”

这个说法，一度在延安各校求学的众多青年知识分子及一些党员干部中很有些影响。

它反映出当时在我们党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革命的实践、党的正确路线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认识还不一致。它反映出尽管在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实践得到了公认，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正确思想，还没有为全党所普遍接受和掌握。它反映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虽然已被唾弃，但是他那一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外衣仍然迷惑着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仍然吓唬着一些工农干部。

此外，当时在延安还有一股自由主义的空气。个别知识分子干部在报纸、刊物、墙报上发表文章、漫画，揭露延安的所谓“阴暗面”。这些作品有的是由于环境的不适而发泄牢骚和不满，有的是由于感情的差异而讽刺、挖苦工农出身的老干部，还有的则是由于立场的不同而攻击党的领导、否定延安。他们不分延安与西安、成绩与缺点，哪一个主流哪一个支流，一概否定，一概批判。

这股空气反映出，自从抗日战争以来有几十万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其中一些人不可避免的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作风带了进来。

对于前面那个流行的说法，我并不赞同，但也说不出好多道理来。

对于后面那股自由主义的空气，我和许多从前线来延安的同志都非常反感。我曾为此向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同志放了一“炮”：“我们在前方抗日，流血牺牲，人家却在这里说风凉话，挖苦人！”

这只是凭个人的朴素感情和直觉对待那样的问题。我的思想理论水平，还亟待提高。

为了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针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状况，提高全党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清除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更好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完成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从 1938 年的六届六中全会起向全党同志一再发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党内的学习空气也随之逐步浓厚起来。到了 1941 年和 1942 年，抗战虽然处于最困难的阶段，但总的局势变化不大。党中央便决定利用这一相对稳定的时机，集中进行一次全党性的整风运动。

1942 年 2 月 1 日下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全体学员集合在延安大砭沟

党校礼堂，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我们的校长毛泽东主席、副校长邓发、教育长彭真以及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参加典礼。

毛主席走到讲台前，代表党中央致词：“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

接着，毛主席作了关于整顿党风的演说，向党校学员和全党同志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在演说中，毛主席着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剖析了主观主义及其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种表现形式，从党内党外的种种关系上批判了宗派主义，同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这篇演说在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更名为《整顿党的作风》。关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问题，毛主席在这次会上没有讲，几天后在另一次干部会上作了专门讲演。

开学典礼之后，我们党校学员立即开始以整顿三风为主要内容的学习。

这年4月和6月，党中央先后作出决定，在延安、在全党普遍开展整风学习。这就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风”。

整风运动贯穿了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工作的两年多时间，使我从中接受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洗礼。

延安整风是一场普遍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

党中央为我们规定了22个学习文件，其中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这22个文件，对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对于扫除教条主义的迷雾、认清左倾错误路线的根源，对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对于增强党性、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中央和党校的领导同志都一再要求我们，要吃透文件的精神实质，要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毛主席在整顿三风的演说中告诫我们，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在学习中，我们注意防止主观主义的学风，贯彻毛主席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对每一个文件一遍一遍地通读，逐段逐句地精读，不光是读懂文意，而且理解精神，领会实质，掌握整风的思想武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说明实际中的问题。

我们在窑洞里讨论整风报告，在油灯下认真阅读文件，在马莲纸订成的小本本上记下学习心得。大家学习愿望之强烈，学习态度之认真，钻研问题之刻苦，讨论问题之热烈，确实是空前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些有一定实践经验而缺乏书本知识的人，学习中更是如饥似渴。

我们七八个人住一个窑洞，铺前用四根棍子、几块木板支起的长条饭桌就是学习的书桌。天一亮，就起来阅读文件。重点的地方，记上笔记，不懂的地方，互相切磋。切磋之后，再弄不懂的地方，就向党校直至中央领导同志反映。到晚上，围在桌子旁，点上两盏美孚灯，常常学到深夜。讨论问题，

大家各抒己见，毫不顾虑。争论起来，你一句，我一语，有时吃饭也争，睡觉也争，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好在大家毫不介意，因为彼此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弄清问题，掌握真理。这场伟大的学习运动，使我们如沐春风，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延安整风是一场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进行的思想教育运动。

在第二阶段即整风阶段，我们“反省自己的工作与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认真检讨在自己身上有哪些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毛病，同志之间开展批评和帮助，达到改造思想、改进作风的目的。每个同志都向党组织写出个人的“思想历史自传”。写自传在当时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尽管没经验但非常认真。从自己的家庭和儿时一直写到当前，既写清自己参加革命前后的全部经历，同时重在说明思想上的发展变化，对过去发生的工作错误、思想困惑也毫无保留地写出来，交给党审查，请同志们批评。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认识自己、深刻解剖自己的过程，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

延安整风是一次对党的队伍从思想到组织都进行严格审查和整顿的运动。

在整风过程中穿插了一个审干阶段。本来，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对党员、干部进行组织审查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中央社会部长康生的插手，审干发生了很大偏差：一个是主观主义的“想当然”，一个是“逼供信”，一个是“扩大化”。

一次，我参加支部审查一个姓董的干部，他讲述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时说到某年12月曾在杭州西湖里划船。主持审干的同志是北方人，听到这里，把桌子一拍，呵斥道：“你说的这个就是假的！12月还在划船？12月冰都好厚了，你划什么船？这就是假编的！”下来以后，我找到主持审干的同志说：“杭州12月划船和北方结冰是一回事吗？你根本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就说人家有问题，这不是主观主义的想当然吗？”

当时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不可能对来自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干部的历史情况去调查清楚，因而从谈话中找破绽就成了主要的审查方式，有的同志凭主观推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错误。

在主观主义的审查方式下，“逼供信”盛行一时。有人经受不住就做了假坦白，说自己是什么“特务”、“红旗党”，怎么加入的，怎么混到延安来的，还有哪些同伙。审查者据此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结果导致了“扩大化”。康生把审干变成了一场祸及整个延安的“抢救运动”，一些青年被打成派来搞暗杀、搞破坏的“特务”，河南、四川等白区地下党被诬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晋西北的新军干部也被说成是阎锡山的人，伤害了不少同志。康生搞的这一套根本违背了整风宗旨。整风反对的是主观主义，康生搞的正是主观主义的“想当然”；整风反对的是宗派主义，康生搞的正是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审干中发生的这一问题，当然只是延安整风中一个支流，不能因此而否定整风的巨大成就，但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对于审干偏差，毛泽东、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及时出来制止、纠正。毛主席为审干制定了九条方针，并根据党的历史上曾发生乱捕滥杀的血的教训严格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避免了历史悲剧的重演。对“抢救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党中央在审干后期做了甄别平反。审干的“九条方针”、“一个政策”和“甄

别平反”的做法也是延安整风创造的经验之一。

在审干中我们军队干部有个好处，就是从小参加军队并且始终没有离开过，没有被捕被俘、跟国民党接触这类事，因此也没有挨整。但我认为自己历史清白，没有什么好审查的，对思想上的深入检查不够，这是我的一个不足。

延安整风是一次对党的历史和路线进行重新学习、全面总结的运动。

整风是以路线学习为开始的，又是以路线学习作结束的。整风的最后阶段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这是延安整风发展的高级阶段，对于全党正确吸取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党中央把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文件编成《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书。我们从中全面学习党的历史，结合个人所经历的斗争实践，认真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为什么会在1927年发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为什么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苏区损失十分之九、白区损失几乎十分之十？为什么张国焘会向党闹独立性？

在学习总结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各地区、各部队的同志分别举行座谈会，总结检讨本地区、本部队的历史。这种座谈会又被形象地称为“山头”会议。

我们在延安的120师干部由贺龙主持，在陕甘宁联防军司令部多次召开座谈会，讨论从红2方面军到120师的历史，对其中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搞清楚：湘鄂西苏区为什么会全部丧失？红3军为什么会发生“肃反”扩大化？段德昌、王炳南、宋盘铭等大批好干部为什么会被杀掉？这些一直在我们心中困扰难解的问题豁然明朗了。许多同志联系亲身经历，声泪俱下地控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和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

对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总结，最后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2年底1943年初，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急剧缩小、党政军干部多了出来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

这样在1943年春，有数千名干部从各个根据地长途跋涉，穿越封锁线，汇集到陕甘宁边区的门户绥德城。为了尽快安排处理好这些干部的学习，中央组织部从党校抽调第2支部的书记赵振生、第4支部的我以及校部女秘书柳文、总务处长张明远，作为“中央处理委员会”的派出人员前往绥德。

5月，正是槐树飞花的时候，我们四人骑马来到延安东北200余公里的绥德城。

绥德城及其附近村庄住满了来自各地的干部，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军政指挥员，有地方党和抗日政权的书记、县长，有日寇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他们经受了抗日战争最严酷岁月的磨练和考验，是党的宝贵财富。我们转达了党中央对这些同志的热情欢迎，找他们逐个谈话，了解其参加革命、加入党的简要经历，向他们介绍延安的基本情况。我们在绥德师范学校设立了考场，举行摸底考试，文化考算术和一篇作文，政治考时事政策和党的基本知识。然后根据这些同志的职务、经历、文化程度和学习愿望进行分配。原任职务高一点、文化程度高一点、有五年以上党龄的干部进入中央党校；职务低一点、文化低一点、党龄短一点的留在绥德进入重新组建的抗大总校。

在招考党校学员时，一些同志问我：“中央党校学什么呀，好不好啊？”

我自豪地告诉他们：“中央党校是毛主席的校长，你们说好不好啊？”

他们听了高兴地说：“好，好！”我乘势鼓动说：“那你们就报考党校吧！”

我们在绥德工作了一个来月，把上千名干部大体分配完毕，而后返回延安准备继续学习。走到离延安还有一天多路程的甘谷驿，我接到党校一位同志从延安打来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去，不再当学员了，到党校第2部当组织教育科科长。

我们在绥德为党校招考了数百名学员，中央党校扩大了，分成两个部。原来的学员作为第1部，这批新学员组成第2部。

2部设在原中国女子大学旧址。张鼎丞任部主任，孙志远、安子文先后担任副主任。部下面有三个科，主管党务和学习的叫组织教育科，我任科长；负责行政事务的叫秘书科，科长傅雨田；管理生活的叫供给科，学员分为十几个支部。每个支部设书记、学习干事、生活干事，有学员三五十人。

2部于1943年7月正式开学，而后立即投入整风学习。我当组织教育科长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学习，制走学习计划，了解学习情况，收集大家难于理解、争论不下的问题反映给部校领导，他们再反映给党中央领导同志，有时也请中央领导同志来向学员直接解答。我已经参加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对学习方法、步骤总算有一点经验，这对我协助部领导组织、安排整风学习很有帮助。

2部开学不久正赶上延安“抢救运动”搞得正凶。1部白天晚上、大会小会号召“有问题”的人出来坦白，我们2部也去旁听了几次会。鉴于1部的教训，彭真副校长等校领导明确我们2部主要是学习文件，没有受到大大的冲击。

1943年秋末冬初，又有一批干部从前线调回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党校成立了第3、第4部。4部同志都是参加革命多年、职务比较高、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工农干部和红军干部。4部主任张启龙，副主任伍云甫，后为程世才。我从2部调到4部当组织教育科科长，工作还是一样，主管党务和学习。4部没有自己的教员，我们就去请1部和校外的同志来上课，主要还是听党校统一组织的大报告，学习内容仍然是整风文件。

革命的家园

延安的生活是很苦的。

没到延安以前，我常听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向部队讲延安生活是如何的苦，要我们把战斗缴获的物资和开荒种的东西上交延安。当时我认为，还是我们呆的晋西北这块地方苦，延安毕竟是后方嘛。

自从在延安住下来以后，我才真正了解到延安的苦。

国民党政府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下，停发了抗战初期根据国共协议应拨的微薄军饷，接二连三地发动反共高潮，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地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多次策划进攻延安，竭力切断陕甘宁边区与外界的联系，扬言要困死、饿死共产党。这是造成延安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的主要原因。此外，在延安及其附近数十里，几乎每一条山沟、每一座山头都住满了机关、学校、部队，仅靠贫瘠的黄土地上原来那点物产和其它根据地辗转送来的战利品根本无法养活这么多人。为了坚持抗战，党中央亲自带领延安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1年我刚到延安就参加生产。我们八路军军政学院的学员在延安机场边的荒滩上开了一块地在那里种菜。

1943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阴谋进攻延安。为了制止内战、保卫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命令从晋绥、太行、太岳等地调回四个旅：358旅、教导1旅、教导2旅、新4旅。

我在党校2部接到命令，要我回358旅担任副政委。我去上任时，部队正调到延安驻防，上级划定了王家角的一片山头说“这就是你们住的地方”。我率715团在王家角跑山头，选营址，削齐山壁，挖出一排排窑洞，扎下营盘。

不久，国民党的反共高潮被击退，胡宗南进攻延安的阴谋破产了，我又回到党校。以后358旅在那里开荒种地，养猪种菜，建设起一个满不错的家园。

这年秋后我和贺炳炎等在党校学习、工作的同志结伴回到358旅住了几天，只见部队正在收获大生产的丰硕成果，三个多月前还是荒山秃岭的王家角如今已是牛羊满坡，庄稼满山，磨盘大的南瓜又面又甜。战士们个个都是黑红的脸膛、健壮的体魄。

党中央曾在中直后勤机关的窑洞前召开了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动员会。我们与会同志席地而坐，听毛泽东主席亲自作动员。

毛主席身穿八路军灰布军装，两个膝盖处打着一尺多长的大补钉，十分惹目。他走上前来，向我们讲了我党我军面临的严重困难：日本人搞封锁，国民党不给钱，你们说怎么办？

毛主席提出了三条。他向前伸出双手，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数说着：“第一条是解散，第二条是饿死，第三条是生产。”他一条一条地问大家是否愿意，而后响亮他说：“既然大家为了革命事业奋斗，一不愿解散，二不愿饿死，那么就只有自己动手，参加生产劳动。”

我们从毛主席的动员中，从他那身打着补钉的旧军装上，看到了战胜困难的唯一出路，汲取了信心和力量。动员会后，毛主席招待我们在那里吃了一顿饭，饭菜都是中央机关自己生产的。

毛主席动员之后，在延安、在陕甘宁边区，进一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的热潮。上至党中央毛主席、八路军朱总司令，下至普通战士、老百姓，都无一例外地参加了生产运动。毛主席荷锄种菜，总司令街头拾粪，任弼时纺线夺魁，都是广泛传扬的佳话，极大地鼓舞了延安军民的生产热情。各个机关、学校、部队都涌现出大批劳动英雄、生产模范。

延安的生产主要是两类：一个是农业生产，开荒种地，解决吃饭问题；一个是手工业生产，纺纱捻线，解决穿衣问题。

中央党校因为整风学习的任务重，没有搞开荒生产，只在课余开展一些手工业生产。

我在党校4部时学会了捻羊毛线。我们每人弄了一架“土”纺车，初学时真费了不少劲，两只握惯了枪杆子的手怎么也不听使唤，不是粗细不匀就是断了线，越急越不灵。

当时359旅在延安东南的南泥湾屯垦，他们的生产搞得好，在整个边区都很出名。359旅旅长王震兼延安卫戍司令，住在延安。我去找王“胡子”要一架“洋”纺车。所谓“洋”只是相对于我们自己做的土纺车而言，他那个是木匠做的，很正规的。

我问他要：“你们359旅生产是模范嘛，你又是卫戍司令，搞个好纺车还不容易？”王“胡子”爽快地给了我一架好纺车。

有了这架纺车，我每天课外把它架在窑洞里，右手缓缓摇动纺车架子，左手徐徐捻送羊毛坨坨，一圈圈又细又匀的毛线从手里出来了。我把捻的羊毛线送到党校的生产合作社，换得了7块钱，拿来买学习和生活用品。

在延安的大生产中，我们不仅改善了物质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亲身体会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无穷力量。不管是国际帝国主义还是国内反共势力，不管是军事进攻还是经济封锁，都无法压倒中国共产党人，而只能被我们所战胜！

延安的生活是清苦的，但也是丰富多采的。整个延安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氛，处处有歌声，周周有晚会，苦中有乐。我们党校学生和工作人员自己动手新建了大礼堂，毛主席欣然题写了“实事求是”的校训，镌刻在大礼堂正面墙壁上。党校各部都组织了各种球队和戏剧队，我也是个文娱体育活动分子，篮球、足球样样都玩，经常跟其他单位打比赛，还学会了跳舞、滑冰。

延安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不少同志在这里相继解决了个人生活问题。用朱总司令的话说，叫作“要建立革命的家务，同时也要建立个人的家务。”

1942年8月2日，120师在延安的同志欢聚在中共西北局驻地的一排窑洞前，一来纪念南昌起义15周年这个伟大的日子，二来祝贺贺龙司令员和薛明同志结婚。薛明原是来自平津的女学生，当时已经是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一位年轻的女部长了。我们在贺老总和薛明的窑洞前一起照了一张像，留作喜庆的纪念。

当时在延安有许多老红军出身的干部都已进入而立之年，该成家了，延安也有不少投身抗战的女青年敬慕老红军干部，这样双方谈起恋爱来。

本来这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却招来一些人对老干部的讽刺、挖苦。

比如讲：女青年提出“到延河边去走一走”，老干部却说“那有什么看头啊，水还不是往下流的？”女青年又提出“看看月亮吧”，老干部却说“月亮有什么看的？月亮象烧饼。”

这一类话多啦！总之是讲老干部和女青年在思想感情、生活情趣等各个方面都格格不入。

这些讽刺、挖苦，引起许多同志的反感，我也是其中一个。有一次杨尚昆同志给我们讲课，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挖苦老干部？”

我和家人自从1935年11月红军长征分别以后就断了音讯。直到1942年贺龙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到了延安，我才从跟他一起回来的肖庆云那里得到消息，说我的妻子肖良良早已被杀死了，我们都相信这个消息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她是贺龙的外甥女，是红军的妻子，早就有人想整死她了。

有一次，薛明同志介绍我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一位女同志认识了。这位女同志叫白林，是一个四川妹子。1937年抗战爆发后她们兄弟姊妹几个从大后方投奔到延安，她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了几年，然后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当资料员。

我俩相识后，在学习和工作之余，有时她到党校来找我，有时我到中央办公厅驻地杨家岭去找她。每次去杨家岭都在任弼时、陈琼英两口子的窑洞里落脚、说话。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交谈，我俩逐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

感情。

1943年10月9日，“双十节”的前一天，我和白林结婚了。联防军司令部处长谷志标把他住的一间房子腾出来给我俩作了新房。薛明陪我涉过延河，把白林接来。

那天贺老总有事没在家，薛明加上党校副校长彭真和张洁清两口子算我这边代表，杨尚昆和李伯钊夫妇、王若飞和李佩芝夫妇是白林一方亲属和组织的代表，大家热热闹闹在一起吃了顿饭，我俩就算是成婚了。当时没得“蜜月”一说，婚后三天我和白林就分开了，我回中央党校4部，她回杨家岭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虽然同在延安却也不能朝暮相处。第二年我离开延安上前线。以后我们一直是聚少离多，直到全国解放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家。

没想到，全国解放后又传来我的前妻肖良良“死而复生”的消息：她没有死，还活着！只是已经被国民党的桑植县长弄到外乡嫁人了。

这是反动统治阶级给我造成的家庭悲剧，也是相当一批老红军战士的家庭悲剧。

思想上的洗礼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所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它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是无产阶级思想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是打破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

经过这次整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党的团结统一和战斗力得到空前的加强，我们的党由此成熟起来，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不仅如此，这次整风，教育了从大革命时期到抗日时期投身革命的几代共产党人，使之胜利地肩负起领导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任务。这次整风，还以其独特的创造和成功的实践，为以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巨大的精神财富。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延安整风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发扬。

延安整风是我入党以来所参加的第一次整风，也是我参加革命队伍五十多年来接受的第一次最为系统的理论教育、思想教育、路线教育和党性教育。

如同所有参加过整风学习的同志一样，我在整风中受到的教育是深刻的，收获是很大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收获，就是减少了盲目性，增加了自觉性。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认识，对于党的历史、党的路线和党的领袖的认识，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和前途的认识，对于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的认识，较之过去都清醒一些、全面一些、自觉一些了。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经过整风学习，我搞明白了产生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弄清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危害，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掌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國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在党的历史上为什么会多次出现错误路线，产生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如何认识和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识和处理好这个问题有什么重要性？对马克思主义应持什么态度，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具体化、中国化？对于这些事关党的指导思想、事关中国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在整风之前我是不甚清楚或缺乏思考的。这一点，正反映了当时自己思想上的盲目。

在整风中，党史央、毛主席把这些问题鲜明而又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让大家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去学习，去思考，去明辩是非、端正思想。整风运动始终围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一中心内容和主要任务进行，并着重反对对革命危害最为严重的教条主义。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两个报告中，淋漓尽致地批判了不从实际出发，只从主观愿望出发，或只从书本出发，或只从外国经验出发的主观主义；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指出主观主义违背马克思主义列宁定义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基本原则，采取一条“理论和实际分离”的原则，害己、害人、害革命，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的态度，是共产党的大敌、工人阶级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强调要采取有的放矢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为了帮助人们澄清模糊观念、从教条主义的迷惑和束缚中摆脱出来，毛主席在报告中还专门对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等基本概念进行了科学的解释。为了在全党倡导实事求是的作风，毛主席特意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我们联系左、右倾路线给党所造成的危害，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和其它整风文件，反对主观主义，批判教条主义，受到了一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教育，大大地明辩了是非，端正了思想。这个教育对我一生都是重要的，在当时许多方面都是带有启蒙性的。整风之后，我懂得了主观主义正是我党历史上几乎把中国革命事业葬送掉的左倾路线的思想根源；懂得了王明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一个只知背诵马列词句、根本不懂马列主义、根本不懂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者；懂得了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从延安整风到现在的50年间，毛主席关于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的讲话，犹如晨钟暮鼓，经常响在耳边。我总是告诫自己在工作中，一要注重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防止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二要注重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三要力求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把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同自己所在单位的实际、自己所主管工作的实际结合起来。我在后来工作中用以自律的这么三条，追溯起来，正是延安整风的产物。

第二，经过整风学习，我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加深了对毛主席领导正确性的认识，从而在思想上对毛主席的领导更信服、更坚定了。

我们这支部队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始终与党中央分隔两地，孤军苦斗，直到长征结束才与中央会合到一起。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是在1937年5月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我第一次接触毛主席的文章也是这一年在陕西富平县的觅子镇，读到上级发下的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油印本，印的质量不好，字迹看不清。1940年春在晋西北的方山县圪洞镇，上级又发下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由于部队正在打仗，对抗日战争究竟要打多久心里没数，因此学习很认真，一有时间就拿出来学，从此对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和他的军事思想有了认识。这年秋我又看到了毛主席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我到延安特别是到中央党校学习、工作的这几年，毛主席作为党校校长使我们经常可以直接聆听到他所作的报告。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是我们必读的重要整风文件，我们通读、精读了一遍又一遍，联系实际来学习。

在整风中，除了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讲话和著作，还对党的历史和路线进行了重新学习和总结。这样一来，我对毛主席的认识加深了，看到在党的历史上左、右倾错误路线都给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只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把中国革命引上了胜利前进的道路。我看到毛主席不光是有实践，为中国革命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实践问题，有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实践；他还有理论，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而且他的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中国化了的理论。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产物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思想武器。延安整风时期，也是全党同志认识并接受这一思想的时期。1943年，周恩来同志回到延安。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讲：“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间，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当时全党同志的共同心声。可以说，延安整风之后，我对毛主席的领导是坚信不疑的了。即使是在他晚年错误地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身陷囹圄多年，但对他从思想上感情上也仍然没有动摇过。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十分正确和英明的决议。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应该一代代地传下去。

第三，通过整风学习，我掌握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解除了一个在思想上一度困扰自己的问题。

贺龙同志是我的革命引路人，是我们这支部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我是在贺龙同志的关怀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是抱着“拿起刀枪跟贺龙”的思想参加革命、参加红军的。

开始我只是把贺龙当作一个了不起的个人英雄来崇拜，“贺龙怎样做我就怎样做”是在我头脑中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即使在远离贺龙、远离红军主力的游击生活中，因为坚信“贺龙一定会回来”而苦苦坚持着；在左倾路线导致党组织和政治工作被取消、根据地全部丧失的绝境中，因为抱着“跟贺龙走就一定有出路”的思想而支持着。以后随着左倾错误的逐步纠正，随着党组织和政治工作的逐步恢复，我对党的认识和信仰真正确立起来。长征结束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我在思想上、政治上打开了眼界，相信党的领导超过了崇拜个人英雄。

但是在这以后，在怎么样看待贺龙的问题上，党内有的同志有过一些这样那样的看法，或指责贺龙是军阀主义，或指责2方面军是贺龙个人的部队，由此也牵扯到我们一些跟随贺老总多年的老部下。有的同志被作为“军阀主义”的代表挨了整，我和一些同志则被用作指责贺老总“任用亲信”的话柄。在这种情况下，我和贺炳炎曾赌气坚决要求离开这支部队。

我俩对关向应政委发牢骚：“我们是为党为革命工作的，不一定非要跟

着贺龙不可？我们可以离开嘛！”接着我又补充说明一句，“没有贺龙，我廖汉生现在还不知道干什么呢？我们桑植那个地方有枪则王，也许没法活下去，我早已被逼上梁山去了。”这是气话，也是心里话。

由于这时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一方面对于那些对待贺龙同志的片面认识不能予以理直气壮的反驳，另一方面还不能把服从党的领导与跟随我所崇拜的英雄较好地统一起来，因此我在思想上一度感到矛盾和困惑。

延安整风学习中，120师的同志在总结从红军时期到抗战以来的历史的基础上，统一了对贺老总的认识。我对这个曾经一度困扰自己的问题，则用整风中学到的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作了较多的思考。对贺老总究竟应该怎么看？他的主流和本质是什么？经过思考我认为，毛主席在1938年讲的贺龙同志革命坚决、对党忠诚、联系群众这三条，就是他的本质和主流。对这三条，我跟随他多年，体会尤深。

贺龙革命坚决，那是有史可证的。从他两把菜刀闹革命起，他就追求真理，追求革命。他拉队伍、搞武装，从来就不是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而是为贫苦人打天下。他投身革命是有理想、有主义的。穷人要翻身，究竟怎样翻法？为了这，他跟过哥老会，打富济贫；跟过中华革命党，搞二次革命；跟过孙中山，反军阀、反列强；也信过克鲁鲍特金，信过无政府主义；最后他跟定共产党，献身工农革命。当他家老屋被烧、祖坟被挖、亲人被杀时，他没有动摇过；当族人骂他、敌人诱他时，他没有动摇过，当队伍丢了、人枪散了时，他也没有动摇过。垮了再干，再垮再干！硬是有那么一股百折不挠、万死不辞的坚决劲。

贺龙对党忠实，那是有目共睹的。在共产党最倒霉、被杀头的时候，他一个堂堂军长、一个非党人士，不顾个人安危，不惜高官厚禄，毅然率部参加了南昌起义，加入了党。从那时起他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并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把自己磨练成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领导的这支部队长期与党中央分距两地，但他总是坚决执行党的指示，自觉服从党的领导，他把自己带出的部队始终看成是党的队伍。他不止一次他说过：率领军队的党员，绝对不能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自己如果调动工作时，就希望代替自己工作的人能够很快地把军队带得很顺手，否则自己心中是不安的。在他的身上表现出特别坚强的党性。

贺龙联系群众，那是有口皆碑的。他视人民如父母，视战士为子弟，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同甘共苦，生死相依。他襟怀坦白，顾全大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搞个人或山头的小圈子。我们这支部队是贺老总从家乡搞起来的，自然会有一些干部是他的亲戚和老部下，但是贺老总对我们这些人非常严厉，批评也比较多，而对一批批外来干部却相当和气，讲究方法。

因此，贺龙同志不仅是一个从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而且是一个有着高度党性的、时刻把自己牢牢置于党的领导下的忠诚战士；他不仅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事将领，而且是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的党的坚强领导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家跟随贺龙干革命，实际上就是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当然，他不是没有缺点的，毛主席在整风时还讲过自己有缺点，问题是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支流不看主流，过去有些同志对贺龙同志的看法是片面的，违背辩证法的，不符合实际的。

在整风中间，我对贺龙同志的认识，由过去带有较多感情色彩的感性认识上升到了能够深入本质的理性阶段，在思想上解决了服从党的领导与服从

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的群众领袖人物的一致性，我的思想从此坦然了，再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困惑过。以后，不管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的这种态度始终没有改变。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得知我长期跟随的贺龙元帅被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时，我内心的悲愤和沉痛是用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的。

第四，通过整风，我去掉了长期存在的自卑感，增加了自信心。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有种自卑感，认为我们红2军团的干部比其他部队的干部水平低。因为在湘鄂西时期红2军团的党组织被解散过，政治工作制度被取消过，大批干部被当作“改组派”杀掉了，所以我们在党的建设、政治建设和干部水平上，远远不如别人。在与6军团会合时我就产生了这个观点。以后与1、4方面军会合又看到，4方面军虽然出过张国焘闹分裂的乱子，但是他们的部队扩大得很多；1方面军是党中央直接指挥的，有那么多中央领导同志长期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出的干部很多。这个观点在我头脑里扎得很深。经过整风学习，一方面，是自己确实在延安的窑洞里取到了一些“真经”，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水平有了一些提高。另一方面经过在党校接触了许多来自各个部队的干部，我看到各个部队战斗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发展历史都差不多，遭受过错误路线破坏的不仅是我们这一支部队，而是整个党、整个红军。每个同志理论水平、思想作风各有特点，但成长历史也都差不多，从整体上看并不存在2军团的干部就比其他部队的干部要落后一些。每一个人，每一支部队都各有长处，各有短处，经过努力学习和锻炼，短处是完全可以转变为长处的，盲目自卑是没有根据的。当我告别党校重返前线的时候，我已经树立起自信心和自豪感。

延安四年，我经历了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洗礼，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从一个比较盲目的革命者转变成一个比较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延安四年，使我受益终身。

第十章

南下襄南

在抗日战争度过难关、走向胜利的阶段，党中央及时制定了大发展的战略方针。

此时，我参加八路军南下支队，告别延安，重返前线，来到新四军 5 师暨鄂豫边区所辖襄南地区工作，从八路军的老战士转为新四军的新战士，从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指挥员转为负责一个地区党政军工作的一元化的主要领导者。这个转变对我来说，肩负的担子很大，经受的锻炼也很大。我和同志们一道，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紧紧团结和依靠襄南抗日军民，巩固并扩大了这块敌后根据地，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南下前的教诲

1944 年夏，我患了肺病。当时对这种病没有多少好办法，而在药品奇缺的延安只能依靠休养和自身抵抗力。按照医嘱，我暂时脱开中央党校 4 部组教科长的工作，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找了个窑洞住下，一边休养，一边读书。

这期间，我感觉到延安乃至整个战局的气氛正在出现一种令人欣喜、令人鼓舞的新变化：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进入收尾阶段，加紧筹备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大反攻，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延安的报纸每天都登载着苏联红军反攻到什么地方，希特勒的军队撤退到什么地方；在中国战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抽调大批兵力向粤汉等铁路线进攻，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在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其政府军“一溃再溃，连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辽阔区域；我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各解放区战场已经度过最艰难的阶段，相继开始局部反攻。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针对日军南侵企图，为了推进对日实施战略反攻的阵地，党中央提出了“敌人攻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的战略决策：决定组织八路军南下支队，跟在南侵日军后面，挺进湘粤边界地区，发动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根据地。同时，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回到延安后讲新四军缺干部，要求派大批干部去，中央又决定组织干部大队随军南下补充到新四军 5 师中去。

国际国内战局的变化，党中央的决策，鼓舞着延安的每一个人。

我在延安已经四年了。四年来我总忘不了烽烟正浓的杀敌战场，忘不了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重返战场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兴奋之中，我的病很快就好了。

中央决定，由贺炳炎和我组织一个干部大队，重返洪湖地区。我开始忙于物色干部。我在贺老总的支持下，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从中央党校学员抽调了原红 2 军团的老干部 30 多名，其中现任团职干部十来个，此外还有 358

旅教导队的干部和一批从宜昌来延安学习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全大队共百多人，编入八路军南下支队。

八路军南下支队由 359 旅主力和三个干部大队组成，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下分六个大队。1、2、3 大队是 359 旅的战斗部队，4、5、6 大队是干部大队。其中 4 大队以原红 6 军团暨湘赣苏区的老干部为基础，加上 359 旅干部训练队，由郭鹏任队长、廖明任政治委员，准备随 359 旅南下开辟湘粤赣新区。5、6 两个大队是中央准备补充给新四军 5 师的干部。5 大队以原红 2 军团暨湘鄂西苏区的老干部为基础，由贺炳炎任队长、我任政治委员，任务是回到原洪湖老苏区一带，加强 5 师在那里的干部力量；6 大队以原红 4 方面军暨鄂豫皖苏区的老干部为基础，由文建武任队长、张成台任政治委员，准备到鄂豫边区加强 5 师本身的力量。

南下干部调齐后，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进行思想准备。党中央领导同志纷纷来给我们作报告，找我们谈话，交待任务，介绍情况，提出要求，使我们的思想得到一次极好的武装。

毛泽东主席亲自给南下支队干部讲话，指明当前的时局、政策和任务，提出了我们的工作方针——大大发展自己的力量。

毛主席强调了团结问题，剖析了山头主义，要求我们到了新的地方，第一要非常谨慎，虽然在党校里学了马列主义，究竟学的怎么样，现在还没有测验，到那里人家很拥护你，开展了工作才算有成绩；第二要尊重人家，不要乱批评，要多谈心，必须坚持真理，随时改正错误。

毛主席还以柳树和松树作了形象、生动的比喻，要求南下工作的同志学习柳树的灵活性和松树的原则性，象柳树那样可亲，象松树那样可靠。

王震司令员、王首道政委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上述指示。王“胡子”还宣布：毛主席要我们学习松树和柳树，这次南下我们就要把这两种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

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也给我们讲了南方的抗日斗争形势。

中央书记处书记、原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代表党中央直接向我们交待了任务：扩大部队，扩大根据地。同时刘少奇同志提出了搞好团结的两点要求：你们到了新的地区工作，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都变了，要注意一个是团结原有同志，一个是服从新的领导。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给我们作了两次报告，介绍了新四军在长江两岸坚持抗日斗争的战斗历程，介绍了 5 师部队和干部的情况，欢迎我们去那里工作。

我们第 5 干部大队将要去的洪湖地区是贺龙率领红 2 军团开创的老苏区，干部们大多是贺老总从那里带出来的老部下，因此我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向他汇报了南下准备情况，希望多听一听他的指示。贺老总只是强调要贯彻中央指示，要我多去听听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当时陈云同志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住在联防军后勤机关那里，贺老总叫我去听听陈云同志的指示。

我按照贺老总的意见到陈云同志的窑洞，请他给我做指示。陈云同志在延安担任过多年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那大他跟我谈了一次话，并没有具体指示我应该怎么干，而是专门给我谈了一个题目，叫做“毛主席的精神”。陈云同志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党的历史与现实等方面谈了“毛主席的精神”对于指导革命、指导工作的重要意义，谈

了他自己读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的体会。他对“毛主席的精神”主要谈了四条，并作了充分阐述。对这四条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得那么准确了，但是不论当时还是今天，我都清楚地记得陈云同志谈到“毛主席的精神”最本质、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这也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确立起来的思想路线。陈云同志谈的“毛主席的精神”，实际上也就是后来党的“七大”开始明确使用的统一概念“毛泽东思想”。这次谈话，使我对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思想有了一个更加清晰、更加深入的认识。陈云同志虽然没有给我讲具体怎么干，但是他教给我的是争取革命胜利、做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

从受领任务到出发前，我接连三次来到关向应政委的病榻前探望，话别，聆听教诲。有时是我一个人去，有时跟贺炳炎等一路去。关政委的肺病已经到了晚期，病魔的折磨使他形消骨瘦，衰弱到了极点，但看到我们来他还是撑着病体缓缓而谈。关政委兴奋地谈起国际国内的时局，鼓励我们去工作，去战斗，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他深情地谈起洪湖老苏区人民对革命的支持，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大有所为。他沉痛地谈起左倾路线给党和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告诫我们经过延安整风之后对左倾、右倾的错误路线搞清楚，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他严肃地谈起团结的重要性，要求我们注意搞好党内党外、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的团结。

关政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跟贺炳炎两个脾气都不好，你们自己要团结好，同时也要团结下属，尊重上级，遇事不要急，要冷静思考，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虚心向群众学习、向人民学习，要克己宽人，取人之长来补己之短。”

当我们最后一次向关政委告别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伸出瘦骨嶙嶙的手拉着我们，激动地说：“去吧，你们如今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负责干部了，象一只只羽翼渐丰的鸟儿就要毛于各自飞了！”说着，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

我们紧紧握着关政委的手，眼含热泪，说：“放心吧，关政委！我们一定记住你的话。”

我在延安四年，经常可以听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针对一项具体任务，有这么多的领导同志耳提面命，使我们得到如此之多的教诲，这还是我所经历的第一次。领导同志谆谆善诱，推心置腑，既交待任务又提出要求，既阐明中央方针又教给工作方法，为我们这次南下指明了方向，给予了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力量。

当告别延安南下的时候，我们已经树立起这样一个思想：我们是从党中央身边出发的，是经过中央党校学习和延安整风锻炼的，应该牢记党的教诲，不辜负党的期望，坚决完成任务！

从八路军到新四军

194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的这一天，我告别了党中央领导和党校的同志们，告别了贺关老首长和老部队，告别了妻子白林，从延安出发，踏上南下征程。

我们第5干部大队比整个南下支队早走三天，因为原358旅教导队的干部要到晋西北去换枪。我们东渡黄河，来到离石县的晋西北军区，在吕正操

司令员的关照下，把教导队原来参差不齐的枪都换成了清一色的马步枪。

我们与随后到来的南下支队主力会合后，向南翻越吕梁山，徒涉汾河滩，通过同蒲路，进入太岳根据地，来到晋东南分区，在沁水县休整了几天，做南渡黄河的准备。

南下支队计划从垣曲渡口渡河，但在那里只找到一只小船，整个支队5000人马及大量辎重很难全部过去。支队司令员王震下令：各大队的骡马统统丢下，交给晋东南分区的干部。

王“胡子”命令一下，我们几个干部大队都有点不愿意：把骡马丢下，有了伤员病号怎么办？辎重粮食哪个驮？今后还有长长的一段路怎么走？何况就要进入敌占区，各种困难少不了，南下的征途才刚刚开头嘛！但是带着骡马看来又过不了黄河。我们只得做减装准备。

那几天特别冷，气温骤降，已是临近12月底了。侦察人员发现，距垣曲渡口数里外的一段河湾，就在这一两天中忽然结起了一层冰，形成一座天然冰桥。

据当地老百姓讲：“黄河结冰在这个地方是百年罕见的奇观，真是天公作美，天助我八路军！”

整个南下支队带着骡马辎重从冰桥上从容地走过黄河，没有丢下一人一马。

过了黄河，我们进入河南境内。这里原是国民党第1战区驻守的地方，但在1944年春天日军发动中原战役，国民党40万大军一溃千里，中原大地沦入敌手。南下支队一面行军一面不时地跟日伪军交火，且战且走，越过陇海铁路，涉过洛河、伊河、汝河，来到鲁山县境。

这时日军已经发觉了我们的南进意图，沿鲁山公路严密布防，企图将南下支队堵截消灭。

过路的这天夜里，前卫突破封锁线，大部队顺利过去了，我第5大队跟随后卫走在后面。正要过路时日军机动部队赶来，把我们与前面隔断了。我们面临着过不去路和遭敌消灭的危险，好在大家多是身经百战的老干部，临危不乱。贺炳炎和我组织人员用驳壳枪暂时顶住敌人，指挥大家不顾一切猛冲，在敌人的炮火下硬是通过了封锁线，还带过来前面跑散的同志，接着连夜涉过沙河，在天亮时赶上了大部队。回想昨夜过路的情形真是太险了！我们这个干部大队被拦在那里要是过不来，百多名干部就全完了，那将如何向党中央交待。

鲁山过路后，南下支队进入黄淮平原。这里是中原著名的产粮区，由于战祸和天灾，呈现在眼前的竟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我们原以为能在这里补充粮食，却不得不以每人每天几块红薯裹腹，忍饥耐寒，顶着漫天大雪，渡过澧河、淮河，越过平汉铁路，一路向南挺进。

1945年1月底，南下支队到达湖北境内的大悟山区，与李先念同志领导的新四军5师会合。

两个多月来，我们孤军深入敌后，在冰天雪地中跋涉数千里，冲过道道封锁线，渡过条条冰河，一往无前，不可阻挡。

在大悟山区的5师司令部驻地，新四军5师暨鄂豫边区为八路军南下支队举行了隆重的会师联欢大会。“向八路军老大哥学习！”“向新四军5师战友学习！”的口号声融合在一起。5师首长和边区领导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张树才联名发出了《为庆祝大会师慰问八路军兄弟书》：

同志们！你们带来了新的力量，这力量象征着广大敌后的新发展，新胜利……；你们带来了新的力量，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已号召边区的党政军民以最虚心最赤诚的心来接受，来向你们学习，这将必然使边区各方面的工作迅速地走上更巩固的道路！同志们，让我们紧密地携起手来，让我们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肩并肩地为完成党给予我们的任务而奋斗！

2月初，南下支队和各干部大队负责同志参加了鄂豫边区党委扩大会议。边区党政军领导分别作了关于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群众斗争、政权工作的报告，介绍了边区军民孤悬敌后坚持抗战的战斗历程。南下支队负责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大发展的指示，介绍了华北抗日斗争形势以及延安整风和大生产的经验。两军同志在一起学习中央指示，结合边区情况，分析形势，研究任务，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以发展为主，同时兼顾现有解放区的巩固。

在大悟山休整几天后，王震、王首道率领南下支队1、2、3、4大队继续南下，渡过长江，向湘粤边地区挺进，完成下一阶段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与东江纵队会合的任务。

文建武带领的第6干部大队留在大悟山，补充到5师机关和部队中去。

我们第5干部大队把原120师司令部参谋处长唐健泊、保卫处长黄新远等干部留给5师。李昌因为跟边区党委副书记陈少敏很熟悉，提出留在边区工作，我们也把他留下了。贺炳炎和我带着大部分干部离开大悟山，前往我们的目的地——原洪湖苏区、现为襄河南北的3分区和5分区工作。到襄北时把吴子杰等襄北籍干部留给5分区，我们带着另一部分干部渡过襄河，于3月2日抵达襄南3分区。

一路上，我们受到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欢迎，沿途各地早就计算好我们的行程，在经过的村镇街道摆上茶桌、备好手中，在宿营地号下住房、备好饭食睡铺。热烈之情，感人至深。

3月3日，襄南地委、专署和第3军分区联合在潜江县熊口镇孙家台召开了欢迎大会。驻地军民以及从各县赶来的代表数千人参加大会。十里八乡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前来助兴，打旗子，吹喇叭，耍龙灯，舞狮子，划彩船，踩高跷，把过大年的所有名堂一下子全搬了出来，热闹非凡。妇救会、儿童团提着鸡蛋、鞋袜、香烟、小吃，一个劲往我们手里、衣袋里塞。

欢迎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开始，第3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放致了热烈的欢迎词。贺炳炎和我代表南下干部感谢襄南党政军民的热情欢迎，表示要和襄南人民一道为完成大发展的任务共同奋斗。军分区原司令员吴世安、政治委员方正平和反战同盟的日本友人大久保、农救会的黄会长也讲了话。接下来，演剧队登台慰问演出，我们拉着儿童团娃娃的手请他们坐在台前一起观看，直到天黑才尽兴而散。

一连三天，各种慰问、联欢、座谈活动不断。地委机关报《襄河报》也以头条报道《八路军大批干部莅襄河——军民欢迎盛况空前》。各县、乡的老百姓自发前来驻地慰问，对我们寄予厚望：“无能的国民党抛弃了襄南老百姓，新四军来后我们才有了保障，现在八路军来了，老百姓的力量更强了！”

来到襄南后，按照5师首长命令和鄂豫边区党委决定，贺炳炎担任了第3军分区司令员，我担任中共襄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原司令员吴世安、地委书记兼政治委员方正平调回大悟山另行安排。我们带来的干部也都充实到军分区机关、部队和各县指挥部去。其中王绍南任军分区副司令员，

魏国运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田任政治部副主任，史可全任后勤部氏，谷佑箴任后勤部副部长，董家龙任卫生部长，张秀龙任独立团长，王立中任教导团政委，刘林、刘彬、蔡诚、张鸿卿、沈国栋、陈一勋、熊四钩等担任了各县军事指挥部指挥长。

从此，我们正式加入到新四军的行列中。

团结就是力量

会合之后，首要问题是要搞好团结。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现实的需要，是我们顺利完成大发展任务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证。

党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给我们交待任务时，反复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团结。南下途中，党中央又发来电报作了关于会合后团结问题的指示。

中央根据历史上两个部分会合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警惕：因领导方面对会合问题未预有各种政治准备，在初度热烈联欢之后，即继之各种摩擦对立，以致影响尔后团结和损害共同作战，其关键在于双方都有盲目的山头主义，自视甚高，外来方面不入境问俗，本地方面忽视询问来者情况，因而在互相接触的批评中逐渐造成对立，影响团结。

中央指出：对会合应采取妥善态度，最重要的一条是提倡互相尊重、互相学习、隐恶扬善，严禁批评并不许私下谈论对方缺点，纠正肆意指摘的自由主义态度。在双方群众面前采取说好、学好的互相学习的亲和、团结态度，在党的领导方面则采取交换意见、发扬长处、纠正弱点的严肃的原则态度，这是一个团结的原则和方式的综合问题，希研究领会，妥善执行。

党中央反复强调团结，对我们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南下途中，我们利用行军间隙对全体干部进行了深入的会合教育，树立起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观念，虚心向孤悬敌后坚持抗战的英雄的新四军 5 师学习，决不可因来自延安就自视甚高，自以为是。会合以后，我们亲身感受到新四军同志对八路军战友的一片兄弟情谊，从 5 师和边区领导到襄南分区的干部群众都对我们非常热情、非常尊重，张口闭口“向老大哥学习”，尤其是在安排使用上表现出博大的胸怀、无私的风格，在工作中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令我们深受感动。

在隆重热烈的联欢之后，在不绝于耳的称颂声中，我们牢记中央指示，保持清醒头脑，明确一个认识：当来到新的地区以后，我们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都变了。直接领导者不再是八路军 120 师的贺龙、关向应，不再是中央党校的毛主席、彭真等老领导，而是新四军 5 师和鄂豫边区的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这些新领导；被领导者也不再是过去熟悉的老部队、老部下，而是还不熟悉的新部队、新部下。因此，怎么样服从 5 师新的领导、团结襄南原有干部？这是我们特别注意的问题。

我们把中央提出的任务、要求概括成一个口号，叫作：“服从新的领导，团结原有同志，开展对敌斗争，扩大部队，扩大根据地。”这个口号叫得非常响亮，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在工作中也是十分注意的。

1945 年 3 月 10 日至 20 日，在潜江熊口镇，襄南地委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我传达了党中央和 5 师、边区党委的指示、要求。方正平和我两个原任、新任地委书记分别就“襄南发展”与“党内团结”作了报告。

我在报告中首先谈了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问题。

处理党内关系的目的是，在于打倒敌人，团结自己。毛主席告诉我们两句话：对敌人是“狠”，对自己是“和”。否则，要想达到战争胜利的目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党内的同志，应该是团结的，是“和”的。

少奇同志指出，我们对自己“和”的方面没有对敌人“狠”的方面明显。即是说“和”的方面不够，往往有些小问题争论不休，闹意见，闹纠纷，使矛盾扩大，没有整套的好办法。因此少奇同志告诉我们，对自己“和”方面要反省一番。党员与党员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过去是否采取了“和”的方针，要每个同志自己反省。

“和”不是一团和气，而是用必要的正确的思想斗争来达到团结。如党内有意见分歧时要进行思想斗争，但斗争的目的是要达到团结，斗争不能过火。为了达到团结，在方式上要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来反省自己。反省不在于痛骂自己，而是要深刻地实事求是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今后如何改正自己的错误，达到“和”的方针。

领导干部要团结下层干部。下层干部犯了错误，领导干部要批评他，这是替他撑腰，要帮他把错误及其责任搞清。犯错误的干部自己应当负一部分责任，领导干部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如搞不清会降低干部工作的积极性。

领导干部要团结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别人不同意自己意见的时候，或别人同意自己意见带勉强的时候，可要大家经过酝酿求得意见的一致，不同意之处可尽量从思想上说服他，只有二三人不同意也须来一次酝酿求得解决。这也是团结干部、达到“和”的很重要的一点。

在报告中，我着重谈的另一个问题是山头主义。

毛主席说：山头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亲疏关系。往往是在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形成一个山头。原因之一，来拿毛主席话说，是长期的农村根据地分割形成的，所以山头的形成也是必然的。原因之二，是党内教育不够。山头主义与宗派主义不同，宗派主义有错误的纲领、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组织活动，宗派主义在延安整风中已经受到党内的反对。毛主席说：宗派主义没有了，今天存在的就是山头主义。

今天党内的山头主义是存在的，如何来解决呢？客观原因的消灭，只有争取革命胜利以后才能消灭。所以目前只有从主观上加以教育。

第一，要承认山头。因为客观原因长期存在，我们只有承认了它，才能重视它，设法改正它。

第二，要照顾山头。说照顾山头，不是照顾自己的山头，而是照顾别人的山头。照顾它，是否给以平等待遇就可以了？这样下妥当。对别人的山头要特别照顾，并且要给以优先权。往往在物质上要发生问题，要注意。别人的山头来了，提出来要人家照顾，这也是不对的，不但不会消灭山头，相反会使山头增加。

第三，要改造山头。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应该对自己这个山头多加教育，要多照顾别人，多反省自己，要诚恳地帮助别人，要设法了解人家，同时也使人家了解自己。这样才可能解除彼此之间的亲疏关系。

我的这个报告，所讲的实际上是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指示精神和延安整风的一些基本精神。这些精神是我们处理问题、搞好团结的思想依据和工作方法。

在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我们围绕着团结与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用

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来统一大家的思想，规范大家的言行。我们把团结与发展联系起来看，看到没有紧密的团结就不会同心同德的奋斗，也就不可能实现大发展，不可能赢得抗战的胜利。

襄南的干部来源广，成份多：有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也有四面八方的外来干部；有抗战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也有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的老干部；有根据地自己培养的工农干部，也有从敌占区和大后方武汉、宜昌、重庆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而分区和各县主要领导干部则大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开创根据地的5师干部，一部分是受命于发展的南下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亲疏关系和山头问题，是搞好党内和干部队伍内团结的关键。要解决好这个关键，主要是看我们南下来的同志做的怎么样，首先是看我这个书记做的怎么样？

我是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我的一言一行对下属、对全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基本上都在军队里工作，带兵打仗和做军队政治工作，对地方工作很不熟悉；虽然先后担任过政治委员和党的书记，但主要是在一个大的编成内、在上级统一号令下行动。象现在这样，担任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书记，主持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领导几百万人口、上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根据地，对我来说还是头一回。我没有经验，情况不熟，压力很大，担心假若出点小乱子都可能影响党的任务的完成。

因此我在工作中要求自己，一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鄂豫边区党委的指示，切实结合襄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二是紧紧团结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老老实实地向当地原有干部学习，向身边的同志学习，向襄南的父老兄弟学习，从他们那里了解情况，吸收经验，听取意见，集中大家的聪明才智，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三是冷静克制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存在着急躁冲动的毛病，碰到不满意的事情就要讲出来，有时还不管不顾地发上一通火，当着贺关的面也是如此，好在都熟悉我的性格，能够谅解宽容。到了新的地区，当了最高领导，就不能再由着自己的性子了，我对自己采取强行克制的办法，同时注意方式方法，提高思想修养，这个毛病去掉了不少。

我们南下干部是带着大发展的新任务来的。发展是要有基础的，没有以往的基础也就没有今后的发展。我们充分肯定原有干部开创的功绩，充分肯定原有的成绩。对于存在的弱点多建议，少批评，学习长处，原谅短处。

南下干部在5师和边区党委的安排下全都担任了县团以上的主要领导职务，原有干部除调职学习者外部成为我们的副手或下级。他们主动接受我们的领导，我们则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

南下干部多是从枪杆子里打出来的军队干部，原有干部多是在党政群系统工作的地方干部。我们充分认识中央指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党，反过来，党要领导军队”这个道理，自觉服从党的领导，充分尊重地方干部。

由于全体同志的紧密团结，襄南党组织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力的战斗集体，并且把广大军民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从而为襄南地区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思想和组织基础。

发展襄南

大发展的方针，是我党根据国内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制定的正确方针。

毛主席讲：“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今后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国”（《学习和时局》）。

在襄南如何落实大发展的方针，发展党的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发展根据地，这是摆在襄南党政军民面前的头等紧迫的任务，也是我们负责同志日夜思虑的问题。

所谓襄南，是指汉水以南与长江以北的地区，汉水在这一段又叫襄河，其中心区包括潜江、沔阳、江陵、监利和今天的洪湖、沙市一带。

我虽然是初到襄南，但对这个地区并不陌生。这里曾是湘鄂西苏区著名的洪湖根据地的一部分。1930年贺龙率领红军东下洪湖，我一直留在湘鄂边的大山里坚持游击斗争，时常听到从洪湖传来的消息，从那时起这里就成了我神往的地方。

对于大多数南下干部来说，这里则是他们自幼生长的故乡，也是参加红军并浴血战斗的地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同志在这里建立了红2军团，创造出著名的洪湖根据地。毛泽东主席在抗战初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把“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作为“河湖港汉地带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43年，新四军5师派部队，挺进襄南，同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老苏区人民一道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一次党中央又把我们将派回来，目的是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以便在不远的将来进行大反攻时，这里就是收复武汉三镇的前进阵地。

我们看到，襄南根据地能够在日伪顽交错盘踞的缝隙中，在江汉之间的平原水网上，在中原要地大武汉的一侧，坚持抗日斗争，取得这样的局面，很不容易。我们从中得到很大的鼓舞，对完成大发展的任务增强了信心。同时我们也看到，襄南根据地还存在着一些弱点，尤其是军事力量和干部队伍还比较弱。与中央提出的任务和要求相比，我们的力量还显得很不够。这也促使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发展。

在襄南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我们组织大家一起学习中央方针，学习边区党委指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同时紧密结合襄南地区和各县的实际情况，讨论我们的工作，研究今后的任务。经过十天的会议，我们重新确定了襄南地区1945年的工作方针是：“以发展为主，同时照顾巩固。”

基于对形势的分析，我们看到抗日战争有可能很快出现胜利反攻的局面，因此着重部署从3月到8月这半年内各项工作大发展的具体目标和要求。主要是：扩大武装，扩大根据地，扩大党的力量，扩大抗日统一战线。

扩大武装，这是发展襄南的重点，也是所有抗日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

比较而言，襄南地区地盘大武装少。上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七八个县团单位，总共只有六七千人枪。5师和边区党委要求我们，在半年内扩大到15000人。地委经过分析研究，提出了将现有力量扩大一倍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多，需要我们下大力来搞。我们在根据地内，广泛宣传抗日战争胜利发展形势，动员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掀起一个轰轰烈烈

的扩军热潮。我们对县区乡游击武装充实提高，在不妨碍坚持本地斗争的前提下适当给予升格，加强主力的力量。我们向各据点的日伪军发动军事和政治攻势，在战斗中尽可能多捉俘虏，争取、改造日军士兵加入反战行列，大力开展瓦解伪军工作，策动其反正，弃暗投明。扩大武装所需的枪支弹药则基本上从敌人手中夺过来。扩大后的武装，军分区指挥一个江北独立团、一个干部教导团，县一级建立了军事指挥部和游击总队，区乡纷纷健全充实了武装中队和亦兵亦农的民兵组织。

扩大根据地，是发展襄南的另一个重点。我们的方针是：巩固基本区，开辟外围区，挺进敌占区。

我们坚持原有地区的巩固，率领根据地军民挫败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围攻、骚扰，并主动袭击、围困敌据点，迫使敌人向中心城镇收缩，各县力争把被敌人分割的地区打通，把根据地尽可能连成一片。

我们把地区发展与扩大的重点放在长江以南和襄河以西。江南包括湖北的石首、公安和湖南的华容及洞庭湖区岳阳君山一带。地委和军分区为了加强江南的力量，在3月间将原石公华县委改组为江南中心县委，由南下干部梁诚和原有干部李秉范担任县委正副书记，同时建立了江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以桃花山为依托向长江两岸发展，并打通与鄂南的湘鄂赣地区的联系。襄西主要是向汉水以西、宜昌北面的荆门、当阳、远安发展，建立了襄西指挥部。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襄南根据地达到了鼎盛时期，以潜江为中心，东至平汉、粤汉铁路线上的汉阳、嘉鱼、蒲圻，西至荆门、当阳、江陵，北至襄河，向南则一直排到洞庭湖边。在这么一个广阔区域内，襄南军民与敌人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拔掉了一些据点，收复了一些地方，并与其它地区一起构成了对武汉外围的战略包围。

扩大党的力量，这是发展襄南的核心。

我代表地委向各县党组织提出了扩大党的力量的任务、要求和具体方法。首先使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明确：革命事业的壮大、革命战争的胜利，有赖于党的发展。抗战前我党只有4万多名党员，现在已经发展到100万，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但是还要看到中国有4万万人口，只有100万党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个大发展，才能更有力地领导起全中国人民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地委先后从区乡抽调了数批政治上可靠、又有斗争经验的老党员：集中到洪山公学进行培训。洪山公学是边区党委直属的一所干部学校，设在襄南的潜江县熊口镇。我们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开设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学习马列主义常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熟记党纲、党章，明确党的各项政策、主张，掌握基本的工作方法，然后把这些同志派到新开辟的地区工作，去建立党组织，发展新党员。在发展中我们注意既要积极又要慎重，处理好“量”与“质”的关系，使党在迅速地大量地发展的同时确保不叫一个异己分子进入党内。为了加强党的基层建设，我代表地委提出了建设一个好支部的四条标准，即“对敌人斗争搞的好”、“减租斗争搞的好”、“生产运动搞的好”、“防好运动搞的好”。党的基层组织带领群众开展各项工作，发挥出战斗堡垒作用。

在襄南这个地方发展党、扩大党的积极分子队伍，不可回避地要碰到一

些复杂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苏区“改组派分子”和“自首分子”的问题。我们南下干部一到襄南，老百姓就传开：“当年的红军又回到洪湖来了！”有的听说是“贺司令带人回来了”，把贺炳炎传成贺龙了。有一些原洪湖苏区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战士和红军家属找上门来，诉说往事，打听亲人下落，要求做些工作。这些人里面有的是掉队人员，有的是失散人员，也有在“肃反”中被开除的“改组派分子”，以及苏区垮掉后登记“自首”的分子。

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每一个人的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妥善处理。在洪湖老苏区，由于左倾错误路线搞的“肃反”扩大化，党组织被整垮了，一批批党员干部当作“改组派分子”或被杀掉或被驱离了。我们南下干部都经历过那一段历史，在延安整风后期又总结了那一段历史。根据整风精神，我代表地委宣布了处理历史问题的政策：对所谓“改组派分子”，如果搞清楚确实冤枉的，即承认他是党员，他的家属当作革命家属看待；一时难以搞清楚的，对其家属也要给予一定的照顾。我们公开承认过去“肃反”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认真解决他们提出的申诉，逐个给予适当安置，希望他们在当地继续为党工作。他们眼含热泪，失声痛哭，倾吐了憋在心中十多年的冤屈，解除了思想上的包袱，以加倍的热情为党工作。历史证明，这些所谓“改组派分子”基本上都是被冤枉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陆续都得到了平反昭雪。

对于老苏区垮掉后的“自首分子”，党中央在我们南下时做过很客观的估计：洪湖苏区垮掉后的十几年中，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和强制“自首”，留在苏区的党组织和党员有相当一部分会因为种种原因而“自首”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央提醒我们要慎重处理好。这些人有的是被强迫“自首”的，有的是由家属替其“自首”的，有因缺乏远见而被当时白色恐怖形势所趋而“自首”的，也有“自首”后破坏我党利益的。按照中央政策，我们区别各自情况给予个别处理：能够真心拥护我党、真正来工作的可以分配，不加拒绝，但必须有一个原则——要有利于党、有利于革命，必须有一个条件——要向党写自传、写申明书，把“自首”的原因、过程和以后经历实事求是地、不加丝毫隐瞒地写出来，给党审查。有过一些错处只要没有破坏党的利益，主动写出来后可以下加追究，重新工作后取得成就的可以将功折过；工作有大成就、对党有大功劳的，如果要求入党可以慎重地个别解决。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我们为党的工作争取了一批人，同时也保持了党的纯洁。在地委、各县委和各基层支部的努力下，襄南党组织和党员队伍逐步发展扩大，质量有所提高，在敌占区也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

扩大统一战线，是发展襄南的重要一环。襄南靠近武汉三镇，濒临水陆要冲，来来往往的各种人物、各种关系很多。在大革命期间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都是斗争旋流的中心，红白严重对立，阶级斗争相当激烈，地主阶级曾是革命的对象，苏区失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参与迫害我党同志和红军家属。因此对我们南下干部的到来，有一些地主、士绅很担心，怕算旧帐。

为了争取和团结更多的人，襄南专署召集了士绅会议，贺炳炎司令员首先讲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明了我党的团结抗日态度。

贺炳炎讲过之后，我又作了具体的解释：“这次南下干部回到家，有许多人的父母兄弟在苏区失败后被人杀害了。这是非常痛心的事！但是共产党是不会为了私仇而违反党的政策的。只要那些人现在是抗战的，我们还是以朋友相称，过去的帐不算了。希望襄南各界各阶层人民为了打走日本帝国主

义的共同目的，一致团结，旧仇旧怨一笔勾销！这是我代表南下的同志要向各位表明的。”

我们以共产党人博大无私的胸怀，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不计前嫌，积极争取地主、士绅们为抗战事业做一些工作，如认购公债、代购物资等。我们在襄南建立了各界人士组成的参议会，在敌占区的大城市建立了一些统战关系，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起三三制的地方政府。

由于边区党委的正确领导，由于襄南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襄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襄南大生产

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是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战胜日寇与国民党封锁以及天灾而造成的严重物质困难、增强军民团结和抗战信心、创造长期抗战物质基础的重要途径。

襄南地区位于江汉平原上，本是鱼米之乡。由于战祸连年，日寇掠夺，使得田园荒芜，水灾频频，民不聊生，血吸虫肆虐，走在街上常常可以看到挺着大肚子的男女，每到冬天许多人家把门一关就外出讨饭。襄南根据地建立以后，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和生产运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借鉴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经验，于1945年春进一步动员全体军民掀起大生产的热潮。地委、地区专署、军分区和各级党政军群组织纷纷成立了生产委员会。

4月5日，农历清明，军分区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宣告成立了以副司令员王绍南、供给部长史可全为正副主任的总生产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朱绍田介绍了延安大生产的情况和经验，我作了《今年机关部队如何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的动员报告。

针对一些人对生产运动存在的模糊认识，我着重解释了军队为什么要生产的问题：

“中国旧社会几千年都是‘当兵吃粮’，老百姓是这样看法，我们也有个别同志是这样想法。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论在南方或北方都要进行生产呢？”

“第一，正因为八路军、新四军与旧军队不同。旧军队是军阀军队，是危害老百姓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目的是为中国老百姓求解放，使得每个人有饭吃有衣穿。我们打日本，拼命，吃苦，都是为了把国家建设好，使老百姓过快乐日子。生产也是替老百姓打算盘，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第二，我们打日本要吃饭、穿衣、用东西，老百姓不能多出钱，公家也就没钱解决，只有靠生产来解决自己的困难，改善自己的生活。

“第三，襄南、襄西、江南是我们的，父母子弟也在这里，我们要把它建设成有吃有穿的地区，家庭问题也解决了。

“因此，我们要生产。”

关于怎么生产，我宣布了军分区制定的生产计划：要求实现县、团以上机关、部队自给粮三个月、菜半年，区乡武装自给粮四个月、菜八个月的目标。生产的内容应以开荒种田为主，同时从事纺织、编席、喂猪、捉鱼等工

副业生产。奖励措施应采取公私两利、超产分红。生产中注意军民兼顾、劳武结合的原则，强调“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从军分区的司令、政委到班排干部都应当亲自领导和参加生产运动。

阳春三月，正是春耕生产的大好时节。襄南各地到处呈现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为了扶持农民生产，地区专署及时发放500万元边区货币的农业贷款，从江南的石首、公安、华容购运了数百头耕牛到江北，贷给缺牛农户。襄西地区去年大旱，加上顽匪搅扰，有一半以上的农户无种下秧，有些连吃的都没有，我们从监利运去几百担谷子，发放救灾款，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在农民中有组织地开展耕牛与劳力、技术与劳力等各种形式的换工互助，指导精细耕作。

襄南生产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水利。这里是长江与汉水两大水系的交汇处，大大小小的河湖沟汉纵横交织，星罗棋布，每到雨季内渍外涝，一片汪洋，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造成严重危害。特别是连通汉水与长江的东荆河，年久失修，堤脚被水掏空，堤身危若屋檐，一旦决口就将直接威胁潜江、沔阳、江陵、监利等县人民。

地委、专署、军分区动员军民抢修大堤。在赶筑马颈项堤的工地上，我们书记、专员、司令亲自上阵，贺炳炎司令员独臂担土拉车给军民以极大的激励。农民群众争先恐后出堤工，劳动英雄层出不穷。一位聋哑人，他妈妈用手比划给他看：堤要倒，有水，不能吃饭了！他扛起扁担就跑上了工地。有一位姑娘，挑得重，跑得快，连好多男人也不敌她，男人们羡慕他说：“娶到这样的姑娘是满享福的呀！”经过20天昼夜突击，用工15万个，完成土方35900，赶在汛期之前完工，使百余亩农田受益。

鄂豫边区党委领导同志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在7月3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边区的水利建设，“在襄南三军区做得很有成绩”，“特别是争取时间，在农忙前完成，更刺激与提高农民生产情绪”。

在大生产的同时，襄南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也颇有成绩。

日本帝国主义随着战争的进程及其国力的衰败，变本加厉地推行“以战养战”政策，对襄南鱼米之乡进行疯狂的掠夺和封锁。我们向敌人展开经济斗争，发展、扩大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

我们借长江之利，在江面上和渡口处设立了武装税卡，凡上行宜昌、下行武汉、横渡南北的商船都要从我们这个地方过，要过就要给我们纳税，连日本人做生意也要老老实实地给新四军纳税。我们收的税款相当多，全地区一年就可以搞到上亿元，少部分留做襄南建设之用，大部分送到大悟山，上交边区财政。边区和5师的经费来源主要靠襄南的税款收入。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作“边区第一，襄南第二”。

襄南还担负了1亿多元边区“建国公债”的购销任务。我们一方面广泛动员根据地内的士绅、富户认购公债，一方面运用各种关系向日伪占领区和国民党盘踞区大力推销，一直销到武汉三镇去，连日本洋行、伪组织也购买了数额可观的公债。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布匹、硫磺、钢材、铜材等日伪禁运物资，我们都有办法从敌占区购运出来。在敌人的封锁中，襄南根据地却呈现出人民乐业、商贾云集的景象。

这年夏天，贺炳炎司令员带着部队到襄西边沿地带扩大、巩固根据地，我留下主持全面工作。这时，上级传来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的消息。

我是党的七大代表，对七大的召开盼望已久。早在 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了召开七大，1939 年我由 120 师 358 旅 716 团党员大会推选为七大代表。党中央曾多次筹备召开七大，我也多次准备参加七大，但由于形势紧张而一再推迟了。1945 年 4 月到 6 月，全党同志翘首以待的七大终于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召开了。七大是我党自 1928 年莫斯科六大后相隔 17 年召开的，是自党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筹备时间最长、准备最充分、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代表大会。七大制定了党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作为七大代表，我虽然身在前线不能参加大会，但是为大会的胜利召开而深感振奋。在党的七大精神鼓舞下，襄南军民更加积极地贯彻“大发展”的方针，进一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进一步扩大党的队伍和人民武装，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快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准备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8 月上、中旬，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传出后，襄南分区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朱总司令的命令，坚决执行边区党委和 5 师的命令，迅速动员全部力量包围了盘据在这一地区的日伪军据点，向其发出立即向我缴械投降的最后通牒，坚决消灭那些继续顽抗之敌。分区部队先后拔掉了潜江县梅家嘴等日军据点并包围了潜江城，重创不守投降令仍然“扫荡”桃花山的日军部队，全歼驻监利县毛家口的伪军自卫团，策动驻污阳县胡场的伪军 400 余人向我投降。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历经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华民族在近百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第一次赢得完全的胜利！

1937 年 9 月 2 日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我们在朱总司令、贺龙师长的带领下举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从那时起到现在不多不少整整八年。在这八年间，我们从西北到中原。从黄河之滨到长江岸边，从八路军到新四军，经历了多少次激烈残酷的战斗，牺牲了多少个英勇善战的好同志，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这一天！

第十一章

重返晋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选择。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把反革命内战的阴云压向中国人民头上，企图重建其独裁统治，将中国仍旧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道路。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反对内战和独裁，争取和平与民主，进行了包括和平谈判在内的一系列巨大努力。当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之际，我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被迫进行了坚决的自卫战争，以粉碎反动派的军事进攻。

在抗战胜利后的一年之中，我由地处中原的江汉解放区，调至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尔后又返回晋绥解放区参加自卫作战。其间经历的正是当时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搏斗。

江汉解放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刚刚传出，蒋介石就打着“收复失地”、“受降”的旗号，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向我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大举压迫。首当其冲的就是地处中原的鄂豫边区。党中央及时指示新四军5师：迅速集中力量，准备对付即将到来的内战危险！

根据中央指示，5师决定组建一个野战纵队和江汉、鄂东两个二级军区。师首长命令襄南3分区司令员贺炳炎担任江汉军区司令员，襄北5分区政治委员郑绍文任军区政治委员，5分区司令员罗厚福任军区副司令员，我由3分区政治委员任军区副政治委员，3分区副司令员王绍南任军区参谋长，5分区政治部主任侯政任军区政治部主任。接到五师首长电今后，我把襄南地委书记和军分区政委的工作移交给原组织部长吴云鹏同志。我和贺炳炎、王绍南等带领一批干部和主力团队北渡襄河，与罗厚福、郑绍文、侯政等同志一起组建江汉军区。

江汉军区下辖襄南、襄北、鄂中三个军分区和一个独立旅，该旅由原襄南分区两个团和襄北游击武装组建的一个新团集中整编而成，共三个团、一个警卫营，作为军区直接指挥的机动力量，江汉军区首长兼任独立旅首长。我们一面将部队集中整编，一面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作好反内战的准备。

江汉军区位于中原腹地，正当水陆交通的要冲，南扼长江，东与鄂东军区挟制平汉铁路并形成对武汉三镇的战略包围，因此成为国民党政府军全力争夺的前沿。从日本投降之日到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的大批部队下山摘桃子，从四川、贵州、云南的大后方沿长江源源不断地涌入我们这个地区，抢占了武汉三镇，又沿平汉铁路源源不断地向北涌去，抢夺地盘，进攻解放区。

看到这个情况，许多同志忿忿不平，纷纷提出：“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来了，他们跑了；现在日本侵略者打跑了，他们却来了，来摘桃子、打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打？”

“毛主席为什么要去跟蒋介石谈判，会有什么结果吗？”

特别是一些红军干部对抗战前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杨虎城的命运记忆犹新，担心：“蒋介石会不会故伎重演，会不会扣住毛主席、周副主席？”

这些问题不光下面的干部战士有，我们军区领导同志也很不理解。好在党中央及时向党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我们反复学习中央精神，搞清楚：谈判也是斗争，是一种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是去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为了争取和平、制止内战！从而使每个同志都懂得和平谈判的必要性。

同时也有少数同志对国共和谈谈判抱有过高的希望，产生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以为国共双方一坐下来谈，蒋介石就不会再来打我们了。对此党中央也早有分析，告诫全党保持高度警惕。中央的通知特别指出：“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我党力量比华北、江淮所处地位较为困难，中央对于这些地方的同志深为关怀。”“这些地方的同志必须独立地分析环境，解决问题，冲破困难，获得生存和发展。待到国民党对你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可能在两党谈判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出有利于双方的处置。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

我们学习中央指示，教育干部和部队认清：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来看，它是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这个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从我们长期以来同国民党打仗与合作的经验来看，它在每一次获取革命胜利果实之后总是一巴掌把帮助过它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打入内战的血海；此外，从我们所处的战略位置来看，江汉解放区位于武汉的卧榻之侧、过道之间，对我们这个地方蒋介石是势在必夺的，中原之战绝难避免。

在重庆谈判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时刻关注着毛主席、周副主席谈判的消息，一方面通过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的警惕；一方面抓紧部队的整编、训练，随时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犯。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我们为我党取得的会谈成果、为毛主席安全返回延安感到高兴，同时也为国民党政府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地位感到愤慨，许多同志对我党主动让出湖北、湖南、广东等八个南方解放区感到难以接受。

根据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和上级命令，我们首先撤出长江南边的石首、公安、华容三县。江南中心县委书记梁诚、副书记李秉范、挺进支队队长郑怀远率领“石公华”地区党政干部和部队撤到江北，梁诚率江南指挥部、挺进支队编入江汉军区独立旅。

我方从江南撤出后，国民党军全部占领了这个地区，向坚持抗日有功的共产党人、民主政府工作人员、民兵和群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有的被捕入狱，有的惨遭屠杀，有的逼走他乡，江南解放区沦入白色恐怖之中。与此同时，大批国械党军继续向我江汉军区的襄西、襄南进犯。

10月间，为了求得一块生存之地，中原我军决定依托鄂豫交界的桐柏山区及南边的大洪山区坚持斗争。奉党中央命令，王震、王首道率领的359旅南下支队从湘鄂赣边界山区北返，王树生率领的八路军嵩岳军区部队从豫西地区南下，与新四军5师会合中原，共同组成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任中原军区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生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

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原军区下辖两个野战纵队和江汉、鄂东、河南三个二级军区并三个独立旅。

从10月中旬起，中原我军组织了桐柏战役，解放了桐柏、新野、唐河、枣阳等城。我江汉军区配合主力进行桐柏战役，率独立旅向北挺进钟祥与随县之间的大洪山区，扫除了那里的反共顽固势力，建立了洪山军分区。

12月间，国民党军从南北两面向桐柏地区合围。我军主力接连打了几仗，虽给敌人以打击但没能挡住越来越多的敌军，遂撤出桐柏战役。

这时敌情日益严重，鄂东区大部和江汉区的襄南、襄西等地已相继遭敌侵占。为了避免被敌围歼，中原我军决定向平汉铁路以东进行战略转移，目的是向安徽五河的新四军2师部队靠拢。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行动。主力转移时，中原军区首长向我们交代任务，由江汉军区负责安置桐柏战役各部队的伤员，并担负牵制敌军、掩护主力转移的殿后任务。

受领任务时，贺炳炎司令员和我代表江汉军区指战员向中原首长拍了胸脯：请主力放心走吧，我们江汉平原是鱼米之乡、革命老根据地，安置好伤员保证没得问题，你们先走，我们有办法赶上！

主力走后，我们动员群众收养、安置了全部伤员。这时已是1945年岁末、1946年岁首，大批国民党军蜂拥而来，我们遵照中原首长的命令着手撤离江汉解放区的准备。这一次不光是部队要撤走，而且各分区、县、乡的地方党政干部也要一起撤走。我们通知各地干部集中到军区驻地随部队撤离，向各地群众做了许多解释工作。

就在我们准备撤离时，传来了停战的消息。国共双方共同签署了停战协定，下达了停战令：各地区双方交战部队于1946年1月13日午夜前就地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这时中原军区主力已经越过平汉铁路进至鄂豫边界的罗山、礼山、新县一带，先头已抵近安徽边境，再有几天就可以跟2师部队靠拢了。中原主力为了恪守停战协定又返回礼山县（今大悟县）宣化店地区集结待命。

我们江汉军区也接到指令，说：停战了，和平了，不走了。要我们继续留在江汉地区坚持斗争。我们又动员党政干部返回原地。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一刻也没有停止向我方进攻，将中原主力压缩围困在宣化店一线的狭长山沟里，并不断向江汉等解放区蚕食进攻。

我军一方面坚持和平停战原则，揭露国民党破坏协定的战争行径；一方面坚持自卫原则，给予进犯的国民党军坚决抗击。

根据停战协定，在汉口成立了中原地区军事调处三人小组，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震担任我方代表，李先念司令员亲赴汉口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中原首长调郑绍文同志担任中原军区驻汉口办事处处长，郑绍文同志走后，由我接任江汉军区政治委员并代理中共江汉临时区党委书记。

在停战以后，国民党打着“和平”、“调处”的幌子，以军事的、政治的两手千方百计地打击我军。他们利用整军方案，压我江汉军区缩编，指责说“共产党在洪湖一带搞的枪杆子太多了，要严加限制！”又提出：“可以把洪湖地区的共产党武装编为湖北省保安旅，委任该地区负责人为少将旅长。”

听到这些话，我们气愤万分。贺炳炎司令员火冒三丈地说：“谁要当他们那种臭官！他们说我们的枪杆子太多了，我看还是太少了。我们这里本来就是人少枪少，为什么还要减？”

以后，这个整军计划由于多种原因不了了之。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部署已经完毕，他们不再提什么减编而是要全部吃掉我们。

从中原到晋绥

进入 1946 年 3 月，国民党政府军对中原解放区的围攻部署已全部完成，30 万大军、6000 个碉堡把仅有 6 万人的中原我军紧紧围困在宣化店及附近地区，不断进行军事进攻，同时施以政治破坏和经济封锁。

此时正值春荒，青黄不接，我军主力几度粮绝，仅以稀粥野菜度日。我党我军多次提出按照双十协定将部队转移北上或到安徽五河县就粮，都被国民党方面一口回绝，蒋介石只待时机成熟即可进攻。中原大战一触即发！

3 月下旬的一天，中原局打电报给贺炳炎和我，要我们离开江汉军区到宣化店集中，准备撤回延安。

我们交代了工作，越过平汉铁路，赶到宣化店的中原局、中原军区驻地，吴子杰等部分南下干部已经集中在那里了。

中原局负责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的通知精神：南下干部原是中央为了大发展而派出的，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解放区和部队都已缩小，用不了这么多干部，为了保存力量，中央决定将部分同志撤回延安。

从中原到延安这一段路很不好走，虽说国共正在停战，但是各解放区之间都被国民党军严密封锁、包围着。我们准备撤退的干部在一起研究怎么走法。少数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大城市有一些关系，他们利用关系，个别化装坐火车先走。大多数同志没有可利用的关系，由贺炳炎和我带队一起骑马走，计划第一步先到安徽五河新四军 2 师那里，然后再向北走。就在我们进一步商量具体路线时，中原局又通知我们不走了，回到各自的部队去。

贺炳炎和我返回安陆县桑树店的江汉军区驻地，继续坚持斗争。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中原局又来电报，要我们仍日撤离。贺炳炎、我和参谋长王绍南第二次离开部队到宣化店。我们到的这一天是 3 月 30 日。

这天在宣化店，各军区、分区、县的干部集中了许多，都准备撤离。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成员董必武同志也从汉口来到宣化店，受党中央委托前来慰问身陷重围的中原解放区军民。当天晚上，董老顾不上休息，即与中原局、中原军区负责同志连夜开会，研究解决中原危局的有关问题。贺炳炎、我、王绍南住在中原军区司令部旁边的一间房子里。董老他们在隔壁开了一夜的会，决定抽调十名干部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以加强争取和平、制止内战的斗争，同时也可以转移出一批干部。具体人员有：鄂东军区政治委员聂鸿钧、河南军区独立旅政治委员栗在山、13 旅政治委员周志刚、359 旅干部张仲翰和担任江汉军区政治委员的我等。

天亮后，我们十名干部告别了董老、中原首长和战友们，从宣化店出发，乘一辆大卡车经禹王城、河口、黄陂等地，通过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哨卡，来到汉口。这是我从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从山沟里来到大城市，第一次从我党领导的地区来到国民党统治区，环境、任务都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是仅口调处“三人小组”组长、我方代表。王胡子把我们安排在德明饭店休息，等候去往北平的飞机。德明饭店是

座落在法租界内的一家老牌饭店，我早就听说过，贺龙在北伐期间和参加南昌起义前，他的家属就住在这里。现在，饭店二楼设着由郑绍文同志任处长的中原军区驻汉口办事处。我们在这里住了10天，搭乘到一架美国运输机飞到北平。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办公机构设在南河沿大街的翠平庄，临时来往人员都住在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代表团的同志把我们新来的干部也暂时安排在北京饭店，等待分配。我们到的这天正是“四八烈士”遇难的第二天。我们一到北平就听到这个沉痛的消息：在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和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博古），一月前才从国民党监狱获释的新四军原军长叶挺，以及邓发同志，于4月8日乘美国运输机返回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遇难！“四八烈士”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噩耗传出，全党悲恸。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宣布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沉痛悼念“四八烈士”，我们新来的同志也参加了悼念活动。一两天后，聂鸿钧等几个同志分配了工作，我和其余同志仍在等待分配。

大约是到北平后的第八天，军调部我方代表叶剑英叫陈赓和张仲翰、我到他那听汇报。

我们三人来到景山东街人称“叶公馆”的叶剑英同志住所，旁听了军调部我方参谋长罗瑞卿、整军处长陈士榘到东北视察的报告。

东北是国民党与我党全力争夺的战略地区。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帮助下运进数十万军队，抢夺地盘，从3月下旬起，向交通重镇四平街猛烈进攻，企图打开进占北满的通路。罗瑞卿、陈士榘汇报了我军守卫四平的战斗情况。

听完汇报，叶剑英同志根据东北局势的发展和全国内战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严肃而坚决地对我们说：“你们还是回到山沟里打仗去！”

对回山沟打仗去，我是有思想准备的。4月18日，我到北平的第十天，按照叶剑英同志的指示离开，搭乘美国军用运输机飞向延安。

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延安机场刚刚降落，紧接着，又一架飞机降落下来，王若飞同志的妻子李佩芝等“四八烈士”亲属走下飞机。当天，党中央和延安各界群众数百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他的窑洞里接见了“四八烈士”的亲属。我们刚到延安的同志也去看望毛主席。

毛主席沉默许久，只对我们说了一句话：“以后要规定一条，不能这么多高级干部乘坐同一架飞机，一旦出事，我们的损失就大大了……”看得出来，他仍然沉浸在“四八烈士”不幸遇难的深深悲痛之中。

在延安，我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作了一次汇报。因为我们从延安南下前是少奇同志亲自给我们交代的任务。我把我们怎么到的鄂豫边区，怎么扩大的部队和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中原解放区怎么坚持反内战斗争，这次我们是怎么撤回来的，哪些同志仍然留在中原，哪些同志已经牺牲了，详细地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

这期间，贺龙司令员正在延安，他向党中央提出要我回晋绥工作，中央同意了。于是，我跟随贺老总于5月间离开延安，东渡黄河，重返晋绥前线。

在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里，我又跟贺炳炎、王绍南见了面。他俩由董必武从宣化店带到重庆，后经北平、张家口回到晋绥。

从中原到晋绥，从山沟再回到山沟，我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的两种环境，经了解放区与国统区的两个世界。尽管我在汉口、北平各住了10天，进大

城市，住大饭店，跟国民党官员打交道，坐美国飞机，但是我透过那些“和平”的景象，看到的仍然是战争的阴影。蒋介石的停战是假，备战是真；美国的军事调处是假，帮蒋调兵是真。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阴谋只有用正义的自卫战争才能制止，人民得到的胜利果实和根本利益必须靠坚决的战斗来保卫！

就在我们回到晋绥不久的6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开端，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大内战。中原我军以果断的胆略、勇猛的动作，于重兵包围之中分数路突围，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帷幕。

晋北战役

1946年6月，晋绥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组织晋北战役，向蚕食、进犯解放区的阎锡山军进行反击。这时，由358旅、独立第1、2、3旅组成的晋绥野战军正在北线的绥东地区防备傅作义部队的进攻，独4旅正在南线的吕梁地区对阎军防御作战，晋北仅有几个地方团。晋绥军区首长向军委提议从绥东和晋察冀各抽一个旅，共同完成晋北战役任务；同时组建晋北野战军司令部，担负前线指挥。

6月下旬，在兴县蔡家崖成立了晋北野司。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炳炎、我、王绍南分别担任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参谋长，杨尚高任政治部主任，抗大七分校校部作为野司机关。我们晋北野司的同志决心坚决贯彻军委意图，在晋绥军区首长指挥下，以正义的自卫战争粉碎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解放晋北，横扫敌军！

晋北战役由攻取朔县、宁武揭开战幕。

独2旅36团和一个地方团于6月16日晚突袭朔县，全歼守敌1200余名，接着乘胜南下，于6月29、30日再克宁武。7月1日，周士第司令员、贺炳炎副司令员率晋北野司进入宁武，而后指挥从绥东全部赶来的独2旅以及几个地方团向崞县挺进。

两天后，我从兴县经崞岚、五寨、神池、宁武赶往崞县。对这段路，我并不陌生。抗战初期我们首先从这里开始对日作战，今天我们又从这里开始解放战争。

我骑马走到神池时正值中午，又饥又渴，跑遍全城却连一碗面也买不到，想不到竟穷到这种地步。望着饱经战乱的大地，一种解放人民于水火的责任感催促着我，我顾不得饥渴，快马加鞭赶到攻崞前线。

为了打好下一仗，我们认真总结朔、宁战斗的经验教训：在前一阶段，我军以一个主力团加一个地方团，连克朔、宁两城，截断了晋北阎军战争体系的中间一环，获得初战胜利；但在首克朔县时发生了擅自没收工商企业、违反政策纪律的问题。为此，晋绥军区首长给晋北野司发来《对攻朔部队违犯纪律之训令》。遵照训令，我们派攻朔部队协同地方政府组成工作团，返回朔县调查违纪情况，逐户道歉、赔偿，并在所有部队和全体指战员中进行深刻的检讨，进行政策纪律和人民军队思想的教育。牢固树立起这样一个观念：今后随着晋北战役和解放战争的发展，随着解放区的扩大，我们必须更加注意以我党我军的正确政策和优良纪律去争取群众，瓦解敌人，开展工作，人民的财产绝不允许有丝毫的损害，必须加倍地爱惜和保护！

经过总结、整顿，晋北野战军以更加饱满的斗志，继续执行战役第二阶

段攻打崞县、忻州的任务。

这期间，晋察冀军区派来参战的第 11 旅由陈仿仁旅长、王再兴政委率领，自西向东打来，7 月 3 日解放繁峙城，5 日解放代县城，10 日后抵崞县附近，与野司接上联系，为晋北战役增加了一支劲旅，我们考虑到 11 旅刚刚赶来，决定由独 2 旅攻城，11 旅作预备队，地方团破击铁路。

崞县城座落在忻州平川上的崞阳镇，是阎军的战略支点，驻有 40 师 2 团、崞县“爱乡团”和刚窜来的代县“爱乡团”，共 2270 人。城四面为三丈六尺高的城墙，外围有深宽一丈五尺的护城壕和 11 个护城碉堡，城墙突出部构筑了机枪掩体和碉堡，垛口下挖出一排排射击孔，城上城下都设置了大量滚雷、吊雷、拉雷、踏雷。

为了杜绝朔县违纪现象的再次发生，我们自上而下地逐级进行政治动员和政策教育，颁布了严格的人城纪律。

攻城准备中，独 2 旅推广了 36 团战士张八的爆破经验，张八在攻朔战斗中连破两道城门，自己却毫发未伤，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技巧。我们把张八的事迹转报晋绥军区，请求授予爆破英雄称号，在部队中开展学习张八同志、争当英雄爆破手的活动。

7 月 11 日晚，独 2 旅扫清外围碉堡后转入攻城。各团把为数不多的火炮和轻重机枪、掷弹筒集中抵近至距敌 300 米至 700 米内，一齐开火，形成瞬间火力优势，打得敌人无法抬头。与此同时，扫雷组剪断拉雷线，引爆地雷；梯子组把长梯架在外壕，挂上城头；爆破组、突击队相继扑到城下。36 团由张八带领数个爆破组仅用 10 多分钟就把北门两道城门炸开，部队突入城内，夺取了北门、东门。17 团在 3 分钟内跃进、过壕、攀城而上，夺取了西门鼓楼。21 团在先期入城部队的协同下，也从西门南段登城，并堵击南关逃敌。到次日凌晨，守敌大部被歼，少数逃敌也被 11 旅警戒部队和独 2 旅侦察队消灭，全歼敌人 2200 余名，光俘虏就抓了 800 多，缴获甚丰，而我军仅伤亡 71 人。

崞县打开后，独 2 旅按照野司战前部署担负城防，迅速稳定社会秩序。由野司和独 2 旅共同组成的物资管理委员会统一清理物资，妥善保护工商企业和群众利益。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有仓库、商店、学校、教堂、公共机关和民房都受到良好保护，各家店铺照常开门营业，老百姓涌上街头欢庆解放，主动烧水做饭腾房子，慰劳我军。

周士第、贺炳炎和我联名发电报把攻崞情况向晋绥军区首长作了报告。贺龙司令员、李井泉政委、陈漫远参谋长向军委转报《攻崞城部队纪律均良好》，随后把战斗经过报告军委。毛主席拟写了军委指示电，肯定“攻崞经验甚好”，通报其它地区作为攻城参考。

崞县解放次日，晋北野战军以 11 旅为先头继续向南面的原平、忻口两个敌军支点挺进。

据野司缴获崞县守敌一封给阎锡山的意见书称：“我作战无援军，形成孤军作战，易被各个歼灭”。这封意见书还没发出就连撰写人一起落入我军手中。这时，阎锡山也意识到原部署的缺陷，于是变“分兵把守支点”为“集中固守要点”，急令原平、忻口、五台、定襄、河边等处守军不战而退，向忻州收缩。

我军冒着连日大雨，涉过涨水的阳武河，进占原平、忻口，继向忻州挺进。位于同蒲路东的晋察冀 2 分区部队也相继收复定襄、五台两城及阎锡山

的老家河边村，2分区司令员曾美率一个团赶来参加攻忻战斗。

忻州堪称太原的“北大门”，是敌关南区总指挥部所在地。我晋北野战军兵临忻州，威逼太原，令阎锡山坐卧不安。据野司情报侦察，阎锡山于7月15日派第7集团军司令赵承绶从太原赶到忻州，安抚守军。

赵承绶在抗战初期曾与八路军120师同驻晋西北，我们没见他向日军打过一仗，是个妇孺皆知的“草包军长”，靠八路军和老百姓的支援才生存下来并有所发展。1939年12月的晋西事变中，他充当反共先锋，向新军和八路军进攻，结果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不得不退出晋西北。抗战胜利后他卷土重来，再向人民开战。

赵承绶到忻州向守军训话称：“前一段各地撤退不是败下来，是要固守忻州。如果忻州失守，则太原将不保。守忻必守城，否则忻州尤难守。”他许诺每守三天每人开饷1万元。训话一毕，他不敢久留，第二天就跑回太原。

太原城里的阎锡山对连丢数城十分恼怒，以“贻误军机”罪下令枪毙了首失朔城、只身脱逃的朔县指挥李义龙，禁闭了连丢宁武、繁峙、代县、崞县的40师师长王乾元。阎锡山用这一杀一关以警效尤，震慑军心。为了确保忻州，他又从太原增调500名日军赴忻，令驻黄寨的68师师长许鸿林率部北上驰援。

晋北野战军于7月18日进抵忻州附近后，即向外围进攻。这时，敌68师师长许鸿林从黄寨增援至平社。我们决定“围城打援”，以晋察冀部队监视忻州，令独2旅南下平社协同地方团打敌援军。

22日夜，打援部队向平社东面汾阳岭敌山头阵地猛烈攻击。敌军向南窜逃，被预先布置在那里的36团坚决堵击，敌人丢盔卸甲，四处逃散，枪炮辎重扔了满山沟。我军歼敌2000余人，缴获山炮、重型迫击炮5门和大量辎重。平社战斗的胜利，使太原敌军再也不敢出援，孤立、震撼了忻州。

忻州守敌盼援无望，只得作困兽之斗，一面固守城池，一面接连出动千余兵力出城反击，企图打破包围，但都被我军打了回去。阎锡山地面救援失败，改派飞机向我军阵地轰炸扫射，给城内空投补给。

为了加强攻忻力量，晋绥军区首长从吕梁抽调独4旅（欠一个团），由旅长顿星云、政委杨秀山带领，冒着连日大雨赶来忻州参战。同时，中共晋绥分局副书记张邦英、晋察冀分局的一位同志也来野司担任副政委，领导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建立人民政权。

7月28日，晋北野司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攻忻部署。忻州城远比崞县城高大坚固许多，阎锡山又把日军留下的城防工事增修加筑，构成一套纵横交错、内外相连的防御体系。守敌原为4000余人，后从各支点收缩兵力共达8000多人。前委扩大会讨论决定，于7月31日晚攻打忻州城。

当晚，大雨倾盆。经过激烈战斗，独2旅将南关之敌扫清并拔掉城外几个碉堡，11旅攻入匡村、营盘据点。由于雨大路滑，部队运动困难，敌人工事坚固，我军进展较慢，待接近城墙时天色渐亮，不便继续攻城，野司决定撤出战斗。

天亮后，部队返回原驻地，敌人的一架战斗机尾随而来，忘乎所以地在我们头上盘旋、骚扰。11旅立即架起机枪迎着敌机一通猛打，敌机一头坠毁到田野上。我们赶去，发现驾驶员已被击毙。这个意外的收获，一扫攻城未果的沉闷情绪，鼓舞了斗志。

这一天正是8月1日，“看飞机去！”成了庆祝建军纪念日的重要活动。

8月4日，野司再次开会，总结攻城战斗的经验教训，研究下一步作战方针，大家一致认为应当首先消灭城外的车站、营盘两处敌军。

11日夜、独2旅、11旅同时向营盘、车站攻击，接连捣毁数个碉堡，突破部分阵地，毙伤俘虏了一批敌人。凌晨3时许突降大雨，进攻速度迟缓下来，天亮后不得不撤出战斗。

战后，晋察冀参战部队相继调回原建制，晋绥首长调独2旅北上参加大同战役。晋北野司指挥的部队只剩下独4旅和地方团。根据整个战局和部队变化，我们停止攻忻，转入长期包围，同时加强政治攻势，瓦解敌人斗志。忻州守敌给养匮乏，军心涣散，不断有小股士兵携枪出城投诚，五台、定襄籍士兵陆续有600人逃回家乡解放区。

至此，晋北战役基本结束。我晋北野司指挥来自两大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各一部，由北向南，自西向东，逐个拔点，逐段歼敌，总计消灭敌人8600余名，缴获各种枪5000多支、炮20门，用轻武器击落敌机1架。战役期间我军各部队收复朔县、宁武、怀仁、山阴、繁峙、代县、崞县、五台、定襄等座县城及岱岳、轩岗、原平、忻口、平社等大同至忻州间的全部村镇，总计拔除大小据点103个，控制了200多公里铁路，彻底分割、孤立了大同、太原两城，使大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获得解放，也使被长期分割的晋绥、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可以说，我们基本完成了中央军委和晋绥军区首长赋予的战役任务，为晋北解放战争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

关政委不死

就在晋北战役紧张进行中间，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从延安传到晋绥，又从晋绥军区司令部传到晋北战役前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第八路军120师政治委员关向应同志，于7月21日下午10时，在延安因肺病逝世……”

噩耗传来，全党哀伤，全军震惊。党中央和延安各界于7月23日在延安东门外飞机场墓地为关向应同志举行安葬仪式，28日召开追悼大会。8月1日晋绥解放区万余军民在兴县隆重悼念晋绥根据地的开创者和领导者、120师的好政委关向应。我们晋北野战军则在前线以战斗的胜利来悼念关政委。

在战斗间隙，我一想到敬爱的关向应政委永远地离去了，就禁不住痛哭失声，泪如泉涌。13年来的培育之恩，不久前的殷殷教诲，一起涌上心头。

我饱含热泪，写了一篇悼文，托人送到晋绥日报，倾吐我对关政委的深深怀念，从心底发出一遍遍呼唤：

关政委、你和我们永别了！

关政委，你不能死啊！

记得今年4月由湖北回到延安，在探望你时，你见面就说：“回来了好，贺炳炎呢？”即使在卧病不起时，你仍时时刻刻惦记着同志，忘掉了自己。

你同时还告诉我说：“不会死了，去年没有死，现在可以拖过去了。”

是的，党和中国人民还需要你，晋绥人民需要你，我们部队需要你，“贺关”是我们的旗帜啊！关政委，你不能死！

记得1932年，我在湖北鹤峰县工作，游击战争的环境是万分险恶的。这时，“贺关”回来了，使万分危急的我们得到了救星，我也第一次见到了你。

当时由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领导的结果，洪湖苏区失掉了，湘鄂边苏区的内部和外部都处于非常危急中，党的组织被解散了，政治机关被取消了，敌人还在疯狂地“围剿”。你和贺龙同志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坚决地领导我们向敌人搏斗，毅然地重整组织，培养干部，使险恶的局面转危为安。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幼稚的青年，你象先生一样地扶植我，除了在党的路线政策上谆谆诱导外，甚至连填写表册这样细小的工作都亲自教给我。我能对党有点滴贡献，是你教育培养的结果。

关政委，在 10 多年随你工作中，我对你的教导还体会不够，你不能抛弃我，你不能死！

记得 1934 年我们同 6 军团会合，以及后来 1、2、4 方面军会合，你总是教导我们虚心学习，取长补短。在部分与部分之间，你总是教导我们必须团结。当兵团之间发生问题时，你总是批评自己，克己宽人。你常常说：“团结就是力量。”为着把部队提高一步，你总是要求上级或兄弟部队派干部来。当兄弟部队需要帮助时，你也是毫不犹豫地给以帮助。你处处为整个党的利益着想，你没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

关政委，党需要你这种纯正无私的品质成为党内团结的表率啊！你不能死！

记得 1936 年 2、4 方面军会合时，叛徒张国焘企图拉拢 2 方面军，达到他反党反中央的目的，你和贺龙一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曾派干部到 6 师来散布他那一套反对党中央的错误路线时，你说：“没有得到中央指示，只能讲生活问题，不能讲其它问题”，严厉地制止和批评了这种错误行动。张国焘发下《干部必读》反中央的小册子，你马上收回了，不让有毒的思想腐蚀干部，腐蚀部队。你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原则性，且一贯地掌握了毛主席的思想，并在任何复杂困难的情况中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

记得 1933 年我们没有巩固的游击根据地，部队日行夜宿，很少得到半月以上休息。但在这种情况下，你并没有忘记群众利益，差不多每晚都要将没收的东西、粮食给贫苦人民。有的群众恐惧敌人报复不敢公开接受，你就亲自率领部队在深夜里背着粮，送到他们的家里。

你热爱人民，热爱同志。长征过草地，部队是极其艰苦的，你还是非常注意部队的群众纪律。你曾和 6 师一起走过一段路，亲自告诉我们野菜有多少种，怎样吃法，你和我一样用茶叶装在烟斗里当草烟吸。你见到有病的战士，就把牲口让他们骑。你说：“这些同志都是忠实于革命的，只要他们能走一步就要拖他们走。”你看到了牺牲的同志，总是默然哀思。

你对于个人的生活享受毫不计较，你的身体早因过度的操劳而虚弱了，仍将全部心血都放在工作中。

1940 年你回到延安，党中央劝你休息，你还是要坚持工作，直到 1941 年实在不能支持了，才去休养，以至卧床不起。从那时起，我每个月都去探望你。每次见面，为了教育我，你总是要谈时局，谈工作，谈党的历史上的经验。医生来阻止了，你还是要谈一句两句。

1944 年中央决定我到湖北去工作，你在病床上还给我许多具体指示，告诉我怎样注意团结，怎样虚心向群众学习。临别我还去看你三次，我们相对流泪，最后两次竟泣不成声……

今年春天，我回到延安又见到你，满心希望你病体得好，谁知那竟是我

们的诀别。

你死时，我不在你的身旁，不能亲自送你入土安息，这更加强了我的悲痛。

关政委，你死得太早了，中国革命正需要你啊！

现在卖国贼勾结帝国主义，进行空前的大内战，中国人民面临着大灾难，我只得收起眼泪，化悲痛为力量，不辜负你对我的教养，牢记你永别前的遗言，在毛主席和贺司令员的领导下来继续完成你的未竟的事业。

关政委，你的精神永远不死！

从1946年关向应同志逝世至今已经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看来，这篇短文远没有把关政委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光彩一生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而巨大的贡献表达出来。然而，这篇短文却是我当时对这位好领导、好首长、好老师的一腔敬仰、怀念、感激之情的真实流露。世事沧桑，斗转星移。这种感情一直深深地珍藏在我的心底。它伴随我度过了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度过了此后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一直延续至今。

1989年8月，也就是我们的共和国刚刚经历了又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之后，我和黄新廷、杨秀山等战友跟随王震副主席来到大连市金州区向应乡——关政委的家乡，参加关向应同志铜象揭幕仪式。

站在铜像前，我再次呼唤老政委的名字，并告慰他：您和无数革命者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共和国将永远铭记着你们的名字，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决不会让历史倒退，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阔步前进。

关政委，你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你的精神永远不死！

第十二章

转战陕北

1947年春，国民党调集20多万大军进攻延安，妄图摧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我党中央、毛主席却以惊人的胆略、宏伟的气魄，主动放弃延安，坚持留在陕北，继续指挥着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

西北野战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在陕甘宁晋绥人民的全力支援下，以最初仅有2万余人的兵力抗击着10倍于我的敌军，转战于千沟万壑之间，歼敌于筋疲力竭之时，用小米步枪战胜了飞机大炮，创造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又一范例。

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奉调陕甘宁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在侵占张家口之后，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达到了顶点，蒋介石的头脑也发热到了顶点，他下令召开独裁的所谓“国大”，从政治上打击我党和民主力量；同时积极准备进攻延安，妄图从军事上摧毁我党我军首脑机关。

为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部队进行了新的调整。

当时，晋绥野战军在参加张家口保卫战后南下崞县、忻州地区，收复了被阎军重占的原平、崞县；359旅南下部队从中原突围后胜利抵达延安，又从延安回到晋绥归建，我晋北野司正在崞县一带休整，总结晋北战役经验。晋绥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撤销了晋绥野战军和晋北野战军番号，统一编成野战纵队。晋北野司随之撤销，周士第仍回晋绥军区任副司令员，贺炳炎调任独立第5旅旅长，我和王绍南、杨尚高等调入野战纵队。

11月上旬，在岚县地区由原晋北野司机关及直属队与358旅、独立第1旅合编，正式成立了第1纵队。张宗逊任纵队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王绍南任参谋长，洗恒汉任政治部主任。纵队下辖第358旅、独立第1旅。358旅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参谋长何辉燕，政治部主任吴融峰，辖第715团、第716团、第8团和炮兵营；独1旅旅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参谋长李书茂，政治部主任杨琪良，辖第2团、第714团、第35团。

除第1纵队外，晋绥军区又先后组建了第2纵队、第3纵队。

第2纵队由第359旅、独立第4旅在吕梁地区编成，王震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恩茂任政治部主任，张希钦任参谋长。

第3纵队由独立第2、3、5旅在雁门地区编成，许光达任纵队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委员，贺炳炎任副司令员兼独5旅旅长，李夫克任参谋长，杨尚高任政治部主任。

我第1纵队成立之际，正值国民党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调集十个旅、一个装甲团企图对延安发动突然袭击。当时陕甘宁边区部队只有教导旅和新编第4旅，中央军委命令晋绥军区第1纵队紧急调赴陕甘宁边区。我纵立即出发，以急行军兼程西进，准备西渡黄河。

11月16日，贺龙司令员从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赶来黄河边上的临县三交镇，亲自给1纵干部作动员，宣布任务：蒋介石到处进攻解放区，这一回更狠毒，要来打我们的脑袋，进攻延安，想要摧毁我们的党中央！同志们现在就是要过黄河去，去给党中央、毛主席当警卫员，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

贺老总要求我们保持革命传统，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狠狠打击敌人，努力完成党中央交付的光荣任务。

几天来由于严格的保密，除纵队干部以外，基层指战员还不知道西进的目的，现在经贺老总亲自宣布，部队立刻群情激奋，恨不得一步跨到党中央身边去。

我们第1纵队虽然刚刚成立，却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358旅是1937年由红2军团改编而成的，独1旅是1939年由红军老部队与抗日新部队合编而成的，这两个旅又是在贺龙同志长期领导下成长起来的，抗战期间国民党多次阴谋袭击延安，独1旅、358旅分别于1941年和1943年西渡黄河，调防陕甘宁边区。1945年8月贺老总亲率这两个旅重返河东参加抗战大反攻。今天我们再次奉调陕甘宁，任务非同寻常，责任无比重大。这是党中央对我们的高度信任，也是我们的无上光荣。我们在全纵队叫响一个口号：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

第二天，我纵从碛口乘船渡过黄河，踏上陕甘宁边区的土地。

我纵在边区人民的热情欢迎下，经吴堡、绥德、清涧、延川向延安疾进。走到甘谷驿时，迎面碰到从延安撤出的学校向河东转移，其中还有一队坐在牲口驮子里的保育院娃娃。部队闪开大路，让他们通过。看样子延安已经开始疏散，形势紧急啊！我们心里象烧起一团火，脚下的步子迈得飞快。当天到达延安东边的拐峁，在那里休整待命。

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总司令的60岁寿辰。前一天，党中央在延安为朱总司令举行了祝贺活动。从红军、八路军到解放军，朱德同志就一直是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深受全军指战员的爱戴和敬仰。在延安面临敌军进攻的危急形势下，党中央特意为朱总司令祝寿，目的是号召全军学习总司令的革命精神，激励斗志，战胜敌人。

我纵刚到延安，正好赶上这项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派出几名战斗英雄代表前往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向敬爱的总司令送上一份贺礼。

这是一个镶嵌着金色“寿”字的大红五角星，周围挂满在抗日战争、自卫战争中缴获的日本手枪、指挥刀和美国卡宾枪、望远镜。五角星下写着我们的贺辞：“以战斗的胜利给朱总司令祝寿！晋绥军区张廖纵队全体指战员敬贺。”

晚上，我出席了中共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交际处礼堂举行的庆贺会。延安著名诗人柯仲平当场创作并朗诵了一首给朱总司令的长诗，洋洋洒洒，高亢激昂。我代表纵队全体同志向总司令敬酒，表达了敬意和决心。

12月5日，我纵在延安飞机场举行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动员大会。

前一天，纵队接到通知：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要来检阅第1纵队。想不到抵达陕甘宁仅仅几天，中央领导就要来看望我们，真叫人喜出望外。纵队干部立即开会做了研究、布置，提出要把接受毛主席、总司令的检阅作为对部队最好的战斗动员。

在研究如何搞好受阅工作的时候，有的同志提出：部队不久前才从晋绥

前线下来，补充了大批从国民党军解放过来的俘虏兵，他们在受阅中会不会出问题？为了保险起见最好把战士手里的子弹统统收起来。

围绕要不要收子弹，我们进行了反复研究。如果把子弹收起来是保险，但是我们开的是战斗动员会，怎么能够有枪无弹呢？再说把子弹从解放战士手里收走，他们会感到不被信任。我们仔细摸了各单位对解放战士的教育情况和他们入伍后的思想转变，最后定下决心：子弹一颗不收，相信这些战士的思想进步，相信我军政治工作的力量，让他们在接受领袖的检阅中得到更大的教育。

12月5日下午，我纵队近万名指战员全体列队在延安飞机场。

飞机场座落在延安城的东关外，一边紧依着清凉山，一边靠着延河滩。飞机场边上有一块墓地，安葬着“四八烈士”和关向应同志。我带领全纵同志来到墓地前，向尊敬的关向应政委、向“四八烈士”们默哀致敬。四个多月前当关政委病逝的时候，我们身在前线不能亲自送葬，心里一直深为遗憾。今天我们在关政委的墓前召开动员大会，仿佛关政委还象以往那样带领我们誓师出征，他永远活在我们的战斗行列中！

12月的陕北天寒地冻，一阵阵北风从毫无遮拦的机场上吹过。我们在跑道边搭起一个台子，顶上、后面和两侧围着布帐挡风，作为检阅台，纵队和旅、团的干部排列在台子两侧，部队全副武装站满了整个跑道。

随着几声汽笛响，开来几辆小汽车，走下来好几位首长，全纵队的司号员一齐吹起欢迎号。来的首长有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和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等领导同志。

纵队司令员张宗逊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敬礼报告，请中央首长检阅。

毛主席身披灰布棉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线围巾。总司令身穿棉军服，腰扎牛皮武装带。他们健步走到队伍前，在阵阵寒风中从队首走到队尾，从前排走到后排。战士们精神饱满，昂首挺胸，激动的目光紧紧跟随领袖们的身影移动……

检阅完毕，我把中央首长一一向部队做了介绍，请首长们讲话。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代表边区各界人民热情欢迎1纵队的到来，要求我们保卫好边区。

热烈的鼓掌声，激昂的口号声，象惊雷滚滚在机场上空飞扬。头上的宝塔山，身边的延河滩，都记住了我们的誓言：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

毛主席、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和讲话，给了我纵全体指战员以巨大的鼓舞和教育，部队的情绪高涨到了极点。

回到驻地，同志们兴奋地议论不休，纷纷表达自己的战斗决心和胜利的信心。

那些入伍不久的解放战士们更是惊喜万分地感叹道：“在国民党军队当兵几年，连个团长还没见上呢，官大一级压死人哪。参加解放军才几个月，想不到共产党的主席、解放军的总司令亲自来给咱们讲话，真是不一样啊！”

动员大会之后，我纵移驻延安城附近的七里铺、柳树店一带。这期间，黄河东面的晋绥第2纵队和晋冀鲁豫第4纵队接连发动吕梁、汾孝战役，给晋西南的胡宗南、阎锡山部队以有力打击，迫使胡宗南调兵回援、暂停突袭延安的计划。延安形势有所缓和，我纵队转入军政整训，备战练兵。

延安保卫战

1947年初，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已经全面受挫，日趋破产，遂改为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在陕北，蒋介石任命其嫡系胡宗南为总指挥，纠集胡宗南集团和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榆林邓宝珊部，共34个旅25万人，分五路围攻陕甘宁边区，企图夺取延安，一举消灭我党我军首脑机关和边区部队，或将我赶过黄河以东，而后转兵其它战场。胡宗南集团的西路敌军首先以八个旅侵犯我关中分区，接着又以五个旅进攻陇东分区的庆阳、合水。

2月10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签发命令，以晋绥军区第1纵队和陕甘宁边区的新编第4旅、教导旅、警备第1旅、警备第3旅合编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副司令员，我任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野战集团军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担负起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战斗任务。

我们立即在部队中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我也根据军委指示精神，向直属队干部作了关于目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的动员报告。

2月下旬，野战集团军以教导旅和警备第7团守备延安南线，率358旅、独1旅、新4旅及警3旅一部出击陇东，迎战敌军。

3月3日，侵占合水的敌军第48旅从合水县城出来，向西华池回缩。我军358旅隐蔽在山上，旅长黄新廷报告，敌军就在山下的沟里过，要求打它一个伏击。集团军没有同意。

敌48旅通过山沟，于下午进入西华池。358旅再次要求乘敌立足未稳之机攻击，仍未得到同意。黄昏以后，集团军下决心攻击西华池宿营之敌。当晚，358旅、新4旅相继发动进攻，突破了街内和山上的敌军部分阵地。

第二天，敌48旅在飞机大炮的轰炸支援下猛烈反击，并抢构工事固守待援，敌我双方打成对峙。

4日晚，集团军集中358旅、新4旅和独1旅一部向西华池发动总攻，独1旅和警3旅各一部担任警戒，阻敌援兵，务求在当夜全歼守敌。

5日拂晓，集团军派我到358旅、徐立清到新4旅去，分头了解战斗进展情况，督促尽快解决战斗。

我骑马赶到358旅指挥所，见到黄新廷旅长就问：“情况怎么样？”

“怎么样，你们下命令叫撤了。”黄新廷旅长告诉我，部队打得非常猛，一下子就冲到镇子里，把敌48旅旅部打掉了，旅长何奇被击毙，该旅的两个团也受到重创，伤亡很大，剩下的两处据点，只要再加一把劲，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彻底解决了，可惜这时集团军来电话叫撤出战斗。

我有些不大相信，说：“集团军派我来，就是要我了解情况，告诉你们一定把敌人打掉！怎么会叫撤呢？”

我拿起电话向集团军司令部询问，参谋长阎揆要说明是司令、政委考虑到敌人援军迫近，西华池还未拿下，因此下令各部队撤出战斗。

西华池战斗是延安保卫战的序战，我军毙伤敌旅长何奇以下1500余名，只是没能全歼48旅，实在令人遗憾。

在这之后。野战集团军奉命从西线转到南线布防，在富县茶坊召开了战斗总结会，检讨未能全歼敌48旅的教训，进一步动员打好延安保卫战。

中央军委在枣园小礼堂召集旅以上干部会议，总参谋长彭德怀、总政主任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传达了党中央确定的陕北我军基本作战方针：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次加以歼灭，牵制胡宗南集团于陕北战场。会议总结了西华池序战的经验教训，部署延安保卫战，同时决走撤消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恢复原建制。张宗逊和我仍任第1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

3月11日，国民党军的飞机悍然轰炸延安。

13日，胡宗南集团展开全线进攻，并以整编第1军、第29军等部15个旅从洛川、宜川分两路北上，直攻延安。胡宗南狂妄扬言：“三日内占领延安！”

我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毅然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凭借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与敌周旋，诱敌深入，在运动中逐次歼敌。

为了掩护中央机关、军委总部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疲劳与消耗敌人，中央军委下达了保卫延安的命令，以迟滞敌人的进攻。延安保卫战随之进入高潮。

布置在第一线的教导旅、警备第7团等部经过三天激烈战斗，坚决、英勇地抗击了敌12个旅的猛烈进攻，给敌人以很大杀伤。

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以独1旅、358旅、警7团为右翼，归张宗逊、廖汉生指挥，在道佐铺、甘泉、大小劳山、清北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以教导旅在南泥湾、金盆湾、临真、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战斗，调晋绥军区王震的第2纵队过黄河参战，与教导旅为左翼；以新4旅位于中央，在庙尔梁、程子沟、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同时将第1纵队、第2纵队、新4旅、教导旅编为西北野战部队，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将警1旅、警3旅、新11旅、骑6师划为地方部队，统归彭、习指挥。彭总这是临危受命！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在敌军大举进攻延安的危急关头，他看到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部队的贺龙同志不能从河东战场抽身，于是主动请缨，指挥仅有六个野战旅2万余人的西北野战部队与十倍于我的敌军抗衡。从此我们就在彭总的指挥下战斗。

遵照军委命令，1纵队从15日起陆续在甘泉南北投入防御战斗，阻击沿咸（阳）榆（林）公路进犯之敌。

敌军以飞机大炮向我防御阵地狂轰滥炸，竭尽全力发动一次次集团冲锋，不惜代价地企图打开通往延安的道路。

我纵指战员沉着应战，顽强阻击，一边打一边高呼口号：“坚决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每个人的心中都凝聚着一个坚定的信念：绝不让敌人从我这里前进一步！

战斗到18日下午，我纵司令部接到军委通知，毛主席要张宗逊司令员和我赶回延安受领新的任务。

我俩快马扬鞭，于黄昏后赶到王家坪，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副政委正在那里等着我们，毛主席刚刚在他们的竭力劝说下撤走了。

彭总告诉我们：延安保卫战的任務已经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延安群众都已经安全撤离，野战部队主力也将转到延安东北隐蔽待机，你们1纵队

的任务是连夜撤回延安，在明天上午放弃延安，然后向西北的安塞走，把敌人引到安塞以北。

彭总特别叮嘱我们：毛主席是向东走的，你们一定要把敌人向西北吸引。

我们告别了彭总，传令部队停止阻击，交替掩护撤回延安。

历时6天的延安保卫战结束了。我军以小的代价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胜利完成了迟滞敌人进攻、掩护中央机关和群众转移的预定任务，胡宗南“三日内占领延安”的扬言破产了。

入夜，我纵各单位相继通过延安城。城内到处可以看到敌机轰炸后留下的残垣断壁，城外不时传来一阵阵枪炮声。部队在延安住了最后一夜，纵队司令部住在枣园，这里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曾经住过的地方。这一夜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安然入睡。尽管我们把党中央主动放弃延安的决定在部队中进行过反复的解释、教育，指战员们都已经明白这样做的必要性和深远意义，但是一想到我纵是专为保卫延安奉调而来的，我们是在毛主席和总司令面前宣誓过的，现在又要经过我们的手来放弃延安，心里真是不好受啊！

3月19日上午，我纵按照命令规定时间全部撤离延安。中午，敌先头整编第1军第1旅在我第1纵队独1旅撤出之后，侵占延安。

三战三捷

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引起一番轰动。从延安到西安，直到南京，又是“祝捷”、“庆功”，又是招待记者，狂妄自大的胡宗南愈加忘乎所以，一面大事吹嘘，一面急于捕捉我党中央机关和我军主力。

毛主席和彭总正是预见到胡宗南骄横狂妄、好大喜功的心理在侵占延安后必然大大膨胀，指示我纵将敌军引向延安西北的安塞，而将野战部队主力集结在东北的青化砭待机。我纵按照预定部署，撤出延安后顺着延河川大摇大摆地向安塞走去。胡宗南误以为这就是我中央机关和主力，立即亲赴延安督令整编第1军军长董钊率领五个旅尾追而来，另以第31旅向东北的青化砭方向前进，保证其侧翼安全。

我纵走到延安至安塞的路中间接到彭总电令，要我们转赴青化砭歼敌31旅，而以少部兵力继续将敌人主力引向安塞。

当晚，纵队主力突然离开大路，钻入山沟隐蔽东去，只留下独1旅2团第2营引诱敌军北去。这个营在营长张济堂率领下佯作掩护主力撤退，始终与敌保持密切接触，且战且走，巧妙采用“减兵增灶”、“枪打慢牛”等办法，牵着敌军五个旅浩浩荡荡到达安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3月23日，我纵主力到达青化砭段咸榆公路西侧，与路东的野战部队指挥所沟通联系。

青化砭距延安约25公里，咸榆公路由南向北通过，路两侧是大山。野战部队集中全部兵力在这里伏击。刚从晋绥调来的第2纵队和教导旅埋伏在路东，新4旅兜底，我1纵队以358旅埋伏在路西，以独1旅为预备队并警戒安塞、延安敌军。

24日拂晓前，我纵隐蔽地登上公路西边山上的伏击阵地。天亮后敌军的飞机不时在空中侦察。部队在积雪未消、寒风刺骨的山顶上趴了整整一天，为了防止暴露目标不能点火做饭，渴了、饿了只能喝冷水，啃干粮，直到日落西山敌31旅也没有来。

黄昏后，我们带着部队撤下山，回到集结地宿营。

由于白白等了一天，有些同志沉不住气了，猜测说：敌人今天没来，明天也不会来了，可能是发现我军意图了。

这时彭总却沉得住气。他要求我们向部队做好工作：“告诉大家要沉得住气，要相信上级的判断和部署是正确的，要相信延安的老百姓心是向着我党我军的，是不会向敌人走漏消息的。敌人第一天不来，第二天会来，第二天不来，第三天也是要来的。只要我们隐蔽得好，敌人一定会钻进给它布好的口袋里。”

我们教育部队保持战斗热情，保证战斗部署的实现。纵队司令部派出便衣侦察队朝敌军来的方向去侦察，一直到了延安东关外的飞机场附近。

25日拂晓，我纵又回到伏击阵地趴下来，继续隐蔽。

上午，我纵派出的侦察人员匆匆跑来，兴奋地报告：“敌人来了，就在我们后面，马上就到！”

10时许，敌31旅旅部率其第92团由拐峁出发，沿咸榆公路进至青化砭，大摇大摆地钻入我军布下的口袋阵。突然间，空寂无人的山沟顿时枪声大作，伏兵四起，新4旅从北面兜起口袋底，2纵独4旅从南面扎住口袋口，我纵358旅和2纵359旅各从西面、东面山梁上夹击。

毫无防备的敌军措手不及，拥挤在狭窄的沟底，首尾难顾，指挥失灵，队伍乱作一团，火力施展不开，只能眼睁睁地望着我军挟着黄尘，喊着杀声，铺天盖地压了下来。

358旅8团第4连直冲敌旅指挥所，排长尹玉芬带领一个班俘虏了敌旅长李纪云。

仅仅1小时40分钟，我军就把敌31旅旅部及92团共2900余人全部消灭，无一漏网，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一些火炮、重机枪还没来得及从牲口驮子上卸下来就成了我军的战利品。青化砭伏击距我军撤出延安还不到1星期，我军就打了一个大胜仗，振奋了陕北军民。

胡宗南在31旅被歼后急令安塞的整编第1军五个旅转头向东，会同延安东面的整编第29军进犯延川、清涧、瓦窑堡，寻找我军主力。为避免孤军被歼的复辙，敌军采取所谓“方形战术”，几个旅集团前进，同行同宿，日走山梁，夜露山头。

我军却从青化砭转至蟠龙西北地区隐蔽待机，而以小部队牵着敌军转来转去，武装游行200余公里。敌军连连扑空，疲劳不堪，给养困难，遂留135旅守瓦窑堡，76师守延川、清涧，主力南撤。

我1、2纵队于4月6日在永坪镇抓住敌29军后尾，打了一仗，敌军背后受击，又掉转屁股全力北上，并令驻瓦窑堡的135旅南下策应。

4月13日，西北野战部队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决心以2纵和教导旅、新4旅在羊马河伏击从瓦窑堡南下的135旅，命令1纵在蟠龙西北的牡丹川、云山寺一线吸引、阻击敌主力九个旅。

我军要从敌十个旅中抓住并歼灭其一个旅，可以说是“虎口拔牙”。这一仗打不打得成，打不打得好？既要靠兄弟部队能否抓住敌135旅，迅速歼灭，又要看我纵能否吸引、抗击住敌主力。

我纵以358旅对付敌第1军五个旅，以独1旅对付敌29军四个旅。我们要求部队讲团结，讲全局，密切协同，保证胜利。彭总亲自到独1旅向王尚荣旅长重申了此项任务的重要意义。

4月13日，358旅与敌第1军的五个旅接触，立即以积极的动作将其吸引过来，交替掩护，节节抗击，以每天只让敌军前进2至5公里的速度，把敌阻击在蟠龙到瓦窑堡大道以西地区。

4月14日，独1旅与敌29军的四个旅接触，把敌阻击在羊马河以南。

我纵摆出一副决战的阵势，使到处寻找我军不着的敌军全力扑了过来，把敌九个旅牢牢吸引到自己身上，又以顽强的阻击将其死死地拖在那里，在几十公里的宽大正面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抗击战。我纵实施机动防御，在给敌杀伤后主动后撤，又在下一个山头抗击。

这一天敌135旅在羊马河被2纵队、教导旅、新4旅伏击。下午野司给我们传来捷报：“我军全歼敌135旅4700余人，活捉代旅长麦宗禹和两个团长！”

日落后，我纵甩开敌主力，迅速隐没在群山之中。

胡宗南丢了135旅，才知道上了当，命令第1军、第29军向东合围。敌军翻山越岭，劳而无功，粮食又消耗光了，只好撤往蟠龙、永坪补给。

我军于4月19日在敌回撤途中侧击其29军165旅。敌军因屡遭打击，行动愈来愈谨慎，受到攻击后立即收缩，使我歼敌困难，我军在杀伤其2000余人后转移。敌军退回蟠龙。

蟠龙是延安东北的一个重镇。胡宗南在这里设立了补给基地，支撑其大军武装“游行”。如果能打掉蟠龙，就将进一步造成敌军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的条件。

西北野战部队根据敌以为我党中央及我军主力正在东渡黄河的错误判断，将错就错，派2纵359旅和其它各旅抽调的小部队，配合绥德分区和黄河边的晋绥军区第3纵队独5旅，造成我军向绥德撤退、东渡黄河的假象，诱使胡宗南令第1军军长董钊、第29军军长刘戡率九个半旅北上绥德。蟠龙只留下167旅旅部率499团及保安总队驻守。我军乘敌主力回防不及，集中1纵、2纵独4旅、新4旅攻打蟠龙。

蟠龙镇位于一块小盆地里，四面是高地。敌军的主阵地设置在高地上，护卫着镇内堆集如山的军需物资。野司率2纵独4旅、新4旅位于蟠龙镇东面山上，1纵位于西面山上，对敌形成包围。

攻打蟠龙的战斗从5月2日黄昏开始。我军各部队首先扫除了一些小据点，逼近主阵地。敌主阵地为高大的核心堡或土寨子，我军攻坚缺少重炮，只能靠人工爆破，把粉状炸药装入干粮袋捣实，在敌军火力射击下进行对壕作业，一步步贴近敌碉堡，把炸药袋子挂到碉堡上爆破。战士们称之为“膏药战术”。

战斗到4日黄昏，358旅攻下蟠龙北山，独1旅攻下南面的磨盘山，独4旅、新4旅也攻下东山，蟠龙镇一览无遗地暴露在我军视线和火力之下，镇内敌人东突西奔，人慌马乱。

我军从四面向镇内发动总攻，全歼敌精锐167旅旅部、499团及保安队，共6700余人。敌旅长、胡宗南的“四大金刚”之一李昆岗也被358旅活捉，仅我1纵队就俘敌2800多名，缴枪1000余支。胡宗南存放在蟠龙补给基地的1万2千袋面粉、4万套军装、上百万发子弹、千余匹骡马以及药品、望远镜等大量战略物资全部补充了我军。

在缴获的骡马中，有一头骡子是贺炳炎被敌人抢去的。战前，我纵接到野司电话通知：晋绥军区第3纵队副司令员兼独5旅旅长贺炳炎调任第1纵

队副司令员。贺炳炎从蟠龙东面的野司到西边的1纵走马上任，要从敌我之间通过。他的胆子实在大，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头骡子、一匹马。走到中间时，迎面撞上敌人保安队。保安队见这个人披着大斗篷，骑着大骡子，身后还跟着护兵，认为是他们正规军的大官，没敢动他。

贺炳炎开始也把对方误为自己人，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仔细一看，不对。他跳下骡子，带着警卫员顺着山沟跑回去了。

保安队醒悟过来，追了一段没追上，把贺炳炎的骡子抢走了，他那匹马却跑到我纵阵地上。我一看这不是贺炳炎的马嘛，估计出事了，打电话问野司，才知道他有惊无险，又回到野司。

打开蟠龙后，贺炳炎的骡子也缴了回来。

5月9日，北上绥德的敌九个半旅气喘吁吁、饥肠辘辘地赶回蟠龙，其补给基地早已搬运一空并彻底捣毁了，我军也已转至安塞一带休整。胡宗南原先急欲同我军决战，现在明知我军就在安塞却不敢来犯，其进攻势头被初步粉碎了。

从3月19日我们撤离延安到5月4日攻克蟠龙，仅仅一个半月，西北野战部队就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接连三战三捷，总计歼敌1.4万人，活捉三个旅长，极大振奋了边区军民的必胜信心。

5月14日下午，西北野战部队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在安塞县真武洞隆重举行祝捷大会。野战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队和附近老百姓共5万多人聚集在真武洞的延河滩上，场子边上陈列着各部队的战绩表和战利品，主席台上张贴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大幅画像。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专程从安塞北面百里外的王家湾赶来参加大会。

祝捷大会开始后，举行了阅兵式。指战员们穿着胡宗南这个“运输大队长”送来的新军装，携带着美式枪炮，精神抖擞，士气高昂。

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代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切慰问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边区军民取得粉碎胡宗南进攻的巨大胜利。接着，周副主席高声宣布：自从撤离延安后，毛主席和党中央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

这个消息一公布，会场上欢声雷动。人们一遍又一遍传诵道：“毛主席还在陕北！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周副主席号召我们：下定决心，全部消灭胡宗南军队，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同全国军民一道把蒋家军全部消灭！

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副政委在会上讲了话。彭总指出：我们有广阔的良好回旋地区，有边区人民的拥护和帮助，有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全体将士的艰苦努力，只要我们不犯错误，不骄傲，和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不懈，就能全部消灭蒋胡军。

我纵358旅715团2营6连特等战斗英雄郝万龙，在蟠龙战斗中独自俘敌一连人。他代表全体战斗英雄表示了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坚强决心。

祝捷大会后，周恩来副主席和彭总召集野战部队的旅以上干部开会，总结撤出延安以来的战斗情况，研究下一阶段任务。我纵在安塞休整期间召开了战斗总结会、烈士追悼会、英模表彰会，认真总结作战经验教训，整顿群众纪律，补充了一大批从敌31旅、167旅解放过来的战士。

总结三战三捷的胜利，使我们对今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认识更加明

确了，执行更加自觉了，对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蒋介石、胡宗南的进攻更有信心了。指战员信心百倍，斗志高昂，决心发扬党中央对西北我军提出的“坚决战斗的精神”，再接再厉，夺取更大的胜利。

在安塞休整期间，我们按照彭总指令对部队进行作风纪律整顿，严格检查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部队撤离延安后，有一些人存在着忽视群众纪律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当我军打了胜仗后，驻地老百姓把家里的鸡子、羊子和一些生活用品送给我军，说“你们都拿去吧，要不也要被胡儿子糟蹋光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错误地认为：“宁叫我军用光，也不留给敌人掠夺。”乱拿乱用老百姓的东西。对于这些问题，彭总极为重视，责令严肃惩处，不容姑息，并要求一刻也不放松教育。我纵把整顿作风纪律作为思想、政治整训的重要内容，认真查处违犯群众纪律的人和事，对部队进行普遍的教育，强调没有陕北人民的支持，我军就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不可能在这里生存下去。陕北人民心向我党我军，痛恨国民党军的烧杀劫掠，积极支持我军，为我军封锁消息，送来南瓜、小米，安置伤员病号，表现出鲜明的爱憎。

转折点

在我军同胡宗南集团作战期间，宁夏、青海的马家军从西面占据了陇东、三边地区。胡宗南集团的进攻被初步遏止后，西北野战部队于5月下旬从安塞挥师西进，发动陇东战役。

我纵首克蒋台，全歼敌81师179团，接着协同兄弟部队再克环县，给宁马81师歼灭性打击。

6月下旬野战部队乘胜北上，发动三边战役，攻占定边、安边、盐池，收复整个三边地区。进入1947年7月，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

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全面进攻被粉碎之后，重点进攻亦受挫折，反动统治走向崩溃。蒋介石于7月间颁布了所谓“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这个“戡乱令”此后一直施行了40多年，并没能挽救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失败，后来它又成为阻碍祖国统一和台湾与大陆“三通”的障碍，直到1991年5月才不得不宣布终止。

与此相反，人民解放战争在进行了一年后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央前委在靖边县小河村开会，总结解放战争一年来的形势，提出第二年将举行全国性反攻的基本任务。中央决定西北我军出击榆林，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晋冀鲁豫的太岳部队挺进豫西。

同时，为了统一和加强西北解放战争前后方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将西北战场分为前后方两个摊子，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共同经略。西北野战部队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成立了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晋绥军区第3纵队在这时由许光达率领调过河西，编入西北野战军。贺龙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地方部队及后方工作。习仲勋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主持地方党的工作。

我1纵队领导成员也有所变动，张宗逊去野司任职，贺炳炎接任纵队司令员。根据中央通知，我们建立了纵队党委会，进一步加强党在部队中的领导。我担任了纵队党委书记。

1947年陕北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加上胡马军队的大肆洗劫，搞得

老百姓生活很苦，我军吃饭也很成问题。我们常常处于断粮状态，主要吃南瓜和南瓜叶子，有时只能吃当作马料的黑豆，把黑豆压扁与粗糠、野菜熬成糊糊，陕北老百姓叫它“钱钱饭”，即使是这样的东西也不能吃饱。粮食成了制约我军继续在陕北生存、行动、战斗的大问题。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叫贺老总挂帅抓后方，搞粮食，保障野战军的作战。贺老总动员晋西北人民勒紧腰带，抠出小米子，用毛驴一驮子一驮子地给我们运来。为了运这些粮食，晋西北的毛驴都不知累死了多少！我军北上打榆林，背的就是贺老总从晋西北运来的小米子。

打榆林前，我们迎来了南昌起义暨人民军队建军 20 周年纪念日。

每年的 8 月 1 日，我们总要搞一些纪念活动，也还要尽可能改善一下伙食。可是 1947 年的这一天，我们什么吃的也没有了。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拉上我，说：“走，我俩个去打野鸡吃。”

我的眼睛色盲，分辨不清绿树从中的野鸡。贺炳炎的眼睛好，但只有一只左手，打枪受限制。贺炳炎提议：“我来看，你来打。”

我俩漫山遍野地转了半天，总算打到一只野鸡，拿回去下到锅里，又到纵队卫生部要了一撮盐，就这样过了一个建军节。

下午，纵队直属队召开纪念大会，我在大会上讲了人民军队和我纵队的光荣斗争历史，讲了全国解放战争和西北战场的胜利发展形势，为即将开始的榆林战役作了政治动员。

8 月 3 日，我纵出发去打榆林。

榆林城位于晋陕绥边界地区，濒临长城和沙漠，是敌人在我边区北面的战略要地，由邓宝珊部第 22 军和胡宗南部第 28 旅及保安队共 15000 人驻守。

从 8 月 6 日起，西北野战军集中 1、2、3 纵队和教导旅、新 4 旅及警备第 4、第 6 团扫除外围，包围榆林城。10 日到 11 日连续两天爆破登城，但未能成功。

榆林被围后，蒋介石飞赴延安督令胡宗南主力北上救援，敌 36 师沿长城外侧的沙漠地带避开我军阻援部队，快速插到榆林。我军见榆林一时难攻，且调动敌主力北上目的已经达到，遂撤下来转至榆林与佳县之间待机。

这时，贺龙、习仲勋率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后方机关向黄河东岸的晋绥边区转移，并借机诱使敌人误以为我党中央和野战军主力将撤离陕北。胡宗南急令 29 军军长刘戡率五个旅北上、36 师南下，夹击我军于黄河与无定河之间的狭小地区。

敌 36 师师长钟松救援榆林有功，得意忘形，马不停蹄地紧追我军身后，声称要“一战结束陕北战争！”野司决定抓住孤军冒进的敌 36 师歼灭它。这时党中央也从靖边县小河村转到这一地区，与野战军主力会合。

战前，野司召集各纵各旅干部开会，毛主席、周副主席也来参加。自从撤出延安后，我们就与党中央分开活动。毛主席他们单独同敌人周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我们一直担着心。今天见到毛主席，我们纷纷上前敬礼，代表广大指战员问好。

毛主席给我们分析了全国各解放区战场陆续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然后他用一句湖南土语形象地说：眼前陕北的处境，就象我们湖南人常说的“过山坳”，快爬到山坳坳上了，千万不能松劲，要咬紧牙关一鼓作气地爬上去，往后的道就好走了。

毛主席的指示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决心打好这一仗，胜利实现“过

山坳”。

8月18日，我军对路经沙家店向东运动的敌36师发动突然攻击，敌军匆忙收缩。不久下了暴雨，山洪暴发，战斗中止。

20日，1纵、2纵在沙家店向敌36师师部及165旅发动攻击，教导旅、新4旅在常高山围住了向沙家店回援的123旅，3纵和绥德分区警4团、警6团阻击住前来增援的刘戡部。

战斗中，我纵接到彭总向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发出的动员令：“彻底消灭36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民族解放事业，继续你们无限英勇的精神，立即消灭36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的完成战斗任务！”我们把彭总的动员令传达下去，部队士气倍增，向敌人发动更加猛烈的攻击。我军在黄昏前全部攻占了敌军阵地，敌师长钟松和165旅旅长李日基等少数残敌趁天黑下雨化装逃跑，胡宗南最精锐的三大主力之一整编36师就这样一战被歼了。

沙家店大捷是西北战场的伟大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我军从此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

战后，野战军前委在野司驻地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沙家店大捷，研究下一步作战方向。毛主席、周副主席、弼时同志特意赶来祝贺。

毛主席满面春风地说：“打得好啊，同志们！”

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主席指挥的好！”

毛主席接着讲：“沙家店这一仗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陕北战争已经过山坳了。”主席称赞彭总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我们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毛主席又乘兴吟诵了长征初到陕北时写下的诗句：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在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总的主持下，会议讨论了反攻作战的方向、计划。我们各纵各旅的同志纷纷表示有决心、有信心继续拖住胡宗南主力在陕北，就地歼灭它。

沙家店大捷之后，太岳的陈赓兵团南渡黄河，出击豫西，威逼潼关、西安，迫使胡宗南调其进攻陕北的主力第1军、第29军南下应急。乘敌南下之机，西北野战军沿咸榆公路两侧展开一场猛烈的追击战，从米脂一直追到延川，在关庄、岔口击溃敌四个旅，迫使敌军停滞在延安地区整补，无法南援。

乘胜反攻

1947年9月下旬，西北野战军为适应战略进攻的要求，又有新的发展和壮大。原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警备第1旅、第3旅和骑兵第6师组建成立了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不久，又以教导旅和新4旅组建成立了第6纵队，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张贤约任副司令员。我第1纵队也有所调整，

358旅原8团改称714团，独1旅原714团改称为1团，35团改称为3团，调整后358旅辖714、715、716团，独1旅辖1、2、3团。

9、10月间，西北野战军实行内线与外线相配合的反攻作战。2纵、4纵进行外线作战，出击延安以南的黄龙山区，发动黄龙战役。野司率1纵、3纵和教导旅、新4旅在延安东北进行内线作战，发动延清战役，肃清驻守延长、延川、清涧之敌。

10月1日，3纵攻占延川，教导旅攻占延长，我纵攻占清涧南面的三十里铺。10月4日1纵、3纵包围清涧。

清涧是咸榆大道上的要冲，驻守着敌整编第76师师部、第24旅旅部和—一个多团兵力。敌师长廖昂早就是彭总的手下败将。11年前红军三大主力由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指挥，进行了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役，歼灭胡宗南部第78师，廖昂当时任该师232旅旅长，他全旅被歼，自己却侥幸逃脱了。昔日的败军之将，今天竟当上了中将整编师师长。廖昂在清涧城周围高地构筑了以大小碉堡为核心，外壕、鹿砦、铁丝网相环绕的防御工事。

10月6日，1纵、3纵分别从西面和东面向清涧进攻。经过三个夜晚的连续突击，我纵相继攻克城西高地的大部分阵地，只剩下耙子山主阵地。

耙子山是清涧城的天然屏障，又是俯制全城的制高点，南北长约百余米，守敌将数丈高的天然陡壁加以人工切削，形成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构成我军夺取清涧的最大障碍。9日晚，358旅716团、独1旅第2团协同夹攻耙子山。716团以搭人梯、挖踏孔的办法登上山的南端，以对壕作业一点点逼近敌碉堡和小庙，而后发起强攻，但因地形受限、火力不足，攻了几次都未能成功，部队伤亡较大，指战员们都很着急。

从我军攻击一开始，清涧城里的廖昂就频频向胡宗南呼救。敌29军军长刘戡率五个半旅从延安来援，已接近清涧，与教导旅、新4旅等阻击部队展开激战。耙子山攻不下来必然影响整个战役进程。

这时，我纵接到野司打来的电话。彭总焦急地对纵队司令员贺炳炎喊道：“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来？你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

贺炳炎正在为部队伤亡大、进攻受阻而伤脑筋，他也喊了起来：“部队伤亡大，有困难！”

他俩在电话里吵起来，贺炳炎把话筒也摔了。

彭总摔下电话，带着野司副参谋长王政柱直接到了358旅指挥所，他叫上黄新廷旅长、余秋里政委到前沿观察，指示部队调整部置，重新组织攻击。

10日上午，部队终于拿下了耙子山敌军主阵地。战斗中716团团长沙汉元不幸被流弹击中牺牲。

战后，彭总带着旅长们察看敌军防御工事又一次来到耙子山前，感慨地说：“象这样坚固的工事，象我们这样的装备，要不是革命的军队，任何队伍都是拿不下来的。”以后，清涧人民为了纪念为解放清涧而牺牲的储汉元团长等烈士，将耙子山更名为“汉元山”。

10日下午4时，我纵和3纵同时向清涧城发起总攻。清涧城东高西低，西城墙依清涧河陡峭的石堤而筑，竖梯、爆破都受地形限制。担任主攻的358旅714团主动提出改向北门爆破，他们在独1旅3团和3纵独5旅配合下成功地炸开北门，我纵由此突入城内，协同已从东门入城的3纵全歼守敌。

敌师长廖昂可没有当年在山城堡那么走运，想跑没跑掉，被3纵俘虏。

刘戡率援军赶到清涧时已经晚了，连城都没进，只在山头上宿了一晚，接出孤立于绥德、瓦窑堡的守敌，退回延安。

敌军撤走后，我们重返清涧住了两天，又到了绥德。绥德分区主持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还为我纵队一名绥德籍的新兵举行了庆功会。部队在这里总结延清战役：此役共歼敌 8000 余人，收复延长、延川、清涧、绥德、瓦窑堡 5 城。与此同时，在外线出击的 2 纵、4 纵攻克黄龙、白水、韩城等地，取得了黄龙战役的胜利。

延清战役的胜利使延安东北只剩下榆林一地孤悬北线，胡宗南部第 28 旅从榆林空运西安，剩下邓宝珊第 22 军及地方武装孤守榆林。野司决定乘胜北上，第二次攻打榆林，扫清北线，巩固后方，进一步保障驻佳县的党中央的安全，创造大军南下的有力态势。

10 月下旬，野司率 1、3、6 纵队和绥德分区两个团分路北上，突然包围榆林城。

27 日向外围发动进攻，我纵担负从南面攻击的任务。358 旅 714 团占领了飞机场，敌一架运输机满载枪支弹药糊里糊涂降下来，714 团战士郝宗耀等操起 60 迫击炮击中油箱，飞机被烧毁，驾驶员被俘。

在我纵攻击正面有三义庙、凌霄塔两处敌军阵地，是榆林外围的主要障碍。尤其是凌霄塔高高矗立在一块高地上，塔下由 10 多个碉堡环绕护卫，塔身坚固，设置多个火力点，居高临下控制着城南。我们令 358 旅、独 1 旅攻击这两处要地。30 日夜 358 旅 714 团攻占三义庙，独 1 旅第 2、3 团经连续爆破攻克凌霄塔阵地多个碉堡，于 31 日下午攻占凌霄塔和南关，拔掉了最后的障碍。

11 月 2 日晚，野司令 3 个纵队向榆林城发动强攻。我纵在城南担负主攻。经过一夜激战，攻城部队都未成功。野司遂令一面围城一面挖坑道爆破。5 天后坑道挖成了，随着一声巨响，500 公斤炸药把城墙炸坍 20 多公分的缺口，准备从爆破口突击的独 1 旅 2 团却以为没有炸开，被敌人用火封住了，痛失良机，6 纵队的坑道爆破也失败了。

在我军围攻榆林时，宁夏马鸿逵的整编第 81 师等部十个团的步骑兵从西面驰援而来。野司决定撤围打援，在榆林西南的元大滩迎击宁马。我纵 358 旅首先与敌骑兵遭遇，敌骑兵在飞机支援下向 715 团 1 营散兵线猛烈冲击，团长罗坤山负伤。我军在沙漠中顽强抗击，打退了敌军。第 2 天，我纵配合 3、6 纵队向敌军阵地进攻，敌军退却后与榆林守军会合。我军二打榆林遂告结束。野司率部队撤下来，回到绥德、清涧一带休整，转入冬季整训。

永恒的记忆

我和第 1 纵队的战友们，从奉命保卫延安开始，就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下，在彭总的率领下作战。在转战陕北的一年中，我们亲眼看到陕北战场的形势，从我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之日起，就一直按照毛主席的预定战略意图，沿着一条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轨迹迅速地发展变化着。

首先，我军经过一场预有准备的延安保卫战，我中央机关从容撤离延安，留给胡宗南一座空城。

之后，仅一个半月，我军接连三战三捷，使不可一世的骄狂之敌损兵折将，气势汹汹的进攻势头颓然粉碎。

不到半年，沙家店一役，即宣告了敌军重点进攻被粉碎。我军以此为转折，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

不到一年，我军共歼敌6万余人，用敌军俘虏补充了自己，用敌军武器装备了自己，兵力扩大了两倍。敌我力量的对比由战争开始的10比1改变为5比1。更重要的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已取得战略主动，内线防御转为内线进攻，并即将开始外线进攻，敌人则由重点进攻被迫转入重点防御。

然而，在战争开始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却是极为悬殊的。从总体上看，开始进攻陕北的敌军有34个旅，25万人，我军却只有6个野战旅，2万余人；敌军有飞机大炮，装备优良，我军却只有小米加步枪，装备低劣。在如此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势下，我军何以能够步步走向胜利，而敌军步步走向失败呢？是什么力量推动战争形势向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呢？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军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呢？我认为，其原因和力量就在于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在于彭总的正确指挥，在于西北我军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在于陕北人民和全国人民坚决支持，在于各解放区军民的战略配合。

第一，从敌人向陕北的重点进攻开始，党中央、毛主席与敌消灭或驱逐我党中央、解放军总部的图谋针锋相对，决定以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三人组成我党我军的最高统帅部，留在陕北战场，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

战争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策。采取这样一个决策，不仅使西北战场以很少的兵力吸引和歼灭了大量敌军，支援了其它战场的解放战争，而且以其巨大的力量，鼓舞了陕北乃至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信心。当时毛主席坚持不去黄河以东，要留在陕北，不要野战部队护卫，只带领几百人的机关和警卫人员，化名昆仑纵队，独自与敌周旋，这是何等的胆略和气魄！是毛主席的这种胆略和气魄，给了我军克敌制胜的巨大精神力量。记得自周副主席在祝捷大会上公开宣布“毛主席还留在陕北”的消息后，“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这句话就成了激励我军粉碎敌人进攻的战斗动员令。

第二，主动放弃延安，是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战局上投下的一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妙棋。它使我军迅速由被动转化为主动，轻装上阵，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而蒋介石、胡宗南从占领延安之日起，就背上了包袱，先骄其兵，后疲其师，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地步。

毛主席的用兵之道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着眼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敌人的进攻一开始，他就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棋高一着，占居主动。对这一点，反动而又愚蠢的敌人是根本不可能明白的。我们自己的一些同志，当初对党中央放弃延安的意图也不十分明确。随着战局的发展，这着棋的作用日益明显的表露出来，大家才认识到：没有当时延安的放弃，就没有后面的胜利。

第三，陕北我军在作战中，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关于以打运动战为主的思想，关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区为主要目标的思想，关于陕北作战采取“磨菇”战术的思想。可以说，我军的作战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毛主席战略战术原则的生动体现。我军一方面始终牵着敌军鼻子，在陕北战场上转圈子，大游行，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使之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后方空虚，补给困难，疲于奔命，处处扑空，挨打饿饭，士气低落。另一方面，

在运动中抓住孤立之敌或敌军中薄弱的部分，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从内线防御到内线反攻期间我军每一个战役的胜利，都无一不是贯彻毛主席的作战思想、作战方针、作战原则的结果。

毛主席在给野司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中，把西北野战军的作战方针形象地定名为“磨菇”战术：“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人在现地区内周旋一个时期，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经之路”。我们就是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条必经之路走向胜利的。

第四，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人心向背。撤离延安前后，有许多同志为了安全起见都主张毛主席转移到黄河以东的晋绥解放区去。毛主席则坚持留在陕北。他说：“这个地方群众好，地形好，十分安全。”我党我军紧紧依靠人民，人民始终心向我军。相互间真正形成了同甘苦、共患难、心连心的关系。如果没有陕北人民的无私奉献和全力支撑，没有晋绥军民的大力支援，没有全国人民的坚决支持，我们要想取得转战陕北的胜利、粉碎敌人的进攻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西北野战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在彭总的亲自率领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扭转了陕北的战局，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创造的经验也是丰富的。陕北战场就是一个我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大课堂，我有幸得到了在这个大课堂里学习的机会。

毛主席运筹帷幄，用兵如神，高招迭出，妙着横生。彭总临危受命，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以其卓越的指挥才能率领部队英勇奋战。陕北人民敢于斗争，敢于牺牲，敢于胜利。这些，都给我以巨大的教益，给我留下永恒的记忆。

第十三章

新式整军

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有许多好做法、好经验是由基层指战员创造出来的。

1947年冬季，西北野战军进行的以诉苦和三查为中心内容的冬季整军运动，就是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创造。毛泽东主席把它赞誉为“新式整军运动”。

在新式整军中，我们第1纵队的诉苦三查开展得比较早，比较普遍和深入，得到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的指导和肯定，也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注和表扬。

诉苦三查的由来

1947年11月中旬，我第1纵队在横山县的响水堡、吴家岔一带进行短暂休整，按照野司要求对刚刚结束的榆林战役进行初步总结。

我军已经是两打榆林了，两次都没有打开。这不能不引起从野战军首长到基层指战员的深思，各级都在认真地检查原因：

在战役指导上，我军对胡马两敌迅速增援榆林邓宝珊部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在战术技术上，我军攻坚火力弱，装备差，经验不足。但是即使这样，榆林城也不是绝对打不开。

一打榆林，我纵358旅715团爆破小西门成功，突入一个排，但连营团指挥员仍以为城门没炸开，另行组织攻城，先头排得不到后续支援，伤亡大半，退守到城门洞里。后来竖梯登城的一个排与门洞里的那个排会合，再次派人报告，上级仍未作处置和报告，直到拂晓我军攻城未果野司下令撤回。

二打榆林，我纵独1旅2团挖坑道爆破城墙成功，该团指挥员却以为爆破未成，没有及时派部队乘隙突入，天亮后才发现城墙炸开，但突破口已被敌火力封住。

两打榆林未克，皆因一些人畏缩不前、谎报军情，个别营团指挥员责任心差、敷衍塞责，导致痛失良机，贻误战事。而两次重犯同样的错误，也反映出我们纵队领导姑息迁就，处理不严，教育不够。可见，战斗意志不强才是攻榆不下的根本原因。

通过对榆林战役的检查，我们发现部队思想上的问题不少，突出的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对解放战争发展进程和我军即将担负的任务思想准备不足。

解放战争开始以来我军接连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相继转入内线反攻、外线反攻。这年10月解放军总部发布毛主席在陕北佳县神泉堡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任务。战争进程几乎是以每三五个月就出现一个转折的速度发展、变化着，一方面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一方面也使一些人思想准备不足，有些人的思想甚至还停留在抗战胜利后的阶段。他们不清楚为什么要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有的提出：“以前我们唱歌子‘打走日本好回家’，现在怎么还不让回家？”像这样不懂得解放战争的正义性、必要

性，也就不能自觉担负起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第二，对解放区正在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认识不清。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布同日，党中央发布了《土地法大纲》，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我军由于忙着打仗还没有深入进行土改教育，一些人不清楚为什么要搞土地改革？不懂得什么是剥削？有的家里分到土地就要求回家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有的家里被农民斗争了就消极不满，甚至抵触对抗。我军指战员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如果对这场彻底消灭农村封建剥削关系的深刻变革缺少应有的认识，那么“为土地而战”的积极性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兵员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战争开始前我纵 358 旅、独 1 旅的战士基本上都是根据地入伍的子弟兵。后来随着战争发展，一方面大量减员，一方面俘虏了大批敌军士兵，而在人烟稀少的陕甘宁和晋绥边区兵员困难，新成分的补充从过去主要靠子弟兵变为几乎全部从俘虏兵中解放入伍。解放兵在全纵各连的比例平均占到 60% 以上，有些连队占到 80%，他们加入我军后掉转了枪口，但由于多年所受国民党军欺骗宣传和旧观念的影响，一些人并不十分清楚我军的性质、宗旨、任务、纪律，不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只知道“吃谁的粮，扛谁的枪，就给谁打仗。”有的身上沾染着不少旧军队的坏毛病，我们一些干部因此嫌弃和反感他们，这也影响了内部团结。

第四，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一些人胜利信心不足，害怕艰苦生活，思想厌倦了，斗志衰减了，纪律松懈了，作风疲塌了。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部队在榆林战役中的战斗力，更为严重的是将使部队与解放战争飞速发展的形势和伟大历史任务不相适应。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

过去对这些问题，我纵遵照野司要求曾不断进行教育，多次进行整顿，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战事频繁，一直未能找到一个适当的时机和更为有效的办法，对部队进行一次集中的、深入的、系统的教育。

在榆林战役总结中，我纵 358 旅 714 团、715 团率先采用了诉苦和三查的方法，为从根本上解决部队存在的上述问题提供了经验。

715 团是一个有着光荣斗争传统、能征善战的红军老部队，打过许多硬仗、苦仗。两打榆林该团都担任主攻，却没有打好。元大滩打马家骑兵，一度乱了阵脚，向敌进攻时又以六路纵队连冲敌五个集团工事，伤亡过大，团长罗坤山的腰部也负了重伤。对此该团作了认真严肃的检查。

首先是查斗志，为什么仗没打好？主要是斗志不强。指挥不果断，突击不勇猛，抗击不顽强，个别人甚至贪生怕死。

接下来就是查思想。为什么斗志不强？主要是思想上有问题。对战胜敌人信心不足，对长期战争厌倦消极，不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

再进一步又查阶级。为什么思想上有问题？主要是阶级立场不对头，从中发现了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蓄意破坏的分子，而大多数人还是缺乏一定的阶级觉悟。那么你是不是贫苦阶级出身？这样又引出了诉苦。他们这样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诉苦，以 714 团搞得最早、最好。该团又以 2 营为最。2 营政治教导员夏伟是个很会做思想工作的政工干部。解放战争初期，他就根据国民党军大量俘虏兵开始补入部队的新情况，搞了国共两军的对比教育，启发解放兵控诉在国民党军遭受的抓兵之苦、当兵之苦，畅谈解放军里官兵平等、军民一

家的亲身感受，收到很好效果，并推广到全旅。一年前我纵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检阅，358旅的大量解放兵一点问题没出，就是对比教育的成效。根据以往的经验，在榆林战后检查战斗意志时，714团2营在旅政治委员余秋里的指导下首先开展诉苦教育，从根本上提高战斗意志。358旅政治委员余秋里做政治工作很有特点，一个是深入基层和战士中间，具体解决问题；一个是善于抓典型，运用典型推动工作。714团2营诉苦和715团三查的做法经他加以总结，推至全旅，同时也引起纵队党委和野战军前委的重视。彭总在一次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此一问题，前委起了批准作用。起带头作用的是358旅，又以714团最为突出。”

11月下旬，野司召集1、3、6纵旅以上干部开会，总结二打榆林战役，同时决定利用冬季休战，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整训。彭总要求我们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普遍深入地开展诉苦运动与土改纪律教育，对历次战斗进行民主检查，扩大党的组织。而后野司率1、3、6纵移驻靠近晋绥的米脂、绥德、清涧一线，我纵驻清涧地区。纵队党委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整训工作。358旅介绍了714团、715团的经验。我代表纵队党委明确宣布运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政治整训。

根据野战军政治部的20天整训计划，纵队政治部拟定出具体步骤：第一步广泛发动诉苦，进行阶级教育，以搞通剥削关系，提高阶级觉悟；第二步普遍进行三查，以清理思想，增强斗志，纯洁队伍；第三步深入开展练兵，以达到团结杀敌立功的目的。

一场声势浩大的以诉苦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就这样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在全纵队开展起来。

诉苦教育

诉苦，就是控诉地主阶级给予劳动人民的剥削之苦，控诉国民党反动军队给予士兵群众的压迫之苦。目的是要通过诉苦使广大基层指战员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学好《土地法大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两个文件，搞通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从根本上提高政治觉悟和战斗意志，牢固树立“为土地而战”和“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思想。

从阶级教育入手提高政治觉悟，其实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做法。在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中，我们就是靠它来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由于战争性质、内容、对象的变化，我们主要进行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教育。因此在这中间以及后来入伍的基层指战员的阶级意识比较淡薄，一些人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当抗日民族战争已经转变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内革命战争以后，阶级教育再次成为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课题。

纵队政治部下发了《土地法大纲》，要求熟悉阶级教育的红军老干部亲自领导部队搞教育，要求懂得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政治干部辅导战士学习，但不搞包办代替。在纵队党委的统一指导下，各旅、团、营、连诉苦教育的方式、步骤、重点各有不同，大体都经过这么几个阶段。

首先是酝酿、座谈，发动诉苦。

有的单位从回忆个人和家庭的穷苦生活开始，有的从讲解《土地法大纲》开始，有的从宣读晋绥解放区《告农民书》开始，有的从辩论“穷人为什么

穷、富人为什么富”开始。总之，经过充分酝酿和座谈来发动诉苦、发现典型。让那些既有贫苦遭遇又有一定觉悟的同志先在本班本排诉苦，带动一般同志诉苦，然后运用苦大仇深的典型召开全连、全营、全团军人大会，带动起更加普遍的诉苦，形成高潮。

在那个时代，哪一个劳动者出身的同志没有一肚子苦水啊！大大小小的诉苦会在窑洞里、操场上开起来了。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战士们一个接一个登台，争相诉说自己过去饥寒交迫的生活、逃荒要饭的经历、家破人亡的遭遇，诉说自己的亲人是怎样被饿死、冻死、病死、打死、逼死的，兄弟姊妹是怎样被卖掉的，土地房子是怎样被夺走的。从国民党军队解放入伍的战士除了诉这些苦，还诉说自己是怎样被卖壮丁、抓壮丁的，在国民党军队里又是怎样挨打受骂、被长官克扣欺压的。

诉苦诉到伤心处，诉者失声，听者动容，台上台下泪水交融，场内场外同仇敌忾。

358旅716团通讯队解放兵于德水就是一个典型。他在军人大会上控诉说：

“我家5口人祖种40亩地，后来父亲眼瞎了不能种地，欠的租子还不起，老财把耕牛拉走了。全家人没法过，父亲打短工，母亲妹妹做针线，我去给老财放羊。老财嫌我吃的多不要了，父亲又送我到铁厂拉风箱。年底结帐给铁不给钱，说了好多好话，才给了点钱回家过年。腊月廿八我被抓了兵。正月初三父亲来看我，因为衣衫破烂不准进，在外面转了三天碰到我出来才把父亲带进去。父亲掏出糠窝窝吃，我看了伤心，到伙房要点饭。事务长强硬地说：‘要吃饭拿钱来’。我说：‘我家穷，没有钱。’事务长却说：‘谁要你穷的！’我再三央求才要了碗饭。父亲很快吃光了，放碗不放筷子。我明白他是没吃饱，又去求来半碗饭。父亲吃完知道再没有希望才把筷子放下……”

诉到这里，于德水放声大哭，在场同志无不落泪。大家劝他不要说了，他一抹眼泪：“我还要说，国民党那里我们穷人是吃不开的。解放军就不同，我刚被俘过来就看到对来队家属招待得很好，回去时免费坐火车，还送钱……”他又哭了起来。

诉苦之后是挖苦根。

开始有的单位没经验，只是单纯地诉苦，结果诉完了，哭完了，教育也结束了。纵队和旅团领导发现后及时指出：诉苦不是目的，流泪还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搞清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才能挖出造成穷苦的根子。

我们向部队提出问题：“苦从何来？”“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启发大家深入讨论。

对这个问题，不同出身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贫苦出身的同志由于千百年来剥削阶级传统观念的影响而认识相当模糊。开始讨论时能够正确说明这个问题的不多，反面意见却不少：

一是说穷人是命穷，富人是命富。“路上有一块金子，穷人过去看不见，富人过去拾到了。”“富人有财神，铁条变金条”；

二是说富人富是祖上积攒起来的，是劳动起家、会持家，穷人是不会持家、好吃懒做败家的；

三是说富人不但剥削人反被穷人剥削。“世上只有穷人欠富人，没有富人欠穷人的。”“地主养活了长工，地主不租地给穷人种，穷人就要饿死。”

对这些说法，我们不急着下结论，而是让每个人充分发表意见，运用辩论和算帐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自己教育自己。

对于“谁养活谁”的问题，实质上是个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714团的一个战士说的好：“清涧河里的水本不值钱，谁都可以去担，但我担回来就可以卖钱，就是因为我劳动后才值钱的。土地也是一样，地里本不长庄稼，我给老财种了地才生产出粮食。这就是老财剥削我们的劳动力。”

那些持地主富农思想的人又退一步说：“人家养你的肚皮，你就应管人家的地皮，天经地义！”也有的说：“老财雇长工是两相情愿，给了你工钱就不算剥削。”

于是，大家就一笔一笔地算帐。你一年给地主种多少地？每年收多少粮？地主给你多少工钱？这些粮都是劳动得来的，但工钱却少得可怜，这是不是剥削？有的用笔算，有的用口算，有的在地上划圈圈、搬小石子。一个算完了，又帮另一个算；有谁算不清，大家一起帮他算。

算着算着，许多同志禁不住哭起来了：“我一年到头流血流汗，给地主白白干活，过去总以为穷是自己命苦，现在才知道是被剥削穷的！地主老财不劳而获，是靠吃我们的血汗得粮买地才富起来的！”有的战士说不好“剥削”二字的含义，就用自己的话来说：“反正是咱穷人吃亏！”这样更容易接受。

一些出身地主家庭的人也主动以自家的罪恶行为揭穿剥削的秘密。

独1旅2团2营有个排长叫周甲子，在全营军人大会上控诉了他家如何把一个中农逼至破产的事实：我家就是老财，大斗进小斗出、吃租子、放高利贷都是剥削。我村崔老汉有1垧多水地、几垧坡地，他给儿子讨婆姨找我父亲借了60元白洋，议定5分利，年底还清。到了期限，我父亲想要崔老汉还，但我祖父更会剥削，叫明年再说。崔老汉非常感激我家。第二年他将水地种了西瓜，指望卖瓜还清这笔帐。瓜快熟时我父亲带着狗腿子逼着要钱，软的硬的把地夺过来。收西瓜时，老汉想自己白辛苦一场气病了，想吃块瓜，他儿子来求给两个。我父亲破口大骂：“瓜是白洋买来的，要吃拿钱来！”他儿子气不过到地里拿了4个瓜，被我叔父抓住送到村公所，罚了8块白洋。崔老汉把家里东西卖了净光才交上钱，病更重了，无钱治病又没粮吃，托人到我家借了1石粮，利滚利变成11石，把所有的地和零碎东西都算给我家还不够。这就是老财剥削穷人的铁证！

来自地主家庭内部的揭露成为诉苦教育的一个有力形式。

对于“命运说”，来自晋绥解放区的新战士用土地改革的翻身事实给予了有力驳斥：“过去我吃糠受苦，一天挣不了半碗米，土改后分了20垧地一头牛，生活有了保障，从前是我，现在也是我，这是命吗？”

这话最有说服力，也引起广大指战员对土地改革的极大兴趣。大家详细询问土改情况，逐条学习《土地法大纲》，满怀希望地说：“土地改革好，分了地我们穷人就能活了。”

搞通剥削关系之后，我们把“挖苦根”与“拔蒋根”紧密结合，引导指战员把个人和家庭苦难遭遇与整个阶级的苦难命运联系起来，与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联系起来。

我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启发大家在深度和广度上做进一步的思考：你是四川人，他是河南人，为什么都是一样的苦？山西的老财、陕西的地主，为什么都是一样的黑？穷人为什么有理打不赢官司？共产党领导穷人斗地主、

分田地、过和平的日子，国民党为什么不让？蒋介石为什么发动内战打我们？

经过大讨论和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大家对这一连串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你的苦，我的苦，他的苦，都是咱劳苦阶级的苦，天下穷人是一家；山西的老财、陕西的地主，都是剥削穷人才富的，天下老鸦一般黑；国民党的官府是为地主阶级说话办事的，国民党的军队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就是他们的总头子，剥削制度是总根子；我们共产党、解放军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战斗的；我们只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才能过上好日子。

广大基层指战员弄懂了这么一篇大道理，把朴素的痛苦感受升为理性的阶级觉悟，把个人的仇恨上升到阶级的仇恨，打掉了对蒋介石的一切幻想，树立起为土地而战、为人民而战的思想。同志们自觉地喊出：

“苦从何处来，仇就向何处报！”

“打倒蒋介石，土地回老家！”

三查整顿

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目的是纯洁组织，整顿思想，增强斗志。

诉苦教育深入进行了一段之后，纵队党委认为：经过诉苦教育广大指战员已经发动起来，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已经大体搞清，敌我界线比较分明，阶级觉悟充分提高，群众自觉提出了进一步检查阶级成份、思想立场、战斗意志及作风、纪律的要求，普遍开展三查的条件已经成熟。

纵队党委向部队下达了转入三查的指示，要求各单位在上一阶段诉苦教育取得很大成绩的基础上，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普遍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群众性运动。我们号召全体干部、党员和每个同志，自觉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及阶级出身。有缺点错误不要紧，认真检查，立即改正。

从1947年12月下旬至1948年1月5日，全纵队普遍开展了三查整顿。

三查中，我们继续发扬诉苦时形成的群众性自我教育的气氛，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普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放手让群众去讨论。同时这种民主又是有领导、有秩序的。根据群众要求，纵队党委批准各连队、机关部门和直属单位由军人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三查委员会”，作为临时机构，在支部和党委领导下组织本单位的三查，研究并提出处理各种问题、各种人的意见，报纵队党委把关。

三查首先是查阶级。

在诉苦教育中，通过对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辩论，各单位都发现了出身剥削阶级而又坚持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人，因此三查初始就涉及到对每个人阶级成分的检查。

独1旅2团7连有个排长叫侯玉柱，他在讨论剥削关系时公然说：“你们说地主剥削人，那么八路军拉人当兵、打榆林要老百姓送粮送草，都是剥削。”他的这套歪理从全排全连一直争辩到全营大会。后来党组织发动群众展开说理斗争，米脂籍新战士用亲身经历予以驳斥：“胡宗南进攻边区，烧杀掠抢，奸淫妇女，我是为了保卫边区自愿参军的。打榆林送粮草，是米脂老百姓自觉自愿的。”

侯玉柱仍然固持己见。群众起来追问他是什么阶级成份？他讲家里有

120 亩地，哥哥是土匪，父亲是恶霸，本人不务正业。又问他为什么参军？他说因赌博输了钱。继续追问他在部队干了什么坏事？他交代在佳县准备拖枪叛变，在米脂强奸一个小女孩，还曾打骂老百姓，贪污大烟百两。最后追问他为什么讲这套歪理？他说对分配土地不满意。群众非常激愤，当场把他捆起来。他在关禁闭时打死哨兵要跑，被发觉后钻进一间屋里对抗，往外扔手榴弹，被击伤后才逮捕起来。

侯玉柱这类异己分子在各旅团都有发现。对阶级成分的审查，清理出一批不纯者：有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人，有混入我军阴谋破坏的奸细，有恶习不改的兵痞。这种审查是必要的，纯洁了我军的队伍，纯洁了党的组织。

在审查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向，如过分看重成份和出身，发生捆绑打骂行为，个别单位在群情激愤之下甚至打死了人。我们从各旅团的报告中及时发现这些偏向，纵队党委立即通报各级党组织，要求坚决制止并纠正过火行为，提出查阶级要把重点放在认真检查阶级立场上来，不论你是什么阶级出身的人，关键是检查自己的立场对不对头。这样，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整个三查的重点是查思想、查斗志。

由于有诉苦和查阶级作为基础，检查起来也就顺理成章：

你是贫苦阶级出身也好，剥削阶级出身也好，在你头脑中有哪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解放战争的性质是不是明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幻想是不是打掉了，对于土地改革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拥护？在以往的战斗中，你的战斗意志坚决不坚决，有没有厌战情绪？你对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坚定不坚定，有没有悲观情绪，你打仗勇敢不勇敢，有没有贪生怕死的行为？你对战友团结不团结，有没有打骂行为？你对人民爱护不爱护，有没有违犯政策纪律？

这实际上是对每个人、对整个部队的一次全面检查，既检查思想和斗志，也检查工作、纪律、作风和团结；既检查战士和基层，也检查干部和机关。先由个人作自我检查，然后由大家进行评议，表扬好的，批评差的。

原来一些出身很苦但表现消极的人，特别是那些刚刚从国民党军解放入伍而思想没有真正转变过来的人，检讨

了过去的错误，悔恨得痛哭流涕。同志们也批评他：“你家那么苦，你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打敌人！”这些人受到很大震动，发誓一定要洗心革面，当个好兵。

358 旅 714 团 2 营 4 连有个战士叫路新理，原是胡宗南部 167 旅的，从蟠龙战役中解放入伍。他初到我军时怪话连篇。行军走山路，他就说：“钻山沟，走夜路，连比土匪还不如。”发给他一顶帽子，他背着人把帽子甩到地下，用力去踏。发给他津贴费，他把钱票扯掉了。攻打环县时，他看到敌人被我军打垮了，便说：“你拿的是枪，不是木杆，为什么不抵抗就跑了？”经过不断批评教育，他的思想由不愿在我军干转变到“吃谁家饭，给谁家干”，但仍然消极。

在诉苦三查中，他回忆起全家从山东逃荒到山西，后来父亲被老财逼死，弟弟被卖给老财家，自己被国民党军抓了兵。他检讨了自己的消极态度，痛悔万分，在军人大会上，他把手中的枪高高举起，说：“我拿这支枪过去不知道干什么。今天我算明白了，我拿这支枪是干什么的！我没有了家，现在只有报仇，要保卫穷人，为穷人翻身打仗！”从此，他的学习、训练非常积极了。

早在榆林战役总结中，战士们对少数干部的指挥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在三查中战士们又要求对干部做进一步的检查。

纵队党委在关于三查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全体干部、党员都要积极地、自觉地参加这个运动，并在检查之内，不能例外。我们要求：连队干部同战士一起检查，营以上干部参加本单位检查，机关干部先下基层再回机关检查。各类人员在三查这个总题目内检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连队干部主要查战斗意志和带兵作风，机关干部主要查工作态度和思想立场，供给干部主要查经济手续。查出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有官僚主义，不关心下属，对不良现象麻木不仁；有战斗责任心差，执行命令打折扣，打滑头仗；有斗志不强，贪生怕死；有生活腐化，贪污公款；有军阀作风，体罚、打骂战士，持手枪威吓逃兵。

在各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和带动下，战士们打掉顾虑，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大胆批评。被军人大会议面对面批评的有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和旅、纵机关的科长、部长，他们受到很大的触动和教育。各级干部尤其是军政主官也都主动进行检查，认真听取来自部下的批评。

三查中纵队党委部署了对党支部和党员的检查。检查党支部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党员的入党动机是否端正？与群众的联系是否紧密？在战斗和工作中是否起到了带头作用？在党内自查的同时，公布党支部和党员名单发动群众一条一条、一个一个地进行评议。支部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并对每个党员作出结论。对群众意见强烈、确实不合格的分子，根据群众评议和支部会议讨论决定，报上级党委批准后清除出党。

三查比较过去的整风、整训，开展得更加普遍。过去整风主要是党内和干部，整训则主要是战士和基层。这次不同了，不论党内党外、干部战士、连队机关、前方后方、男的女的、子弟兵解放兵、老同志新同志，人人都来检查。

对查出的有问题的人和事，我们按照党的一贯政策，思想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着重于端正思想、改进工作、转变作风。同时在组织处理上区别不同情况，纵队党委做出决定：对确实的特务和有组织的反革命分子，交保卫部门处理；对混入我军且不适合留队的投机分子坚决清洗；对地主出身，过去表现不好，现在对土地改革仍不转变态度的人，调离工作继续学习和教育；对虽然是地主出身但经过严格考验，一贯表现好的人，仍继续原来的工作。

三查不仅仅是查问题，不是一味地查出多少问题、多少坏人坏事就算完事，而是通过“查”这个手段来起到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积极作用。

在三查后期，各单位普遍召开了“团结进步大会”，促团结，促进步，鼓斗志。同时，在连队开展推荐干部、推荐党员的工作。由士兵群众推荐那些在诉苦三查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并且一贯表现出色、有较高政治觉悟、有较强组织指挥能力的同志担任干部，由支部讨论提出任职建议，再由旅、纵党委批准后正式任命。推荐党员则采取自己申请和群众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后报上级党委批准。

从群众中推荐出来的新干部、新党员，觉悟高，斗志强，有威信，能打仗。推荐工作使我纵因战斗减员而严重缺额的基层干部队伍和党组织得到迅速的大量的补充，使干部、党员普遍受到一次民主评议，也使各级党组织又多了一条考察与选拔干部、吸收党员的有效途径。

大练兵

1948年1月，正当三查进行中间，西北野战军在党中央驻地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有团以上干部参加的首次前委扩大会议，贺炳炎和我带领各旅团的军政主官从清涧赶到杨家沟参加会议。

在这之前，党中央于1947年12月间在杨家沟召开了会议。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就是根据中央12月会议精神并在中央领导同志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会上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主席在报告中再次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达到了一个转折点”的著名论断，并进一步揭示“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主席还总结解放战争一年半来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前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副主席给我们作了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任弼时同志作了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前委书记彭德怀做了《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总结了西北野战军从延安保卫战到二打榆林、从内线防御到内线进攻作战的经验教训。

前委扩大会议围绕这几个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西北野战军将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打到蒋管区的两个基本任务：一是大量消灭敌人，二是建立根据地，并规定了我军在新区的各项政策。

会议期间，前委组织交流了各纵各旅冬季整训的情况。358旅政治委员余秋里汇报了该旅诉苦三查的典型经验，独1旅副政治委员颜金生汇报了该旅从解决剥削关系入手进行阶级教育的经验，我代表纵队党委汇报了1纵开展诉苦三查的基本情况。

我首先汇报了整训开始前部队存在的问题：阶级意识比较模糊，阶级立场不对头，战斗意志不强，纵队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等等。接着汇报了我们是如何从诉苦、挖穷根入手开展阶级教育的，如何经过酝酿、座谈发动群众掀起诉苦高潮的；汇报了在讨论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中出现的各种争论、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汇报了是如何进行三查的，以及检查出来的坏人坏事；汇报了部队正在出现的新气象、新面貌。

毛主席、周副主席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不时地插话，询问详细情况，热情肯定诉苦三查的做法，对有关问题作了指示。

当听到占连队成分80%的解放兵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时，毛主席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409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毛主席还把余秋里找去专门听了358旅的情况汇报，又在独1旅政治部《关于9天阶级教育主要经验总结》的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

周恩来副主席肯定说：“放手发动群众、高度发扬民主的诉苦三查运动是有成绩的，是整军与土改结合起来的一种群众性的政治工作，应该受到称赞。”同时，他又以一贯严谨的态度把汇报中没有完全解决好的一些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深入讨论，提醒我们“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研究不好的一面”。

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在今后的外线进攻作战中，“我军政治工作必须采用新方式”，“发动解放兵自动诉苦，子弟兵讲过去痛苦及翻身情形，老战士讲人民解放军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为什么要遵守群众纪律，反复展开讨

论，有计划地经常社会调查，做群众工作，分析阶级（搞通剥削关系），这些都是士兵群众提高阶级觉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办法。”“此次诉苦与三查运动，得到了不少的收获。……今后各纵队，均应继续普及与深入这一运动。”

对于我纵开展的诉苦三查，野战军前委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在给党中央《关于1947年冬季整军运动报告》中，引述了我纵一些连队和个人的事例，评价说：“I纵队诉苦与三查运动，做得比较普遍与深入，从上至下，司政供卫各部门到连队所有人员均无例外地参加了这一运动。”

党中央和野战军前委对诉苦三查所作的指示，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也使我们的认识深化了。如果说前一阶段我纵的诉苦三查是自发地搞起来的话，那么前委扩大会议后，做得就更加自觉了。

回到清涧驻地，我们进一步检查诉苦三查的情况，使之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

同时，我们逐级在部队中传达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和野战军前委的决议，认清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有利形势，明确外线作战的伟大任务，把诉苦三查运动适时地转入练兵阶段，在全纵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大练兵热潮。

指战员们诉苦诉出了深仇大恨，三查查出了高昂斗志，学习党中央、野战军前委“向国民党统治区出击”的号令鼓起杀敌立功的强烈愿望。这三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空前高涨的大练兵热潮。

当时正值三九天，冰天雪地，气候寒冷，每个人心里却燃烧着一团火，起床号没吹就进了训练场，熄灯号吹过了还不回来，有病的也不停练。连队干部不断向我们发“牢骚”说：“以前是从屋里催促到操场，现在从操场往屋里拉；以前是下命令练兵，现在下命令休息。拉都拉不回来，下命令也不管用！”

我纵358旅、独1旅的练兵是有传统的。早在1943年驻防陕甘宁边区时，部队中就开展过轰轰烈烈的练兵运动，涌现出众多“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358旅创造的“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练兵经验被中央军委、毛主席批转全军推广。这一次358旅又创造了诉苦三查的经验，为我军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再做贡献。部队发扬老传统，注入新经验，带着阶级仇恨练兵，越练劲越足。

在大练兵中，基层指战员着重训练进攻作战的各种技术、战术，纵队和旅团干部着重学习毛主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总结以往经验，提高指挥能力。整个纵队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求战情绪空前高潮。

各单位纷纷召开动员会、誓师会，踊跃请战，许多人刺破手指写了血书，714团2营6连的请战书上写着全连有多少亲人被逼死，多少人被捆打，多少人被抓壮丁，多少人坐过国民党官府的牢房。部队中到处回响着这样的口号：“血债要由血来还，消灭蒋军报仇冤！”

一些连队为死难的亲人和牺牲的烈士举行“公祭大会”，进行“灵前宣誓”。练兵场上搭起灵台，挂起挽联，摆上两块大灵牌，上书：“旧社会折磨死的爹娘兄弟姊妹之灵位”、“为人民翻身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之英灵”。在这两块大灵牌下，摆上个人做的小灵牌，有祭父母兄弟的、有祭战友同志的。同志们流着热泪祭奠，高举铁拳宣誓。

有的同志面对亲人灵牌哭着说：“你们死得太可怜了。现在我们手里有了枪杆子，我要为你们报仇！”

有的跪在亲人灵牌前，说：“你们死了以后，我被蒋介石抓了兵，打咱穷人的队伍。今天我已明白了，我有罪，向你们请罪。现在我到了人民军队里，我要为你们立功！”

有的祭罢亲人，转身向全连敬个礼，说：“我要求同志们帮我报仇！”全连同志则一齐高呼为某某的亲人报仇。

家在蒋管区的同志表示：“打回老家去，消灭地主老财，消灭蒋介石！”来自解放区的同志表示：“打到蒋管区去，帮助那里的穷人翻身，不消灭蒋介石不回家！”各单位纷纷向纵队提出：“我们要求上级赶快下令打出去。早打出去一天，蒋管区的穷人就早翻身一天，少受一天罪。”

1948年春节前后，我纵各团相继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为转战陕北以来的战斗功臣隆重庆功，为出击蒋管区誓师。各单位争着要求“打头阵，立第一功！”战士们自动联名给各级首长写信求战，很多战士还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总表达自己的决心。

我们一面把部队的求战情绪报告给野战军前委和中央领导，一面引导部队深入讨论：怎样才能完成打到蒋管区去的任务，怎样才能打胜仗？

全纵队从上到下、从单位到个人进一步学习新区政策，普遍制订杀敌立功计划和公约，加紧战前练兵，保证完成党中央、野战军前委赋予我们的战斗任务，为即将开始的外线进攻做好了充分的思想、组织、战术、技术等各方面准备。

新的启示

历史已经证明，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群众性思想教育运动，是我军政治工作和民主生活的重要发展。

它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使之自觉地担负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任务；它出色地解决了解放兵的消化、改造问题，使之从被迫替国民党反动派卖命的炮灰迅速转变成自觉为人民解放而战的人民战士；

它全面增强了军内军外的团结，使子弟兵与解放兵、老战士与新战士以及官兵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原来存在的某些隔阂，被阶级友爱代替了；

它空前地激发了广大指战员杀敌立功的热情，使之掀起了大练兵的热潮；

它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纪律上、军事训练上全面加强了部队的建设，使之在外线作战中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总之，诉苦三查使整个部队和每个同志的面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焕然一新。正如毛主席所说：“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诉苦三查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效果，并作为我军政治工作一次成功的实践载入了史册，给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军政指挥员许多重要的启示。我的感受是：

首要的一条，思想教育必须着眼于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

毛主席和彭总都在他们的一些讲话和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诉苦三查的

根本经验。毛主席说，由于诉苦和三查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为完成土地改革，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而战的觉悟，大大增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彭总在给中央军委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三查（有四查五查者）运动前的思想准备，就是普遍发动挖穷根与彻底挖蒋根。挖穷根的目的就是在思想上解决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打倒地主富农思想与立场、建立明确的为土地而战的意志。挖蒋根的目的就是要清洗对蒋介石的一切幻想，建立彻底打倒蒋介石的思想。在上述思想准备基础上再行转入三查运动，以达到纯洁思想、纯洁组织之目的。”诉苦三查之所以能够解决问题，取得成功，根本的原因就是毛主席和彭总共同指出的它为解决问题首先奠定了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提高指战员的“觉悟性”。我们在诉苦三查中，正是从阶级教育入手，抓住剥削与被剥削这个根本的阶级关系，抓住“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个根本的历史任务，抓住“为谁当兵、为谁打仗”这个根本的认识问题，一步一步地从根本上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从而为有效地解决部队中存在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团结等诸多问题打下了基础，收到水到渠成、吹糠见米之效果。设想一下，当时的整军运动，如果不抓阶级教育，不注意从根本上去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而是忙于就事论事地解决具体问题，那么，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要解决部队中的种种问题——用彭总的话讲叫“庞杂的思想”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思想教育必须着眼于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这是诉苦三查所给予我的一个首要启示。

思想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实实在在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是诉苦三查给我的启示之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的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同时实行土地改革。它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有效地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切实解决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当时实际情况表明，只有实实在在地解决存在的问题，部队才能胜利地担负起新的历史任务。这对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任何脱离实际、回避矛盾、不求实效的做法都会危害部队，危害革命。

诉苦三查，从它的产生来看，正是适应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实际需要和部队的实际情况，紧密联系部队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从它的目的来看，对于部队提高觉悟解决问题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诉苦是为解决问题打基础，三查是为着直接解决问题，二者都是有的放矢，互为联系，没有搞“空对空”、“两张皮”。从它实施的方法步骤和要求来看，始终注意从各单位和每个人的实际出发，不图形式，不走过场，采用的做法不强求一致，各自根据实际情况去创造；解决问题不做硬性规定，各自结合自己的问题去确定，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从它实施的组织领导看，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体察群众情绪，集中群众智慧，及时将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再回到群众中去指导实际工作，使之步步引向深入，落到实处。同时，始终注意通过大量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和周密的组织工作，使人人都受到教育，得到提高。因此，诉苦三查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思想教育必须以群众性的自我教育为主，这是诉苦三查给我的启示之三。

诉苦三查的一个本质特点在于它是一场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诉苦三

查的产生就是出自群众的创造，在教育中也严格贯彻了群众路线，领导者预先不划框子，不定调子，而是让群众自己讨论问题，自己明辨是非，自己教育自己。人人都当教育者，人人又都受教育。运动中的典型都是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的，又带动了运动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在诉苦三查中，广大指战员真正成为搞好这场教育的主体。

诉苦三查给我的启示之四是思想教育必须充分发扬民主。

有领导有秩序地实施民主，是诉苦三查获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彭总称，诉苦三查是“我军首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毛主席讲，诉苦三查使得我军“完全有领导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在诉苦三查中，正因为贯彻了充分发扬民主的原则，因而，使得积极因素得到了调动，消极因素得到了克服；正气得到了发扬，邪气得到了打击；优点得到了坚持，错误得到了修正。采用这种有领导、有秩序地发扬民主的方法进行整军，不仅对我军民主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极大地焕发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诉苦三查给我的启示之五是思想教育既要继承过去的优良传统，又要根据新的情况，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彭总反复讲过，新式整军运动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坚持和继续，不能把我们说成是新式整军的创造者。“我们应该从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只是给新式整军运动充实和增加了内容。”彭总的这些话是十分正确的。从阶级教育入手提高政治觉悟，是从红军时期就创造出来的经验，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做法。诉苦三查，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又根据解放战争的新形势和部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赋予它新的内容和形式，从而使我军政治工作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和作用。这说明，在思想教育中，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十四章

扬威西北战场

1948年，西北野战军展开了一场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进攻。

尽管在西北战场上仍然处于敌大我小、兵力悬殊的情况，但是我军坚决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战略任务，正确运用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抓住一切有利战机，主动向数倍于我的敌军发起进攻，从宜川、瓦子街战役首战告捷开始，连续给敌以重大打击，大量歼灭了其有生力量，迅速扩大了解放区。我军在一系列外线出击中越战越强，在一个接一个的战役胜利中发展壮大，迎来了西北解放战争的最后决战。

宜瓦大捷

1948年初春，西北野战军经过了为期两个月的以诉苦、三查、练兵为主要内容的冬季整军，面貌一新，斗志昂扬，开始了外线的战略进攻作战。

春节前，野司来电要1纵去参加作战会议。我们带着全纵指战员的求战决心，快马加鞭赶到米脂县吕家沟的野司驻地。

西北野战军要打出去，举行外线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个战略方针是1月间前委扩大会议上已经确定了的。首先打向哪里呢，我们在组织部队讨论“打出去”的具体方向时，指战员们提出过三种建议：

一是北上三打榆林邓宝珊。这样可以出二出两打榆林受挫的气，拔掉边区北方这颗孤立、顽固的钉子，但榆林城坚固难攻，短时间难以拿下，得手后又因地处沙漠难以发展。

二是西进陇东、三边打马。这样可以利用胡马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但路远缺粮，以我步兵打马骑兵难以歼灭，且对胡宗南主力没有消耗。

三是收复延安。这样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但敌重兵固守，我伤亡必大。

在作战会议上，彭总引导我们分析了上述三种方案的不足：这些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打出去”，只是在边沿上打转转，达不到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大量消灭敌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彭总宣布：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西北野战军将要南下陕中，进军黄龙山区，配合中原的陈赓兵团打击胡宗南主力。作为“打出去”的第一步是发动宜川战役，“围城打援”，以一部兵力包围宜川城诱使刘勘率部增援，我军以主力设伏，歼敌于运动之中。

刘勘是胡宗南的整编第29军军长，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敌主力之一。在陕北作战中，他连吃败仗，胆小怯阵，受到胡宗南的训斥，现驻守延安、洛川、宜君、黄陵、宜川等地。

我军围攻宜川，刘勘主力会不会来增援呢？我们都有些担心。

彭总胸有成竹地分析道：刘勘没有多少行动自由，他的命运操在胡宗南手里。上次增援榆林，刘勘已经因畏缩不前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胡宗南给他记着一笔帐呢。我军只要把宜川打得紧，胡宗南就会下死命令叫刘勘增援，他就不敢不来，一定会乖乖钻进我军布下的圈套。

野司作战会议结束后，我们迅速向部队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彭总的战役指示，进行了战前动员。

春节一过，西北野战军即挥师南下，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

2月22日至24日，第3、第6纵队完成了对宜川守敌整编第24旅的包围。而后，野司在3纵司令部再次召开作战会议。

彭总指出：据各方面情况判断，胡宗南一定会派兵增援，刘勘这家伙走瓦子街至宜川的可能性大，我军按此方案部署。刘勘援兵一出动，围城部队就视其快慢而动，急来慢打，慢来急打，诱其上钩；打援部队要封死口袋，坚决顶住，决不让一个敌人跑掉。

彭总强调，要有最大的决心和毅力，有坚强的战斗意志，攻击发出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决拿下来。他还特别指出，各部队要有战役全局，只要对战役发展有利就要主动去干，不能延误战机。这是西北野战军最大的一次战役，胜利了就会改变整个西北战场敌我对比形势，为解放大西北创造条件，延安的敌人也就成了瓮中之鳖，指日可下。

宜川被围后，胡宗南即令刘勘率整编第27师、第90师四个旅八个团的兵力沿洛川至宜川公路经瓦子街轻装驰援。

围城部队向宜川外围发动猛攻，拿下太子山、外七郎山等要点，拔掉宜川城的西北屏障，急得敌旅长张汉初在报话机里向刘勘连连哭救。胡宗南下了死命令，逼得刘勘率部乖乖进入瓦子街以东地区，力图当天赶到宜川。

野司命令3、6纵队各一个旅继续围城，另两个旅自东向西阻敌援军，1纵断敌后路并自西向东攻击，4纵和2纵分从北面、南面夹击。

28日下午天气骤变，开始是细雨纷纷，后来是雨雪交加，入夜则是鹅毛大雪漫天飞扬。

我纵以独1旅为先头，尾追敌后，沿公路自西向东，向瓦子街攻击前进。在恶劣的天气中，我们身上的棉衣先是被雨雪打湿了，后来又被冻成冰铠甲，部队全然不顾，一脚泥水一脚雪，按时赶到瓦子街。

29日拂晓6时，担任前卫的独1旅3团全歼敌90师搜索连，攻占瓦子街，并迅速向南北两山攻击，切断了敌军后退之路，扎住了“口袋口”。

随后，纵队指挥所也来到瓦子街。我们得知从河东赶来参战的2纵因距离较远，雪路难行，尚未占领瓦子街南面高地，而敌主力正向该地集结，如不迅速堵住这个缺口，敌人就有可能从那里逃窜。

贺炳炎司令员和我商量了一下，立即改变原定全纵均在公路以北作战的部署，以公路为界：独1旅在北山、358旅在南山，由西向东全力攻击。我们要358旅派一个团接替独1旅1团3营向瓦子街东南高地攻击，堵住敌军南逃去路。

358旅考虑到兵力状况，提出，该旅三个团，已有一个团向洛川警戒敌后续部队，一个团留作纵队的预备队，再拿一个团出去，手里就没兵了。

358旅确实有困难。但是，为了保证整个战役全局的胜利，我们坚持要求该旅拿一个团出来。

358旅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坚决执行命令，派出714团及715团一个营去执行这个任务。

714团在不久前的诉苦三查中搞得最早最扎实，在这次瓦子街战斗中又打得最苦最顽强。该团在任世鸿团长率领下连续夺取了南山数个阵地，堵住了敌军的南逃去路。他们那里是敌29军和90师指挥部所在地，是敌突围的

主要突破口。敌军不惜血本，向 714 团占领的阵地发动一次次冲锋，战斗进行得相当残酷。

714 团团长任世鸿牺牲了，参谋长武治安牺牲了，政委徐文礼、副团长薛常义负伤了。

该团第 2 营教导员夏伟在营长不在位、副营长陈占彪牺牲的情况下指挥全营作战，身负重伤。

2 营第 6 连 140 多人打得只剩下十来个人仍在顽强战斗，像一块啃不动、砸不烂的硬骨头牢牢地守在阵地上。6 连的这种“硬骨头”精神后来名扬全军。

6 连第 2 班班长刘四虎是诉苦三查中涌现出来的子弟兵典型，他以一把刺刀与十几个敌兵展开白刃格斗，连接刺倒七个敌兵，威震敌胆，他自己也被敌人捅了 11 刀，昏倒在战壕里，后被增援的同志救出。

714 团 4 连解放战士路新理英勇杀敌，冲锋在前，用自己的鲜血实践了“为亲人报仇”的誓言。

在北山与敌争夺的独 1 旅同样打得勇猛顽强。

全纵队不只是一两个单位、一两个人表现勇敢，而是所有单位、所有的人。不管是老兵新兵，子弟兵解放兵，干部战士，可以说没有一个畏缩不前的，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一边打一边高呼口号：“为牺牲烈士报仇！”“为死难亲人报仇！”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血战。敌我双方反复争夺每一个山头阵地，多达 20 余次，直到白刃格斗，撕杀肉搏。

下午，第 2 纵队赶到瓦子街南面，投入战斗。北面，独 1 旅也与左翼第 4 纵队沟通联系。我军各部队密切协同，把敌军压在瓦子街以东的山沟里。

入夜，北风呼啸，大雪下个不停，我军露宿在山上梢林中，准备最后的进攻。

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打电话到 1 纵指挥所，向我询问白天的战斗情况，下达了明日拂晓总攻的命令。而后，彭总关切地问：“雪下得这么大，会不会影响部队的行动？注意叫大家多活动，不要冻伤了。”

我报告了部队的情况，说：“请彭总放心，雪下得越大越好啊！”

我在雪中一棵白桦树上用匕首刻下了一行顺口溜：“冒雪穿梢林，为的是人民。打死刘勘，活捉严明！……”

3 月 1 日拂晓，雪住天晴，我军各部队向龟缩在山沟里的敌军发起总攻。2 纵由南向北，4 纵由北向南，6 纵、3 纵各一部由东向西，我纵沿瓦子街公路和甫北两山自西向东攻击。独 1 旅夺取了北面的元宝山，358 旅扫清了南山，而后向敌密集的地方冲击，直捣敌军、师指挥部。到下午 5 时，瓦子街战斗胜利结束，援敌全部被歼。敌 29 军中将军长刘勘在漫山遍野的口号声中丧魂落魄，绝望之际用手榴弹自毙。敌 90 师师长严明在逃跑中被击毙。刘勘的笔记本、严明的手枪均被我纵战士缴获。敌 27 师师长王应尊也被活捉，后混在俘虏群中乘隙跑掉了。两年后王应尊在四川德明县与裴昌会等一同起义，回到人民一边。全国解放后，我在北京张宗逊同志那里碰到王应尊，谈起瓦子街战斗，他笑着说：“哎呀，那时我不应该跑啊！”

瓦子街战后第 2 天，围攻宜川部队也发起总攻，到 3 日上午全歼城内守敌一个旅，活捉旅长张汉初。至此，宜川、瓦子街战役胜利结束，全歼敌一个军部、二个师部、五个旅近 3 万人，取得了战略进攻的第一个大胜利，也

是西北战场上空前伟大的胜利。

我纵共毙伤俘敌 11177 名，缴获火炮 43 门、轻重机枪 410 挺，其它枪 3337 支。指战员们以空前高涨的战斗意志，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灵活机断的组织指挥，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野战军首长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张德生联名给我纵队发来嘉勉电：

“贺司令员廖政委转 1 纵全体指战员同志：你们为完成任务，歼灭敌人，不顾严寒大雪，按时迂回敌后，与敌反复肉搏，此种不怕牺牲、不怕饥饿、不怕寒冷、坚决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你们为人民事业的高度觉悟，是值得全军学习的。希望你们虚心学习，继续奋斗，消灭蒋胡匪，解放大西北！祝贺你们的胜利！”

毛泽东主席在瓦子街战斗结束后的 3 月 2 日签发了党中央的贺电。几天后，毛主席又以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名义发表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热情称赞：“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到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宜瓦战后，野司召集各纵负责干部在宜川城外山上的一座小屋里，进行战斗总结。谈到胜利的取得，我们无不感到有这样几个重要原因：

一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战役决策英明正确，野战军前委和彭总的战役部署得当。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自觉性，提高了贯彻十大军事原则的自觉性。

二是前方指挥员坚决、灵活的指挥。首先是彭总和野战军首长指挥得好。其次，从纵队、旅、团到营、连、排、班，都能够坚决执行上级的总意图，机智灵活地指挥部队努力保证战役全局的胜利，表现出高度负责和主动精神，同时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牺牲在前。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广大基层指战员经过诉苦三查的新式整军运动焕发出高昂的战斗意志和强大的战斗力。因而能够自觉战斗，不怕牺牲，万众一心，群威群胆，攻如猛虎，守如泰山，无往而不胜。

出击西府陇东

继宜瓦大捷之后，西北野战军乘胜向南出击黄龙山区，我纵解放宜君、黄陵两城，兄弟部队解放白水等地。而后野司一面以 3、6 纵队围攻洛川，一面以主力就地发动群众建设黄龙山新解放区，并准备打援。

3 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率领的中央机构从米脂县杨家沟出发离开陕北，东渡黄河，经晋绥前往河北阜平县西柏坡，与少奇同志、朱总司令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

一年前我纵奉命最后撤出延安，我们总想有那么一天能亲手收复延安，请党中央、毛主席再回延安，但党中央领导不等延安收复在即，就向华北进发了，这表明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迅速，党中央、毛主席要到靠近平津大城市的地方去指挥全国解放区军民夺取最后的胜利。

西北野战军原准备围洛打援。但增援洛川的敌裴昌会兵团害怕重蹈刘勘援宜全军覆没的复辙，磨磨蹭蹭，每天只走几公里，后又按兵不动。

4 月 14 日，彭总在马栏镇野司驻地召集各纵各旅干部开会，决定在攻洛

一时难下、打援不成、粮食困难的情况下，直捣胡宗南战略后方，出击西府地区，攻敌要害宝鸡，调退延安、洛川守敌，巩固我后方和黄龙新区，建立麟游山根据地。

4月16日，野战军留下第3纵队继续围困洛川，监视延安，主力分三路出击西府地区。

我纵为中路，直插宝鸡。17日解放旬邑城；18日强渡泾河攻打彬县城，俘敌少将指挥官赵漳和陕西7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乔维森以下1685名；22日解放麟游城；23日解放凤翔城；24日抵近宝鸡城西的千阳河畔。其他两路部队也夺取了永寿、长武、扶风、灵台、岐山、眉县。我军出击西府，迫使蒋介石、胡宗南不得不放弃延安。

4月21日，3纵收复被敌侵占1年1月又3天的延安城。喜讯传来，军心大振。仅仅年把时光，西北战局就发生了如此根本性的变化。去年胡宗南气势汹汹进攻我党中央所在地，如今我军浩浩荡荡直捣其战略后方。

宝鸡是胡宗南的后方补给基地，由整编第76师师长徐保率师部及工兵营、特务营、144旅新编40团以及保安21团共2000余人驻守。徐保原是28旅旅长，我军第一次打榆林时他率部保榆有功得到胡宗南的奖赏，76师师长廖昂在清涧被俘后，他升任师长。这次我军打宝鸡，他幻想再立一功。

胡宗南为了保住后方补给基地，一面严令徐保坚守宝鸡，一面催促裴昌会兵团和青海军阀马步芳第82师从东西两路驰援，企图夹击我军在渭河与千阳河之间的狭小地区。

野司命令1纵与2纵攻打宝鸡，6纵、4纵进行机动防御，我军攻打宝鸡部署完成后，敌情突变，胡马两路援军一改过去的迟疑不前，积极、快速地向宝鸡逼进，与阻援部队展开战斗。

4月25日晚，彭总给1纵打来电话，找我征求意见：“你看还打不打宝鸡？”

我向彭总报告：“先头部队358旅下午就出发了，已经渡过了千阳河，到达攻击位置，为什么不打呢？打吧！”

26日拂晓，我纵从西北西面协同东面2纵向宝鸡发起攻击，独1旅以2团为先头从西门突入城内，358旅以716团为先头攻占飞机场后从北山冲进市区。午后，我军已经占领城内大部，并向徐保的最后据点发动猛攻。

徐保把他的指挥所设在火车站内的铁甲列车上。尽管大势已去，但他仍然凭借着坚甲利炮进行顽抗，打得非常凶。我军攻了多次，最后终于把铁甲列车击穿。战士们冲进去，把负重伤的徐保抓住，用担架抬到我纵指挥所。第2天徐保伤重毙命，贺炳炎司令员叫人把他埋到宝鸡的后山上。

徐保毙命的消息传到省城西安，有人联系到20多天前刘勘在瓦子街毙命，写成了一幅对联：

刘勘勘内乱内乱未勘身先死，
徐保保宝鸡宝鸡不保人已亡。

此联一出，立刻传遍西北大地，也在敌我两军中流传一时。

我军攻克宝鸡后，胡马两路援军已相继突破阻援部队的拦阻，尤其是裴昌会率领的约10个旅已经逼近凤翔，使宝鸡城内的我军背水背敌，形势急转直下。27日晚，彭总命令我纵迅速收拢部队，炸毁敌军事设施，连夜撤离宝鸡。

宝鸡不愧是胡宗南的后方补给基地。我纵缴获了整窑洞、整车皮、整仓

库的武器装备及粮食、布匹，称之为“堆积如山”也毫不为过。可是撤退的时间实在太仓促了，这么多宝贵的物资一下子搬不走，实在叫人叹惜。

我们打开粮仓布库向正处于饥寒交迫的老百姓发放成袋的面粉、成捆的布匹，能扛走多少算多少。全纵队的骡马都以最大驮载量满载着枪炮、弹药。贺炳炎司令员向部队下了一道命令：“全纵每人背上一捆卡叽布或一发炮弹。”这都是我们最缺的。有了这些布，不但可以解决我纵的夏衣，连今年的冬衣都有了。炮弹更不用说了，我军的炮本来就少，一门炮还没有几发炮弹，攻城时主要靠人往上送炸药包，有了这些炮弹可以少牺牲一些同志啊。实在搬不走的物资，我们只好把它连同军火仓库、兵工厂一起炸掉。

在一声声巨响中，胡宗南的补给基地化为灰烟。

我纵于4月28日全部撤出宝鸡，29日进占千阳城，30日到达陇县高岩镇，奉彭总命令休息了一天，整理携带的大量军用物资。而后，我纵继续随野战军主力北上，准备收复陇东地区。

5月5日，野战军先头6纵教导旅走到镇原东边的屯子镇，遭到青马整编第82师步骑兵的包围。彭总命令1、4纵队于6日赶到屯子镇救援，以内外配合消灭青马82师。

我纵按独1旅、纵队部、358旅的行军顺序向屯子镇开进。

独1旅进至屯子镇西南20公里处遭到敌军多架飞机袭扰，部队就地隐蔽，停止行进，在原地耽搁了几小时。后卫358旅则被从泾川北进的胡敌整编65师隔断。

贺炳炎和我派侦察科长刘英到前边了解屯子镇的情况，但他去了约半个小时仍不见回来，我们又派参谋长陈外欧前去，也不见回来。事后得知，侦察科长刘英和参谋长陈外欧到屯子镇后了解到敌我态势已经发生变化，原为敌军包围我军，现为我军包围了敌军，因此两人没再返回。我纵独、旅到屯子镇后，即协同6纵新4旅向包围教导旅的马家军进行反包围，内外夹攻。

6日晚，教导旅从屯子镇撤走了。7日晨，被隔断的358旅击退敌65师赶来与纵队主力会合。这时大批胡军已相继逼近，与马家军形成合击我军的态势，野司命令各纵交替掩护向东转移。彭总率野司随我纵一起行动。

我们走到屯子镇与肖金镇之间的南庄李家，彭总发现应在这里担任警戒的部队先行撤走了。这时马家军的一个骑兵团和一个保安团与先头6纵新4旅遭遇，挡住了东撤之路，屯子镇的敌军又从身后紧追上来，胡敌也围拢上来，野司和我纵陷入敌包围之中。

我立即命令独1旅副政委颜金生带第3团和第1团各一营占领警戒位置，掩护部队通过。主力护卫野司坚决向东突围，连夜通过了2纵与敌36师激战竟日的荔镇。

8日我军击溃尾追的马家骑兵，向东南疾走。11日进入陕西黄陵县境内，又与胡敌36师123旅遭遇，独1旅3团和358旅716团一个营将敌击溃。12日进至关中分区的马栏、石底镇，方才彻底摆脱追兵。15日转入休整。

我纵在出击西府、陇东行动中毙伤俘敌7076名，攻克宝鸡，缴获大量的军用物资，但在仓促向东转移中丢了不少，实在可惜。

有威可畏 有德可怀

5月下旬，在洛川县上基镇野司驻地，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二次扩

大会议。前委书记彭德怀主持会议，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王维舟、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等领导同志也从收复后的延安赶来。各纵队司令、旅长和政委们都参加了会议。

这次扩大会议的议题是总结自第一次扩大会议以来进行春季攻势特别是刚刚结束的西府战役的情况，会议连续开了8天，开得相当严肃。与会同志对西府、陇东战役的成败得失及其种种原因，畅所欲言，议论纷纷。彭总做了报告和总结，贺老总、林主席、习仲勋同志讲了话，各纵各旅的干部都汇报了本部队的情况，谈出了自己的认识。会议基本统一了大家的思想，着重总结了应当记取的经验教训。

我军由黄龙地区出击西府、攻打宝鸡的方针应该说是正确的，行动也是成功的。在战役的前一阶段，我军攻克12座县城，收复延安，夺取洛川，摧毁宝鸡补给基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但是在后一阶段，我军没有打好，仓促撤出宝鸡，堆积如山的军需物资没能全部带走，6纵教导旅、新4旅先后遭受严重损失，1纵和野司东撤受阻、身陷险境，没能完成收复陇东、三边的预定任务。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多，教训深刻。

首先，是思想上有些骄傲轻敌。

我军出击外线第一仗就取得了宜瓦大捷，胜利后过于乐观，对困难估计不足，以为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可以马上站住脚，可以很快搞起一块根据地，其实不那么容易。

对敌人实力估计不足。没料到胡宗南在其主力连续遭到歼灭性打击后仍能集结起10余个旅的兵力增援宝鸡，没料到敌人在尾迫我军时一改过去的迟缓不前而能全力追踪。

对胡马矛盾估计过头。胡马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有，还不小，但是他们在对付我军上是一致的，这次胡马联手夹击，配合得十分积极。

同时，我军在战役战术的配合协同、敌情我情的及时沟通、部队的纪律作风上，也都存在不少缺点，有的甚至相当严重。

彭总在会上两次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我们在战役指导上犯了若干错误和缺点，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

对部队中暴露的问题，彭总也毫不客气。他严厉地批评有的部队在阻援时不坚决致使野战军主力陷入被动，有的部队在担任警戒时不打招呼就撤走，给敌人钻了空子。彭总发了很大的火。前委扩大会议宣布给某旅旅长撤职处分，要求大家应当把这些问题当作一面镜子来检讨自己，经常警惕。

彭总在会上肯定了“1纵队在西府战役是坚决勇敢迅速的”。同时他也批评了我纵的缺点：一是说5月6日配合6纵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耽搁了时间，行动迟缓；另一个是说5月11日在公和源转移过早，影响了野司的部署调整。

5月11日的情况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我纵开过连以上干部会后，彭总打电话找我，纵队司令部作战科长接电话后报告：“政委已经睡下了。”彭总没有让作战科长叫我。第二天作战科长才告诉我，彭总来过电话，后来直接向716团政委栗光祥下达了任务，叫部队继续向东走，结果我纵走了。实际上彭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我们一面休息一面准备粮食，以使我军埋伏于职田镇大山边，待4纵将敌诱到时，一起歼敌一两个团，即可打掉其嚣张气焰。我们把他的意思弄反了。

后来彭总专门派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来查问这件事。

彭总在前委扩大会上说：“我们的粮食没有准备，边区的粮食也很困难。敌人要是继续追赶，我们退到延安也不会安全，就非退过黄河去。”他批评我纵没有意识到危险，走了。

我误会了彭总的意，听成是批评我纵有意识地走了。我很不冷静，当场就跟彭总争辩起来：“什么叫有意识的？”

散会以后，彭总把1纵的同志留下来，继续了解情况。林伯渠主席、贺龙司令员、王维舟、习仲勋等领导同志也都参加了。

几位首长给我们开了个小会，严肃地批评道：“1纵仗打得不错，工作有成绩，作风纪律也比较好，连着受了一些表扬，就骄傲啦，听不进批评啦！”

当时我们一些同志对彭总批评人过于严厉有看法，有意见。

记得十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彭总就听说他厉害，有时发火骂人，那是在1937年8月，716团正在陕西富平县觅子镇进行抗日出征前的整编、训练，彭总来检查工作，宋时轮团长和我把司令部的房子腾给他住了几天。我们听说他厉害，他不叫，我们也不主动去见他。从1947年3月起我1纵在彭总直接指挥下战斗，一年多来，我们对他的指挥由衷的敬佩，但是对他的威严还有点受不了。

为了帮助我们正确看待批评，林伯渠主席专门讲了如何认识彭总。他问道：你们知道彭总怎么叫的“德怀”吗？

我们回答不出来。

林主席是党内著名的“五老”之一，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他告诉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做“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彭总正是这样的人！你们不要光看到他严厉，“有威可畏”的一面，同时要看到他“有德可怀”的一面。他的“威”正是“德”的一部分。你们愈是了解他，甚至受到他的批评愈多，也就愈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啊！

林主席语重心长的一番话，引起了我们的深思：

彭总对革命忠心耿耿，对人民敬若父母，对同志坦诚相见，对个人自我反省。他性格耿直，刚正不阿，从不隐瞒自己的思想。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从不存个人私心。他治军严格，又爱兵如子，从不搞特殊待遇。他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从不顾及情面。他疾恶如仇，从不姑息。

在这次前委扩大会议上，彭总所以发那么大的火，除了性格的原因外，主要是他以对革命事业、对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来看待在战役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认为“这是从个人得失与局部安危出发而破坏整体与全局的利益”，“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他常对我们讲：“打仗关系着党和人民的命运，关系着指战员的生命。”因此他把战斗的胜败、指挥的好坏看得很重很重。

“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彭总确实是这样的人，名不虚传啊。

我们1纵队的干部多挨了彭总、贺老总、林主席的一顿批。这顿批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全面、深刻了。从这以后，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发生遇到批评不冷静这类事。

前委扩大会议经过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使每个与会者都从中得到了很大教益。

回到部队，我们按照前委决定，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夏季整训，发扬诉苦三查的好经验，开展“评斗志、评政策、评工作、评作风”的评功查过运动，

使部队的军政素质又有了一个新的提高，同时也使指战员们一扫陇东受挫的灰暗心理，重新振奋起高昂的战斗精神。

8月间，西北野战军再次从黄龙山区出击，发动澄城、合阳战役。我纵协同兄弟部队在壶梯山、冯原镇、王庄镇给胡宗南部整编36师以第二次歼灭性的打击，我军收复韩城、澄城、合阳三城，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

看戏与改计

9月间，在野司驻地的一所小学校里，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讨论加强请示报告制度，研究秋冬两季继续向胡宗南集团进攻的作战方针和新区政策等问题。

西北野战军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增加了5名委员：野司参谋长阎揆要、1纵政委廖汉生、3纵司令员许光达、4纵司令员王世泰、6纵政委徐立清。

第三次前委扩大会议从9月12日至23日，接连开了十来天。我们白天开会，晚上都想松弛一下，正巧某部一个评剧团从河东的山西运城过来，演了一出评剧《玉堂春》，请各纵各旅干部观看。

晚上，在一片空场上搭起戏台，挂上汽灯，敲响了锣鼓家什。我们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看戏。彭总也来了，坐在我们身后。

这个小剧团，原来是个跑江湖的戏班，不久前刚刚在山西被收留入伍。

他们演的这出《玉堂春》，演到苏三和王三公子在庙里相会，穿插了一些噱头。当时这类旧戏都是这么演，我们看戏时谁也没有在意是否合适，光想着轻松、娱乐了。

第二天，会议继续举行。

彭总宣布开会后，严肃地看了看到会的干部，气冲冲地问：“昨天晚上的戏是谁点的？”接着说：“这是什么戏嘛？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低级情调！你们都是指挥员，是要带兵打仗的，看这种东西，会起什么作用嘛？这是消磨革命意志！我不反对大家看戏，我们应该多看一些歌颂英雄、歌颂人民、鼓舞士气、增强斗志的戏。”彭总越说越火，大大地发了一通脾气。

昨晚的戏大家没有多少印象了，经彭总一批，这才意识到确实有些不好的东西。大家见彭总发那么大火，一个个面面相觑，闷不作声。会议一时僵在那里，不能进行。

这天的会议轮到我第一个发言，我首先说：“昨天是我们点的戏。彭总批评的对。我们看戏光想到娱乐，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今后一定警惕。”

彭总点了点头。于是我开始发言，会议继续进行下去。

在后来的一次前委扩大会上，彭总为自己常发脾气的事向大家征求意见。我给他提了一条：“你批评人是对的。但你在批评时骂人，人家对你就敬而远之。”彭总虚心接受了这条意见。

我们根据彭总的指示，让纵队和各旅剧团排练、演出了一批有教育意义的优秀剧目。其中，歌颂晋绥女英雄的《刘胡兰》、反映农村剥削关系的《白毛女》、《血泪仇》和揭示战斗英雄刘四虎成长道路的《刘四虎》等戏，对部队教育很大。

在我军休整期间，胡宗南为阻挡我军继续南下，亲自飞赴大荔，部署整编第17师、38师及36师残部在大荔以北、洛河以东地区，依托城镇村落，

构成正面宽 20 公里、纵深 30 公里的防御带。

野司下达了荔北战役作战预案：第 1 纵队沿澄城至大荔公路实施正面突破，2、3、4 纵队分两翼进行围歼。

我纵能不能首先突破敌防御带，关系全局。为此，贺炳炎司令员和我召集各旅干部对野司的预案进行深入研究。

会上，358 旅旅长黄新廷提出了不同看法：从敌人防御正面突破困难很大，不如从侧翼打进去，分割围歼。他建议纵队报告彭总改变预案。

为了摸清敌军防御情况，我们派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带领侦察队，潜入预定作战地域进行战役侦察。

侦察队时而身穿便衣，时而身着国民党军服，深入到敌区。他们发现敌防御正面是其整编 17 师的守备重点，兵力集中，工事坚固，我纵若正面突破很难成功。他们又绕到敌人侧后，很容易地插入敌腹心地带，将其防御纵深摸了个透，还捉回了几个俘虏。

纵队立即召集各旅干部开会，根据黄新廷旅长的建议和刘桐树的侦察报告，再次讨论作战预案，一致认为应把从敌正面突破改为从侧翼插入其腹心，将敌防御体系割裂，各个围歼。

我打电话向彭总报告了黄新廷旅长的建议、刘桐树的侦察报告和大家讨论的意见。

彭总听了以后，立即表示：“谁的方案好就用谁的。黄新廷提的好就按他这个主意办。”并要刘桐树带着从敌区捉回的俘虏向他当面报告。

野司首长重新研究后，否定了原来预案，制定出新的战役指导方针：集中野战军主力，从侧翼直插敌心脏和侧后，割裂包围，各个歼敌。

10 月 5 日晚，我纵以两个旅齐头并进，急行军十几公里，直插敌后。2、3、4、6 纵也分割包围了敌军。敌军的整个防御体系顷刻间土崩瓦解。

黑夜中的敌纵深，四处都是敌人，四面都在响枪。我纵毫不迟疑，大胆穿插，按照预定路线在敌阵中分路展开。

358 旅先头 714 团与弃阵撤逃的敌 48 旅旅部 300 多人遭遇，该团以第 3 营扑上去全歼这股敌人，活捉旅长万又麟，团主力则一步不停继续穿插，割裂了敌 17 师所属 48 旅与 12 旅联系。我纵歼灭 48 旅大部，而后协同兄弟部队包围、追歼敌 17 师师部及 12 旅。

7 日，我纵协同 2、3 纵队向位于二线的敌 38 师进攻，一鼓作气攻破其防御阵地，迫歼该师大部。

10 日后，胡宗南调集 13 个旅的兵力反扑过来。西北野战军集中主力歼灭其中的整编 65 师大部，而后转入抗击战。

敌军集中了全部大炮并配以 10 余架飞机向我军阵地狂轰滥炸。13 日这天敌人的炮火空前猛烈。我带着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和警卫员孙占明正在土坎下观察战况，一发炮弹打过来在我们身边爆炸，把刘桐树的一只眼炸瞎了，我的警卫员孙占明也被炸伤。就是在这么猛烈的炮火下，我纵顽强抗击，许多同志负伤不下火线，涌现出众多惊天地、位鬼神的英雄。阵地上到处回响着“为穷人报仇！为刘胡兰报仇！为牺牲同志报仇！为我们自己报仇！”的口号声。

荔北战役前后共 10 天，西北野战军在彭总正确决策和指挥下，歼敌 25000 人，先后给予敌 4 个整编师歼灭性打击。我第 1 纵队毙伤俘敌 6500 余名，自己伤亡 2663 名，其中伤亡党员 1340 名。在任务繁重、战斗激烈、伤亡相当

大的情况下，我纵全体指战员表现出了英勇顽强、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空前高涨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对革命的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充分的军事民主。

为此，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发出通令嘉奖：

“此次荔北战役，在战前我1纵侦察人员捕获敌俘、数次深入敌之纵深，确实查清敌之部署及其阵地内之地形道路，对我军歼敌计划部署上起了重大作用。在我军进攻开始时，该纵第358旅714团，于10月5日之夜，以勇猛果敢神速机敏之行动，从敌48旅防御阵地西观、寺前两据点间，钻入敌之纵深火网，消灭敌48旅旅部，俘敌旅长、参谋长等主要军官，同时迂回到48旅与12旅之间，控制要点，隔断两旅之联系，完成我军分割围歼敌人之战役任务，对我歼敌17师、38师起了决定作用。特此通令嘉奖，作为我全军学习之范例。”

彭总听到我纵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负伤的消息后，写来一封慰问信：“贺、廖、陈转刘桐树同志：瓦子街、西府、冯原和此次战斗中，1纵侦察工作在孙科长及你的以身作则下，不怕危险和困难，完成了历次的侦察任务。特别是这次消灭17师、38师战役中，你们提供了很好的意见，使战斗顺利进行，保障了战役的胜利。你们创了全军侦察的模范，号召全军向你们学习。当战斗结束之际，忽闻你身负重伤，我们以同志之热忱，向你表示亲切的慰问，望静休养，祝你早日健康。”

接到野战军首长发来的嘉奖令和慰问信，我纵全体指战员深受鼓舞，同时想到战前彭总认真吸收来自下级的意见、果断修改战役方案，我们从中又一次感受到彭总虚怀若谷、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高尚品格，彭总为我们做出了军事民主的表率。

1948年严冬到来之前，西北野战军为配合中原的淮海战役，于11月下旬发动冬季战役。1纵与4纵组成右翼兵团，出击铜川、耀县。我纵冒雨在陈炉镇、康庄、军台岭连打三仗，击毙敌17师师长王作栋以下1162名，俘敌副师长王恒英以下2969名。与此同时，由2、3、6纵组成的左翼兵团全歼敌76军。战后，西北野战军转入两个半月的冬季整训，告别了战略反攻的1948年，迎来了夺取最后胜利的1949年。

西北大军在前进

1949年1月，西北野战军召开了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会上，贺龙同志传达了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在解放战争第三年争取打前所未有的歼灭战、加速夺取全国胜利的精神。前委书记彭德怀讲了1948年几项工作的基本总结和1949年的任务。

会后，我向纵队传达了党代会精神，组织各级干部学习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我们一面为解放战争胜利形势所鼓舞，一面为进军大西北、解放全中国的重任所激励，在全纵队掀起一个学习和练兵的热潮。

早在头年11月国民党军进行了扩编，胡宗南部的原整编军改称兵团，整编师改称军，整编旅改称师。其实胡敌主力部队差不多都曾被我们西北野战军歼灭或给予重大打击过，有些还不只一次两次，补了又补，因此这种扩编只

是打肿脸充胖子而已。

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有关规定和指示，也进行了新的整编。这种整编与敌军相比有着根本的不同，我军是在胜利中的发展壮大。西北野战军奉命改称第1野战军，各纵队改称军，旅改称师。

我第1纵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贺炳炎任军长，我任政治委员，陈外欧任参谋长，洗恒汉任政治部主任。原358旅命名为步兵第1师，师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原714、715、716团改为步兵第1、2、3团。原独立第1旅命名为步兵第2师，师长王尚荣、政治委员颜金生，原1、2、3团改为步兵第4、5、6团。1948年2月归属1纵队建制的晋绥军区独立第7旅命名为步兵第3师，师长傅传作、政治委员曹光琳，该师辖步兵第7、8、9团，仍留山西的太原战役前线。此外，军还有一个直属炮工团。

我们这支部队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的名称，是按照全国各野战军统一序数排列形成的，本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全军同志都为这个“第1”感到特别的光荣和自豪，格外看重和珍惜它。

为了358旅三个团谁能当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团”，部队从上到下还争论了一番。按过去的习惯，一支部队总是把底子最老、战斗力最强的单位排在序列前头，行军、打仗也常是这样。

在358旅的这三个团里，715团、716团的部队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诞生了。一个生长在湘鄂边，一个生长在洪湖，其中还有南昌起义的血脉，抗日战争爆发后它们分别由红军师、军合编、缩编而成。这两个团历史长，底子老，能征善战。

而714团则是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1939年在冀中由716团抽出的三个老红军连队组建独立3支队，又与冀中游击武装扩编而成。比较起来，这个团只有部分红军底子，建团历史短。

三个团都要求成为“第1团”，而715团、716团认为自己的理由更充足一些，716团还希望贺炳炎和我作为老团长、老政委能为他们说说话。师、军也有一些干部认为把715团或716团编为“第1团”更好些。

在确定编制序列的军党委会上，我提出，714团的资历虽然比不上其它团，但他们在西北战场上仗打得好，工作也出色，尤其是在诉苦运动中带了头，在瓦子街和荔北战斗中两次受到野战军的通令嘉奖，他们的工作堪称第一。结果大家统一了思想，确定把714团编为“第1团”。

在整编中，每个单位、每个同志都大大提高了荣誉感和责任感，决心发扬革命传统，争创一流战绩，把我们这支部队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第1军”。

1949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我1军参加了春季攻势，5月上旬至6月中旬又参加了陕中战役。第1野战军解放西安和陕中广大地区，迫使胡宗南部队退到汉中。

在这期间，彭总和第2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王震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后王震先行回到西北，向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报告。彭总没有直接回西北，而是奉中央军委命令到太原前线指挥攻打太原，回来时将华北野战军第18、19兵团和一直在山西作战的第7军、1军第3师、3军第8师带到西北。

6月间，第1野战军在礼泉县开了一次前委全体委员会议。前委书记彭德怀宣布：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其它野战军都已经成立了兵团，原华野18、19兵团也调归1野建制，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没顾上这件事。现在我

们1野也要成立兵团，准备成立第1、第2两个兵团，每个兵团各辖三个军。接着彭总就兵团如何组成及干部如何配备问题，叫委员们提出具体方案。

由于委员们对这个问题事先没有准备，会议沉默了一阵，没有发言。

我考虑了一下，提议道：“这个问题好办。1、2、7军组成第1兵团，兵团司令兼政委王震；3、4、6军组成第2兵团，司令许光达、政委王世泰。”

彭总问我：“你干什么？”

我回答：“我还在1军嘛。”

彭总把这个方案向其他同志征求了意见，通过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组建了兵团机构。

1野1、2两个兵团的组建和18、19兵团调来西北作战，大大加强了西北我军的力量。我军从1947年的两个纵队另两个旅2万余人，发展成为今天的四个兵团、十二个军34万人，加上贺龙同志领导的西北军区地方部队，共计40余万人，在总兵力上首次超过了胡马敌军，改变了西北战场长期处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局面，为进军大西北准备了强大的力量。

由于兵团的组建和3师归建，我第1军领导班子也做了加强，除军长、政委不变外，又增加了2师师长王尚荣为副军长、军政治部主任洗恒汉为军第一副政委，1师政委余秋里为军第二副政委，原1师师长黄新廷调到3军接替许光达任军长。

7月2日，1军在户县涝店镇的渭河滩上召开全体军人大会，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欢迎第3师从山西正式归建，誓师进军大西北。

第3师及其前身独立第7旅从拨属我部建制以来，一直在山西参加攻打太原的战役。它原是由吕梁地方部队升格为野战部队的。在太原外围战中，独7旅承担主攻太原东山制高点牛驼寨的艰巨任务，经过一个月反复争夺终于全部占领牛驼寨，部队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伤亡。该旅曾来电向纵队报告了战况，同时表示决心要“重建7旅”。我拟了一封回电，批评他们“7旅并未打光，何提‘重建’？”同时鼓励他们看到胜利，增强信心，以便再战。在太原攻城战中，他们较好地完成了主攻任务。他们这次归建，带来了太原战役缴获阎锡山的山炮等战利品作为见面礼，带来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宝贵经验，也使1军兵力壮大到35370人。

在军人大会上，贺炳炎军长和我都讲了话，热烈欢迎3师同志到来，号召全军同志团结一致。

这天，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1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1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等首长驱车前来参加我们的大会，并讲话勉励我们做好全歼胡马敌军、彻底解放大西北的准备。

渭河滩上，战旗猎猎，枪炮如林。我第1军3万多名指战员举起手臂，奋力高呼：“消灭胡马匪，解放大西北！”

第十五章

解放青海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令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全国奋勇进军。

我第1军在野战军和兵团的指挥下，进军西北，解放青海，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祖国的江河之源。从此，青海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军指战员和青海各族人民一道，在西北边陲奏响了建设新青海的雄伟乐章。

进军大西北

1949年7月6日，第1野战军在咸阳城里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向大西北进军的计划。

早在4月间，当国民党反动政权顽固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之际，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遵照此令，人民解放军先后向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向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向西北西南等一切尚未解放的地方奋勇进军。

这是中国革命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与挫折之后，夺取最后胜利的伟大进军；

这是4万万中国人民彻底摆脱被剥削、被压迫命运，从此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伟大进军；

这是彻底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创建一个人民的新中国的伟大进军。

中央军委确定第1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于年底前占领甘宁青，而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占领新疆，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另一路由贺龙率领进军西南，协同第2野战军解放贵州、四川、西康。

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根据军委部署和指示，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确定了在西北地区“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发动扶眉战役，以19兵团钳制退守彬县、长武、永寿一带的青宁二马，集中1、2、18兵团围歼收缩于渭河两岸扶风、眉县地区的胡敌主力五个军。

7月11日，扶眉战役开始。在渭河北岸，2兵团首先迂回敌后，18兵团及第7军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公路自西向东攻击，前后夹击敌38军、65军、119军于扶风以南；在渭河南岸，我第1军协同第2军围歼周至与眉县之间的敌24师及61师一部。

战斗中，1军以1、2两师大胆插入敌纵深，分割包围，而后连续攻击，猛打猛冲，到12日午时将守敌大部歼灭。

贺炳炎军长和我乘坐不久前缴获敌军的吉普车，超越仍在肃清残敌的部队，一直向西赶到横曲镇，抓住先头1师3团，直接命令该团及2师4团、6团3营立即毫不停顿地向眉县追击前进，命令3师插向眉县以西。随后，全军相继转入追击。

这是我们第一次乘坐吉普车调度部队，指挥战斗。从红军时代起我们一直都是骑马。不久前缴获了敌“青年军”的三辆吉普车，但无人会开，用牛

车拖回来时有一辆翻到山沟里报废了，只剩下军长、政委各一辆。我们到俘虏中找司机。有人担心俘虏兵靠不住，会把首长摔死。对此，兵团司令兼政委王震讲了一句名言：“俘虏兵会开车，政治上不一定可靠，可能会把首长摔死；我们不会开车，翻车也会摔死。两者相比，俘虏兵如果不是有刻骨仇恨，他也不会摔我们。”我们到“青年军”俘虏里找出了两个原车的司机。这次我们坐吉普车指挥，抓住了宝贵的战机，如果还像以往那样骑马赶路肯定赶不赢。

部队不顾饥渴，不怕疲劳，冒着酷暑，急行军赶到眉县附近，正好堵住从渭河北岸溃逃的大批敌军。

北岸之敌在西有2兵团顽强阻击、东有18兵团猛烈攻击的情况下，走投无路，纷纷跳入渭河泅水向南逃来，上岸后已是溃不成军，筋疲力尽，重武器都丢进渭河里，几无战斗力可言。

我军以火力封住敌人逃路，同时进行政治喊话，令其投降，在黄昏前的一小时里将其全部俘获。清点一下，竟有敌38军、65军、119军等部8000多人。

渭河滩上，象落汤鸡似的俘虏成群结队接受收编。渭河水里，一片欢声笑语，战士们一边擦洗身上的征尘，一边打捞敌人丢弃的枪炮，总计打捞出4门山炮、20门迫击炮和数以千计的各种枪支。

经过一昼夜战斗，我1军共毙伤敌1325名，俘获11225名。要消化这上万名俘虏，我们原有的补训团已容纳不了，为此成立了补训师。

扶眉战役歼敌四个军4.3万余人。只此一役，胡宗南在关中的主力大部被歼，残部逃入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胡马两敌被彻底分割，青宁二马退守陇东地区。

7月16日，贺炳炎军长和我参加了野司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暂不占领汉中而集中兵力歼灭青宁二马的指示，野司决定乘胜“阻胡打马”，以18兵团警戒胡宗南余部，以1、2、19兵团分三路西进，发动陇东战役，歼灭青宁二马。

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原拟在六盘山脚下的平凉地区与我军决战。但宁马指责青马将其部摆在前边而自己却缩在六盘山待机，二马互存戒心，各保实力，在我大军西进的势头下不战而退，其“平凉决战”计划自行流产。

我第1军为兵团先头，从室鸡沿西安至兰州大道向甘肃攻击前进，准备歼灭驻守陇县的青马骑兵第14旅，但敌闻风而逃，退守固关镇。我1军于7月25日解放陇县，继续向固关迫击前进。

固关镇位于陕甘交界的关山东侧，是西兰大道上进出陕甘的重要门户，马步芳把他最精锐的骑兵第14旅放在这里，企图阻挡我军西进入陇。

7月28日，第1师和军属炮兵向固关发动进攻，首先夺占了四周高地，而后向镇内攻击。在甘肃境内马鹿镇的敌骑8师前来增援，军部即令1师暂停攻击，待敌骑8师被迂回的7军包围后再一举全歼。但部队攻击勇猛收之不及，守敌迅速崩溃，纷纷脱离阵地，上马向西逃往甘肃。1师跟踪追击，7军迂回部队将逃敌拦截，前后夹击，把敌骑14旅歼灭。我1军毙伤俘敌1200余名，缴获战马1500多匹，为继续进军大西北提供了大批骏骑。

固关战斗的胜利打开了进军陇东的门户，我军乘胜追击，1军解放秦安，2军解放大水，其它部队也接连解放陇东广大地区。青宁二马一个逃往兰州，一个窜回宁夏被分割开来。

7月底，青海军阀马步芳当上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自命“西北支柱”，叫嚣“要与共军决战兰州城下”。

野司确定了“先打青马，后打宁马”的方针，发动兰州战役，令2兵团和19兵团主力围攻兰州，19兵团64军向银川警戒宁马，1兵团7军留驻天水协同在西安至宝鸡一线的18兵团钳制后面的胡宗南残部，1兵团率1军、2军和18兵团62军挺进临洮、临夏，准备直捣青海，截断青马后路。

我1军在秦安休整一周，进行了歼灭青马的政治动员，而后于8月11日从秦安继续西进，12日解放陇西，15日解放渭源，17日解放临洮，21日继2军之后西渡洮河，23日进驻临夏，军侦察队解放黄河岸边的永靖城。

临夏又称河州，是青宁二马出生和起家的地方。我第1兵团解放临夏，抄了马家的老窝子，大大动摇了兰州守敌的军心，迫使马步芳从兰州前线抽调骑兵第8师回防青海，从而减少了攻兰阻力，也保障了野战军主力的侧翼安全。

野司赋予1兵团的任务是，一方面准备渡过黄河进军青海，一方面准备如果兰州方向需要，即调赴攻兰前线。

野战军主力第一次攻兰未能成功，彭总命令1兵团在河州停止待命，待攻兰情况明朗后再决定如何行动。

8月25、26日，经过两天激战，兰州城被野战军主力攻克，青马3万余人被歼，马步芳等头子乘飞机窜回西宁，残部仓惶逃往青海、新疆。西北战场从此大局已定，我军面临的任務基本上只是走路与接管了。

挺进西宁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当日，野司向1兵团下达了进军青海的命令。兵团部率2军从临夏取道循化过黄河，经甘都、化隆等地由南向北进军。我1军从永靖渡河，经民和、乐都沿湟水及兰州至西宁大道，由东向西进军。两路大军象张开的铁钳指向西宁。

水靖渡口是从甘肃进入青海的一个传统渡口。守敌逃入青海时把原有的铁索桥彻底破坏了，大小船只也被掠走或烧毁了，敌人企图凭借黄河天堑阻挡我解放大军的进军步伐。

8月27日，渡河开始。先头第2师和军直炮工团利用前几天收集到的铁链、绳索、木板和几只小船尝试在黄河上架设浮桥，但皆因水流湍急而失败，仅有的几只小船也被冲走了。

贺炳炎军长和我赶到水靖渡口，向副军长兼2师师长王尚荣了解了情况，察看了渡口，决定放弃架桥，学习当地老百姓的办法，用牛羊皮筏子渡河。

这一带的老百姓祖祖辈辈使用一种牛羊皮筏子来往于黄河波涛之间。这种皮筏子制作并不难，把整张的牛羊皮制成皮筒，四边扎紧，吹足气，形成一只浮筒。如果是单人就抱上一只浮筒游过去。如果人多就再把几个皮筒绑在木架下面，组成一只皮筏子，一次可载四五个至十来个人，连划带飘就冲过去了。

我们派出政治机关于部和大批指战员到沿岸老百姓家中深入宣传，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很快就收集到大量皮筒，赶扎出上百只皮筏子，并且找来一批经验丰富的水手。

28日凌晨，先头2师5团第3营乘坐皮筏子冲过黄河激流，抵达北岸，迅速控制了渡口，夺占了山头阵地。而后，全军各师、团依次乘皮筏子渡河。

笨重的山炮则拆开来，用皮筏子一件一件运过去。大批骡马怎么办？我们采取红军时期的老经验，把骡马赶下河，让它们自己游过去。只要打头的下水了，后面自动会跟上。也有个别胆子小的光在岸边转圈子，有一个战士气得抡起木棍子使劲打，棍子都打断了。我到河边检查渡河情况正巧撞见了，批评了几句，那个战士仍不住手。我也火了，打了战士两下才制止住。事后我懊悔不已，写了一封信检讨错误，赔礼道歉，并在军党委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从8月28日至9月2日，经过数天抢渡，全军30000余人、2000余匹骡马、上百门重炮以及全部辎重，凭借最原始的工具，安全迅速地渡过黄河天险。

为了不给回窜青海之敌以喘息之机，不使青海解放进程有丝毫延误，我们派出由军、师、团三级侦察人员组成的骑兵先遣队，在军司令部侦察科长孙巩带领下先行，查明沿途敌情，开辟前进通路。

先遣队轻骑快马，昼夜兼程，如尖刀直捣。大部队随后跟进，浩浩荡荡，似铁流滚滚。

兰州战前回窜青海的青马骑8师和战后逃回的残兵败将，在我各路部队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不战自溃，仓惶逃散。据先遣部队报来的消息称，马步芳已于兰州解放次日从西宁乘飞机南逃，马步芳的儿子、青马82军军长马继援于8月31日窜回西宁，9月1日乘飞机逃走，其部下四散而去，各奔东西。

西宁城内的部分士绅和各族群众主动出来维持社会秩序，看守马家遗弃财产，并派出十几部汽车前来接运我军，迎接解放。

9月5日，1军先锋部队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下进入西宁。从此这一天就作为青海解放纪念日载入史册。

正巧，我的二女儿也在9月5日出生了。我特意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涤青”，以纪念我军如铁流一般荡涤青海、解放青海的历史功绩。

西宁解放两天后，贺炳炎和我率：军军部进驻西宁。9月9日，王震率兵团部和第2军从另一路进抵西宁。

随着省会的解放，1军以西宁为中心迅速向四周扩展，相继进驻大通、湟源、湟中、贵德、互助、乐都、民和、化隆、甘都等县。至9月底，除边远牧区外，青海大部获得解放。

9月8日，1军奉中央军委电令，成立了“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政治部主任洗恒汉、副主任张国声分别担任市军管会正副主任。我担任了省军管会主任。军管会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收降青马残余武装，发布通告，命令残敌立即报到登记，向人民缴械投降。

兰州战后，青马残部数万人逃回青海，大多数溃散回乡，一些高级军官带着部分人枪龟缩在西宁附近的大通县桥头镇、湟中县上五庄，海晏县三角城等地，观望形势，伺机而动，但在我军的军事震慑和政治争取下，他们走投无路，不得不向我军接洽投降。9月8日，在上五庄的青马82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等320余人向2师受降人员投降。9月10日，我军又在三角城接受青马190师师长马振武、357师师长杨修成、骑8师师长马英等2000多人投降。此后，逃散各地的青马官兵陆续向我军投降，总计2700多名，其

中将校级军官 350 名。

我们对来降官兵予以登记，收缴武器，给以政策教育，下级军官和士兵发给路费遣散回家，校以上军官编入设在西宁的“解放军官训练处”集中学习改造。

从强渡黄河时起，1 军在解放青海的过程中总计俘敌 2821 名，缴获火炮 77 门、机枪 373 挺、汽车 70 辆、战马 1760 匹、炮弹 2.2 万发、子弹 244 万发。

9 月 18 日，西宁市各界人士、各族群众 3 万多人和解放军隆重举行庆祝西宁解放大会。我军举行了威武的入城式，各单位打出一面面记载着战功和荣誉的锦旗，步兵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骑兵跨着一匹匹战马，炮兵牵引着一门门重炮，行进在西宁的主要街道上。人民群众在街道两旁挥动彩旗，高呼口号，夹道欢迎。

庆祝大会在军文工团高昂的军乐声中开始。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工震发表讲话，各族各界群众载歌载舞，欢庆解放。

不久，我们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1 军指战员和各族人民再次在西宁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把一面面亲手制作的五星红旗升起在青海高原上。

一位 75 岁的老人在街头挥笔赋诗，表达出各族人民欢庆解放的喜悦心情：

马到青海四十年，
人民苦死万万千。
解放大军来征剿，
至时拨云见青天。

建立人民政权

青海解放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接管地方各项工作，帮助青海各族人民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

由于马步芳家族在青海 40 年的残暴统治和血腥镇压，致使青海解放前除了零星的自发的群众反抗外，全省没有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一个共产党员，连一个民主党派和出名的民主人士也没有，假使有也根本无法存在。在马家统治下，凡是反马的，不管什么人都格杀无论。因此我们在建立新政权时缺少大批干部，特别是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同时，由于我军进军神速，接管地方工作的干部一时还来不及随军行动。这样，在青海建立人民政权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 1 军指战员的肩上。

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指示精神，积极担负建政工作。在进军的同时，我们就准备了一批城市工作干部。西宁解放后，立即抽调干部组成了军管会，下设民政、公安、军事、文教、财经、交通、民族等处，接着又相继在西宁市和各县建立人民政府，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实行全面接管。

在接管工作中，我们采取的具体做法是：以西宁市为中心扩及各县，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地进行；将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属之机关、工厂、矿场、银行、公司、学校、牧场、邮电等部门，以及马步芳之财产，收为人民所有；

对企业保持原封不动，不拆散原来的机构，并在一定时期内不改变其原来制度，以利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对学校实行严格保护，除撤办某些反动教职员、取消某些反动课程和制度外，均维持原状，以利复课和逐渐改良；对于反动政权机构及其制度则予以摧毁和拆散。

9月下旬，我去兰州参加第1野战军前委会议。会议对各部队今后的任务做了分工，其中1兵团部和2军、6军由王震率领从青海继续西进，翻越祁连山，进军新疆；1军留驻青海，并兼青海军区，担负彻底摧毁反动统治、建设人民新青海的任务。

回到西宁，我向军党委传达了前委决定。9月27日，军党委做出《当前工作的决定》，号召“全军必须坚决贯彻建设新青海的这一工作队思想，及明确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将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

奉中央军委命令，9月26日和10月1日相继宣告成立了青海人民军政委员会和青海军区。军政委员会是解放初期的临时最高行政机构，代行人民政府的职权，并负责定期召开青海人民代表会议，筹备成立青海省人民政府。我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主任，主持全省军政工作。军政委员会确定以“稳步前进，耐心地提高群众觉悟，团结各民族，建设人民的新青海”作为施政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我们深入宣传我党我军的纲领、政策，动员逃散在外的旧公教职员和群众回来安居乐业，收缴马家军残部的枪枝弹药，组织恢复生产，稳定社会治安，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不久，中共西北局陆续派来一些干部领导地方的党政工作。

9月17日党中央复电西北局：“同意青海省委以张仲良、廖汉生、洗恒汉、贺炳炎、王尚荣、张国声、傅子和、余秋里8人组成。并以张仲良为书记，仲良、汉生、恒汉三人为常委。”

张仲良同志原是陕甘宁晋绥边区的一位专员，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后来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4军政委。西北局派他来西宁组织中共青海省委。9月25日，青海省委正式成立，担负起领导青海各族人民的重任。

为了尽快地开辟工作，我们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从部队中抽调了大批优秀干部到地方工作，抽调一批团政委、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和军师团政治机关人员到各县去担任县委书记、县长。

我们采取各单位划分区域、包干负责的办法，一个团级单位包一个县，迅速在各地建立人民政权。1师负责大通、门源、互助、民和等县，2师负责湟源、湟中、贵德、海晏等县，3师负责西宁市和化隆、乐都、循化等县，军直负责共和县。不久，军党委又决定从全军每个党委、支部再抽调4人，充实各县、区党政领导班子。到次年9月，1军共抽调2000多名干部和党员老战士到地方工作。这些同志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扎根青海几十年，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

我们在对反动政权进行彻底摧毁的同时，对旧政权的供职人员除首恶者予以惩处外，其他尽量给予安置，愿意为人民服务者予以量才录用。

到1949年底，全省已先后建立了14个县市的人民政权，对我军力量一时还未达到的边远牧区也给予新的任命或派员前去推行新政。各地方的一些头面人物和各族群众纷纷派出代表到西宁向省人民军政委员会致敬，请求派部队和干部去那里。

西宁解放前夕，远在巴颜喀拉山南、通天河畔的偏远牧区玉树、囊谦、称多三县藏族各部落，受到马步芳的威逼勒索，前往西宁“献马”，交纳贡品。他们走到海南地区时，得到西宁解放、马步芳逃走的消息，遂决定继续赶到西宁，把这批贡品作为礼物送给新政权，计有骏马千匹、珍贵兽皮百张和麝香、鹿茸等物品，其中还有一只活猓獭。

我会见了这些部落的头人囊谦千户扎喜才旺多杰、扎武百户久美等。

他们向省军政委员会祝贺青海解放，并对我说：“只要你们一次派出3000骑兵，我们就归顺你们。”

我代表省军政委员会收下了这批礼物，向玉树地区藏族人民表示谢意，表示我军将尽早进军玉树。

11月初，玉树地区通电起义，经过半年准备，我们抽调人员、马匹组建了由军侦察科长孙巩任队长的骑兵支队和由团政委冀春光任地委书记的玉树地委干部队，于次年6月进军玉树，在那里建立了人民政权。

关于玉树藏胞送来的那只活猓獭，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去兰州开会时把它送给了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贺老总去北京开会时又把它送给了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则把它转送给北京动物园。

青海其它偏远牧区如兴海、都兰、同德、果洛等地的宗教领袖及部落头人都先后来西宁向省军政委员会请求归附。我们根据情况陆续派出领导干部和部队，帮助那里的人民建立起新政权。

在普遍建立各地基层政权的同时，省军政委员会遵照中央和省委指示，抓紧筹备省人民政府的成立。我们按照政治协商的原则，推举出各界代表作为省人民政府成员，西北局派1野副司令员赵寿山来西宁组织省人民政府。

1950年1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上午10时在省府礼堂隆重举行庆祝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令：任命赵寿山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仲良、廖汉生、喜饶嘉措、马朴为副主席。此外还有16位政府委员。1军政治部副主任、西宁市军管会副主任张国声担任秘书长。

在庄严的气氛中，省政府组成人员举行了宣誓就职典礼。我和马朴副主席分别发表了简短的就职讲话，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团结各族人民，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决议和命令，坚决克服困难，建设新青海。

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召开了首次委员会会议，由我做了“青海人民军政委员会工作报告”，汇报了三个月来军政委员会在接管、清匪肃特、财经、建政、教育、民族、交通七个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其中，对建政工作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肯定了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完全正确的，肯定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确是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会议对军政委员会的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由于军政委员会3个多月工作的结果，在组织上、政策上及施政工作上已提供并积累了宝贵经验，从而奠定了省人民政府顺利组成的基础”。此后，省人民军政委员会即行撤销，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青海省人民政府的宣告成立，标志着全省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彻底翻身，从此当家作了主人。

民族联谊

青海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全省人口解放前没有精确的统计，据旧政府近似正确的估计约 120 万人。其中汉族约 50 万人，占总人中的 47%；藏族约 40 万人，占 33%；回族 10 万余人，占 12%；土族约 7 万人，占 6%；蒙古族约 2 万人，占 2%，还有撒拉族、哈萨克族。

长期以来，青海各民族同胞共同生活在这块广阔的高原上，各民族之间既有友好相处的传统情谊，也存在着一些尖锐复杂的历史矛盾。特别是马家家族统治青海期间，在对各族人民进行阶级压迫的同时进行民族压迫，推行“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挑拨民族矛盾，对弱小民族肆意掠夺，对敢于反抗其统治的民族进行血腥镇压，造成民族之间积怨颇多，隔阂很深，纷争不已。

基于上述情况，从解放青海之时起，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政府和党委，都十分注重民族问题，始终把解决民族问题、增进民族团结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和重要保证来抓，按照党的民族平等的原则和各项民族政策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

进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我军在向大西北及青海进军过程中，进行了普遍而认真的民族政策的学习教育，规定了民族地区严格的特殊的纪律。譬如严格禁止在寺院中驻兵喂马，禁止进入信教群众的经堂，不准借用回民群众的炊具，不吃浑肉，不进内房等等。军管会设置了民族处，专门负责各民族的联系工作。指战员们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从而赢得了各民族同胞的热烈拥戴。

甘南藏区的拉卜楞寺派人来西宁，找到青海省军政委员会，请求允许他们在青海寻找该寺活佛的转世灵童。

我告诉他们：“你们完全可以按照宗教的规矩办，我们不会阻碍的。”

来人回去后又与拉卜楞寺里管事的喇嘛一道来到青海，经过一番寻找，选定一个穷苦出身的孩子作为该寺活佛的转世灵童。

青海塔尔寺的活佛僧众为了感谢我军对这座名寺的保护，特派代表来西宁向省军政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解放军朱总司令献上锦旗，旗中分别用藏文写着献辞：“大哉我公，拯弱救焚，打倒黑暗，康济斯民”“指挥群力，扫落污浊，中华再造，亿万期年”。正是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军摧毁了马家的黑暗统治，这就从根本上拔掉了民族压迫的总根子，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真正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实现了各民族的空前团结。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我们逐步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了一批县级民族自治政府，在多民族杂居地区建立了各民族联合区域自治政府。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主席在 1949 年 12 月对青海省委发出指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省里举办了青年训练班，选拔、培训少数民族干部，经过短期学习，把他们充实到各县领导班子中去。这些同志经过实践锻炼，很快成为党在民族工作中的骨干。

调解民族矛盾。按照民族平等的原则，以调解、协商的方式，妥善处理各民族之间的遗留下来的纠纷、隔阂、积怨。在各族群众中反复说服、劝解，要求互谅互让，制止流血械斗，从而促进了各民族的和睦相处。

做好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领袖的工作。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领袖在群众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做好他们的工作对于加强民族团结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对这些人，主要是通过集体座谈、个别交谈、广交朋友等方式，与其联络感情，沟通情况，解释共产党、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使其去掉疑虑、增进了解，然后通过他们来带动更多的群众。

在省人民政府中，就有几位民族宗教人士和我们一起共事。

一位是马朴副主席，回族代表。他原是马步芳的老部下、旅长，曾参加围堵西路军，抓了不少红军战士，后来解甲归田，闲赋在家。青海解放后，他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我们对他不计前嫌，团结共事，凡有重大的集会都是我和他先后登台讲话。他在回族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为稳定回族群众出了不少力。其他回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看到共产党、解放军对马朴这样的人不但不报复，还请他担任省政府副主席，由此打消了疑虑。

另一位副主席是藏族的喜饶嘉措大师。他是一位藏传佛教学者，在其所钻研的领域有很高的造诣。开始我们对他那个领域不懂，他对共产党、解放军的一套信仰、理论和政策也不懂。但我们对他很尊重，向他解释政策主张，再加上他自己实际观察，使他对共产党、解放军逐渐有较深的了解。我们与喜饶嘉措大师相互沟通，紧密合作，对团结藏族群众和喇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联络民族上层人物和宗教领袖的工作中，我们按照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对流落青海的著名藏族宗教领袖十世班禅给予了一些帮助。

十世班禅原是青海循化县的一个苦孩子，家里很穷，后来他被选定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1949年8月在青海塔尔寺举行了坐床大典，随即即为躲避战乱跑到了柴达木盆地的都兰县香日德。西宁解放后，党中央要求我们找到十世班禅。我们通过喜饶嘉措大师与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政治代表计晋美取得了联系。计晋美首先来到西宁，参加了民族联谊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计晋美即以班禅的名义向北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兰州彭德怀司令员发电致敬。

1950年6月，当剿匪斗争和建政工作进行了一段之后，我们派人把十世班禅及其一行接来西宁。我以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与班禅见了面，并请他到青海军区司令部里坐客。

当时十世班禅只有12岁，还是个娃娃，由他的父母和一个哑巴弟弟陪伴，政治性活动和与外界的联系由班禅堪布会议厅及其负责人计晋美负责，日常活动由他的经师照管。没有经师的允许他自己不能随意行动，包括吃的东西，不经过经师的手别人给的东西不能吃。班禅到我那里，我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摆了一些本地产的糖果，我给他拿了几块，他很有礼貌地接过去吃了。初次见面，他话不多，但举止间表示出对共产党、解放军十分尊重。经过几番来往、交谈，班禅对我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结束了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到塔尔寺住下来，为促进西藏的和平解放作出积极贡献。

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签订后，班禅准备返回西藏。临行前，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和我到塔尔寺看望了他，与他告别。西北军区派联络部长范明、青海军区派部队护送他入藏，回到日喀则。此后，十世班禅为维护祖国统一、抵制西藏分裂，奋斗了一生，成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召开民族联谊会议。1950年1月中旬召开了青海历史上第一次各族人

民联谊会。我们遵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根据青海多民族的特点，邀请各族群众推举出的代表以及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来到西宁，共聚一堂，同商大事。

这些人中有千户、百户、活佛、阿訇、胡图克图和蒙旗亲王的代表、班禅的代表等。有的同志开玩笑他说：“我们这是大会诸侯。”

联谊会上，我代表省人民政府致了开幕词：“我们自青海解放之日起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民族政策，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青海人民政府一切工作的基本政策。”并提出“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达到各民族团结，消灭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隔阂；如何迅速有效地巩固社会治安，使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如何沟通游牧区贸易，繁荣经济。”

开幕式上，省委、政府、军区的同志和各族代表也都纷纷致词。

会议期间，大家本着团结协商的精神畅所欲言，共商大计，通过了有关决议，制定了“民族团结公约”，并发表了致中央人民政府的致敬电。

这次会议体现了青海各民族不分语言、不分地域、不分信仰、不分风俗习惯，一致团结、友爱、和睦，共同商讨建设新青海的大计。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代表们和各族各界群众 3 万多人在西宁大教场隆重庆祝青海省各族人民联谊会的成功。我请代表们检阅了 1 军部队，观看了军事表演。这次联谊会 是青海历史上各民族空前团结的盛会，促使各族人民从此携起手来，为建设新青海团结奋斗。

剿匪平暴

青海的迅速解放，使长达 40 年的马氏家族统治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数以万计的马家兵如树倒猢狲散。但是，反动残余势力并不甘心灭亡。

早在马步芳逃离西宁时，其子马继援曾召集部下密谈，写指示信，暗授策变机宜：战马变耕马，刀枪埋地下，伺机而动，卷土重来。

1949 年 10 月，在马家老窝甘肃临夏发生了暴乱，我 1 军抽调 1 师开赴临夏协同兄弟部队剿匪平暴。经过两个月的连续清剿，扑灭了匪乱，胜利完成了任务，于年底前班师青海。

当 1 师还在甘肃临夏剿匪之际，青海的反动残余势力以马家上层军官、恶霸地主、反动宗教上层分子为主，纠合逃入乡间的散兵游勇，欺骗、裹胁一些回族群众，掀起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12 月 5 日，我军解放西宁仅三个月，马英、马成彪两股匪徒首先向我发难作乱。

马英原系青马骑兵第 8 师师长，我军解放西宁后，他曾迫于形势向军管会登记，不久跑回家乡。5 日这天，马英纠合 5000 余众将大通县城、桥头镇及附近的我县、区政府和部队驻地包围，进行疯狂的冲击。

与此同时，马成彪纠合 1200 余众在门源县作乱，次日攻陷门源县城，我政府副县长翟洪儒等 40 余人全部牺牲。

随后，反革命武装暴乱迅速漫延，小峡、湟中、循化、化隆等地相继发生股匪暴乱。一时间，各地匪乱四起，大有黑云压城之势。他们围攻县城重镇，袭击部队，捣毁党政机关，残杀我军地人员，甚至砍头剁脚，剖腹挖心，割舌剜眼，陈尸旷野，其暴行令人惨不忍睹。

此时，我军尚未完全站稳脚跟，边远地区尚未完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

权尚未完全建立和巩固。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企图趁此时机，推翻人民政权，复辟其反动统治。他们狂妄叫嚣：“要把共产党、解放军赶出青海！”

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军政委员会、第1军暨青海军区动员全省党政军民开展剿匪平暴的群众性斗争，给反革命武装暴乱以坚决有力的回击。

军部接到3师9团关于大通县城、桥头镇被围遇险的报告，立即派3师师长兴中率该师7团和军直侦察连乘汽车紧急驰援，接着加派2师6团和军炮兵营增援，击退了数千匪众，解除了大通、桥头之围，而后对参与作乱的股匪进行清剿，将其一部歼灭、大部击散。

匪首马英再次纠合600余人进犯桥头2师骑兵营从湟中赶来配合6团1营将匪击溃，歼其200余人。战士们从一具矮胖匪尸上搜出马英的水晶私章和金条，证实匪首马英已被击毙。《青海日报》报道了“顽固不悟反人民的下场，匪首马英被我击毙”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大的震动，震慑了其他股匪，鼓舞了剿匪平暴的各族军民。我军主力乘胜进剿在门源作乱的马成彪股匪，收复门源县城。

在大通、桥头剿匪的同时，2师5团围歼了进占西宁东边平邑、小峡地区的股匪，击毙匪首韩静如。接着2师5团与师骑兵营配合，将作乱湟中的哲马禄、马彦股匪大部歼灭，收复湟中县城。

在化隆、循化等地原青马骑兵14旅旅长马成贤、100师师长谭呈祥、新编军参谋长马忠义、伪西宁市市长韩进禄等匪首密谋重新组织新编第82军。我以回师青海的第1师及2师6团连续清剿，将马成贤股匪大部歼灭，并以军事进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迫使马忠义、韩进禄、马希统、马全彪等匪首向我军投降。

1950年1月，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流窜作乱的股匪，军党委决定组建骑兵团，贺炳炎军长和我等军的领导同志带头把自己的乘骑交出来，并以原军和各师骑兵营为基础，迅速组建了骑兵团，执行机动剿匪任务，深入草原、沙漠追歼残匪。

剿匪平暴是一场尖锐复杂的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反革命暴乱的发动者利用历史遗留的民族矛盾，造谣污蔑“解放军是汉人的军队，要杀回灭教。”竭力煽动民族仇视心理，一时间欺骗、裹胁了不少回族群众。

部队在执行剿匪平暴任务时，碰到了前所未遇的困难，既有坚持反动立场的匪徒进行顽抗，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围攻，甚至有一些身背吃奶娃娃的回族妇女也手举镰刀，冲着我们的战士叫喊：“杀呀，杀呀！”

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部队的思想认识不完全统一。一些战士本来就对我们的同志惨遭杀戮而悲愤万分，看到对我军喊“杀”的人更加火冒三丈，真想端起枪来痛痛快快地还击。从基层不断传来“以血还血”、“以刀对刀”的强烈要求。

军党委立即召集会议，及时掌握部队的思想动态，反复强调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民族、宗教、统一战线等一系列政策，必须坚决执行我军的群众纪律。

对那些朝我军喊杀的回族群众怎么办？我在军党委会上作了回答：“我们一些同志被杀了，我们心里难过，气愤，于是有人主张以流血对流血，报复一下子。我说这样不行。假如我们采取同样的报复行动，不讲政策，不加区别，我们就会失去群众，结果流血会更多，军队流血，群众也流血。我们必须坚持对部队指战员、对当地各族群众进行反复、耐心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严格地、模范地执行政策纪律，以我们的实际行动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制定了“军政兼施、分别对待”方针，在剿匪平暴斗争中坚持把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把首恶分子与一般群众区别开来，把匪特问题与民族问题区别开来，团结和依靠各族人民，最大限度地孤立并狠狠打击极少数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的人。剿匪部队以遵纪爱民行动，揭破了所谓“杀回灭教”的谣言，争取了大量受欺骗、被裹胁的回族群众丢掉刀枪，安于生产，有的匪首还被群众主动绑送人民政府处理。

在西宁“解放军官训练处”里接受学习改造的青马旧军官有少数人一直消极对抗、暗中捣鬼，当外面发生暴乱时他们内外呼应，企图暴乱。我们对极少数坏头头给予了严厉打击，同时教育绝大多数人坚持学习改造，继续跟着共产党走。

从1949年12月发生大规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到次年8月大股匪徒基本肃清，我1军共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毙伤敌2100多名，俘虏2200多名，争取投降1000余名，缴枪1800余支、骡马1300余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这之后，我军继续对分散流窜和隐蔽活动的零星散匪，进行分区驻剿，同时组织武装工作队和民兵，结合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工作，彻底摧毁匪乱的社会基础，以根绝匪患。

剿匪平暴实际上是我军与青马军事斗争的继续，是解放青海的继续。这场斗争捍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巩固了解放青海的胜利成果。在剿匪平暴斗争中，我党政军民也付出血的代价，仅1军就伤亡1000余人，超过了进军青海时的伤亡。

1950年9月下旬，1军暨青海军区召开了首次党代表大会。党代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党的委员会，我当选为党委书记。

这次党代会着重讨论了当前及今后“1军的任务是什么？”“工作重点在哪里？”

从青海解放起，上级赋予我们的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建设新青海，一个是建设国防军。这两个任务都很重要，但我们的工作方针应该以哪个为主呢？

有一些同志提出：“胜利了，建国了，敌人都被消灭了，今后没有什么仗好打，我们当然应该以建设新青海为主。”

另一些同志则提出：“军队就是要打仗的，我们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建设国防军。”

这两种意见争论得相当热烈。根据讨论的情况，我在会上作了《关于军党委的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意见的报告》，总结了自1947年8月党委会建立以来的军队建设、战斗、工作的情况，提出了今后任务的意见：

建设新中国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建设新青海是上级赋予1军的光荣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参加；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国内反动派和国际帝国主义是不会甘心其在中国失败的，千方百计要搞垮我们，不惜使用武力；我军是新中国的保卫者，必须时刻准备以武装的力量来保卫祖国，保卫经济建设，保卫人民和平安定的生活。“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不能放松。青海解放后，我们存在着一定的骄傲自满、轻敌麻痹思想，对逃窜散匪未趁热打铁、积极进剿，结果匪乱一起，被动出击，不分昼夜，不避风雪，军民均遭受部分损失，这个教训必须记取。

军党委在统一大家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我军的总任务是为建设正规国防军、建设新青海而奋斗。在这个总任务中，又以建设国防军为主。

1 军党代会结束以后，我们即奉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命令，派遣驻扎玉树的骑兵支队配合西南军区 18 军进行昌都战役。早已做好进军准备的骑兵支队于 10 月 2 日从玉树地区的巴塘出发，由北向南进军，人不离鞍，马不停蹄，直插昌都侧后，堵截住了企图西逃拉萨的大批藏军，与 18 军部队配合，迫使藏军主力 2700 余人全部放下武器投诚，打开了解放西藏的大门，胜利完成了昌都战役任务。

建设新青海

在青海解放的同时，1 军领受了“建设人民的新青海”的任务。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青海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素有“黄金青海”之美称。在旧制度的统治下，青海却又非常贫困落后。经济极不发达，交通格外闭塞，百业凋零，民不聊生。马步芳对青海各族人民肆意掠夺，用民脂民膏建筑起自家的安乐窝，而偌大的青海近现代工业几乎等于零。马步芳吹嘘的所谓“八大工厂”，实际上是只能生产一点皮革、火柴、肥皂等简单产品的八个作坊。省城西宁号称 6 万人口，实际不足 5 万。马家父子在逃离西宁时，对银行、公司、工厂进行了抢掠和破坏，用飞机劫运了大量的黄金、银元和珠宝。在农区和牧区，大批牲畜被马家军的散兵游勇抢走了，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十分困难。

我军解放青海，接收下来的只是一副破烂摊子。

青海解放后，我们在继续肃清反动残余势力、建立人民政权的同时，着手治理马步芳洗劫后的摊子，组织恢复生产。军管会和军政委员会设立了工业、财经、交通等部门，派出人员发动工人群众修复机器，清理场地，迅速将原有的工厂、作坊全部复工；组织贸易公司和银行平抑物价，遏制通货膨胀。新生的人民政府更是把组织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

1 军暨青海军区动员全体指战员积极参加建设新青海的伟大斗争。为了帮助人民政府解决财政收支的严重困难，部队自动停止开支，并继续承担从部队调到地方工作人员的供给，把节省下来的钱支持人民政府度过难关。

1950 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除西藏、台湾等处尚待解放、各地残余土匪尚待剿灭以外，已经基本结束，国家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已经开始。遵照毛主席关于军队参加国家建设的指示，根据上级赋予 1 军建设新青海的任务，军党委先后几次作出决定：除以一部兵力继续担负剿匪肃特、巩固社会治安之外，坚决执行生产建设任务。

针对一些同志嫌青海苦、不安心在青海工作的思想，我们在部队中普遍而深入地开展“热爱青海、建设青海”的教育，引导广大指战员既要看到旧青海贫穷落后的一面，又要看到新青海前景远大的一面；我军不但解放了青海，而且应该建设起一个欣欣向荣的新青海。

为了真正做到以青海为家，我和王尚荣副军长派了一辆吉普车把妻子孩子从古都西安迁来西宁，在青海安下家。指战员们树立起扎根青海、长期建设青海的思想，以巨大的热情投身到建设新青海的伟大事业中。

军党委组织了生产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的生产。1950 年开春，各单位立即掀起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和运输业为输的大生产运动。开垦荒地 76000 亩，播种 71900 亩，种菜 2490 亩，超额完成了每人生产 3 石小米的任务，喂

猪养羊，开小作坊 40 个，采金 200 余两，大大减轻了国家支出和人民的负担，也带动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我军抽调兵力，同人民群众一道修筑了平安渠、湟惠渠、人民渠，总长 63 公里，投入兵工 76789 个，可灌溉耕地 70000 亩。

我军组织勘察队深入荒无人烟的柴达木盆地进行勘察，抽调了 3 师 8 团的两个步兵连和骑兵团一个连组成先遣队开发柴达木，在那里种庄稼，种萝卜。

我军动员所有人员来植树造林，各部队自己修建营房，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我军抽调 2500 余人，仅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修复西宁飞机场，增建石质跑道一条。

1950 年 4 月 27 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给我军下达了修筑青藏公路西宁至黄河沿段、宁张公路西宁至大梁段两条公路的任务。

自古以来，青海高原上只有牦牛商队踏出的一条唐蕃古道，被人们视为畏途。青藏、宁张公路的修筑，对于建设新青海、支援西藏解放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们于 5 月 10 日向部队下达了筑路命令，先后抽调 1 师两个营、2 师三个营，3 师 8、9 两个团大部及军直特务营共 9000 余人，组成筑路大军，由王尚荣副军长担任总指挥，浩浩荡荡开上了筑路工地。

在青海高原上筑路，困难相当大。这里群峰相隔，江河阻断，有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雪山荒原，有—步一个水窝窝的草地泥泽，还有一镐一个白印的冻土层，天气变化无常，自然条件恶劣，工程艰苦危险。

筑路大军在数百里筑路线上摆开战场，搭起布帐篷，垒起铁匠炉，使用钢钎铁锤、铁锹大镐等简陋的工具，开辟着边疆国道。指战员们象执行战斗任务一样，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战胜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了保质保量，同志们主动提出口号：“一次修好，永保坚固！”“水冲不垮，车压不塌！”以对祖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精心施工，严格把关，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了任务。

在工程临近收尾时，我陪同西北军区副政委甘泗淇到筑路第一线视察，乘吉普车从西宁跑到黄河沿，检查工程，慰问部队。我们走过一处处险要地段，看到一个个艰巨的工程，深深地为英雄的战士所叹服。军区首长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甘泗淇联名发来嘉勉电：

“贺廖王吴转青藏公路全体同志，你们为了建设新玉树，配合西南兄弟部队迅速解放西藏，冒着恶劣气候，在恶劣的地理条件下忍受任何艰难困苦，赶修青藏公路。在筑路过程中，风餐露宿，雨雪交加，发挥了高度集体英雄主义的创造精神，同在战斗中杀敌一样，解决了历史所未曾克服的淤泥崎岖荒漠地区筑路的困难，为人民国家创造了建设的奇迹。你们这种革命的集体的新英雄精神，是值得全军学习的。我们特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并预祝早日胜利成功。”

在上级领导的鼓励和青海人民的支持下，筑路大军经过艰苦奋战，青藏、宁张两路段从 5 月初开工到 9 月初基本竣工，仅用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新建公路 400 余公里，砌筑大小涵洞 900 多个，为亘古荒原开辟出一条黄金路。

为了感谢筑路大军在开发建设新青海中立下的功劳，青海党政机关暨西

宁市各族各界人民派出慰问团深入工地，送来锦旗，上书：“开路先锋，人民功臣。”沿路各族群众也送来哈达等珍贵礼物，表示慰问。

青海省人民政府、青海军区于1950年9月24日作出决定，在日月山、三塔拉、鄂拉山、长石头山、大坂山等最为艰险的路段竖碑铭文。

贺炳炎、我、王尚荣、杨文安、吴融峰等共同题签了竖立在日月山上的纪念碑。日月山是历史上文成公主进藏和亲经过的地方，今天一条汽车大路把青藏高原变成通途，筑路英雄的业绩堪与日月同辉，山河共存！

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青海军民团结奋斗，迅速医治了旧社会的千孔百伤，使一个生机勃勃的新青海屹立在祖国的江河之源。

后 记

几年前，解放军出版社就约我写回忆录。写不写，开始我有些犹豫。因为与许多者同志相比，我的经历平凡，也没什么奇特之处。但是，当我想到战争年代我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艰苦曲折的斗争，所付出的血的代价，所留下的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老战士有责任、有义务把亲身经历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记述出来，以缅怀先烈，鞭策自己，激励后人。

在撰写的过程中，我遵照党的实事求是的一贯教导，力求在纷坛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写出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同时我要求自己，不突出自我，不局限于个人活动，而是努力反映：领导我们走向胜利的伟大的党，我投身54载的伟大的军队，养育我们的伟大的人民，给予我许多教诲、影响和帮助的领袖、英烈、战友们。我之所以从一个湘西农家儿子成为一名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士，完完全全是人民革命的时代风云所使然，个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此外，我在军队中长期担任政治干部，尽可能反映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政治工作优良传统，这也是我在撰写时注意的一过艰苦奋斗，青藏、宁张两路段从5月初开工到9月初基本竣工，仅用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新建公路400余公里，砌筑大小涵洞900多个，为亘古荒原开辟出一条黄金路。

为了感谢筑路大军在开发建设新青海中立下的功劳，青海党政机关暨西宁市各族各界人民派出慰问团深入工地，送来锦旗，上书：“开路先锋，人民功臣。”沿路各族群众也送来哈达等珍贵礼物，表示慰问。

青海省人民政府、青海军区于1950年9月24日作出决定，在日月山、三塔拉、鄂拉山、长石头山、大坂山等最为艰险的路段竖碑铭文。

贺炳炎、我、王尚荣、杨文安、吴融峰等共同题签了竖立在日月山上的纪念碑。日月山是历史上文成公主进藏和亲经过的地方，今天一条汽车大路把青藏高原变成通途，筑路英雄的业绩堪与日月同辉，山河共存！

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青海军民团结奋斗，迅速医治了旧社会的千孔百伤，使一个生机勃勃的新青海屹立在祖国的江河之源。个方面。

由于自己水平有限，上述愿望能否在这本回忆录中体现出来还很难说。偿若能体现一二，我就聊以自慰了。书中谬误之处，欢迎批评。

此书撰写时，李迎选同志收集资料、整理成稿，胡子克同志帮助修改，出版社的同志给予指导，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这篇后记完成时，正值我81岁生日。耄耋之年，回首往事，我为党领导人民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而无比自豪；瞻望前景，我对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

1992年11月14日

